

陳映真

思想與文學

●  
●  
下

編 蘇 陳  
淑 光  
芬 興



CHEN YINGZHEN  
VOLUME II  
THOUGHT AND LITERATURE

CHEN YINGZHEN: Thought and Literature - VOLUME II

在這個紛亂的大時代中，陳映真作為普遍性思想資源的力量更為顯著，無論他的人道主義與國際主義，以及第三世界的認同與關懷，都是面對所謂資本的討論，從既有的

極為迫切需要的精神資源。本書邀集來自東亞地區的思想者，重新開啟對於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揭示其開放性、異質性，及其內在高度的生命力。



01471396



9 789868 673533

ISBN 978-986-86735-3-3



港台書  
陳映真

思想與文學

[下冊]

CHEN YINGZHEN  
Thought and Literature  
[ Volume II ]

陳光興、蘇淑芬 編



- 發行人 周渝  
社長 徐進鈺  
總編輯 王增勇  
執行編輯 蔡志杰  
助理編輯 廖瑞華  
編輯委員 (依姓氏筆劃序)  
丸川哲史、王瑾、王增勇、白永瑞、汪暉、邢幼田、柯思仁、孫歌、許寶強、夏曉鵬、夏鑄九、馮建三、趙剛、翟宛文、Chris Berry、Gail Hershatter
- 顧問 (依姓氏筆劃序)  
丁乃非、于治中、王振寰、丘延亮、江士林、朱偉誠、呂正惠、何春蕤、李尚仁、李朝津、李榮武、林津如、陳光興、陳忠信、陳信行、陳溢茂、許達然、賀照田、黃麗玲、廖元豪、甯應斌、錢永祥、鄭村棋、鄭鴻生、魏均
- 榮譽顧問 (依姓氏筆劃序)  
王杏慶、成露茜、李永熾、吳乃德、吳聰敏、林俊義、高承恕、徐正光、梁其姿、蔡建仁、張復、傅大为、鄭欽仁
- 國際顧問 (依姓氏筆劃序)  
溝口雄三、蔡明發、濱下武志、Perry Anderson、Arif Dirlik
- 網址 <http://www.bp.ntu.edu.tw/WebUsers/taishe/>  
電郵 [taishe.editor@gmail.com](mailto:taishe.editor@gmail.com)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 6395 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 2634 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陳映真：思想與文學／陳光興、蘇淑芬編。--台北市：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出版；唐山發行，2011.11  
384面；14.8×21公分--(台社論壇叢書：17)  
ISBN 978-986-86735-3-3(下冊：平裝)  
1. 陳映真 2. 學術思想 3. 臺灣文學 4. 文學評論 5. 文集

863.07

100022444

台社論壇叢書 17

陳映真：思想與文學(下冊)

Chen Yingzhen: Thought and Literature (Vol.2)

- 編者 陳光興、蘇淑芬  
執編 陳筱茵  
封面設計 黃瑪琍  
策劃 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印刷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16巷1號  
電話 (02) 2236-0556  
發行 唐山出版社，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B1  
電話 (02) 2363-3072 傳真 (02) 2363-9735  
郵政劃撥 0587838-5，戶名：唐山出版社  
Email [tonsan@ms37.hinet.net](mailto:tonsan@ms37.hinet.net) 網址 <http://blog.yam.com/tsbooks>  
定價 370元 **NR**  
出版日期 2011年11月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唐山出版社更換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編輯說明：本書下冊之「附錄」簡要整理陳映真重要著作，收錄有人間出版社陳映真作品集15卷本(1988)，洪範出版社陳映真小說集6卷本(2001)、陳映真散文集1卷(2004)，北京三聯出版社《陳映真文選》(薛毅編，2009)。

本書上／下冊作者的引文出處，小說部分均統一為洪範出版社陳映真小說集1-6卷，評論雜文部分均統一為人間出版社陳映真作品集7-15卷、洪範出版社陳映真散文集1卷、北京三聯出版社陳映真文選1卷，並在文中隨文採小字簡註(篇名，出版卷集；頁數)。其他未收於「附錄」之陳映真著作則在隨文註腳中詳列出版資訊。

感謝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贊助部分編輯費用

## 上冊目錄

編案／陳光興	5
<hr/>	
【楔子】	
陳映真的核心政治思想／陳明忠	9
<hr/>	
輯一   文學史	
試論陳映真的創作與「五四」新文學傳統／陳思和	15
陳映真和「魯迅左翼」傳統／錢理群	51
抒情和現實之間／松永正義	67
歷史的廢墟、烏托邦與虛無感／呂正惠	75
討論與對話／黃佳璿、蘇淑芬錄音整理	111
<hr/>	
輯二   思想	
頡頏於星空與大地之間／趙剛	131
《悠悠「家園」》與〈忠孝「公園」〉／崔末順	201
「白色恐怖」的歷史心靈活動／王墨林	231
討論與對話／胡璣文、林家瑄錄音整理	245
<hr/>	
輯三   作家圓桌論壇	
陳映真小說中的死亡書寫／英培安	257
逃離陳映真？／朱天心	293
陳映真的山路／藍博洲	299
陳映真對我們意味什麼？／侯孝賢	317
陳映真的視野／韓少功	321
討論與對話／簡于鈞、蘇淑芬錄音整理	327

## 下冊目錄

### 輯四 | 實踐

---

- 陳映真與台灣的「六十年代」／鄭鴻生 343
- 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賀照田 381
- 陳映真在《人間》／王安憶 451
- 試談「九〇年代的陳映真」／曾健民 499
- 討論與對話／夏林清主持／張瑜珊、林家瑄錄音整理 535

### 輯五 | 第三世界

---

- 陳映真和馬華(民族)文學／莊華興 545
- 陳映真思想中民族主義與第三世界的重疊／白永瑞 557
- 陳映真和「第三世界」的政治／文化評論／王曉明 567
-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陳光興 575
- 討論與對話／翟宛文主持／詹亞訓、林家瑄錄音整理 633

### 輯六 | 綜合討論

---

- 盜火者陳映真／施淑 643
- 從拉斯基到陳映真／孫歌 647
- 2007/10/18／林思晴 657
- 喪父／陳幼唐 669
- 討論與對話／賴鼎銘主持／吳欣潔、林家瑄、蘇淑芬錄音整理 679

### 【後記】

---

- 「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會議」的故事／陳光興 695

### 【附錄】

---

- 陳映真重要著作 703
- 作者簡介 713

# 陳映真與台灣的「六十年代」

試論台灣戰後新生代的自我實現

鄭鴻生

## 國家劇院舞台上的陳映真

2004年9月18日晚上，雲門舞集的《陳映真·風景》在台灣最高的藝術殿堂國家劇院首演。林懷民將他在年輕歲月讀陳映真的小說〈將軍族〉、〈兀自照耀著的太陽〉、〈哦！蘇珊娜〉、〈山路〉等，所受到的感動與意象編成一齣舞作，再配上德布西(C. Debussy)的音樂、李臨秋作詞的台灣老歌〈補破網〉以及蔣勳的朗誦等做為背景音響。首演獲得很大的成功，結束後掌聲雷動，久久不止。報紙如此描述：

雲門舞集《陳映真·風景》昨晚首演，陳映真筆下台灣卑微的小人物，在舞台上迸發生命的力量。首演結束時，林懷民把玫瑰花束傳遞給坐在觀眾席的陳映真，陳映真紅著眼眶，三次起身致謝，巨大的身影在昏暗的聚光燈下，一如他的作品幽微卻隱隱含光。<sup>1</sup>

首演當場我遇到了不少像我這樣已過中年，頭髮開始花白，平常不會特意來看雲門演出的觀眾。他們這次都是衝著陳映真而來的，正

1 《聯合報》2004年9月19日頭版現場圖片說明。

如季季在一篇文章寫的：「林懷民把他的偶像陳映真，珍藏在心底40年，不時回味，左右推敲，終於在2004年的九一八，把陳映真的小說從幽微的角落，推向燈光明滅，車輪隆隆的舞台」。<sup>2</sup>這些中年觀眾就是來緬懷回味3、40年前初次接觸到陳映真小說時的感動。

這是個弔詭的場景。一個小眾菁英的、高文化的，又主要是成名於歐美的現代舞團，其整個呈現的氛圍與意義，顯然與陳映真後來旗幟鮮明所倡議的頗不搭調。然而，陳映真還是去參加了首演，接受了獻花，並且以其一貫的低姿態，紅著眼眶無語地向熱烈鼓掌的觀眾回禮。他後來還向記者表示「舞蹈不是戲劇」，他「完全尊重林懷民的詮釋」。

陳映真在1968年因社會主義信念而入獄，1975年出獄後繼續堅持，後來大家認識的陳映真幾乎都是圍繞在他所「明火執仗」的左翼大纛上。陳映真做為某種信仰與世界觀的代表人物，在台灣是寂寞的，被認為是一種過時的六十年代的激情與夢想。但是林懷民為他編舞這件事卻讓我感覺到，做為一種與生命貼近的行動召喚，他卻是不寂寞的，而有很多的追隨者與同道。譬如在前不久(2009年9月)舉辦有關陳映真創作50週年的一項活動中，贊助者趨勢教育基金會的陳怡蓁也坦言他們夫婦在1970年代末羈留美國工作時，因為讀了陳映真的〈夜行貨車〉，而毅然決定回台創業。<sup>3</sup>

陳映真的小說感動並影響了很多文藝青年，包括林懷民。這些人後來的思想與行動的出路是多樣的，大部分並沒能追隨他的政治信念，但當初都受到同樣的衝擊。我們或許可以說，陳映真六十年代的小說所蘊含的多面意義，遠遠大過他自己從那之後一直篤信的東西，而在這些多重影響之中，有一大部分已經不是他能期待、預見或掌

2 季季，〈林懷民的陳映真〉，收入《寫給你的故事》(台北：印刻，2005)，頁50-53。

3 陳怡蓁，〈向陳映真致敬〉，收入《人間風景·陳映真》(台北：文訊雜誌社，2009年9月)，頁4。

握。然而本文並非要來回答他的作品裡頭到底蘊含著什麼特別的思想（譬如左翼的或人道的理念），以及為何會有這麼豐富而多重的影響力（譬如林懷民如何受到影響）這類問題，而是試圖在另一層次，即生命實踐與時代背景的層次，來探討他的文學活動所代表的世代自我實現的意義。林懷民用現代舞來回味他當時的感動與詮釋，正可開啟我們這麼一個視野，重新來看陳映真在六十年代的這另一種意義。

當一個人在實踐時，就是拿他原來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望，來和身邊的現實世界碰撞，是與當下和在地緊密扣連的。而當一群人甚至一整個世代在進行集體實踐時，他們所碰撞出來的就可能是具有時代特徵的世代自我實現了。從這視野來看，任何文藝創作都可以是具有時代意義的實踐，甚至一個新的行業的生成與發展都可能具有這種時代意義，並非一定要政治或社會運動才稱得上實踐。

當然在歷史上最醒目的實踐往往是政治或社會運動，對中國而言一百多年來就表現在解決傳統與現代、外力與自主、保守與進步及威權與自由的各種矛盾上，其中充滿著理念與實踐在生命各個層次的辯證循環。而台灣的六十年代也基本上是這麼一個由理念到實踐的轉折期，陳映真的文學創作正是開啟這個世代實踐的重要代表。本文想探討的就是，他在六十年代對當時知識青年在實踐層次上的影響，及其作品與行動所反映出來的那個時代的知識青年，從理念到實踐的心志轉型上的意義。

台灣這批戰後出生，成長於1950、60年代的新生代知識青年，包括大專院校的學生與陸續出到社會的畢業生，以及更多期望進入大專院校的高中生，或沒能繼續升學的中學畢業生。這批能夠讀書閱報，接受文字信息的年輕人，他們的數目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與教育的普及而快速成長，到了六十年代已經形成一股不小的群體。

以台灣各級學校升學率來看，在我出生的1951年小學畢業生升



上初中的升學率是38.6%，我小學畢業的1963年增加到54%，到我大學畢業的1973年則增為83.7%；而1951年初中畢業生的升學率是57.3%，到我初中畢業的1966年則增加到75.8%。以全體國民的教育程度來看，中等學校以上學歷的人口在1952年只占8.0%，到了我升上初中的1963年是13.4%，而在1975年我退伍時則上升到30.6%。若以絕對人數來看也呈現急速上升的趨勢，1951年台灣從小學到大專等各級學校的當屆畢業生是16萬人，1963年增加到45萬人，到1973年更增加到近90萬人；其中當屆中等教育畢業生在1951年是3萬6千人，到我高中畢業的1969年則增加到27萬7千人；而在學的中等教育學生人數1951年是12萬8千人，1969年增加到102萬8千人，有7倍的成長率。可以說相較於日據時代，台灣在經過1950年代開始的普及教育後，到了六十年代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口確實已是個不小的群體。<sup>4</sup>

這一群體或許來自不同出身，但卻有著相當的自我認同，其中大部分人廣義而言可以歸入陳映真所細緻描繪的「市鎮小知識分子」這個知識階層，並且在國民政府的一體化教育下，省籍族群之分也漸減弱。這批知識青年的特質在於他們是台灣第一批接受現代中國教育的新世代，然而接受的卻又是兩岸分斷體制下的現代中國教育，這是其時代特徵。

這裡將台灣戰後接受中國教育的新世代以世代的概念來涵蓋，是有其歷史與時代意義的。蕭阿勤(2008)曾以「回歸現實世代」一詞來形容在1970年代開始進行政治與社會行動的台灣知識青年，他用「回歸現實」這個概念作為區隔的判準，將戰後台灣知識青年劃分為1960年代以前與1970年代以後的不同世代。本文想要闡述的則是不同的世代概念，其實對台灣戰後新世代的知識青年而言，1960年代與1970年代

4 以上資料來自《歷年度各級教育簡況》(教育部統計處，2008)與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經建會，1983)。

是同一時代的不同階段，而這兩階段的台灣知識青年除了年齡上的同輩差距外，就戰後重新接受國府的中國教育而言並無基本不同，在成長期有著共同而特殊的時代背景，只是要到1970年代的新形勢下，知識青年才有了政治與社會行動的實踐條件，而不能說1960年代的台灣知識青年不「回歸現實」。

若我們也用這種世代概念來涵蓋文學與思想的心智活動，則這個世代實踐早在1960年代之初就開始了，譬如陳映真的小說與許登源等人在「中西文化論戰」時的論辯文章。後文將對這點進一步申論，而這裡將先簡要地從台灣六十年代的這批戰後新生代知識青年的思想狀況，以及陳映真在其中所處的歷史角色談起。

### 六十年代台灣的思想狀況<sup>5</sup>

1970年代的台灣在思想上有個重大轉折。1975年8月一本政治刊物《台灣政論》出版了，雖然到了年底即遭查禁，卻是這個思想轉折的重大標誌。這本刊物的名稱有兩個意涵：「台灣」與「政治」，顯示了本土黨外新生代的首次政治集結。相較於1950年代政論刊物《自由中國》名稱的意涵，這是從「中國」變成了「台灣」，而「自由」變成了「政治」。自1960年《自由中國》停刊之後，《台灣政論》是15年來第一本成氣候的政治刊物，雖然只出了5期就停刊了，但它的出版不論在政治上或意識形態上都是劃時代的。「台灣」與「政治」這兩樣東西在1975年之後的30多年來，成了台灣社會的兩大主導意識，也是兩頂金鐘大罩。

要理解這麼一個轉折，必須回到3、40年前的情境，尤其回到那

5 本節關於台灣六十年代思想狀況的內容，請參閱鄭鴻生(2006b)〈台灣的文藝復興年代：1970年代初期的思想狀況〉，或其精簡版(2006a)〈台灣思想轉型的年代：從《送報伏》到《台灣社會力分析》〉。

段從1960年《自由中國》停刊，到1975年《台灣政論》發行的這15年間的狀況。這15年正是如今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當權的戰後新生代思想成長的年代，以下我們就以延長了的「台灣的六十年代」來泛稱這段基本沒有政治刊物的15年。本文提到台灣的「六十年代」蓋指1960至1975年的這15年。<sup>6</sup>

台灣的六十年代是個「文藝復興」年代。相較於西方文藝復興從神權籠罩下解脫，台灣則是從1950年代嚴厲肅殺的禁制中鬆綁，而出現了創作與出版的榮景。那時不僅冒出很多新的出版社，像文星、水牛、志文等，大量出版新書與叢刊，包括在地的創作與外文的編譯，更有很多大陸遷台的老出版社，如商務、世界、中華等，也將他們在1920、30年代大陸時期的老書大批翻印出版，譬如商務的「人人文庫」涵蓋了大陸時期那2、30年間的各種思潮與論戰。如此新老書店如雨後春筍，一套套文庫接連出版，有如一場思想的盛宴，帶給當時的青少年巨大的啟蒙。這些書都是以成熟了的現代白話中文在論述辯駁，構成台灣戰後新生代的思想資源，本省子弟在這段期間藉著大量閱讀這些作品，培養出更上一層的現代中文的語言、思考、論述與創作能力。

這是個台灣文藝豐收的時代，不僅大陸來台的青年作家開始大量創作，掌握了現代白話中文的新生代台灣青年文學創作者，也如雨後春筍，紛紛冒芽，甚至長成大樹，創作出大量文藝作品。除了接二連三出版的文學刊物《筆匯》、《現代文學》、《文學季刊》、《純文學》外，報紙副刊像早期的「中央副刊」和林海音主持的「聯合副刊」，都提供他們創作的園地。這個時代產生了陳映真、黃春明、季季、施叔青、王禎和、七等生、李昂等本省作家，開創了後來稱為鄉土文學的流派，引發風潮，成為1970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的文本基礎。

6 「六十年代」一詞在本文專指從1960至1975年這15年，而1960年代、1970年代等提法則指涉一般使用的10年為期的年代。

六十年代是五四運動在台灣重新演練的時代。作為中國現代革命重要一環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在出版物與思想上經由像「人人文庫」這類叢書在台灣重新出現，還藉著《文星》雜誌的「中西文化論戰」，讓當年的中國現代化路線之爭在台灣重演一遍，有若一場為台灣新生代所辦的中國近代史的補課。李敖等人當時以全盤西化派的姿態及潑辣的文筆挑戰對手，他們的觀點與視野雖沒超過大陸時期，而且其中也充滿各自隱諱的政治意圖，卻無損於這是一次中國現代化議題的實質論辯，無損於這是一次台灣遲來的五四的重演，即使這些補課與排演都必須限制在當時的親美反共的思想框架之內，只能涵蓋到五四豐富意義中的有限面向。

而這時就已經有不少戰後新生代的本省籍知識青年，能夠純熟地運用國語來書寫與論辯了。諸多參與「中西文化論戰」的殷海光弟子都是本省人，如許登源、何秀煌、洪成完等。他們雖非論戰主角，但都能洋洋灑灑、下筆成章，運用中文的邏輯思辯能力，比起多是大陸渡台知名學者的對手如胡秋原、徐復觀等，毫不遜色。在這裡，論辯的結果與是非暫且不論，台灣新生代知識青年能無礙地以現代白話中文來思辯與論述，確是有著十足的世代實踐意義。

以「文藝復興」之名來稱呼台灣的六十年代或許過譽，但這裡要強調的是，在經過嚴厲肅殺的1950年代之後，台灣人的戰後新生代藉著學會國語，重新掌握了語言工具，可以大量閱讀1920、30年代以降的各種中文書刊。（鄭鴻生，2007）相較於在日據時期成長的他們父母那輩人，歷經過日本帝國皇民化運動與國民政府粗糙的語言政策交相的禁制與割裂而變成失語的一代，台灣戰後新生代重新掌握了語言工具，而在因緣際會的六十年代出版榮景中可以閱讀論述。於是這些新出的創作與翻版的舊書、這些與文化論戰相關的各種論述與翻譯，包括李敖與殷海光的一系列著作，構成了台灣六十年代知識青年從中

學到大學的思想成長背景。

六十年代又是冷戰時期美國文化開始全面影響台灣的年代，歐美青年那時的各種叛逆之舉如反越戰、民權、嬉皮、搖滾樂及新潮電影大量傳入。台灣青年在經過「文藝復興」的洗禮同時，也如饑似渴地接受全球性青年造反風潮的感染。加上台灣是美國圍堵社會主義國家的冷戰前哨，駐台美軍與來台休假的越戰美軍也帶來一番美式風光。全部使用英語廣播的美軍電台(ICRT前身)更是青年學子聆聽「上國之音」的重要頻道，而其中有不少是帶著叛逆因子的西洋熱門音樂節目。因此歐美青年運動除了帶來政治方面如反越戰與民權運動的衝擊之外，還有著文化方面的深遠影響，經由音樂、書刊、影像的傳布，美國青年的「反文化」運動，從花童、嬉皮、搖滾樂到嗑藥等等思潮，也感染了這個年代的台灣知識圈。與此同時，以「西化」為內容的「現代化」在年輕人心目中遂戴上了神聖光環，以美國為標竿的全球化思想基石「現代化理論」，也在台灣的知識界開始發聲。

陳映真1967年的小說〈唐情的喜劇〉頗為經典地描繪了台灣六十年代的知識圈受到西方思潮衝擊，及對歐美現代性熱烈追求的情景。小說女主角先是遊移於兩位本土青年思想大師之間，其中一個搞邏輯實證論，一個搞存在主義，都是當時台灣的思想顯學。而她最後的歸宿卻是一個美國大軍火公司的科學家。邏輯實證論與存在主義最後都抵不過美國的全球化大企業，及其背後的現代化理論。

而台灣的六十年代這15年也大約就是陳映真從1959年開始創作，1968年入獄，到1975年出獄的這段時間，正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階段。當他在1975年出獄時，台灣的裡裡外外卻有了極大的變化。除了《台灣政論》的出刊所揭示的一個新的內在動力之外，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在1972年2月訪問北京，更是啟動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局勢。

這是個「中國」之名在台灣開始失去光環的年代。在中西文化論戰與現代化理論的接續衝擊下，中國傳統變成是與黨國威權綁在一起的落伍之物。攻擊傳統的李敖與斥罵「中國醬缸文化」的柏楊，他們的著作都是當時知識青年的精神食糧。而且在六十年代冷戰與親美反共的現代化意識形態的交相影響下，現實的中國則一直是被醜化的怪物，當時大陸上的中國人不是「匪幹」就是「苦難同胞」，兩者都呈現出模糊不清的疏離面貌。然而在1971年底國府退出聯合國，接著1972年春尼克森訪問北京之後，台灣失去代表中國的名分，國民黨就此開始失去政權的法統正當性，而這正是台獨意識在部分新生代青年中萌芽茁壯的時機。

總的說，中國20世紀上半期的各種現代化運動在台灣六十年代的部分重演，一方面是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補課，另一方面卻又孕育了台灣民族主義的思想基因。這種自我悖反的情況，只能用辯證思維來理解，1970年代後台灣的思想轉折正是這個辯證發展的結果。

## 社會意識在台灣的重建

在這思想有如天馬行空又詭譎多變的六十年代，陳映真小說的出現有著多重意義，其中社會意識在戰後台灣的重建與傳承最為顯著。

1968年春天我讀高二時曾參加一位學長組織的地下讀書會。那時正是升學的聯考制度籠罩青年學生一切活動的年代，我們這些膽敢搞讀書會讀課外書的自然有些較為叛逆的文藝青年，不僅不用聯考對個人前途的重要性，還無視於思想管制的眼線。而我們這個讀書會第一次討論的就是兩篇文學作品：陳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以及張愛玲的〈留情〉。張愛玲以其1940年代上海時期的作品在台灣重新現身，而陳映真的作品則是以那時台灣當下在地的氛圍，同樣吸引了諸多文藝青少年。



我們在讀他們的小說時，也在讀著他們的時代意義。與此同時，我們也熱衷於法國前衛電影、聽Joan Baez與Bob Dylan的抗議歌曲、汲取美國民權與反戰運動的養分。而陳映真作品中極為濃厚的社會意識更讓我們深受感動，他在1968年入獄前的小說與論述，對那一代的文藝青年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從〈我的弟弟康雄〉開始，他筆下「市鎮小知識分子」內心充滿進步理念卻拙於行動的蒼白形象，與屠格涅夫(Turgenev)筆下像羅亭(Rudin)那樣的角色相互映照，一直在我們這些知識青年的敏感心靈裡隱隱作痛，難以擺脫。舊俄的小說也在六十年代的台灣風行，大陸時期翻譯的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托爾斯泰(Tolstoy)等人的作品，隨著那時的出版榮景紛紛翻印出來，為六十年代的台灣披上了1930年代的大陸氛圍。從19世紀末的舊俄知青，到1930年代的大陸知青，最後是六十年代面對威權體制的台灣知青，那種心境竟然可以一脈相承。而陳映真充滿深刻內省的作品，就在直接呼應這條時代的傳承，深深吸引住心中有所醒悟，卻自覺無能於現實處境的台灣青年學子。

陳映真所鋪陳出來的，不僅觸及當時知識青年的敏感心靈，還從生命層次去呈現社會主流的偽善與欺罔。然而他並沒有耽溺在這種「蒼白、憂悒」與自省的境地裡，他的小說不只傳達給讀者一種對卑微困頓者的悲憫胸懷，也透露出一種對人間現實與真相的清澈洞察。不論是〈淒慘的無言的嘴〉裡逃亡的雛妓、〈將軍族〉裡那兩位苦命卻莊嚴的男女主角、〈六月裡的玫瑰花〉裡的黑人軍曹與台灣吧女，〈兀自照耀著的太陽〉裡那個礦區小鎮的醫生家、〈第一件差事〉裡找不到心靈出路的胡心保，還是〈最後的夏日〉裡那個失戀扭曲的外省教師裴海東，甚至〈唐倩的喜劇〉裡的女主人翁，從陳映真筆下流出的不只是「哀矜勿喜」的胸襟，而且也是超越族群，既不分黑白人種，也不分本省外省的清澈視野。陳映真的小說從蒼白憂悒走向清澈洞察，他自己在1975年出

獄後如此回顧：

在一個歷史底轉型期，市鎮小知識分子的唯一救贖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實踐行程中，艱苦地做自我革新，同他們無限依戀的舊世界作毅然訣絕，從而投入一個更新的時代。（〈試論陳映真：《第一件差事》、《將軍族》自序〉，人間版作品集9：頁9）

我們當時並不清楚陳映真因何入獄，對他在1968年進行實踐的內容也一無所悉。然而陳映真的小說，以及更廣義的說同一時代的黃春明、王禎和及後來引發論戰的「鄉土文學」作品，共同呈現一種對卑微、流離、困頓、扭曲的人類處境的關懷與洞澈，共同傳達一種十分激進（以陳映真語彙言「新而徹底」）的信息。這種對主流觀點的質疑與批判、對其偽善與欺罔的鄙視、對各種壓迫的不妥協、對理想的認真與執著，並且超越自我本位去認識人間真相的新而徹底的視野，在陳映真的小說裡出現得最早，表現得最強烈，吸引了不少當年的知識青年。

陳映真的六十年代小說從〈麵攤〉開始就強烈隱含著左翼的信息<sup>7</sup>，但因時代條件而沒能明白言說，他政治理想的眾多追隨者也都沒能清楚讀出，直到最近才由趙剛鞭辟入裡地闡述出來。<sup>8</sup>雖然他在入獄前的小說沒能明白說出左翼的政治理念，但其社會意識之濃烈與自我反省之深刻，足以讓讀者自行將他連上魯迅。這在當時有著一個承先啟後的意義：一個在1950年代遭到肅清的台灣左翼傳承，在這裡藕斷絲連

7 見趙剛(2009b)〈理想的心，慾望的眼：重讀陳映真的第一篇小說〈麵攤〉〉。

8 見趙剛，〈青年陳映真：對性、宗教與左翼的反思〉，發表於「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會議」（2009年11月，新竹：交通大學），此篇文章改寫為〈顛顛於星空與大地之間：左翼青年陳映真對理想主義與性／兩性問題的反思〉一文，收入本書上冊。

被神秘地接上了，而被掩蓋了的五四的左翼傳承也透過這麼一種連結呼之欲出。他在六十年代的這個文學實踐帶給尋找「救贖之道」的進步青年極大的啟示。

陳映真的這條承先啟後的線索如今較為清楚，也有不少論述。以上主要在概略描述台灣六十年代的思想大背景，以及陳映真在左翼傳承上承先啟後的歷史位置。有了這個背景的理解，接下本文主要探討的不再是陳映真明火執杖所代表的左翼影響，而試圖去發掘他在六十年代的另一種意義，即是台灣戰後新生代如何透過實踐來進行世代自我實現的這個面向。

### 政治行動做為新生代的一種實踐形式

當我在1970年來到台大哲學系時，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與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還是系裡的兩大思想主流。邏輯實證論在六十年代台灣知識圈的風行，離不開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這套當時在西方已漸過時的顯學，成了他用來批判政治威權的強大武器，對青年學子發揮重要的啟蒙作用，打破了舊有的神話、傳統與偶像。這麼一套企圖要取消西方傳統哲學所有命題的全盤性思想武器，十分投合當時激進的知識青年，用它來反抗以文化道統自居的威權當局。殷海光不僅引介邏輯實證論，還大力推介自由市場派個人主義大師海耶克(F. Hayek)。維也納出身的另一名大將波普(Karl Popper)的「開放社會」論也同時風行。這些結合政治、經濟與哲學於一爐的思想體系，竟能在台灣的知識青年中蔚為風潮，成為顯學，其複雜的內涵是否真被讀者所理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可以用來作為思想批判的有力武器。

作為思想的武器，存在主義也成了當時台灣知識圈的另一門顯學。存在主義從「存在先於本質」的立論出發，反對任何先驗的理念加

諸個人具體存在的種種精神束縛。這套與邏輯實證論並不搭調的歐陸哲學思想，主要在文藝圈作為一種苦悶時代的文學思潮在流行，譬如英年早逝的醫學院學生王尚義所寫的《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與《野鴿子的黃昏》這兩本書，就風靡了多少青年學子。<sup>9</sup>存在主義在台灣雖然大半以文藝創作來呈現，但也少不了哲學界的參與，台大哲學系的陳鼓應即是其中大將。而陳鼓應卻又是殷海光的親近弟子，陪著他走完生命的最後階段。殷海光與陳鼓應的親密師生關係，可以用來理解這兩套扞格不入的哲學理論，為何在六十年代的台灣會一起被用來作為反抗威權體制的思想武器。

如果說思想主要是被拿來當成現實的工具，那邏輯實證論與存在主義這兩套流行思潮在1970年代的退潮，也就可以理解。來到1970年代，此時對岸文革熱潮已過，越戰步入尾聲，歐美青年的各種反對運動也各自收尾，但是台灣還能感覺到外頭這些運動巨大能量的餘溫。因此雖然六十年代的反叛旗手都已不在，陳映真在1968年身繫囚籠，殷海光在1969年去世，李敖被軟禁且接著在1971年也步入牢籠，很多曾在六十年代搖旗吶喊的人也都出國或躲入學院，而台灣卻進入了轉型的時刻。

新的局面以一個愛國運動來開始，「保衛釣魚台運動」在1970與1971年接連爆發於北美洲與台灣的大學校園。<sup>10</sup>這是一次純粹的政治行動，學生重提五四運動的口號「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要求當局在釣魚台列嶼的問題上不能屈服於美日強權。

9 可參見王尚義的《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台北：文星，1963)和《野鴿子的黃昏》(台北：水牛出版社，1966)。

10 關於「台灣的保釣運動」(1971至1973年)請參閱鄭鴻生的《青春之歌》(台北：聯經，2001)。

在台灣這個政治運動雖然局限在大學校園裡，卻有著不尋常的時代意義。台灣的保釣運動最熱烈的是在台灣大學，而其中最積極參與的即是這些有著殷海光傳承的哲學系年輕師生，而這批人又多是在這之前曾熱切捧讀過陳映真的小說，並被深深衝擊過，如同北美保釣運動的多位發動者。

當時在台大啟動保釣運動的除了港澳僑生外，就是學生刊物社團《大學論壇》社。論壇社當時的成員主要來自兩個高中學生刊物社團，一個是《建中青年》社（台北建國中學），包括論壇社社長錢永祥；另一個是《南一中青年》社（台南一中）。錢永祥在高中時就深為陳映真作品裡豐富的社會意識與實踐精神所震撼，而南一中這批學生，包括上述我高中時參加過的那個讀書會的成員，也同樣地都曾被陳映真的作品所深深感染過。這兩批高中生曾在1968那年南北串連，湊在一起，後來上了大學又聚到這個《大學論壇》社來，而其中有多位還是哲學系的學生。有著這麼一個淵源，來到1970與1971年之交釣魚台事件發生時，這批吃過陳映真奶水的學生遂被這一事件所驚醒，並且抓住這一足以引發變革的實踐契機而參與發動台大的保釣運動。

從保釣運動開始，過去只能在文學與哲學上尋找精神出路的知識青年，如今驟然轉到在政治與現實社會中尋找出路，十多年來所積累各種精神與思想能量，逐漸匯聚到保釣運動及其衍生的政治與社會行動上了。在保釣運動爆發後的台大校園，學生越過了愛國運動的局限，轉而要求校園民主，並進一步批判政治體制。同時也興起一股「走出大學象牙塔」的風潮，有不少學校成立社會服務社團像慈幼社，名目上是走出校園去扶助社會弱勢者，實質上卻起著重新認識自己社會的作用，有如當時大陸的「知青下鄉」。整個校園一反過去沈浸在抽象理念與男女愛情的氣氛，而進入一個「要能在此時此地實際做出什麼」的精神面貌。

這種對社會實踐的要求在1960年代後半已見端倪，尤其呈現在陳映真入獄前以許南村為筆名所寫的一系列評論上。他在1968年發表於《文學季刊》的〈最牢固的磐石〉一文中，以受到存在主義與邏輯實證論影響下的知識圈對黑澤明(黒沢明)電影《紅鬍子》(赤ひげ)的冷淡反應為例，說明我們的社會需要一種從現實出發的素樸理想主義。(〈最牢固的磐石〉，人間版作品集9：頁113-123)黑澤明在《紅鬍子》裡用很平白的手法描寫一位醫生的人道精神，因而被譏評為既缺乏前衛新潮，又是「老掉大牙的人道主義」。為此，陳映真指出這些以複雜高深理論為藉口，犬儒地拒絕理想主義的人，只是在維護其既得利益，維護社會的既定地位。當時有人質疑說理想主義具有欺罔性，他則認為只要站穩了正義的立場，理想是得以實現的。唯有在現實社會中進行實踐，才可能站穩正義的立場，不致迷失，而這個「真理的倫理條件，便是理想主義得勝的最牢固的磐石」！這篇評論對於當時身陷令人目眩神搖的西方理論迷宮中的知識青年，可說當頭棒喝。這種對實踐的呼喚確實啟發了不少人，而小說家陳映真寫起評論這件事也正代表著一種實踐的轉移。

陳映真在他入獄前發表的〈最牢固的磐石〉這篇文章，被我們這批在1971年春發起保釣並開始尋找另類出路的台大學生，奉為經典捧讀再三。在接著的1972年底台大「民族主義論戰」中，我還將這篇文章摘取精華，改頭換面，以〈理想主義的磐石〉為題，以許南村諧音「喃春」為名登於學生報刊，用來辯駁對手。在1973年初春的「台大哲學系事件」爆發後，我又將他的另一篇評論〈知識人的偏執〉稍做剪裁後，以「秋木」為筆名登出來。如今想起，雖然陳映真入獄前的作品裡頭毫無半句左翼用語，但已是飽含社會主義的思想因素，確實構成了保釣運動時期我們這批學生的重要思想資源。

我的這種將陳映真當成「左翼專屬」的心情，向來是大部分左翼人士的共同感情，我一直要到世紀之交才陸續被各種來自五湖四海開始



湧現的陳映真迷，包括本文一開始提到的林懷民、季季、陳怡蓁等這些朱天心所說的「秘密黨員」，他們所呈現的對陳映真的多重感受面向所驚醒。而這個也即是我寫作本文的動機所在，試圖卸下我對陳映真向來的「左翼專屬」心情，來理解他在六十年代超乎左右、更大更廣的時代意義。對於左翼而言，他是黑暗時代的一線光明與星星之火，而我想從這一線星火中引伸出一個較為光明開闊的視野。因此本文論述的基本重點不只在於陳映真對台灣的左翼影響及其階級面向，而更在於他對戰後台灣青年世代起到驚蟄作用的實踐啟示。

這些對社會行動的心理要求，當年在一些知識青年中逐漸積累著，終於在保釣運動及其後續的民主抗爭與社會關懷中爆發出來，直到今天台灣政治上的紛紛擾擾都起自於那個時刻。知識青年會有從理念到實踐的心志轉型，除了愛國、自由、正義這些觀念本是較具號召性的旗幟外，又有著更深更廣的時代意義。如果我們把社會實踐作為一種世代生命的自我實現來理解，這是戰後新生代對其當下與在地的生命空間，不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的，所提出的行動要求。是新生代在六十年代接受了這麼多民族的、哲學的、文學的上層抽象理念之後，所爆發出來對生命的自我實現的要求。

如此，自我實現就不只限於政治或社會領域，不只出於被某種抽象的主義或崇高的民族所召喚而發的行動，而是任何與當下和在地扣連緊密的作為。後來稱之為「鄉土文學」作家的陳映真這一代，雖說他們所創造的豐富文學作品所使用的語言，是台灣人在光復後才學會不久的現代白話中文，就是一個當下而在地的文學創作實踐。甚至在鄉土文學之後知識圈對楊逵的抗日文學、陳達的吟唱、洪通的素人畫、朱銘的雕刻等的發掘，都與在地實踐息息相關，而從保釣開始的一連串政治社會行動也是這個戰後新生代自我實現的一個面向。

以這個擴大的陳映真視野來回顧那個年代，我們就可以來考察

另一個世代實踐之例：1970年代「唱自己的歌」的現代民歌運動。

## 另一個實踐場域——民歌運動的發展脈絡

正當《台灣政論》1975年出刊前後，台灣開始了一場現代民歌運動，這個「民歌」並非來自民間傳唱、沒有作者、也無固定樂譜的民謠，而竟是知識分子自行定義的「自己創作，唱給自己聽」的歌，尤其大半來自大學校園及知識青年群體，因此後來又叫「校園歌曲」。知識青年自己創作的歌謠竟叫民歌的這種名不符實的狀況，必須從在那之前大家唱些什麼歌及其唱歌的心情與環境來理解。而這與六十年代陳映真所代表的新生代自我實現的社會實踐又有何因緣？先讓我們簡單回顧它的歷史背景。

整個1950、60年代，台灣民間傳唱的歌曲主要就是國台語流行歌。國語流行歌承接大陸時期上海周璇、白光的歌謠繼續發展，到了六十年代由於作曲者少，需求量大，就大量引入國外流行歌曲的旋律（大部分日本與少數西洋與韓國歌曲），填上中文歌詞由歌星傳唱。台語流行歌則淵源於台灣民謠以及日據時代的流行曲，到了六十年代也因作曲者少的同樣原因，而大量引入日本流行歌曲來填上閩南語歌詞。

當時民間對流行歌曲的大量需求，部分來自一個物質條件的變化，即是電晶體收音機、電唱機以及33轉長時間LP黑膠唱片的問世與量產。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從都市到鄉村的街頭巷尾莫不充塞著國台語流行歌，有來自店家招徠生意的，有來自敞開大門的住家客廳的，甚至從村子的公眾廣播器傳出的。唱流行歌是當時平民百姓的兩大娛樂之一，另一個是看電影。

處於這種民樂飄飄處處聞的氛圍中，戰後新生代的知識青年心情是頗為複雜的。在學校的音樂與道德教育裡，那些老是糾纏在男女愛

情或兄弟義氣的流行歌蓋屬低俗的靡靡之音。而且當時流行歌曲演唱者也確實尚未完全脫離舊時演藝工作者的社會位階，還帶著「戲子」的遺痕。我們這批新生代從小在學校就被教導著不要聽這些靡靡之音，接受過日本教育的我們父母輩也對這類歌曲嗤之以鼻。學校裡教的除了愛國歌曲外，就是藝術歌曲了。這些歌曲源自西方古典音樂，又多是1930、40年代的創作，缺乏時代的脈動。

然而真正存在於愛樂青年心裡的，卻又有著另一番音樂世界的圖像。首先西方古典音樂當然是最高級、最值得追求的，但卻又不那麼親近悅耳，難以朗朗上口。另一個選擇就是西方流行音樂，尤其是英文流行歌。這雖然也被正統音樂工作者及道統維護者歸類為通俗、膚淺甚至崇洋，卻由於它是以英美排行榜的方式被介紹進來，而有了「西洋熱門音樂」之名，彷彿這樣就與國台語流行歌有所區隔了。的確是有所區隔，這些歐美流行歌對知青而言確實是比國台語流行歌位階要高，因為它是用英文這個上國語言唱出來的，當然就大不同於被官方認定為靡靡之音的國台語流行歌了。何況，這些洋歌又確實有著豐富的旋律與多樣的風格，那般悅耳動聽，遂成了知識青年都要能哼上兩句的自我標籤。

台灣在六十年代大量引入西洋熱門音樂的同時，如前所述也是大量引入西方思潮的年代。而就在這種洋歌的氛圍中，六十年代歐美社會的反戰、反體制、爭民權的抗議民歌，以及富含叛逆因子的搖滾樂，也藉由這麼一個管道大量流進台灣的大學校園。甚至隨著知識青年思想的躍動，也成了時髦與啟蒙的音樂。胡德夫曾如此回憶：「這些歌在那個時代真的是很啟蒙我們，一首明明是反戰的歌，但是它歌出來的是花，是飛鳥，是海豚，是子彈大砲，是墳墓，卻可以直接的撼動我們」。<sup>11</sup>英文裡的folksong翻譯成民歌，而不是民謠，飽含著這個

11 蔣勳對談胡德夫，〈從「美麗島」看到「美麗的稻穗」〉，載2006年4月《印刻文學生活誌》

時代意義。這是六十年代大學校園的音樂氛圍，愛樂青年或者一心鑽進西方古典音樂的高塔，或者就唱著 Beatles、Bee Gees、Bob Dylan 與 Joan Baez。社會上那一片「靡靡之音」不太進得了校園，學生開舞會播放的大半是洋歌。

以上是這個現代民歌運動開始前大致的狀況。然而隨著 1970 年代開始的整個知識青年心志上的轉型，唱什麼歌這件事也烙上了時代印記。帶著政治警覺的學生以保釣運動及衍發出來的民主抗爭與社會關懷，來展現他們的實踐。而愛樂的青年夾在這個西方古典音樂、西洋熱門音樂以及國台語流行歌之間，隨著 1970 年代從《台灣政論》開始的政治動盪，他們則以「唱自己的歌」來進行他們的世代實踐。

愛樂者的這個自我實現是從洪小喬開始的<sup>12</sup>，她在 1971 年開始拿著一把木吉他，在《金曲獎》電視節目上彈唱包括自己創作的歌曲，吸引不少知識青年甚至長一輩的專業人士。大家心照不宣都很清楚這是有別於流行歌的、比較符合知識分子身分的、有「文化格調」的東西。接著有一群年輕人如胡德夫、楊弦等人就在新興的「民歌餐廳」裡，拿著木吉他自彈自唱起來，還自己譜曲作詞，這很清楚是受到西方民歌手的啟發。1974 年李雙澤還為胡德夫在國際學舍辦了一場演唱會，以卑南族歌謠〈美麗的稻穗〉做為演唱會名稱。到了 1975 年楊弦的「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有如「辛亥革命第一槍」，被認為是正式啟動了這麼一個集體的創作衝動。這個當時被冠以「中國現代民歌」的運動不僅吸引來很多年輕音樂工作者，還有不少有地位的文學家像余光中的大力贊助，不少他的詩作也被譜成歌曲傳唱，成為這運動的一部分。這個接合民謠風格與文學創作的民歌運動，獲得西洋熱門音樂節目主持人

第 32 期。

12 本節關於台灣 1970 年代現代民歌的發展，請參閱張釗維，《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台灣現代民歌運動史》（台北：滾石文化，2003 年 10 月）。

陶曉清在廣播電台熱心引介，並在節目裡建立排行榜。在電台的推波助瀾下，這些「民歌」開始吸引知識青年。

這個「唱自己的歌」運動當時又有著另一股動力，竟是來自對陶曉清的挑戰而開始的。1976年底位於淡水河口的陳映真的母校淡江文理學院（淡江大學前身），舉辦了一場「以西洋民謠為主」的演唱會，輪到代替胡德夫上場的淡江校友李雙澤時，他一手拿著吉他，另一手拿著可口可樂上台，當著主持人陶曉清的面質問大家為何喝的還是可口可樂？唱的還是洋歌而不是自己的歌？隨後他就在來自台下「我們有什麼自己的歌可唱」的質問下，在台上唱起〈思想起〉、〈補破網〉、〈雨夜花〉等台灣民謠與老歌，以及〈國父紀念歌〉和〈Blowing in The Wind〉，引來台下噓聲與掌聲兼有的反應。事後李雙澤念念不忘「無自己的歌可唱」的質疑，遂開始創作歌曲。這個史稱「淡江事件」開啟了李雙澤這一系，與《夏潮》雜誌有關的「唱自己的歌」的路線。這個帶著夏潮色彩，倡議知識青年應該走入民間、關懷弱勢的民歌路線，深深吸引胡德夫、楊祖珺，還有其他民歌手。他們在那幾年除了開了幾次公開演唱會，包括紀念早逝的李雙澤（淡江事件一年後他在淡水海邊因拯溺而亡）的紀念會外，楊祖珺也走入弱勢社群如收容雛妓的廣慈博愛院以及工廠廠區去教唱，胡德夫後來甚至全身投入了原住民運動。這一系帶著左翼色彩、關懷社會弱勢、反對國內外強權的民歌手，其實是更符合美國抗議民歌的傳承。而這麼一種帶著抗議精神的民歌運動，在政治衝突升高的1970年代末，也就不免被當局封殺了，卻也留下了〈美麗島〉、〈少年中國〉、〈老鼓手〉等多首經典名曲，及其充滿著陽光的抗議精神。

「中國現代民歌」與淡江／夏潮的抗議民歌這兩個看似對立的資源，在1970、80年代之交的政治動盪中被新生代的商業機制接收，並以「校園歌曲」名目現身。這個校園歌曲之名確實較為符合這批新生代

唱自己的歌的屬性，那是屬於整個戰後新生代知識青年自己的歌。〈少年中國〉一曲的作詞者蔣勳那時說道：

幾年前被帶動起來的「中國現代民歌」運動，不斷發展，有更趨熱烈普及的現象，我對這個運動的名稱略有意見，把它改為「校園歌曲」。「校園歌曲」的成員絕大部分是非音樂科系的大學生，在他們愛好音樂的成長過程中，西洋熱門歌曲成為他們主要的模仿對象。「校園歌曲」的出現，說明了幾方面的意義：

第一，對英語熱門歌曲在校園氾濫的反省。

第二，對學院音樂與社會脫節的抗議。

第三，提高目前商業性流行歌的素質。<sup>13</sup>

這是他在1979年為新格唱片所出的楊祖珺第一張專輯所寫的話，把這個「現代民歌」與「抗議歌曲」的互相轉化搏成，而最後以商業機制「校園歌曲」出現的歷史，作了簡要的詮釋。而楊祖珺那時的經歷也很可作為這一段歷史演變的註腳，她既參加過現代民歌的演唱會，也是李雙澤歌曲的傳唱者，最後經由新生代的唱片公司發行第一張專輯。

然而「校園歌曲」終究不過是策略上的暫時名稱，用來與當時的國台語流行歌有所區別，以便在其萌芽階段能得到主流的認可而存活，更重要的是能得到日漸擴大並有消費能力的知識階層的欣賞。因此不出數年，在這一批新起的音樂工作者中，就產生了像羅大佑、蘇芮等風靡整個華人世界的新歌手，這時也就不再有「校園歌曲」之名了。此後流行歌曲風格為之一新，還開創了台灣作為華人地區流行歌曲中心的時代。同時它在社會上所代表的意義幡然丕變，不僅不再被認為是

13 蔣勳，〈從「校園歌手」到「民歌手」〉，《楊祖珺專輯》（新格唱片，1979）所附的歌手介紹。



靡靡之音，而且還成為流傳無礙，上下階層都在傳唱的真正流行歌，政治人物往往也需要在台上哼上一曲來博取民心。

相對地，西洋熱門歌曲在1980年代之後的知識青年心中漸漸不再熱門，也不再被認為較為高級。同時很多搞西方古典音樂的人，也不再將自己與流行歌做出那麼死板的區隔，讓兩者之間存在著較大的模糊空間。「唱什麼歌」就此不再有以前那麼嚴格的上下標準，那個曾經存在於台灣知識青年心裡的音樂高低上下區隔之牆就此動搖。

## 民歌運動作為世代的自我實現

對於民歌運動所帶來的這麼個重大轉折，張釗維在《台灣現代民歌運動史》裡指出向來有「兩種詮釋脈絡，分別站在台灣高層文化文藝發展與流行音樂發展之歷史過程的角度來看待現代民歌」：

- (1) 鄉土／本土文化運動的脈絡：[……]現代民歌運動是整個「本土運動」中的一環。這股反向自己，回歸本土的自覺性意識潮流，在六〇年代之後就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凸顯出來[……]像鄉土文學運動、現代民歌運動[……]在這類詮釋脈絡之下，現代民歌在進入八〇年代之後的發展，基本上是以「沒落」這樣的措辭來形容。
- (2) 國語流行歌曲的脈絡：在這類談法中，將現代民歌(主要是稍後的「校園民歌」)視為是原本被指為「靡靡之音」的國語流行歌曲在八〇年代轉型的重要因素，特別是自現代民歌當中產生了一批新一代的音樂工作者，準此而給現代民歌正面的評價[……]進入八〇年代之後，現代民歌「功成身退[……]完成了它的任務」。(張釗維，2003：xxvi)

從六十年代到今天，對於要唱什麼歌就一直有著各種上下左右對立的爭論，譬如高雅相對於低俗、本土相對於崇洋、學院相對於民間、保守相對於進步、前衛相對於傳統、主流相對於另類、獨立製作相對於商業機制等等。張釗維指出這類對立觀點的差異與矛盾正可提供我們「另一個切入的可能」，底下讓我們從這個戰後新生代自我實現的角度切入，來看看這些對立如何表現出世代實踐的共同心志。

前面提到，成長於1950、60年代的知識青年在音樂上處在一種上下斷裂的不安位置。那時的傳統音樂，包括被冠以「國樂」之名的以及其他民間戲曲，幾乎已被邊緣化了，而國台語流行歌又被斥為靡靡之音，因而對絕大多數人而言，不論喜不喜歡，西方古典音樂都是最崇高的音樂，甚至可以免於當時的思想管制。我讀高中的1968年前後，竟可買到當代蘇聯作曲家蕭斯塔高維奇(Shostakovich)的翻版唱片。然而這真是一種高高在上的音樂，除了欣賞門檻高之外，愛樂青年並沒能有太多現場聆賞或參與演出的機會，因為能學成鋼琴、小提琴等樂器的都屬極少數，而通常又必須從小學起。直到1970年代，這種崇高的音樂從樂器到演奏，就像很多現代事物那樣，基本上都還是從西方橫向移植過來的，缺乏在地的社會基礎。

但是它雖不是有著廣大社會基礎的音樂，來到六十年代卻有個奇特的際遇。如前所述，那時廉價的電唱收音機與長時間黑膠唱片開始量產，而尚未被歐美唱片大廠所在意的翻版唱片遂大量流通，在此情況下西方古典音樂竟然變成是容易聽到的音樂。和西洋熱門音樂一樣，這些唱片的價格比國台語流行歌還便宜，因為基本上只有壓製成本。如此竟然形成了一群幾乎沒有現場演奏會可聽，也不太熟悉樂理與樂器，但卻很容易聽到唱片的西方古典音樂聽眾。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這批愛樂聽眾在那時竟能聽到蕭斯塔高維奇的交響曲。不過它雖然有著不亞於流行歌唱片的流通管道，由於欣賞門檻偏高，甚至在

大學校園也就只能屬於小眾了。如此站在音樂欣賞層級的最高位階，卻是一個沒有社會與歷史基礎，漂浮在上的不安位置。它是橫向從西方移植過來的，自身沒能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再生產機制。

這情況與其原生地歐美社會極為不同。古典音樂在西方，雖然也是高踞上位，卻是自身社會的產物。在其生成過程中，與大眾傳唱的通俗流行歌謠互補，並沒有像我們的社會那樣形成上下斷裂的情況。西方古典音樂創作者從一開始就不斷從民間歌謠汲取養分，不管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不管精緻還是通俗，都是來自同樣的泉源，相輔相成。因此六十年代那時，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的指揮大師伯恩斯坦（Bernstein）會帶著全家人去聆賞披頭四（The Beatles）的演唱會，不以為怪；他的音樂創作也充滿著民間音樂的素材。由於有著這麼一個厚實的社會基礎，西方社會也才会有那麼多樣的音樂形式。

因此西方的上下左右是互補的，而我們的上下左右卻是拼湊隔離的。這不只是音樂界的現象，思想與藝術也是如此。上層知識分子直接從西方移植概念，而非從自身社會與歷史中歸納提煉，思想與概念在沒能與現實扣連時，大半只能成為某種位置表徵。因此這類高層文化就從沒能在我們社會構成一個真正的社會力，只能作為符號與姿態。就是說台灣在那時並沒有真正的「上層文化」與「文化上層」，西方古典音樂圈在此地並沒能形成一個真正有力的文化保守派。

同樣是西方傳來的西洋熱門音樂，卻有著極為不同的景象。首先它的欣賞門檻不高，本來就是西方的通俗歌曲，歌詞雖簡單易懂，但在英文的包裝下也就不被認為低俗。再則它也很快在聽眾裡產生為數不小的演出者，不只很多人能哼上一段，還有不少人學會木吉他。這不只因為吉他比較便宜，還比鋼琴或小提琴易學多了。演唱也無須受過太多正式聲樂訓練，以自然發聲為尚。在後來現代民歌運動中，幾乎所有歌手都是以一把吉他自彈自唱打開出路的。於是廣大的新生代

知識青年階層，處在那種「高不可攀」的西方古典音樂與「靡靡之音」的國台語流行歌的上下斷裂之間，西洋熱門音樂包括抗議民歌遂成為他們最佳的音樂選擇，即使那也是處於一個橫向移植而被數落為「崇洋媚外」的尷尬位置。而當他們不滿足於只是聆聽與演唱外來的音樂，想在音樂上落實到自己的生命經驗，以能有所自我實現時，身邊的西洋熱門音樂自然就成了最佳的參照與出發點了。

由此我們必須看到一個重要現象，1970年代的這批現代民歌手並非外在於西洋熱門音樂圈而突然冒出來的。包括李雙澤、胡德夫還有楊弦這批人，他們原本都是西洋熱門音樂愛好者與演唱者，都是從那裡脫胎換骨生成的，甚至其中不乏接受過西方古典音樂的訓練。而他們的聽眾也原本多是西洋熱門音樂的愛好者，並曾被不少國台語流行歌的迴腸蕩氣所感染。於是他們的發展遂能以一種包容、收編與改造的延續方式進行，而不是由外強加的橫向移植。

總的說，經由戰後普及教育大量培養出來的這麼一大批戰後新生代知識青年，在餵飽了西方古典音樂、西洋熱門音樂、以及國台語流行歌之後，來到1970年代就想要有屬於自己的歌曲了，即使這個「自己的歌」其實混雜了上述所有的音樂元素。於是在1970年代的情境下，我們先有了胡德夫、楊弦、李雙澤，有了校園民歌手，然後又有了羅大佑與蘇芮。這麼一系列下來的知青歌曲，除了訴說民族大義、社會關懷以及人生歷練之外，也不乏男歡女愛。就其歌詞內容來看，或許在修辭上有其較為細緻與獨到之處，但基本上並沒超乎原來愛國歌曲、藝術歌曲再加上各色流行歌曲的範圍，甚至音樂創作本身也非另闢蹊徑。然而，即使裡面容有一些模仿、抄襲與拼湊，但重點在於這些是自己譜曲、自己作詞、訴說自己的生命經驗、唱給自己聽的歌曲。在這點上，這些新歌曲可說是「道地的」(authentic)創作實踐。

從現代民歌到當代流行歌的這一發展，知識圈一直有著各種思想

與實踐層次上的論辯。但不管這些論辯內容為何，是來自鄉土／本土的抗議脈絡，還是校園歌曲／商業發行脈絡，基本都是這個新生代在追尋自己的音樂之路上的自我論辯，是一種內在於自身發展與實踐的論辯，不再像以前那樣還必須藉助外來的、上下左右之分的架構。就由於這是有著廣大基礎的社會實踐，互相之間不是對立斷裂而是互補相成的關係，後來會由商業機制承接，而幾乎全面改造了國台語流行歌的面貌，也就順理成章了。

流行歌之所以流行，本身就意味著易聽易唱，就像傳統民謠。數十年累積下來確實也有不少膾炙人口的曲子傳唱至今，已超出「流行」一詞的時間限制而成為經典名曲。因此靡靡之音的問題其實主要在於其歌詞的通俗性，這問題表面看似有關聽眾的文化水平，但也是當年沒有較多作詞者投入之故。雖然那時還是有些高手如慎芝、葉俊麟等人為流行歌作詞，而黃俊雄為他自己的電視布袋戲配樂所填的詞更是一絕，卻只因時代因素而在知識青年心中有著尷尬的位置。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知識青年唱起國台語流行歌，不免多有偷吃禁果的叛逆感，像是在做一件與其身分不合的事，尤其歌詞又多充滿著較不遮掩的男歡女愛與江湖氣概。其實後來興起的「現代民歌」也一樣要歌唱男女愛情與現代鄉愁，只是歌詞較能與知青的身分搭配，會有以余光中、鄭愁予的詩入譜的情況。就是說不分身分高低，談情說愛本就是年輕人最熱切關心的主題，只是流行歌詞太通俗明白，而讓知識青年感到尷尬。

六十年代的台灣流行歌並不乏雋永的旋律，有來自本土作曲家的，但不少卻是來自日本與西洋流行曲的。這個本土作曲人才的缺乏或許與經濟發展階段有關，但也是由於大半受過正式音樂教育的人才不太願為流行歌作曲之故。這又牽涉到1950、60年代那時，流行歌被正統音樂體系輕視的上下斷裂的情境。總的說，流行歌的作曲與作詞

者終究還是要從音樂知識圈產生，當靡靡之音的污名不除，創作人才是不會願意投入的。1960、70年代那時的國台語流行歌正因缺乏作曲與作詞者新血的投入，已漸陷入自我再生產的困境。而當「校園歌曲」被商業機制流行化，原來的創作人才跟著也成了流行音樂界的人才，兩者的區別就此消失。這也意味著知識青年與一般大眾在音樂上的斷裂的消失，而有了上下的整合。如今即使還存在著大眾型流行歌手／作曲／作詞者（如張惠妹、周杰倫、方文山等）與小眾型另類音樂（交工樂團、黑手那卡西、台客搖滾等）的區分，但基本上都是1970年代之後，社會動力自身產生的不同音樂類型了。

這個原本看似幼稚、局限、缺乏前景的校園知青運動，如今從這個世代自我實現的角度來看，竟還有著如此的時代意義，印證了戰後新生代如陳映真在六十年代所戮力進行的當下與在地事業的實踐精神。具體而言，現代民歌運動開創者中的幾個如李雙澤、楊祖珺、胡德夫等人，在那個年代確實與陳映真的社會意識及實踐精神十分接近。於是雲門在《陳映真·風景》之後，接著又在2006年由布拉瑞揚編了一齣舞作《美麗島》，做為當年春季公演的舞目，獻給現代民歌運動的代表人物胡德夫，並紀念英年早逝的「唱自己的歌」先行者李雙澤。

李雙澤創作於30年前而被遺忘多年的〈美麗島〉一曲，當年就是由胡德夫與楊祖珺兩人首唱。雲門的這齣舞作當然就由雖已滿頭華髮但寶刀未老且更臻成熟的胡德夫親自上台彈奏鋼琴，並演唱李雙澤的、他自己的，以及排灣族與卑南族的歌謠，做為舞蹈的配樂。年輕編舞者布拉瑞揚與胡德夫同樣出身台東太麻里，他的舞蹈與胡德夫的音樂揉合在一起，不僅召回了30年前那個年代的火熱，竟還那麼貼近當代青年的心境。就像馬世芳在為這齣舞作所寫的〈民歌燎原的1970年代〉一文裡說的：

這些年，日子再怎麼難過，胡德夫始終沒有忘記音樂。生命中殘酷的磨難，卻讓他的歌聲與琴藝「熟成」了。近年來，他的現場演出在年輕世代之中找到許多知音，這些年輕人多半在李雙澤逝世的時候都還沒有出生，卻在Kimbo〔胡德夫〕的歌聲裡找回了熊熊燃燒的青春之火。<sup>14</sup>

換言之，雲門與胡德夫的結合是那麼扣緊當下與在地的情境，即使那是一齣現代舞，而胡德夫的音樂又洋溢著爵士與搖滾之風。

2007年10月1日，淡江大學為逝世30週年的李雙澤豎立了一塊紀念碑，接著在4日晚上舉辦一場「30年後再見李雙澤」的紀念演唱會，就在當年發生「淡江事件」的學生活動中心。這場演唱會邀來了胡德夫、雷光夏、張懸等老中青三代音樂人，演唱李雙澤的老歌以及各自的創作曲。原以為聽眾將會是來懷舊的、華髮已生的戰後新生代，竟然當晚擠滿了年輕人，還有很多學生站在後面。而大會邀來的主持人竟是陶曉清和馬世芳母子，當晚陶曉清對於她能重回歷史現場來紀念李雙澤，說出「真是百感交集」這句話，也道出了「唱自己的歌」運動30多年來的巨大成果，已經超越了左右之爭的恩怨。而她的重回歷史現場，也給了戰後新生代的自我實現一個絕佳的印證。

若我們往前回溯，這個唱自己的歌的運動又有個六十年代的先驅，即是許常惠與史惟亮等人上山下鄉在全島進行的「民歌採集」活動。他們採集的範圍從寺廟音樂、地方戲曲、福佬與客家民謠，到原住民音樂，甚至包括大陸來台的各種民間戲曲與說唱，幾乎無所不包。這項採集活動一直延續到1970年代末，其中民間樂人陳達即是在許常惠1967年的採集中發現的，而後又在1970、80年代之交的現代民

14 馬世芳，〈民歌燎原的1970年代〉，刊於雲門舞集2006年春季公演《白×3 | 美麗島》節目手冊。

歌運動中現身並大放異彩。

許常惠曾在1961年開始發起「製樂小集」與「新樂初奏」等屬於西方古典音樂在20世紀進一步發展的現代音樂團體，鼓勵台灣的西方古典音樂作曲者進行創作，為的是〈我們需要有自己的音樂〉<sup>15</sup>，也「為了現代中國誠懇的意識思想提供音樂上的作證」。這批人雖然主要並不是在為社會大眾創作「自己的歌」，卻也代表著台灣的音樂菁英在為自己的歌尋找資源的努力。他學生中的少年丘延亮既參與了民歌採集活動，也曾與其他愛樂知青組成「江浪樂集」創作新曲，而後又在1968年與陳映真抱著同樣的心志而一起被捕入獄。許常惠的另一個學生李泰祥多次參加「製樂小集」作品發表會，後來還成為現代民歌運動中的重要作曲家，留下無數經典名曲。就是說從六十年代的民歌採集到1970年代末的「現代民歌」，不管是參與的青年還是從事的活動，都是承先啟後為自己當下的時代與在地的存在所進行的一場社會實踐，一場世代的自我實現。而跨界於古典與流行的李泰祥，更象徵著菁英與大眾間的斷裂已經開始了彌合的過程。

以上是以「唱自己的歌」運動來說明這個發生於1970年代的在地實踐是有著陳映真淵源的，他們成長於六十年代，吸吮了當時各種思想資源，而在長成後進行了一場世代自我實現。

## 以及現代舞與新電影的實踐場域

在保釣運動與現代民歌接連著風起雲湧的同一年代，林懷民的雲門舞集以及其他現代身體表演者如林麗珍的無垢舞蹈劇場、王墨林的

15 許常惠對史惟亮〈我們需不需要有自己的音樂？〉一文的回應，兩文分別登於《聯合報》1962年6月20至21日、23至24日，與7月10至12日。轉引自趙琴，《許常惠》（台北：時報文化，2002年12月）。



行動劇場、劉靜敏的優劇場、鍾喬的差事劇團等也都在同一情境下先後誕生，是同一時代的延續產物。這裡要問的是這麼一些受到西方現代與前衛藝術形式的啟發而產生的小眾藝術團體，如何與那時的社會實踐扣連在一起？如何體現六十年代知識青年的世代自我實現？

其實林懷民的現代舞團一開始就標榜要「為中國人編舞，跳給中國人看」。而其作品從早期的《薪傳》、《白蛇傳》，一路到後來的《九歌》、《水月》、《行草》，不僅內容本身很多來自本土題材，在舞蹈動作上也漸次加入傳統的武藝元素。就其明白說出的部分而言，確實是很清楚地要有別於只是西方的舞蹈移植。然而從其整個呈現形式而言，那真是一群走在時代前端的秀異分子的作為，就像西方古典音樂裡的現代樂派那樣，不僅較難引起中下階層的共鳴，連一般知識階層也未必能完全接受。這麼一個看似小眾菁英的舞團卻被國際舞蹈界熱切認可的這麼一個奇怪現象，若我們回到六十年代林懷民個人的成長經歷，還是可發現與陳映真的密切關連。

季季在〈林懷民的陳映真〉一文中談到她是如何介紹陳映真的小說給林懷民的：

1964年6月，我[季季]在武昌街明星咖啡館樓下向周夢蝶買了一本新出的《現代文學》，第一次讀到陳映真的小說：〈淒慘的無言的嘴〉，立刻被那憂傷而深沉的氣息所吸引。後來又買了一本舊的《現代文學》，讀到了〈將軍族〉。(季季，2005：50)

那年夏天林懷民考完大專聯考後，來到台北為鼻竇炎開刀住院，季季為他帶去那兩本《現代文學》。林懷民躺在病床上，「臉頰腫脹如肉包，嘴上蓋著一層厚紗布，說話含混不清」，但在季季走後就開始讀起那兩篇小說。他如此回憶那時的情景：

那是我〔林懷民〕第一次讀到陳映真〈將軍族〉和〈淒慘的無言的嘴〉。我一個臉腫得兩個大，用腫成一小縫的眼睛一字一字的讀，感動得唏哩嘩啦。讀完，再讀，再哭。那次手術不算成功，鼻竇炎很快恢復「常態」，不知道跟養病期間激動的情緒有沒有關係。（同前引：51-52）

林懷民在40年後用舞蹈來緬懷那個終生抹滅不了的感動，同樣的感動一樣充塞在六十年代的多少文藝青少年的心胸，包括1971年在台大校園發動保釣運動的那批學生。雖然林懷民後來的社會實踐是那麼一種特殊的形式，他的動力卻是與戰後新生代在各方面的自我實現扣連在一起的。林懷民也自承在留美期間曾受到保釣運動的震撼，就像當年很多留美學生那樣。<sup>16</sup>

同樣有著國際認可的台灣藝術創作，還有1980年代的「台灣新電影」。侯孝賢、朱天文、楊德昌、吳念真等電影工作者，也是與林懷民一樣成長於那麼一個「文藝復興」的六十年代（後起的李安也是）。侯孝賢曾提起他年輕時讀到陳映真小說的感動，而有將它拍成電影的衝動。<sup>17</sup>這一群在六十年代喜歡上電影的文藝青少年，來到1970、80年代就開始在簡陋的條件下拍起電影來。

這批人與民歌運動者的心志極為接近，都有個不滿足於既有電影，而想拍出屬於「自己的電影」的單純心思。什麼是屬於自己的電影？就是與他們生命成長有關的「自己的故事」，看似懷舊，其實卻是與現實扣得很緊的當下而在地的題材。因此他們這樣的動力就與鄉土文學創作者、民歌運動者、前衛身體表演者等同一代人一樣，直接扣連上陳映真在六十年代的創作衝動與社會實踐所蘊含的實踐心志。

16 參見〈想逃的林懷民：注定當舞蹈赤腳醫生〉，《聯合報》，2009年9月13日A8版。

17 〈侯孝賢演講+對談龍應台〉，載2009年4月《印刻文學生活誌》第68期，頁78。

就是說，曾經在六十年代被那麼多義大利的寫實電影、法國的新潮電影、日本的黑澤明、瑞典的柏格曼(Bergman)等大師的名作餵飽了的電影青年，當他們進入當時台灣電影事業的現實環境時，必須設想的是如何從高遠的想望落實為在地的實踐。

林懷民、侯孝賢等人只是這整個世代較為出名的例子，其他還有很多文化藝術圈裡的同輩，都在進行著同一心志的事業。而所有這些創造性的文化現象，不論是文學、音樂、電影還是舞蹈，都有一個共同特徵，就是開創者的行動初衷並不只是為了抽象理念或主義，也不是為了被後代冠以「運動」或「大師」的尊號，而更是一群嗜好、心志與背景相似的積極分子單純的實踐行動。此外他們也並非全都抱著與既有體制或陳規完全決裂的心態，並不必然自認為是在幹一場革命事業。如此也就因為不是被抽象理念所主導，呈現出來的作品內容與形式就有著頗大的歧異，對那個「想要表現出來的自己」是什麼，就有著頗為不同的看法，經由後設的詮釋甚至可以產生極為對立的意識形態。但這些都無礙於他們的作品都呈現出這一代知識青年的共同追尋，是十分當下而在地的實踐。

楊德昌在回憶這群熱愛電影的青年在1980年代初湊在一起的情況時說：

我們很容易就形成一個團體[……]大家就是喜歡做同樣的事、對彼此很了解，一見面就有很多事情可以聊。我們是很自然地在一起的。<sup>18</sup>

他又提到，會與侯孝賢成為好朋友是因為兩個人到同一個剪接師

18 楊德昌訪談，〈幸運的不幸〉，收入白睿文編著，《光影語言》（台北：麥田出版，2007），頁243。

廖慶松那裡，趕著剪接各自的首部重要電影——楊德昌(1983)《海灘的一天》與侯孝賢(1983)《風櫃來的人》。吳念真還認為這些人會湊在一起是一個意外：

我只能說，那時候剛好有一群人，這群人對電影有自己的看法。他們去做了一些事。在一個時期，剛好有一堆人拍出一些電影。我不認為那時候有改變什麼，沒那麼偉大[……]是一個意外。<sup>19</sup>

然而歷史的偶然往往有個時代背景的必要條件，因此我們可以如此理解他這種低姿態的回顧：當時的從事者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只是一心一意去實踐，而沒有太多理念的包袱，卻自然呈現時代的精神面貌。

侯孝賢在很多場合也屢屢澄清，他出名的長鏡頭與遠鏡頭的運用，最初是出於資源短缺的無奈。他在最初的那些電影裡，出於資金的考量使用了很多非專業演員，而他們是較經不起近鏡頭特寫的考驗，因此只好使用大量的遠鏡頭，卻由此形成了他的風格。剛開始很多長鏡頭的考慮也源於此，而後竟發展出其特有的美學。就是說這批電影工作者是在沒有太多電影基礎建設，包括電影理論訓練的條件下，用身邊僅有的工具就起手開創一番事業。1980年代的新電影在台灣戰後世代自我實現的過程中算是發生較晚的，這或許是因為相較於其他文化事業，電影牽涉到更複雜的人事，並且需要動用到較大的資源。

陳映真在六十年代曾經是《劇場》雜誌的熱心成員，並參與過現代戲劇《等待果陀》的演出。2、30年後後的1980、90年代，他的追隨者在《人間》雜誌停刊後陸續發展出各種前衛小劇場來，如王墨林的行動劇

19 吳念真訪談，〈在文化殖民的陰影下書寫台灣〉，收入白睿文編著，《光影語言》(同前引)，頁265。

場、鍾喬的差事劇團等，算是六十年代台灣知識青年的醞釀在1980年代以後的收穫。這些電影與戲劇雖然發生較晚，卻也是承襲了陳映真在六十年代以其創作實踐所啟動的，整個戰後台灣新生代在文化上的自我實現，可說直到1980、90年代盛況未曾稍歇。

### 小結：自由精神與戰後新生代的自我實現

如此，以世代自我實現的觀點來看，我們就會看到從六十年代開始，除了政治與社會行動外，還有一連串的思想論辯、文學創作、唱自己的歌、新電影、現代舞、行動劇場，以及其他多重表演藝術的成果。我們也可用這視角來觀照曾在1969年為台灣青年學子創立《科學月刊》，並在1970年底幫助動員海外保釣運動的那批北美洲台灣留學生。甚至在1970、80年代崛起的台灣電子工業，在其發展背後也是一群戰後知識青年「當下在地」的創業實踐。而1980年代以後的各種社會運動亦可作如是觀。

當然這個當下在地性既非抽象觀念，也非有個特定的具體內容。當林懷民在1970年代初說要為中國人編舞，跳給中國人看時，雖然他當時所掌握與理解的中國受限於當時的台灣，但一點也無礙於他在進行的是「中國」的一種在地實踐。當時林懷民也並不是為了要成就一個國際級的舞團而編舞的，他只是為了要有自己的舞可以跳而編舞。這種當下在地的實踐心志，正是陳映真在六十年代用他的作品與行動鋪陳出來的，代表著戰後新生代自我追尋、自我實現的一個重要面向。

總的說，台灣在歷經六十年代的這一場「文藝復興」的思想衝撞與文藝豐收之後，一方面在上層意識形態領域開始了一次思想的轉型，另一方面也同時開始了一場從思想解放到在地實踐的心志轉型。這個心志轉型是台灣戰後知識青年很重要的一次成長經驗，就發生在舊威

權逐漸解體，而新的意識形態霸權尚未當道的1960年代到1980年代之間。在這個時期，黨國的威權與教條其實已經難以構成內在禁忌，只能是令人討厭鄙夷的外在束縛。在1980年代之後開始發展進而當道的台獨意識形態，當時則還處在萌芽階段。而更重要的是，以美國式現代化為標準的全球化意識形態，雖然已經以文化形式大量進來，卻尚未全面當道籠罩台灣。

在這麼一種狀況下，對於一心追求理想而未曾直接感受到鎮壓之慘烈的戰後初生之犢而言，雖然威權依然籠罩而缺乏形式上的言論自由，但肅殺氣氛已消散大半，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構成不了太大的心理束縛。因此思想的解放、文藝的創作與理想的追尋，反倒沒有太多「政治正確」的陰影在內心起著自我禁制的作用。大家對台灣社會既心懷憂思也充滿期待，覺得可以有一番作為。這種自覺有能力改變周遭世界而且充滿想像力的樂觀狀態，不只發生在被保釣運動洗禮的青年學生身上，也是投入文學、音樂、舞蹈、電影、戲劇，以及電子與資訊產業的所有知識青年的共同感覺。可以說台灣的六十年代相較而言還是個精神上比較自由的時期，沒有太多的心靈禁忌，如此才得以開創出台灣的「文藝復興」時代來。

因此當年的年輕人心中遂有著一份素樸的自由精神，思想與行動也就大膽起來，這正是理想能夠培育而文藝能夠豐收的基本條件。在這種氣氛中，社會有著充沛的內在自由與創造精神，這些乃是讓戰後新生代自我實現成為可能的必要條件。也就在這種精神氛圍中，從陳映真等人開始，如何在當下進行在地實踐成了當時的知識青年最關切的問題。今天台灣可以拿得出來的文藝與思想成果，幾乎都要回溯到那個年代，或者作品創作於斯時，或者作者成長於斯時。

以上是我試圖探討的陳映真的另一種意義，超乎族群、階級、左右以及抽象理念或主義的，一個世代的自我實現的意義，及其發生背景。

## 後記：期待另一個兩岸共同的文藝復興

在陳映真1967年的小說〈唐情的喜劇〉裡，唐情最後的歸宿只能是個美國軍火公司的科學家，什麼派別的思想最後都抵不過美國的跨國軍工綜合體大企業，及其背後的現代化理論。這是陳映真在當年精確預見的思想趨勢，兩岸如今先後籠罩在「美國現代性」意識形態的巨大陰影下。在這些當道的意識形態層次，很多問題遂以二元對立的形式呈現，顯得無解。然而生命不能老是騰空，總要回到地上來尋找出路。從個人到社會都不能只活在理念裡，真正的出路總是要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才走得出來。這也就是當下與在地的社會實踐對整個世代的意義，是陳映真在六十年代不論是以小說創作還是其他形式所呈現的另一種意義。

然而一個能夠實踐／自我實現的「世代」，必然有其擺脫不了的時代背景與歷史因素。就台灣現代化的歷史而言，戰後新生代在六十年代所開啟的具有時代意義的實踐，正遙遙呼應早於他們4、50年的另一批台灣青年先輩的事業。

在20世紀初的1920年代，正值日據時期的中期，台灣漢人的武裝抗爭基本結束，而一批新成長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接受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之外，還大量吸吮了發生在祖國大陸的辛亥革命、討袁之役、五四運動等的思想與精神養分。由此在思想上茁壯的這批台灣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也開始了他們的在地實踐，開啟台灣人民的現代啟蒙與民族解放運動，形成了台灣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文藝復興」。譬如，受到五四運動直接影響的留日台灣青年學生，於1920年在東京創立「新民會」，並仿照北京的《新青年》發刊《台灣青年》雜誌，進行民族主義的思想啟蒙。台灣第一代西醫蔣渭水，以實現孫中山的思想自我期許，在1921年糾集同志成立「文化協會」，展開台灣人民的現代啟蒙

運動，並在1926年成立台灣民眾黨，展開工人農民運動。他的同學、摯友與同志賴和，響應五四的白話文學運動，提倡台灣的白話文學書寫，被尊為台灣現代小說之父。還有以現代戲劇形式巡迴各地演出以喚醒民眾的「文化演劇團」。對這一批日據中期的啟蒙活動者，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都是他們熱血沸騰的來源。

這批台灣的啟蒙先行者所展開的波瀾壯闊的實踐事業，在1930年代日本帝國以九一八事變進一步逞其侵略野心，以及隨著而來在台灣施行的皇民化運動之後，遂遭到殘酷鎮壓而耗盡動能。直到3、40年之後，戰後重新接受中國教育的新世代台灣青年，繼承了這個大傳統，才又開始展開另一番文藝復興的實踐事業。相較而言，陳映真所領頭參與的這一次世代實踐，如本文所描述的，在1980年代之後的蘇東集團瓦解、美國獨霸、鄧小平改弦更張而台獨勢力興起的情況下，也耗盡了動能。

然而來到21世紀，尤其是這幾年來，美國的霸權顯然已走過最高峰，而兩岸的和解則有了顯著的突破，不少人開始反思百年來的中國歷史，這是否又將是另一個新世代實踐的契機？台灣的前二次都在兩岸分斷的情況下出現，其「文藝復興」也都各自受限於不同時期的分斷體制，而下一次或許在兩岸各自與互相的心理禁制解除的狀況下，會是一個共同的文藝復興的來臨？我想這是映真先生畢生企盼的，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 參考書目

白睿文(Michael Berry)(2007)《光影語言》，台北：麥田出版。

季季(2005)《寫給你的故事》，台北：印刻出版。

陳映真(1975)《第一件差事》，台北：遠景出版。

——(以許南村之名發表)(1976)《知識人的偏執》，台北：遠行出版。

陳怡蓁(2009)〈向陳映真致敬〉，《人間風景·陳映真》，台北：文訊雜誌社，頁4-7。



- 張釗維(2003)《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台灣現代民歌運動史》，台北：滾石文化。
- 教育部統計處(2008)《歷年度各級教育簡況》，台北：教育部。
- 經建會(1983)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台北：經建會。
- 趙琴(2002)《許常惠：那一顆星在東方》，台北：時報文化。
- 趙剛(2009a)〈青年陳映真：對性、宗教與左翼的反思〉，《「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新竹：交通大學。(後定稿為〈頡頏於星空與大地之間〉，收入本書上冊)
- (2009b)〈理想的心，慾望的眼：重讀陳映真的第一篇小說〈麵攤〉〉，《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6期(2009年12月)。
- 鄭鴻生(2001)《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出版。
- (2006a)〈台灣思想轉型的年代：從《送報伙》到《台灣社會力分析》〉，2006年8月1日《南風窗》(廣州)。
- (2006b)〈台灣的文藝復興年代：1970年代初期的思想狀況〉，《思想》(台北)第4期(2006年12月)。
- (2007)〈台灣人的國語經驗：尋回失去的論述能力〉，《思想》(台北)第7期(2007年11月)。
- 蔣勳(1979)〈從「校園歌手」到「民歌手」〉，收於《楊祖珺專輯》所附歌手介紹，台北：新格唱片。
- 蔣勳對談胡德夫(2006)〈從「美麗島」看到「美麗的稻穗」〉，《印刻文學生活誌》(台北)32期(2006年4月)。
- 蕭阿勤(2008)《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研院社會所。

## 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

### 陳映真八〇年代的思相湧流析論之一

賀照田

本文要感謝的師友很多。這是因為我雖然很早便知道陳映真其名，讀他卻在2000年以後。促成我最初讀陳的是北京三聯書店的馮金紅編輯。她送我2000年3月北京三聯版的《陳映真自選集》，我拿回來後，很長時間放在一邊。一晚忘了什麼契機，拿起了這本選集，沒想到一拿起便放不下，一口氣讀到天亮，從此開始關注陳映真。此後，楊貞德女士為我影印了人間版《陳映真作品集》6-15卷，趙剛先生把他收藏的30餘冊《人間》雜誌送給了我，呂正惠和曾健民兩位學界先進則陸續幫我湊齊了陳映真主編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加上我自己買的洪範版《陳映真小說集》1-6卷，這樣，關於陳映真的著述我便有了基本規模。

當然，感興趣閱讀是一回事，著手研究是另一回事。使我從感興趣閱讀陳映真到再邁出一步研究思考陳映真的關鍵是陳光興先生。他2007年邀約我參加2009年11月在新竹交通大學召開的「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這推動我去進一步收集手中未有的陳映真著述，推動我從頭認真、系統閱讀我找到的陳映真著述，並留心閱讀對理解、把握陳映真有幫助的著作。不僅如此，陳光興先生和他的團隊淑芬、筱茵、健鐘還為我影印了我缺的各冊《人間》雜誌，並幫我查找了未收集，也未見上述陳映真主編刊物的多篇文章。他們外，為我查找、提供陳映真和有關陳映真文獻的師友還有馮建三、張立本、蔡明諺、黃文倩、林肇豐、彭明偉、張郅忻、邱怡瑄。資料外，在陳映真理解方面給我以幫助的師友則有黎湘萍、曾健民、呂正惠、陳光興、趙剛、薛毅、施淑、李娜、林深靖、鐘喬、藍博洲、孫歌。此外，本論文在撰寫初稿時，曾得到蘇敏逸博士的幫助。初稿完成後，曾經張煉紅、張志強鼓勵，陳光興、阮芸妍批評。

此篇論文如果還有些貢獻，首先應該歸功於上述20餘位師友。另，本文第一稿刊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10年6月號，趁這次收入論文集，我又作了一些修改。故兩稿不同處，以此稿為準。

本文剛寫出草稿，就有朋友指出：文章講的是台灣作家陳映真，實際在處理的卻是大陸當代史。確實，這位朋友說得對，在我自己，這論文確有關「我是誰？我從哪裡來？要到哪去？」——這樣一個讓我的心發疼、發緊卻無法繞過的問題群。

——作者題記

顧名思義，本論文的核心關切，在從曾被陳映真作為通向美好世界系統真理、可行實踐的中國社會主義遭遇危機這樣一個視角，來理解把握八〇年代陳映真知識、思想、文學、文化實踐。選擇這樣一個把握視角，是因為，在六〇、七〇年代十餘年陳映真的思想認識、實踐想像具有中心信仰位置，被陳映真熱烈理想化的中國大陸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實踐，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規劃與實踐，遭遇極大的困難，並於文革後通過中國大陸自身對這些問題的檢討與不義、殘酷的揭露，所引發的陳映真信仰和思想的危機，確是陳映真八〇年代一系列視野、思考、感受、理解的調整，得以啟動的核心背景。某種意義上，就像我們若不以台獨全面性崛起作為理解背景，便不能理解八〇年代以後陳映真許多知識、思想、文學行動一樣，不瞭解中國社會主義危機對八〇年代陳映真知識、思想、文學、文化實踐所以如我們所見展開的關鍵性，而過快聚焦於陳映真每一個具體的知識、思想、文學、文化實踐，實不容易深入感受、理解八〇年代陳映真何以是如我們所見的那樣一種知識、思想、文學、文化實踐展開樣態，不容易感受與捕捉，陳映真在開展他這每一個具體的知識、思想、文學、文化實踐時，除他已正面交代的理由、原因外，其心底更深的情感與思緒脈動。<sup>1</sup>

1 當然，相比台獨全面性崛起對陳映真八〇年代以後知識、思想、文學、文化實踐樣貌形成的影響，中國社會主義遭遇危機對八〇年代陳映真這些實踐的影響，雖然同為關鍵、

也就是說，本文中心關切的不在關注八〇年代陳映真有著相對充分正面展開的諸具體知識、思想、文學、文化論述，而在八〇年代陳映真諸具體的知識、思想、文學、文化實踐背後更具基層性的觀念與感受型構。而之所以致力於這一更具基層性的觀念與感受型構的揭示與把握，是因為對陳映真這一層面觀念與感受型構的把握，既有助於我們對陳映真諸相關具體知識、思想、文學、文化實踐內蘊有更精準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我看來，對陳映真此層面觀念與感受型構的把握與揭示，本身便有著更重要的思想認知價值。

有意思的是，陳映真很少正面談中國社會主義危機對他的影響<sup>2</sup>，偶爾談及，也隱約其辭，不多展開。而這無疑給本論造成著特殊困難。

也因此，我用「陳映真八〇年代的思想湧流析論」作本論文的副標題便有雙層涵義。因為，「湧流」是相對於「波濤」而言的。陳映真八〇年代的波濤是他對跨國企業的精彩文學處理、對禁忌的五〇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的深度開啟，是他對台灣大眾消費社會問題的穿透性揭示，是他「冷戰—民族分斷論」的提出，當然更是《人間》雜誌的創辦，

---

根本上相同，但也有相當差異：一是社會主義挫折發生的具體時空在大陸，陳映真跟它的牽連主要是信仰、知識、思想、感情上的，不像解嚴以後台獨的發展，強力瀰漫於陳映真具體生活於其間的台灣社會中；二是，中國大陸在八〇年代上半的改革開放，成績不錯，人民擁護，且看起來也未背離社會主義的基本面，而這無疑有助於緩解著陳映真直接相關大陸而有的那些緊迫、焦灼感，而解嚴以後台獨在台灣的發展則是一浪高過一浪；三是，相對台獨是九〇年代以後陳映真寫作的經常聚焦主題，八〇年代中國社會主義危機則未成為陳映真寫作時直接正面處理的主題。

- 2 也許陳映真始終沒有找到正面整理中國社會主義危機帶給他的經驗的方式。而這無疑有礙他貫穿講述他的八〇年代經驗。因為，只要看看陳映真1993年冬所寫的極精彩的〈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洪範版散文集1：頁51-69），提到他遭遇社會主義危機前通向社會主義時的經驗時是多麼流暢通貫，提到他寫作最為豐沛，對台灣影響也最大的八〇年代則一筆帶過，以致篇幅上完全不成比例，便可讓我們從這「無言」、「沉默」中，一方面體會、想像中國社會主義危機對八〇年代陳映真多麼重要，以致不談此，就無法貫穿講述他紛繁多彩的八〇年代，另一方面也可讓我們藉此「無言」、「沉默」，感受和體會由中國社會主義遭遇危機視角來整理陳映真八〇年代經驗所具有的挑戰性了。

和它挑起的一個又一個尖銳議題。這樣，用「湧流」，首先是指本論的核心關切不在這些曾引起廣泛關注的議題，而在這些議題背後的陳映真觀念與感受型構的把握。其次，了解「湧流」雖對認識波濤重要，並為安全航行所需要，但因為它從海面不可見，故需要尋找與觀察波濤不同的把握辦法。而這正好可用來喻指，因為陳映真很少正面談中國社會主義危機對他的影響所造成的材料上的特點，本論文展開時於是不得不經常採用耐心迂迴勾稽、細膩索隱、連綴，乃至反復迂迴勾稽、反復索隱連綴的把握方法，以對陳映真有關思考、感受準確顯影賦形。而也正因為從此一角度把握八〇年代陳映真經常不得不的迂迴勾稽等，使得本論文的展開大費筆墨。此所以，已經相當長的本論文仍只處理了對八〇年代初和八〇年代中陳映真的民族主義和理想主義重構問題，而不得不把從本論文設定的角度對八〇年代陳映真作全面貫穿性把握的另外一些工作交給接下來論文的原因，而這當然也是我不得不在本論文副標題加上「之一」字樣的原因。

## 一、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

據陳映真的自述，我們可以清楚知道，早在1966年文革發生前，通過牯嶺街搜到的舊書，通過日本友人幫助提供的書刊，通過偷偷收聽大陸廣播，陳映真已經開始了解並開始信仰中國共產革命、中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sup>3</sup>按陳映真自己的說法，「當時，我從中國大陸

3 關於陳映真了解、接受中國革命、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的情況，可參見陳映真的相關文章：〈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同前引註2）、〈我在台灣所體驗的文革〉（《亞洲週刊》〔香港〕第10卷20期，1996年5月26日，頁50-51），和郭紀舟1994年3月對他的訪談〈《夏潮》重要人物訪問錄·訪陳映真〉（郭紀舟，《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灣：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年1月初版，頁441-481），和其演講文〈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演講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經李娜整理後刊於《上海文學》〔上海〕2004年1期，又

的各種發展中去尋找各種問題的答案」(〈論強權、人民和輕重〉, 人間版作品集6: 頁8), 「當我年輕的時候曾經輕易粗淺地以為社會主義是中國一切問題的解答。而認為當時中國(大陸)所從事的正是問題的解答」(〈台灣變革的底流〉, 人間版作品集6: 頁201)。也就是, 在六〇、七〇年代十餘年間陳映真的意識、理解裡, 其時已經澈入陳映真骨髓的理想主義衝動、中國民族感情、對生命意義感的敏感與看重, 和對弱者、被損害、被壓迫者的深切同情, 等等這些對當時陳映真具有高度重要性的關懷, 都在斯時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得到了恰切的理解與安排。而這也就意味著, 該時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實踐對該時的陳映真而言, 不只是通常理解的和社會主義自身也強調的, 社會主義因包含著對被侮辱、損害階級的公平、民主、尊嚴問題的真正解決, 因此建立起的社會才是真正正義、公平、民主的社會——這當然回應著陳映真對弱者、對被侮辱被損害者的高度關切, 也不只是在六〇年代中蘇論戰所呈現的分歧中, 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無論在觀念意識還是實踐設計上, 都被陳映真認為是更代表著社會主義理想, 而是在這些我們通常賦予社會主義、賦予中國社會主義的曾經通行理解之外, 當時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的理念與實踐還為斯時陳映真強烈的理想主義與熱烈的中國民族關懷提供著——在他自己看來最好、最理想、最飽滿、最恰切的內涵, 還為斯時陳映真高度關切的人的生命意義感提供著——在他自己看來既恰切又飽滿的社會生活形式和精神形式。

正是以這無論在觀念還是實踐上都被陳映真熱烈理想化的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為背景, 陳映真(寫於出獄不久的1975年9月)認為1966年以後的自己「契柯夫式的憂悒消失了。嘲諷和現實主義取代了過去長時期來的感傷和力竭、自憐的情緒。理智的凝視代替了感情的反撥; 冷

靜的、現實主義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義的發抒」，認為當這時的自己「開始嘲弄，開始用理智去凝視的時候」，便得以「停止了滿懷悲憤、挫辱和感傷」去和自己「所處的世界對決」的之前的方式，而「學會了站立在更高的次元，更冷靜、更客觀的、從而更加深入地解析」自己「周遭的事物」。（〈試論陳映真：《第一件差事》、《將軍族》自序〉，人間版作品集9：頁9-10）

對照陳映真1966年至1968年入獄前這一階段的寫作，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確實如他自己所說，寫於這一階段的〈最後的夏日〉、〈唐情的喜劇〉、〈第一件差事〉相比他之前的作品，「嘲諷和現實主義取代了過去長時期來的感傷和力竭、自憐的情緒。理智的凝視代替了感情的反撥；冷靜的、現實主義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義的發抒」；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到，讓他告別過去感傷的重要媒介——對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的信仰，也常常讓他對作為對比的台灣現實不耐，而這特別表現在他寫於這一階段的小說〈永恒的大地〉、〈某一個日午〉中。比如，在〈某一個日午〉中，陳映真便藉著小說中自殺的國民黨官員的兒子寫給其父的信這樣來宣判現實的台灣：現今不過是「使我和我這一代人萎縮成為一具腐屍的境遇和生活；並且在日復一日的摧殘中，使我們被閹割成為無能的宦官」。而且「我們一切所恃以生活的，莫非巨大的組織性的欺罔。更其不幸的是：〔……〕我自己便是那欺罔的本身。欺罔者受到欺罔。開眼之後所見的極處，無處不是腐臭和破敗〔……〕」（洪範版小說集3：頁60-61）。也就是，1966年以後的陳映真確因中國大陸社會主義信仰和文革爆發帶動出的激昂而和此前更感傷的陳映真不同，但這不同得以實現所藉助的中國共產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帶給這時陳映真文學的並不總是「理智的凝視」和「冷靜的、現實主義的分析」，有時恰恰相反，「更高的次元」讓陳映真對現實不僅不是他自己所希望的「更冷靜、更客觀的、從而更加深入地解析」自己

「周遭的事物」，反而因「更高的次元」的對照，讓他對自己所處現實深為不耐。

而正是這樣一種基於美麗想像和因著美麗想像而更覺現實不堪忍受所形成的對比，使得陳映真認為自己這類未失社會意識、民族關懷的「市鎮小知識分子的唯一救贖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實踐行程中，艱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們所無限依戀的舊世界作毅然的訣絕，從而投入一個更新的時代。」（〈試論陳映真〉，人間版作品集9：頁9）是啊，既然舊世界如此不堪，新世界如此美好，那麼有理想性的作家主要該作的，當然在自己堅決棄絕舊世界的同時，也帶動讀者對現實世界不滿與棄絕，嚮往奔向新世界的革命。

當年也正是這樣一種意識，使陳映真渴望行動，也正是這樣一種渴望所導致的讀書會等初步行動，1968年把陳映真送進了監獄，被判10年徒刑，1975年7月才因蔣介石去世百日祭特赦出獄。

坐滿了7年牢獄的陳映真沒有告別他過去的信仰，沒有頹廢，更沒有自暴自棄，反在自己信仰的道路上更堅定、深沉了。上引「市鎮小知識分子的唯一救贖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實踐行程中，艱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們所無限依戀的舊世界作毅然的決絕，從而投入一個更新的時代」，便出自他出獄以後兩個月寫的他出獄後第一篇文章〈試論陳映真〉。顯然，他中國社會主義的信仰如故，他自我界定自己歷史和行動位置的意識如故。

雖然，現實變了。1977年5月在為自己小說集《第一件差事》四版寫序時，他總結他入獄這個階段台灣的變化：

六〇年代的後期，是本省的經濟開始大幅度發展的時代。1965年，美援完成了安定本省的政治和社會，創造一個具有購買力和生產能力的商品和勞動市場的任務。此後，美國和日本以投資、



銀行的設置、技術知識和機械等的對台輸入，在我國國民經濟中，構成一個重要的組織部門，而在世界性景氣中帶動和發展了台灣的經濟。（〈擁抱一盞隱約的燈火：遠景《第一件差事》四版自序〉，人間版作品集9：頁23）

令陳映真欣慰的是，黃春明、王禎和等作家，對這一切有相當敏銳的回應。陳概括說：

在這個社會發展階段中，青年一代的作家所關切的，是和外來經濟力量在社會上的影響相應的外來文化對我們自己文化的衝擊所造成的自我認同的喪失。於是作家的眼光從我們逐漸被國際商品所「國際化」的都市移開，以關切的眼光，去注視民族生活最後的據點——鄉村。在那裡，都市的、工商業的、國際性的經濟和文化的強大影響力，正在向著不知所措的、無抵抗的鄉村，伸出巨靈之爪。（〈擁抱一盞隱約的燈火〉，人間版作品集9：頁23-24）

而這些被稱為「鄉土文學」的優秀小說所描寫的便是「這種結構變革的鄉村人的困境、尊嚴、悲傷和希望」。

但現實的變化沒有使陳映真改變——拋棄現有世界、迎向新世界的理解與決心。用陳映真在這《第一件差事》四版自序因環境不能明言而只能隱約其辭的話來說，就是過去（入獄前）和現在（出獄後）他都「燃燒著對於未來的希望」，都因「懷抱著那一盞希望的燈火」，而自感充實。也沒有改變陳映真作家的責任在激起讀者同樣對現有世界棄絕、嚮往新世界的自我工作定位意識。用陳映真在這《第一件差事》四版自序隱約其辭的話來講，就是希望激發讀者「曠然的寂寞和恍然的反省」。

不過，現實的變化，讓陳映真感覺，他當年小說所藉以激發讀者「曠然的寂寞和怵然的反省」的內容和手法，於現今已經變化了的現實中，卻未必能再有效激起今天讀者「曠然的寂寞和怵然的反省」。相比，已有的被他所稱讚的，描寫這一種結構變革中「鄉村人的困境、尊嚴、悲傷和希望」的優秀作品，儘管這些作者可能並不擁有和陳映真相同的新世界想像和完全相同的寫作意識，但卻擁有陳映真所希望的激發今天讀者「曠然的寂寞和怵然的反省」的作用。只是這些寫作在主題上有它的限制，即它所展開的主要是在經濟、物質上受損的階層、行業、地區，而無法正面展開看起來在物質、經濟上是跨國資本、跨國企業的得益者、參與者們所受到的精神、人格、心理上的傷害，和由此引出的批判議題、批判視野。

所以，陳映真1978年重操小說之筆，三篇之作有兩篇（〈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寫跨國企業下經濟收益不錯的白領心理、精神、人格的被考驗、被損害，也便毫不奇怪了，因為他用意便在激起讀者，對看起來光鮮、現代的其時台灣重要現實跨國資本、跨國企業「怵然的反省」。而從當時評論的反應看，陳映真也確實成功地達到了他激起「怵然的反省」的目的。<sup>4</sup>相比，最早寫成的〈賀大哥〉，雖然和〈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主題不同，但不僅小說中賀大哥越戰經歷有助於推進在保釣運動中已經開啟的對美國的帝國主義一面的認識，其有關得以使越戰發生的美國的狀態，美國精神治療等機構對待賀大哥精神、心理創傷的方式等等，也都有助於開啟對總是以自由、民主、現代形象示人的美國的「怵然的反省」。而其結尾處看起來順

4 參見收入《陳映真作品集14：愛情的故事》（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年5月初版）一書中的評論文章：何欣，〈試析〈夜行貨車〉〉（頁53-65）；詹宏志，〈尊嚴與資本機器的抗爭〉（頁87-100）；許達然，〈從辦公室到工廠〉（頁116-122）；宋冬陽，〈縫合這一道傷口〉（頁123-150）。

帶，其實極為精心的代表其時國民黨政權某一內在心理、觀念面向的劉先生的一席話，也會促進讀者對表現上看起來已有一定改變的蔣介石後國民黨政權的更深的認識。（〈賀大哥〉，洪範版小說集3：頁126-128）

這樣，到陳映真1979年開始了解中國文化大革命存在嚴重問題之前，一方面是陳映真原有中國社會主義信仰的堅定保持，和在新的現實下如何進行有助於通向自己所設定目標的建設性工作的富成效的摸索；一方面是在保釣風潮等的帶動下，台灣雖仍處於對反共、防共過敏的戒嚴體制，其時在思想上，卻不論是帝國主義批判、第三世界論述，還是在民族主義、人道主義、社會關懷旗幟下，所開展出的現實批判意識很強的鄉土文學論<sup>5</sup>，都有公開並產生著相當影響的開展；在實踐上，也出現著以青年知識分子、學生為主體的各種關懷社會、服務社會的運動。也就是，當時雖還不能直接公開紹介、闡揚陳映真其時心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革命、中國社會主義，但確實其時已有了比六〇年代多得多的，開展在感受上使讀者產生「曠然的寂寞」之感，和在思考上使讀者產生「恍然的反省」之感的作品的氛圍與空間，而且現實上也越來越多可能接受這些刺激的人群。

所以，當1979年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實踐的問題、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嚴重問題攤開在陳映真眼前時，可想他所受的打擊多麼深切、嚴重。因為這打擊不只意味著他強烈關切的中國大陸道路本身的挫折，還意味著他自以為在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實踐中找到的，對他

5 陳映真寫於1977年、1978年的〈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關懷的人生觀〉、〈在民族文學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四篇文章（均收入《陳映真作品集11：中國結》，台灣：人間出版社，1988年5月初版，頁9-54），相當集中表現了陳映真其時對台灣時代現實的感受，和與他這時代感受密切相關的文學認識。而這樣內容的陳文在當時能順利發表，也可幫助我們想像1970年代末台灣時代氛圍之一般。當然，要了解當年鄉土文學論更詳細的情況，與它和當時其他時代思想脈動、社會脈動之關係，需讀尉天聰編的《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遠流，1978）。

具有基點性的理想主義、中國民族主義內涵的理想賦予，對他所特別看重的生活、生命意義感如何獲得，與建設實質而非形式的公正、正義、民主道路的取得，等等先前鼓舞著他的新世界熱烈想像的這些以為一起找到了解決之道的基點，現在一起遭遇了危機。而且這些打擊降臨的時刻，正是他在中國社會主義的理解和鼓舞下，以為初步找到了為這條道路在台灣的實現可以作出自己有效貢獻的時刻。

1979年底在和友人談到他所遭受的這打擊時，他儘量用克制、敘述的語言說：

近一年來，大陸的資訊，空前大量地出現在台灣的電視上、報紙、雜誌上。不只是文字，照片，更有活動的影像。我一貫不相信這些，總是打個五、六折去讀。然而，我終於覺得不對頭。使巴金的蕭珊受到那樣待遇的共產黨，和我讀史諾《中國的紅星》裡的共產黨，怎麼也不對頭……。這半年來，我一直處在慢性的思想苦悶裡頭。（〈答友人問〉，人間版作品集8：頁34）

但這樣重大的打擊，使他不可能每次都克制住表達他強烈受挫後的情緒。比如，在寫於1979年11月1日的，為他將要出版的小說集《夜行貨車》寫的序〈顛躓而困乏的腳蹤〉中，他便直指這先前為他所衷心信仰的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為「腐化和墮落了的革命」。他這樣寫到：

在中國，和在古老的亞洲一樣，一切不屑於充當本國和外國權貴之俳優妾妓的作家的命運，是和寫一切渴望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自由、政治與社會的民主和公平、進步的作家一樣，註定要在侮辱、逮捕、酷刑、監禁和死亡中渡過苦難的一生。近百年來，在中國，有許多作家曾以孤單的身影，面對從不知以暴力為恥的帝

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做過勇敢而堅毅的抗爭；也曾為信其必至的幸福和光明，歌唱過美好而充滿應許的歌曲。然而，曾幾何時，他們也以更其孤單的身影，在腐化和墮落了的革命中，或破身亡家、或備嘗更其殘酷、更其無恥的損害和侮辱。（〈顛覆而困乏的腳蹤：《夜行貨車》自序〉，人間版作品集9：頁27）

顯然，文革後大陸自己所揭露出的問題，讓陳映真看到，其時大陸作家所受到的侮辱與損害，超過了他先前一向卑視的國民黨政權在三、四〇年代所加給作家的侮辱與損害。因此，他才會直指，正是在這「腐化和墮落了的革命中」，作家才「備嘗更其殘酷、更其無恥的損害和侮辱」。

無疑，在其時國民黨拼命宣傳中國大陸這些問題，用之鞏固和加強自己權力的合法性時，陳還控制不住作這麼尖銳的指斥（陳明確說過，「詳細描寫這<sup>6</sup>幻滅與反省，對於我的政治處境是有利的。但恰好是因為這樣，我卻特別不願去談它」（〈陳映真的自白：文學思想及政治觀〉，人間版作品集6：頁42）。而這也讓我們理解他當時為何在這麼尖銳的心情下，仍極力避免在公開刊布的文字中直接批判性點中共的名），固然因為揭露出來的事實本身使他震驚，應該也和他高度、全幅信仰的中國社會主義在這震驚中突然跌落，使他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對這一事實相關。這也就是他後來所說的，「曾幾何時，那一度以為是正確、光榮、偉大的真理，不轉眼間崩壞為尋常的塵泥」（〈企業下人的異化：《雲》自序〉，人間版作品集9：頁30）。

而且，我們可以想像，斯時陳映真的心裡肯定一直翻騰著，他後來通過小說〈山路〉（1983年7月寫，8月出版）裡的人物蔡千惠，寫給

6 此處的「這」指對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信仰。

當年因參加台灣共產革命而被繫獄30多年才被釋放的戀人黃貞柏的信所提出的，那個後來被許多論說所反覆稱引的大哉問：「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山路〉，洪範版小說集5：頁88）

而且，我們可以想像這問題對陳映真是多麼殘酷和痛苦。即使在寫於〈山路〉完成10年以後的〈後街〉中，當陳回憶到1970年他在台東的泰源監獄遇見「百數十名在1950年韓戰爆發前後全面政治肅清時代被投獄、倖免被刑殺於當時大屠的恐怖、在縲絏中已經度過了20年上下的政治犯」（〈後街〉，洪範版散文集1：頁60）所帶給他的激動與感動，仍使他不自覺地使用了他敘述時少有的高昂語調。他寫道：

在那個四面環山，被高大的紅磚圍牆牢牢封禁的監獄，啊，他終於和被殘酷的暴力所湮滅、卻依然不死的歷史，正面相值了。他直接會見了少小的時候大人们在恐懼中噤聲耳語所及的人們和他們的時代。他看見了他在青年時代更深入靜竊讀破舊的禁書時，在書上留下了眉批，在扉頁上寫下自己的名字，簽上購買日期，端正地蓋上印章的那一代人。在押房裡，在放風的日日夜夜，他帶著無言的激動和喟歎，不知饜足地聽取那被暴力、強權和最放膽的謊言所抹殺、歪曲和污穢的一整段歷史雲煙。穿越時光的煙塵，他噙著熱淚去瞻望一世代激越的青春，以靈魂的戰慄諦聽那逝去一代的風火雷電。獄中多少個不能成眠的夜晚，他反反覆覆地想著，面對無法迴避的生死抉擇、每天清晨不確定地等候絕命的點呼時，對於生，懷抱了最渴切的眷戀；對於因義就死，表現了至大至剛的勇氣的一代人。五〇年代心懷一面赤旗，奔走於暗夜的台灣，籍不分大陸本省，不惜以錦繡青春縱身飛躍，投入鍛造新中國的熊熊爐火的一代人，對於他，再也不是恐懼、神秘的

耳語和空虛、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洪範版散文集1：頁60-61)

而現在這些「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所投身的革命本身出了巨大問題，真的就意味著這些「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的因義就死、因義被囚，因此便變成實質無價值、無意義的虛空嗎？

而且，不僅陳映真當年獄中所熟悉的投身台灣共產運動的這些「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的因義就死、因義被囚，有這是否只是歷史錯誤所導致的一場自以為義、實質虛空的問題，比台灣共產運動參與規模大得多、犧牲也大得多的中國大陸共產革命，不也同樣有這「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因義就死、因義被囚、因義奉獻是否也只是一場自以為義、實質錯誤的問題嗎。

而陳映真雖然沒有遭到他筆下寫到的那逝去的風火雷電的一代人所遭受的生死考驗，但他藉蔡千惠寫給黃貞柏信講的，「幾十年來，為了您和國坤的緣故，在我心中最深、最深的底層，秘藏著一個您們時常夢想過的夢。白日失神時，光只是想著您們夢中的旗幟，在鎮上的天空裡飄揚，就禁不住使我熱淚滿眶」(<山路>，洪範版小說集5：頁88)，卻一定包含著他在六〇年代信仰共產主義後的孤寂中，在他繫獄7年各種各樣的煎熬中，想像中國共產革命的赤旗飄揚在台灣上空所帶給他的力量與感動。<sup>7</sup>

而且在七〇年代陳映真的意識中，這赤旗飄揚在台灣上空不再只是沒有可能的想像。如他所述，

7 陳明忠在他的〈陳映真的核心政治思想〉文中回憶，陳映真曾留著眼淚告訴他，陳映真在獄中一個談得來的牢友，在臨行前委託陳映真：當五星紅旗飄揚在台灣天空上時，請陳務必到他墳墓前告知。見陳明忠，〈陳映真的核心政治思想〉(收入本書上冊)。

七〇年，他即使在台東山區的泰源監獄，也能從中央日報看見「保衛釣魚台運動」的風潮在島內外激動地展開。他更從在獄中訂購、由他日夜懷念的文友所創辦的《文季》季刊、從《中外文學》中，驚訝地聞到一股全新的、前進的氣息在圍牆外的文學圈中，帶著難以自抑的激越，強力地擴散著。做為一代顯學的現代主義詩，遭到島內外新起的評論家猛烈批判。文學的民族形式與民族風格問題；文學語言應該讓廣泛群眾普遍理解的問題……文學是什麼、為什麼、為誰……這些文學觀的基本問題被提出來了。他像是聽到了人們竟然詠唱起他會唱又因某種極大的威脅而不敢唱的歌那樣地激動。他在那些論戰者的名字中，看見許多他的朋友和他所知道的人們，在前進與反動的雙方，鮮明地站上了立場。他感到囚壁以外的故鄉，不知如何而來的一陣春風，是怎樣開始要煽動星星之火……。（〈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洪範版散文集1：頁61-62）

要知道，這裡的「星星之火」，是讀過很多毛澤東的陳映真，從毛有名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移用過來的，最扼要表達著獄中陳映真對台灣中國共產革命再起來可能性的熱烈期望。而1975年陳映真出獄後，他更清楚了解到台灣在他所期待方向上，和他入獄前比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對此，他概括寫道：

1975年，他因蔣介石去世百日忌的特赦減刑而提早3年獲釋。台灣社會在他流放7年中經歷了「獨裁下經濟發展」的高峰期。重回家園，他頗有滄海桑田的感慨。但台灣的思潮已一反五〇年以降冷戰和內戰思維，更使他吃驚。他於是知道了保釣運動左翼的思想和文化影響。大專校園的社會意識萌芽發展。高信疆主持的時報「人間副刊」在世俗水準上不斷地激起新的知識和文化的漣漪。



朱銘和洪通的藝術使人們對深蘊於民間的強力審美發出了驚歎。「雲門」的集結與創作，讓人們感受到創造性的舞蹈的語言照樣深深地使人們的靈魂騷動不已。（〈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洪範版散文集1：頁62-63）

而接下來陳映真深度參與的左翼雜誌《夏潮》的產生影響，吸引了一時代思想和文化目光的鄉土文學論戰的發生和勝利，及社會意識在青年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更廣泛、深入地覺醒，在在都讓陳映真會比獄中更感覺，台灣離共產革命的赤旗飄揚在其上空這一他熱望的目標更進了一步。

而所有這些，都可讓我們更清楚體會，陳映真事後很少談及的，中國社會主義出了重大問題所帶給他的衝擊與痛苦，是核心性的、根本性的。而且這如此核心性、根本性的強烈衝擊，所搖撼的不僅僅是他的思想和觀念，也直接強烈衝擊到他的精神、情感和心理！

## 二、社會主義遭遇危機與陳映真民主理解、民族主義理解的重構

但為什麼很多左翼知識分子都曾以為是真理的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當文革後它很多重大問題被揭露出來，這一導致世界很多曾被中國文革吸引的左翼知識分子幻滅的事件，卻沒導致陳映真出現在這些幻滅的左翼知識分子中常見的脫隊、轉向（〈台灣變革的底流〉，人間版作品集6：頁201），乃至頹廢、虛無，乃至變為陳映真所卑視的「誇誇然議論著自己的幻滅和對於使自己幻滅的事物痛加責備，且洋洋然以為前進」（〈陳映真的自白〉，人間版作品集6：頁42）的龐然佇列中呢？如此，並不是陳映真沒有經歷痛苦的「幻滅和反省的過程」（同前引：頁42），恰恰相反，

由於陳映真不是一般地一時地把中國社會主義當成真理，而是在十餘年中都把之作為「正確、光榮、偉大的真理」，不僅以之作為自己世界觀、思想的根本憑依，甚至還內在、根本地決定他精神、情感和工作的核心關切感覺，而這些，必然使1979年陳映真所經歷的曾經長時間「以為是正確、光榮、偉大的真理，不轉眼間崩壞為尋常的塵泥」——這一中國社會主義危機對他的衝擊和因之引發出的幻滅感，帶給他大大超過很多受中國文革吸引的左翼知識分子更大的折磨和痛苦。那，支撐陳沒有因之轉向（通過快速承認自己的問題，快速轉向過去與社會主義競爭的成套邏輯，來解消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挫折這一左翼歷史大事件帶來的挑戰），或頹廢、虛無、隨波逐流（等於以承認人生本不需積極地進行價值選擇、價值判斷、價值堅執的消極方式，來應對在這一因對社會主義價值系統的信仰和追求所引出的社會主義實踐受挫所帶給他的挑戰），或通過遁逃到中國傳統、藝術等當中去，以紓解自己的焦慮（這是一種跟現實拉開距離的方式，相比前兩種方式，這尚算一種不無建設意義的較積極方式），而在實質上保持著與先前相通的問題關切、價值關切，他又是通過哪些資源，什麼樣的思想探索和調整做到這一點的呢？

細讀陳映真的各種文字，我們會明白，使陳映真在此挫折面前沒有倒入上舉他人各種途轍的根本，在陳映真對何謂有意義生命、生活的理解<sup>8</sup>，在陳映真對弱者、被侮辱、被損害者的深切同情，在陳映真對苦難發自內心的悲憫和對人為苦難、不公正不容自己的反感與渴望克服，在對民族健康、自主發展的深切關懷，在對近現代中國的被侮辱、被損害，和在此被侮辱、被損害中不斷振起歷史的深切認同。

如前所述，在1979年中國社會主義問題暴露在陳映真之前，陳映

8 筆者將來會專門撰文討論陳映真各種作品中豐富的有關生命、生活意義的理解問題，敬請有興趣的讀者關注。

真所以認為中國社會主義是「正確、光榮、偉大的真理」，根本原因在陳映真認為他所關切的這些問題和價值，都在斯時的中國社會主義觀念邏輯和實踐中得到了理想解決和安置。而1979年中國大陸自身對中國社會主義問題的揭露所以給陳映真以巨大打擊，當然在於文革以後中國大陸問題的暴露，讓陳映真看到中國的實際國力、真實經濟、技術和人們的物質生活水準都和中共過去的宣傳存在很大落差，不過，細讀陳映真的文字，我們可以看到，文革後揭露出的中國社會主義諸問題中，對陳更根本的打擊來自：陳映真本以為中國社會主義是人的充分解放者，廣泛、真正民主的實現者，有意義生活與生命形式的實現者，民族健康主體的塑造者，結果在文革後大量事實的暴露中，中國社會主義反變成了民主的踐踏者，勇於踐行自己批評權力、按照良知講話行為的壓迫者，大批人墮入虛無、玩世、狹隘的重要責任者。

這些問題的暴露，當然使陳映真不再認為六、七〇年代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是對這些問題的完滿解答，是對這些價值的完滿實現與安置。而這樣，也便意味著陳映真在他先前信仰挫折後，必須以這些價值關切為動力，重建他感受、把握人生與中國與世界的基本框架，重新摸索他先前本以為已有了答案的對人、對台灣、對中國大陸與對世界所存在種種問題的新解答。

在陳映真因挫折而幻滅，因幻滅而反省而調整的努力中，陳映真得以最早重構成形的調整是對思考、看世界具有關鍵基點性的民族主義和民主問題的新理解。

還在他因挫折而痛苦方濃的1979年，他便開始重新反省他過去的民主和民族主義理解。在該年年底和友人的談話中，他整理自己反省後關於民主的新理解，說：

第一，我一貫認為，西方式的、「資產階級民主」，有虛偽的

一面。這是至今我也這樣想的。不同的是，我曾相信在大陸有人民的、無產階級的民主。現在，事實擺著，這一點，我錯了。否則，人民、無產階級有充分的民主權利，怎麼會鬧「四人幫」，怎麼到現在才說「中國革命勝利並不是一個人之功績」？

第二，我開始想，不能把民主的問題，用「資產階級性」這麼簡單地收拾。就好像資本主義生產，是人類的一種進步，而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少不了以資本主義的技術、資本、管理為條件——比如說，過去中國正是資本主義太少而不是太多，才使中共面臨著資本積蓄、現代技術和生產管理上的問題。今天，在精神上，中國也同樣缺少資產階級民主生活的經驗，好據以發展更真實，更縱深的，人民的、無產階級的民主生活。

第三，現在，我理解到中國的未來，基本上，是中國人民的未來，而不是那一個黨，那一個政權的問題。要求生活上基本公平充裕；政治上充分而真實的參與，有真實的民主，人民群眾真正的當家做主人；精神上沒有教條、戒律，有充分思想、言論、信仰的自由，這是海峽兩岸中國人民共同的、不能妥協的、不可壓抑的願望。誰實現了，滿足了這個願望，誰就受到全中國人民最堅定、熱情的支持。反之，誰壓抑、反對這個願望，誰就一定要滅亡！

（〈答友人問〉，人間版作品集8：頁35-36）

在同一篇談話中，他亦詳細談及他現今的民族主義理解。他說：

民族主義、對於中國，在目前階段，是要使中國從帝國主義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軍事的支配中求得完全的解放；是民族內部的和平與團結；是承繼民族文化遺產中的精華，並發揚光大

之；是有條件、有選擇地、認真、虛心地學習其他國家的長處，求民族之發展及向上。（〈答友人問〉，人間版作品集8：頁39）

他並特別檢討他過去的民族主義以中共為認同，強調，今後他的民族主義是「以中國人民為認同主體」。他說：

幾十年來，我們在這個分裂的祖國兩邊的政權中，找尋、選擇認同的物件。有人選擇台北，有人選擇北京，也有的人兩邊都不要，要自己塑造認同的目標。現在想來，這些都不能充足地滿足民族認同的需要。但是如果我們認同的主體是那創造了中國歷史的中國人民，我們就不會由那一個黨、那一個政權而使我們失落了認同。我們所認同的，是那歷史的、文化的、混合著恥辱與光榮、挫折與勝利的、我們父祖所立、所傳的國。對於一個愛國者，他不能說：我愛漢、唐，不愛宋、明……。而這父祖之國，歸根究底，正是無數中國人民所建造的。（〈答友人問〉，人間版作品集8：頁36）

熟悉文革後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言論的人，可能不會覺得這些言論有什麼特別，但對熟悉陳映真思想歷程的人來看，便可體會這些言論對接下來陳映真思想展開的重要性。從「生活上基本公平充裕；政治上充分而真實的參與，有真實的民主，人民群眾真正的當家做主人」，和「以中國人民為認同主體」，我們看到陳映真雖然已從激進的「文革」邏輯社會主義大大後退，但並沒後退出社會主義的底線。

從「民族主義，對於中國，在目前階段，是要使中國從帝國主義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軍事的支配中求得完全的解放」的首要強調，我們可以看到陳映真看整個現代世界史和批判當代世界主流理

解的重要角度「第三世界」視野，所以沒有讓受挫後的陳映真產生在基本價值感覺上重構的必要（當然，從七〇年代到21世紀陳映真的第三世界論，包括第三世界視野對中國大陸和台灣思想和實踐的意義，陳映真不斷在充實，在深化），和陳映真此重構後的民族主義仍特別強調「從帝國主義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軍事的支配中求得完全的解放」是中國民族主義的首要課題密切相關。

從陳映真此處資產階級民主、資本主義技術、資本、管理對建成一個好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具有的正面意義的理解，我們看到陳映真和大陸正在起步階段的改革開放政策，勢頭正健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內在配合性。但就像該時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思想解放運動在展開時，是以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承認為前提的，以尚沒有充分認識——在借鑒西方已經發展的相當成熟的資產階級民主和資本主義的技術、資本、管理、行銷和市場治理時，將會形成的和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可能緊張為前提的，此時的陳映真對這中間可能出現的各種緊張顯然也沒有正面去思考。而後來正是在該如何面對、處理這些緊張上，希望中國大陸能找到更理想方法安排兩方面的衝突、緊張關係的陳映真，和在大陸要實際處理這些問題的大陸國家，和試圖對這些衝突作出思想安排的大陸知識分子，從八〇年代後期開始形成著或明或隱的緊張。而這緊張，因中間還夾雜著大陸國家權力腐敗、社會貧富分化嚴重等問題，和陳映真與大陸國家權力與許多大陸知識分子不同調的民族主義感覺、民族主義理解與資本主義感覺、資本主義理解，而變得更加糾纏、複雜。這些當然是後話，但關懷中國大陸發展的陳映真未能早致力思考、安排——借鑒西方已經發展的相當成熟的資產階級民主和資本主義的技術、資本、管理、行銷和市場治理，會和他仍然堅持的左翼取向、社會主義價值間形成的衝突、緊張，不能不影響到他在介入大陸知識、思想、文學問題時發揮更及時有效的影響。

而當然，所有這些重構得以發生的契機，是他過去認為正在有效實現普遍民主，寄託著他民族主義理想和熱望的中共國家本身出現了嚴重問題。而現在把認同基點從被認為代表著真理的中共轉向中國人民，他就不僅為現在困擾他的他過去的民族主義和民主理解找到了一個新的基礎支點，從而解決了他自己的認同失落問題，而且他界定認同中國人民的方式，「我們認同的主體是那創造了中國歷史的中國人民〔……〕，是那歷史的、文化的、混合著恥辱與光榮、挫折與勝利的、我們父祖所立、所傳的國」，他也為自己的愛國感情重置了一個更穩定的基礎。正如他所說：「對於一個愛國者，他不能說：我愛漢、唐，不愛宋、明……。而這父祖之國，歸根究柢，正是無數中國人民所建造的。」而這一認同方式，還紓解著他過去實際上在以他意識理解中的中國大陸社會主義批判台灣現實，現在則因中國大陸社會主義遭受著危機所帶給他批判的結構性困境，用陳自己的話說，就是，以中國人民為認同主體，讓他和過去與他抱有相同立場的朋友，因這新的認同主體而取得了「批評國共雙方的自由」(〈答友人問〉，人間版作品集8：頁39)。

不容否認的是，這一陳映真因應他的信仰、思想、精神危機的民族主義、民主理解的重構，在解決了一些問題後，也留下了很多需要進一步深思的問題。就像陳映真很快意識到的，六、七〇年代中國大陸許多內部問題的發生，跟該時美、蘇兩大國及其盟國、扈從對中國大陸的敵視、封鎖、威脅密切相關，而中國大陸所以陷入這樣一種國際局面，又跟中國大陸其時「尋求國家完全的獨立、民族的完全解放」(同前引：頁39)這一陳映真認為極重要的價值時，不能適當反應，對國際上一些行為和現象的過度反應有關。

而「民族主義，對於中國，在目前階段」，既「是要使中國從帝國主義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軍事的支配中求得完全的解放」，那又該如何處理這一價值目標與他前引民主論述時已邏輯隱含的，並在

中國大陸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和八〇年代中國大陸知識分子思潮中變成越來越強音的——向資本主義學習技術、管理，利用資本主義的資本，和借鑒資產階級民主經驗——這些方面該是一種什麼樣的動態辯證關係呢？同樣困難的問題還有，陳映真民族主義所強調的「承繼民族文化遺產中的精華，並發揚光大之」，和「有條件、有選擇地、認真、虛心地學習其他國家的長處，求民族之發展及向上」，這兩個抽象講來很容易解決，但落實在具體時空中如何拿捏、安排兩者間的關係則常常是很複雜的問題。具體而非抽象地妥置這些問題，要求對世界現實有很深的了解和認識，更需要對中國自身有深切的了解和認識。具體到中國大陸，則需要對大陸1949年以後的歷史，和這一歷史所從出的中國近現代史有深切認識，同時還要對它現實的境遇和現實課題有敏銳、富平衡性的掌握。

同樣，陳映真對何謂認同中國人民的界定方式：「我們所認同的，是那歷史的、文化的、混合著恥辱與光榮、挫折與勝利的、我們父祖所立、所傳的國」，更意味著要真正做到此點，必須做特別的認知努力，才能對這歷史、這文化、這混合著恥辱與光榮、挫折與勝利的、生活於這中國國土上的人民有深切理解與認識，以這理解和認識為前提而出發的思考和批判，才能說是立足於人民的思考和批判。否則，自以為對人民的代言很可能和人民無關，自以為是人民的認識更可能是自己的一廂情願。

而陳映真在把調整後認同中國人民的新思考、新信念用到該時的大陸上時，實際上沒有充分意識他的這一新調整在一時解決了他的困擾後會引出的種種新挑戰。他在宣布認同的主體應該是「那創造了中國歷史的中國人民」後，緊接著寫到：

在中國大陸，現在勇敢地批評大陸體制的人，不論對於中共有多



麼苛烈的責難，但其愛國之情，灼灼感人。不，這簡直是百多年來中國愛國知識分子共同的特點：批評當權，熱愛國家。批評，為了他深愛這祖國。離開了政權，國家還有什麼呢？人民。愛國的中國知識分子最高的誥命，來自人民——而不是那一個黨，那一個政權。這是我新的覺悟，不論是國民黨，不論是共產黨，都曾在歷史上受到人民和知識分子不惜以犧牲生命表達擁護之忱。此無他，因為他們在那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正確地、勇敢地、偉大的站在中國人民的利益上，為實現中國人民共同的願望而奮鬥過。今天，他們所以受到批評，我想，也要從這個視角去分析。

（〈答友人問〉，人間版作品集8：頁36-37）

顯然，這樣的一些表述隱含著多方面問題：一、過度肯認國家權力和人民兩分的有效性；二、對國家權力和人民內部可能蘊含的複雜性和張力的重要性重視不足；三、過度假設人民立場的必然正確性；四、實際等於認為中國愛國知識分子對國家權力的批評自然代表人民。

不錯，國家權力和人民相當程度可以兩分，而且這種兩分對我們展開、認識很多問題是必要的。但在實際認識中，過度誇大這種兩分的有效性，則妨礙很多需要互為視角才能展開的認識。而過度同質性想像國家權力和人民，並認定人民立場的正確，會使我們對人民的認識淺嘗輒止，並缺少深入分析國家權力複雜性的動力。而先入為主認為中國愛國知識分子對國家權力的批評當然代表人民，實際等於在陳映真重構的民主理解和民族主義當中，把看起來居於核心位置的人民實質變成了一個不需特別認識便可被知識分子代表的物件。

以這為背景，我們就可相當程度明白，何以八〇年代初陳映真諸多有關大陸的文章，核心焦點在指控、批判對異議和批判的知識分子與文學家的壓迫。就是，不僅權力壓迫知識分子、文學家本身不義，

需要嚴正抗議，而且由於這些被壓迫的知識分子、文學家代表著人民，代表著有關中國現實和未來的正確立場，這樣，支持這些知識分子、文學家便成了為中國人民負責、為中國負責。

而這樣，我們也就可以相當程度理解，為何他本包含著開啟出新的認識、理解動力與契機的，他的「以中國人民為認同主體」的新觀念，當時並未帶動他進行更多探索。而這樣，也可幫助我們理解，他對他當時已經認識到的一些重要問題，為何也未能去致力、解答。比如，在1980年6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他談到：

中共在大陸31年的經驗，到了今天，中國人民已經深刻地體驗到「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即黨官僚專政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民主」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巨大差距；一個資本主義不發達、在民族資本積累上貧弱的條件上建設社會主義時，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巨大而嚴重的困難；在政治經濟條件不充足的情況下，「社會主義」社會中封建法西斯因素的強大殘留及其可怖的影響；馬克思主義革命的極端宗教化帶來對於人性、道德的令人戰慄的殘害……等諸問題，在過去大陸創痛猶如惡夢的體驗中，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中，為有識的中國知識分子和人民，提出一串串深刻而沉痛的問號。（〈中國文學的一條廣大出路〉，人間版作品集11：頁95-96）

顯然，對這些問題中的每一個的發生與演變作細緻、深入的分析，都會對深入了解、反思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主義，對深入了解、認識和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主義有著明確承傳關係（此處所說的承傳除通常講的承續，還包括以直接反彈的方式所承受的影響，而所以包括直接反彈，是因為直接反彈意味著以反向的方式受毛澤東時代範導）的當時中國大陸國家，和從這一歷史所出的國家下的人和社會有著重

要意義。而且只有對這些問題作細緻、深入的研究與分析，我們才會既清楚把握這些令人痛心現象形成的歷史—結構過程，又能從此歷史中發現可資後面歷史順承轉化的積累和能量。而也只有以這樣一些細緻、深入的研究、反思為參照，我們才會對那些過快、乃至被心情所左右的對毛時代的各種匆促反應，作出恰切的定位和評價。

對中國大陸暴露出的不理想現實痛心，卻又未能深入內在去致力解析、把握這些現實，當然，使陳映真八〇年代初的大陸批評易流於平面化，比如：

在中共「四人幫」崩潰以後，中共政權在中國大陸的政治成績單被揭露了出來。原來在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活中，民主、自由、人權的飽受限制和摧殘，官僚主義、貪污、腐化和特權的橫行、民族自信的極度淪喪，社會生產的一般性的落後這些事實，甚至使自來極度反共的人們，也為之瞠目。（〈路線思考的貧窮〉，人間版作品集 12：頁13）<sup>9</sup>

而這樣一種整理方式，自然容易讓他接受對中國大陸國家政權是「封建專制官僚主義」的過快定性，容易讓他把自己的大陸注意力過分聚焦於該時中國大陸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的運動」<sup>10</sup>，而不去致力對中國大陸國家政權、這一政權下的社會和這一政權下、社會中的人作深入細緻的把握、分析。而這就使得八〇年代初的陳映真雖然在情感上和極度反共的人們不同調，但他八〇年代初批評大陸文字的基本內容，卻和他實際非常有距離的極度反共人們的相關文字，無論在視野

9 〈路線思考的貧窮〉，原刊於1982年9月《生活與環境》(台灣)2卷3期。

10 陳映真，〈迎接中國的春天〉(講演稿)，載《中華雜誌》(台灣)21卷234期(1983年1月)，為陳映真在台灣舉辦的「『中國之春』討論會」上的發言。

聚焦上、問題的把握方式上、定位這些問題的性質方式上，並沒有多少實質不同。

可惜的是，不僅整個八〇年代陳映真沒有再去努力進行對中國大陸歷史一現實的細緻把握和分析，當九〇年代以後時代的氛圍與課題使陳映真覺得需要對毛澤東時代作出重述時，他一些頗具啟發性的有關文字仍不是在對他當年所提出的諸重要歷史—思想課題的發生與演變，作細緻、深入研究與分析的基礎上寫出的，而這，使得這些文字的啟發只是一些初步的方向，而不是切實有力的洞察。

在很大的意義上，中國大陸八〇年代末期為陳映真所憂心、反感的知識分子思潮的所以形成，正是以對陳映真八〇年代初所提到的諸問題和現象作過快定性反應所形成的歷史感覺與觀念感覺為基礎的。此不之思，陳映真當然不能對他反感的中國大陸八〇年代末期思潮的所以形成，給出能貼近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實際感受和經驗的有說服力的分析來，批評也就不能和其時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內部經驗、感受視野有真正對話。而這樣的批評會讓被批評者深感隔膜乃至反感，不能不說也有著陳映真自身的責任了。<sup>11</sup>

追究關懷大陸的陳映真後來所以陷入和大陸作家、知識分子的交流尷尬<sup>12</sup>，其「以中國人民為認同主體」的新觀念用在大陸時所連帶的——認為中國愛國知識分子對國家權力的批評當然代表人民，而人

11 陳映真對八〇年代末中國大陸知識界思潮的分析和批評，集中表現於〈悲傷中的悲傷：寫給大陸學潮中愛國的學生們〉（《人間》雜誌〔台灣〕，1989年6月號，總44期，頁19-24）和〈等待總結的血漬：寫給天安門事件中已死和倖活的學生們〉（《人間》雜誌〔台灣〕，1989年7月號，總45期，頁70-73），我在接下來關於陳映真的論文中對這些分析和批評會有更多討論，敬請有興趣的讀者關注。

12 有關1980年代末、1990年代陳映真跟中國大陸文學界交流中的尷尬和錯位，可參見薛毅，〈烏托邦精神與革命：陳映真在大陸的命運〉（2009年11月21-22日，新竹：交通大學「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會議論文集），頁293-308。

民又正確，這一當初隱含的邏輯與感覺實要負著不小的責任。正是這一隱含的邏輯與感覺使陳映真八〇年代初有關大陸的大多批評文字，並不包含校正八〇年代末期陳映真憂心、反感的大陸知識分子思潮的八〇年代初起源的思想意涵。不僅不包含校正的思想意識、思想意涵，且多數實質上是和對毛澤東社會主義實踐作過快定性反應的當時大陸主導知識、思想狀態與氛圍配合的。

到此，我們便可更清楚看到陳映真民主理解和民族主義重構中的「人民論」對他八〇年代大陸批評、思考的兩面性。一方面，陳的「人民論」使他獲得了一個批判性審視大陸黨國權力的支點，而他「人民論」所隱含的邏輯使他自認他的大陸批評代表著大陸人民心聲，從而有力推動著他八〇年代上半對大陸國家進行積極的批評<sup>13</sup>；但相比這積極的一面，他「人民論」隱含的認識連帶邏輯，則妨礙著他對其時大陸的歷史與現實進行深入、細緻的探索，而這導致著向來敏銳的他的八〇年代上半的大陸批評文字，雖多，卻在大陸歷史、現實認知上甚少獨到性。

當然，這不只是陳映真的問題。在相當的意義上，我們今天所豔稱的中國大陸「新時期」，便是在未對陳映真所提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民主』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巨大差距』等重要問題，作充分細緻、深入的歷史—結構性分析與反省便展開的。而當時許多人所以沒有積極動力去對這些問題作充分細緻、深入的歷史—結構性分析與反省，正在於當時他們認為他們在代表著「人民」的心聲。更讓人驚異的是，遲至今天，對這些問題亦談不上有充分細緻、深入的歷史—結構性分析與反省，當然，更談不上以這些分析、反省為視角，對中國大陸「新時

13 陳映真八〇年代上半對中國大陸國家的批評文字很多，1988年出版的《陳映真作品集6：思想的貧困》、《陳映真作品集8：鳶山》、《陳映真作品集9：鞭子和提燈》、《陳映真作品集10：中國結》都收有這類批評文字。

期」的發生乃至整個「新時期」的變遷作出分析。而這，不能不讓我在為當年的陳映真遺憾時，更為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中國大陸知識界遺憾。

相比，陳映真運用於大陸的「人民」論述因在實質上停留於對大陸「人民」的抽象理解，而對他八〇年代大陸批評、思考產生的種種影響，生活於八〇年代歷史變動快速的台灣的陳映真，則因台灣現實所提出的種種問題的挑戰，使他的「人民」論述在他對台灣的種種批評介入中，很快便不能停留於同質、抽象的理解，而必須發展為分疏其種種內在衝突、緊張和曲折的把握方式。

比如，因知道當時黨外和當時官方所使用的「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有把兩岸分斷固定化、永久化的作用，陳映真便從台灣實際存在的社會經濟地位差別的角度，剖析此看起來具體，實際忽視社會經濟分疏說法的抽象性，並進一步分析此看起來無涉社會經濟問題說法的社會經濟屬性，從而對救平差異、掩蓋社會經濟實質的「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作出了批判。（〈追究「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人間版作品集12：頁41-48）<sup>14</sup>

比如，因為看到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前面的黨外後面的民進黨雖然都有代表全體中華民國人民和全體台灣人民的宣稱，也在這宣稱中對工人階級有種種承諾，但究其實卻缺少足夠的工人階級立場，陳映真因此熱烈希望工人致力「建立真正獨立的產業工會」，並熱烈支持工黨的籌組，期待它們在爭取台灣工人階級參與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的權利，工人階級應得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利益上發揮重要作用。<sup>15</sup>

比如，因看到台灣長期的「冷戰—國家分裂—戒嚴體制」和這一

14 〈追究「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原刊1983年4月《夏潮論壇》(台灣)。

15 參見陳映真，〈建立真正獨立的產業工會〉(人間版作品集12：頁125-128)，原刊於1984年8月《夏潮論壇》(台灣)；〈台灣勞工必須組織自己的政黨！〉(人間版作品集12：頁145-148)，原刊於1987年9月《海峽》(台灣)。

體制下附屬美日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已使台灣不論是官方還是反對黨，都嚴重滋生出戒嚴體質。而此戒嚴體質按陳映真概述是：

一言以蔽之，就是沒有主體性的、盲目的反共，並且從這非主體性的反共熱情、延長為反中國，甚至對中國民族和文化的嚴重歧視；是對美日帝國主義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勢力圈構造非但沒有批判，反而亟欲成為這構造中的一員；是對國際霸權干涉中國內政，欲使台灣與中國永久分裂的陰謀非但不加撻伐，反而公開呼籲國際霸權侵犯中國，使台灣與中國長期分離；是公開反對中國民族主義，在民族、政治、經濟和文化上，提倡具有國際背景的「台灣化」和「台灣主義」……。（〈戒嚴體制和戒嚴體質〉，人間版作品集12：頁141-144）<sup>16</sup>

而這一作為戒嚴體制幾十年後果的戒嚴體質在台灣社會的普遍存在，自然使陳映真認為只有對戒嚴體質進行充分的清理和批判，台灣社會在和戒嚴體質密切相關的問題上才會有健康的看法。

陳映真八〇年代在台灣的一些經驗，當然不會使他覺得不能在國家權力和人民間作出兩分。但僅僅上舉他這些台灣經驗，應該已使他不相信：有完全同質化的人民；人民總是可以和國家清楚切分；人民的立場總是可以信賴；以自由、民主、人權為口號，以代表社會、人民為理由的反抗國家權力者並不必然代表全社會、全體人民，特別是社會中弱勢者、被損害者。相反，國家和人民都可以在某些方面是特定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關係中的被模塑者，某些方面人民、社會和國家之間也互相模塑、互為結構，而太多有關人民的呼

16 〈戒嚴體制和戒嚴體質〉，原刊於1987年8月《海峽》（台灣）。

聲、社會立場的說法只有通過耐心、細緻的分析才能釐清它在特定時空中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內涵。

相比八〇年代陳映真從社會經濟、階級角度和冷戰—國家分裂—戒嚴體制角度對台灣社會的分析，陳映真八〇年代中期以後，也漸多從冷戰—封鎖—民族分斷和對這冷戰—封鎖—民族分斷過度政治、經濟、心理、文化反應的角度來分析毛澤東時代的言論；也漸多中國大陸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有意識對中國大陸菁英進行影響等角度對大陸經濟、社會問題和思潮變遷給出分析；也漸多用階級話語整理中國大陸內部問題的言論。但總的來說，從特定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關係角度對中國大陸歷史、社會的分析未能像他對台灣歷史、社會的分析發展的那麼切實、有力，而他用於大陸描述和分析的階級話語主要是為了提醒大陸注意階級分化、貧富懸殊等問題，遠未能像他從此角度對台灣社會給出的分析更充分、尖銳。凡此，有資料問題，有歷史—現實隔了一層的問題，有大陸歷史—現實更為複雜的問題，有陳映真八〇年代以後主要精力用於台灣內部的問題，但由於這些角度確實是把握大陸歷史—現實不可或缺的角度，進展不夠，使用不夠適度，當然都會影響陳映真從這些角度對大陸歷史—現實把握的說服力。<sup>17</sup>

而且除社會經濟、階級角度和冷戰—國家分裂—戒嚴體制角度對台灣社會的分析外，八〇年代的陳映真還發展出和他理想主義重構相配合的另外一種把握台灣社會的方式，這一把握方式沒有像陳映真的社會經濟、階級分析和冷戰—國家分裂—戒嚴體制分析那樣以正面論說展開，在八〇年代卻實實在在影響著陳映真眾多思想、文化和社會實踐（包括《人間》雜誌創辦這一項八〇年代陳映真最有重要性的思

17 關於八〇年代中期以後陳映真有關中國大陸言論的詳細把握與分析，我在接下來關於陳映真的論文中會有更多討論，敬請有興趣的讀者關注。



想、文化和社會實踐)。而在我看來，至少對大陸而言，八〇年代陳映真理想主義重構和與之配合的陳映真這另外一種把握台灣社會的方式，對同樣經歷了社會主義危機、理想主義挫折，並於這危機和挫折之後快速進入一個商品消費無孔不入的時代的大陸社會，更具啟發性。如此說，並非意在否定陳映真社會經濟階級分析和批判的國際分析的重要性，而是因為相當程度上，大陸文革後雖然一度棄擲了它的階級分析、左翼的批判的國際分析傳統，但後來它自身遭遇的階級分化問題，和它進入世界更深後所看到的、碰到的種種問題，都在相當程度上重新啟動它的階級分析、左翼的批判的國際分析傳統，這也是陳映真這部分資源，在今天大陸引起很多知識分子特別關注的原因。相比，陳映真的理想主義重構和與之配合的另外這種把握社會的方式，則尚沒有在今天大陸的知識界引起足夠的注意，而這也是我接下來會用相當篇幅分疏陳映真這方面經驗與思考的重要原因。<sup>18</sup>

### 三、社會主義遭遇危機與陳映真理想主義的重構

和社會主義遭遇危機後陳映真的民主理解、民族主義理解重構尚有扼要直接講述文字的不同，對陳映真八〇年代知識、思想、文化、文學實踐有著極內在影響的他的理想主義重構，在他的文字中則基本沒有正面、直接講述。而需要我們參照他遭遇此危機前，他有關一個生活於相當時間內沒有共產革命發生可能的社會的人們，又如何過一種有意義的、生命仍充實飽滿的，同時又對該社會最後通向他認為理想的社會有實際正面促進作用的探討。在很大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這

18 有關陳映真理想主義的重構，本論接下來的第三節便有詳細的討論，有關實質影響了陳映真《人間》創辦的他的另一把握台灣社會的方式，我則要在接下來有關陳映真的論文中才能詳細展開，也請有興趣的讀者關注。

是一種歷史—現實條件不配合陳映真希望的——通向社會主義的革命能迅速發生——這一理想的歷史展開條件下，陳有關理想主義的探討。但恰恰是當年陳映真對這一不理想條件下的理想主義探討，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不理想暴露在陳映真面前後的陳映真的理想主義重構有著結構性相關關係。因此，對陳映真這一不理想條件下的理想主義探討的細緻分析，當然也就為我們準確理解陳映真極少談起的中國社會主義遭遇危機後他理想主義的重構所必需。

有意思的是，陳映真有關不理想條件下的理想主義思考的集中表述，是在他寫於1978年初的小說〈賀大哥〉中。<sup>19</sup>而該時間是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許多問題已在中國大陸開始大規模公開揭露，卻尚為陳映真所不知的時刻。

為準確傳達陳映真這一有重要性的思考，我要請讀者原諒我對小說中相關部分作詳細概述和大段徵引。

在小說中，陳映真對不理想情況下理想主義的思考，是通過小說中兩個最主要人物賀大哥、小曹的對話傳達的。這一對話在小說中的有關文脈是，有著一定理想主義衝動和社會關懷萌動的大學生小曹，大學期末考結束後，和她參加的大學社團「慈惠社」的同學一起，到一個天主教辦的在市郊小鎮的「聖心小兒麻痺復健所」去短時間作義工。在這裡小曹碰到了長期在這裡作義工的、當年參加過美國青年反叛運動的Hopper「賀大哥」。在短短幾天的共事中，小曹被賀大哥工作中總是「流露著一種發自內心極深之處的愛的的光芒」的精神狀態，和「如果去愛人類同胞，變得需要有一個理由，這就告訴我們：人在今天已經活在如何可怕的境地」(〈賀大哥〉，洪範版小說集3：頁93)，「如果愛別人，關心別人的事，竟只成為一些稱為這個或者那個宗教的教徒的事，這就

19 有關〈賀大哥〉的寫作時間，1978年陳映真在接受《前衛》雜誌的訪問〈下一件差事：陳映真的再出發〉(登載於該年5月出版的《前衛》[台灣]第1輯)中有明確談及。

告訴我們，這個世界已經不是人的世界」(同前引：頁93)這樣一些言論，所震撼、所吸引，在社團義工結束後，又一個人跑回復健所，以找賀大哥幫助補習英文的理由，想更多地了解賀大哥的心靈和思想的世界。在讀了賀大哥讓讀的一本《普希金傳》和克魯泡特金(或關於克魯泡特金)的書後，小曹既被「集貴族、無賴、執袴、天使和反叛者於一身〔……〕任恣而斗膽地挑激命運中狂亂的歡樂和危噩」普希金的一生所震動，又被克魯泡特金所代表和表現的，「當時俄國的一群恥於坐享他人的血汗所積成的財富，紛紛叛離自己富裕、高貴的門第，憑著自己的力量賺取衣食，並且蜂湧地、深深地走進俄國的廣大的農村，力求與農民親密地接觸，忠誠盡心地在知識上、生活上幫助俄國農民的擴及全俄的運動」(同前引：頁97-98)，激動到連連失眠。

以這些敘述為背景，開始了如下賀大哥和小曹的，有關革命沒有條件發生的情況下，如何堅持理想主義的對話：

「在六十年代，美國也有過類似的運動。」賀大哥用英語說：「那時的美國青年，在一個又一個運動中，對美國的富裕，提出道德方面的質問；對美國國家永不犯錯的神話，提出了無情的批判。」

那時候還在讀大學的賀大哥，「曾以為美國的『革命』就在眼前。」

「你簡直就覺得，那美麗的世界已經在望」，他說：「一個新的、美麗的美國啊。」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普普通通的一個英語單字beautiful，能裝載、能傳達出那麼叫人心疼的熱情和理想。

「後來呢？」

「後來呢」，賀大哥寂寞地、輕輕地搖著頭，說：「後來，多麼

殘酷，那只不過是一場夢，啊，中國人說，說……什麼一夢？」

「噢，『南柯一夢』。」

「啊，南柯一夢。」

賀大哥似乎高興地笑了起來。他說他終於看到，「美麗的美國」、「新的美國」之來，或許是一百年、兩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以後的事。

「一百年、兩百年啊！」

「對的。」賀大哥說。

「啊啊，」我憂愁地、筆直地望著他，說：「那麼，你的一生，如果明知道理想的實現，是十百世以後的事，你從那裡去支取生活的力量啊。」

他的隱藏在棕色的、開著極為分明的雙眼皮中的燈火，悠悠地燃燒起來。不，他說，毋寧是清楚地認識到不能及身而見到那「美麗的世界」，你才能開始把自己看做有史以來人類孜孜矻矻地為著一個更好、更公平、更自由的世界而堅毅不拔地奮鬥著的潮流裡的一滴水珠。看清楚了這一點，你才沒有了個人的寂寞和無能為力的感覺，他用英語說，並且也才得以重新取得生活的、愛的、信賴的力量。

我很坦白地跟賀大哥說，我至極敬愛著他的胸懷。「但是，賀大哥，良善和熱情，怎能改變這麼一個冷漠、凶殘的世界啊！」

「不，讓我們去愛，讓我們去相信，」賀大哥虔敬地說：「愛，無條件地愛人類，無條件地相信人類。」這樣的愛，時常帶來因著我們所愛的對象的不了解，而使施愛的人受到挫折、失望。「但是，這個時候，你最要照顧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別人——照顧自己不在你的愛受挫之後，冷淡了愛的能力，」賀大哥說：「讓我們也相信一切、一切的人——雖然這無條件的信賴，往往帶來

甚至以生命當代價的危機。但是，讓我們相信。」總有一天，他說，更多、更多的人能夠不圖回報，而從一個人的生命的內層去愛別人、信賴別人。賀大哥說：「那美麗的、新的世界就伸手可及了。」

在我們的「慈惠社」裡，「愛心」幾乎成了一個冗濫的套語。但是，差不多整個暑假，賀大哥使我重新認識了「美麗」、「幸福」和「愛」等並不罕見的辭語，是有著充滿希望，充滿了鼓舞人們的靈魂的新的含意。

（〈賀大哥〉，洪範版小說集3：頁98-101）

顯然，這段對話在儘量能被當時環境允許又切合人物身分的情況下，在談——嚮往革命、信仰革命，卻生活在所嚮往的革命不能發生的社會中的人，如何既誠實面對自己信仰，堅持工作有助於這信仰在自己所處身社會最後的實現，身心又始終處於飽滿、充實狀態——這一重要問題的。說「儘量被環境允許和切合人物身分」，是因為相對俄國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思潮與運動，陳映真當時更心契的當然是中、俄共產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但讓這些直接出場，既被當時台灣的環境所不許，也需要更多的鋪墊，才能讓處於那樣一個成長背景和生活環境的小曹接受這些顯得有說服力。而用俄國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和美國六〇年代青年反叛運動為辭，則既不妨礙解釋在賀大哥知道他所嚮往的革命在美國不可能發生時，他如何仍能有小曹所見的心靈、思想狀態，又能給該時已有理想主義衝動、社會關懷意識的小曹，提供著能把她這一切托住、加強，包括把她今後走上這一條路可能碰到的挫折與問題也托住的思想、感覺框架。

顯然，在此處的討論裡，跟可因革命的發生而把社會短時間帶入理想的新世界比，不能發生革命的社會通向新世界，則可通過長

期、艱苦地此社會中人性的一點一滴改善的積累來創造達到的條件。顯然，相信有這種可能，意味著相信即使在一個制度、社會生活有問題的社會中，這社會大多數人仍然有人性改善的可能，而這一人性改善，雖然不會直接伴隨著制度和社會生活的根本重構，卻仍可能有助於制度運轉的改善，社會生活狀態的改善，這樣，人性的改善和社會生活、乃至制度運轉的改善的反復增進互動，和這些改善可能帶來的社會生活和制度的改善性重構，就使得理想的社會終究有實現的一天。

但相比革命發生中因未來新世界就在眼前而引發的飽滿激情，和革命勝利後陳映真想像的，因制度和社會生活已經被重構——生活的充實、健康和人們的善意、建設性努力總是容易得到正回饋，所易帶給人們生活的意義感和主體的充實狀態，此種意圖通過人性的一點一滴改善來達到新世界的途程，則會因為目標可能及身不得見，人們的努力常常得不到正回應，而有人們的建設性動力如何獲得並保持其充盈、飽滿的問題。而這些都是加給在此種途程中仍企望新世界渴望為新世界有效工作的人們的極大挑戰。

而且，不僅有熱情如何獲得並保持的問題，在這種途程中努力於新世界其實還有賀大哥、小曹此討論中沒有出現的認知問題的挑戰。<sup>20</sup>在一個能發生革命，也自認知道如何革命，革命後如何重新安排組織的社會中，企望新世界的知識分子應該集中做的，是陳映真已表述過的，就是一方面在介入的實踐行程中，艱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自己所無限依戀的舊世界作毅然的訣絕，從而為投入一個更新的時代作準備，另外一方面當然則在激起更多人對舊世界的棄絕，激起更

20 〈賀大哥〉中提到賀大哥讓小曹讀維多·柏羅的《美國的軍事·產業複合體及其諸問題》一書(洪範小說集3:頁101)，其目的應在促進小曹對美國有問題一面的理解，故不影響我此處結論。

多人對新世界的嚮往，以增大革命的力量，減削革命的阻力。但對一個只能以一點一滴改良增進所在社會進入新世界可能的知識分子而言，一方面當然必要在介入的實踐行程中，艱苦地做自我的革新，但另一方面由於從舊世界到新世界只能通過一點一滴的改造取得，而為了對舊世界的改造、對舊世界中人性的改造切實有效，知識分子所作的工作當然不能只聚焦於激起更多人對舊世界的棄絕，激起更多人對新世界的嚮往，而還要配合改造的目標，切實增進對舊世界的認識和這世界中已有人性狀態的認識。而這意味著要在認知意識、認知目標要做很大的調整，與此相應，當然是認知習慣、認知方法也要做很大的調整。

如前所述，陳映真在〈賀大哥〉中討論——如果一個社會沒有條件通過革命通向新世界，那該如何走向新世界的這一問題時，並沒有認為台灣不會發生革命。確實，相對於六〇年代，七〇年代以後的國際形勢越來越對中國大陸有利，台灣社會也在萌發越來越多對現實的批判、反抗意識。而更重要的是，在陳映真心目中中國大陸社會主義本身的高度理想存在，使他相信，只要台灣民眾更多了解大陸真相，大陸現實會對台灣社會產生比什麼都強的召喚力，正像在北美的很多台灣留學生由於有機會突破國民黨的宣傳了解中國大陸，而熱烈傾向大陸和社會主義一樣。<sup>21</sup> 這一召喚力，配合國際形勢，配合台灣內部的

21 在1994年郭紀舟對陳映真所作的訪談中，陳映真曾談到他當年參與辦《夏潮》時曾過度樂觀，以為只要讓台灣讀者「了解一點點外面的現實」，讀者就「一定會跟我們一樣」（郭紀舟，《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前引註3），頁473）。我們可以從當時作為中國社會主義象徵的毛澤東其時對北美台灣留學生的影響來體會陳當時何以有這一樂觀心情。毛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後，在世界範圍內，特別是歐美日的青年反對運動和歐美日知識界的新左翼運動中產生了廣泛影響，使時在北美的台灣留學生印象深刻。尤其是在毛澤東和尼克森總統會晤後，毛在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影響更為廣泛。正像《春雷聲聲》的序言中所總結說的，毛同時滿足了身在美國的鈞統運左翼台灣留學生「所追求的中國富強和先進社會的兩個理想」，而使他們產生「國運至此，夫復何求」的心理和精神滿足。這樣，毛

反叛脈動，再加上當時仍然很強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會使這一召喚力爆發出不止成倍的熱情，當然使陳映真對台灣發生革命變革，充滿期待。

這樣，當1979年中國社會主義的諸重大問題暴露出來，不僅使陳映真期待的台灣革命在現實上變得頓時虛渺，而且還產生了，即使革命可以發生，它又能往何處去的問題，也就是革命必要性的問題。1960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所以在世界發生很大的影響，一個重要的背景是蘇聯社會主義問題暴露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被很多左翼作為既堅持了社會主義的根本精神，又克服了蘇聯社會主義的弊端的社會主義摸索去想像和理解。所以，對了解中蘇論戰，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我闡發的理論邏輯的陳映真，其中國社會主義信仰，既來自中國社會主義在理論上被作為真理的優越，又來自相信中國大陸現實上已經摸索出一整套理想的制度和活生生的最民主、人性的社會生活來。但這樣，中國社會主義的危機，對陳便同時是真理的危機和美好世界事實上並不存在的危機。而這也當然使「為何革命？」「革命向何處？」成了問題。

於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危機所衝毀的，不只是陳映真過去十餘年以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為理想的理想主義，它也使〈賀大哥〉中通過人性逐步改善以進入新世界的方案遭遇新的困難。這新的困難是，如果有關新世界的思想原理、組織原理尚未被揭示出來，也就是新世界能否存在、如何存在便是個問題，那，以過去陳映真自以為存在的

---

當然「成為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從毛那裡，他們享受到從未享受過的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尊嚴和自豪感，但從蔣介石那裡，他們卻感受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的羞辱感和無力感」，從而當然對毛澤東和他所領導的中國社會主義有著強烈激情。〈〈把鈞／統運的愛國主義薪火永遠傳遞下去〉〉，《春雷聲聲》，台灣：人間出版社，2001年9月初版，頁12-13。



新世界為理由和目標的致力，就不管是革命式致力還是改良式的致力，其實都是虛妄。

確實，在根本層次上追究，兩者同為虛妄。但若不在這麼徹底的層次上追究，而下移至理想主義衝動甚強，但過去的理想主義又被撤離支柱這一陳映真具體的困境，我們便可發現〈賀大哥〉中這一陳映真本為不能發生革命的社會說法的設計，實有著可幫他在遭遇社會主義危機後，重建理想主義的關鍵問架。這一問架之核心，便在「賀大哥」和小曹討論中實際隱含的邏輯：相信出於對人類的信任和愛所產生的努力，會促成社會中人性狀態的改善，而人性狀態的改善又會有助於社會生活和社會制度運行的改善，而這些人性狀態、社會生活和社會制度運行上的改善，既為進一步人性的改善提供著新的出發點，又可能產生讓人們重思、重構更好地個人生活、社會生活和社會制度的契機。

而這樣，也便意味著，在陳映真以中國共產革命、中國社會主義為完滿真理和實踐示範的理想主義的挫敗後，仍可在對生活的意義、生命的充實的高度關注，對世間苦難、特別是人為苦難的高度直面，這兩個構成著陳映真理想主義最核心動力源的基礎上重建。而這樣，也便意味著，中國社會主義危機的顯露，固然暴露了陳映真過去十餘年理想信仰的虛妄，但這一具體信仰的虛妄並不等於理想主義本身的虛妄！當然，也確實，這一重建後的理想主義，雖然肯定了對生活意義、生命充實的高度關注，對世間苦難、特別是人為苦難的高度直面，這兩個對陳映真理想主義衝動最為基礎也最為核心的維度，對世界具有積極意義。但這種相比過去沒有明確新世界可供指向，沒有明確榜樣可為依循的理想主義的重建，更會使「賀大哥」在向「小曹」描述他的理想主義途路時，已涉及的善的動力問題，行動中人們的自我身心安置問題，飽滿精神維持問題，和「他們」未涉及的，但其實也甚為重要的認知如何與善意衝動配合的問題，都變得更為挑戰。也就是，

「賀大哥」尚以為有「真實」「新世界」可供追求，他只是在設想不能通過「革命」的方式追求時，如何以「改良」的方式追求，而社會主義遭遇危機後的陳映真，則不僅知道過去他以為理想的中國大陸「新世界」事實上不存在，就連我們現在不知形狀的理想的「新世界」在未來是否一定能存在也成了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這種情況下，陳映真若挪用當年「賀大哥」理想主義設想中一部分間架，感受和展開上自然會有不同。

只有透過上面這些曲折，我們才可體會，陳映真如下這些看似流暢的文字，是經過了多少苦惱和糾纏才凝結出的。而只有一定程度體會到這中間陳的種種痛苦和曲折，我們才能充分明白這些扼要表述對陳映真而言的歷史分量和思想分量。

1983年元月陳映真在為綿亙近5年(1978至1982年)的四篇「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雲〉、〈萬商帝君〉結成的小說集《雲》所寫的序言〈企業下人的異化〉，在正面寫了作家對現代企業這種社會經濟形式應抱的研究、思考態度與角度，和應該的寫作著重後。針對有人評論他的「華盛頓大樓」系列為「反企業」小說，他回應道：

不，它們簡直與反不反企業根本是無關的。這些已經做成的和將要做出來的小說，其實是一個時代的自然的產物。在這個時代中，一種稱為「企業」的人的組織體，因著空前發達的科技、知識、管理體系、大眾傳播、交通和龐大的資金，而對人的生活方式、行為、思想、感情和文明，產生了空前深遠和廣泛的影響。這樣的影響，成為一切關心人類的思想家和文藝工作者的艱深的課題。(〈企業下人的異化：《雲》自序〉，人間版作品集9：頁30)

然後他接著寫道：

而這課題之所以艱深，是因為沒有了清晰的答案之故。曾經有一個時期，人們曾信以為有了一個確切不易的真理和答案的。無數優秀、正直而勇敢的作家，為了求得那答案，不惜乎自己的亡家和破身。而曾幾何時，那一度以為是正確、光榮、偉大的真理，不轉眼間崩壞為尋常的塵泥。然則，不能已於希望、不能已於愛和思想的中國新銳思想家與文藝家們，在大苦悶與大徬徨之後，正開始另一次漫長而艱苦的探索。正好是在這樣的時代，曾經一度在革命的喊聲響徹雲霄的時刻，自動放棄甚至鄙夷過創作之筆的作家和藝術家，開始懷著羞慚和更虔誠的心，回到永遠不背叛愛與希望的文學和藝術裡，尋求安身的故鄉。

答案，是失去了。但過去的、當前的和將來的一切偉大的、啟發人心的文學與藝術，卻為我們留下永不疲倦的愛，和永不熄滅的希望。

而只要還有愛和希望，人們就能走出這漫長的崎嶇、孤單和黑夜，終於迎見真理罷。

（〈企業下人的異化：《雲》自序〉，人間版作品集9：頁30）

這些文字不多，但以我們前面的討論為背景，即使這不多的文字，也可讓我們辨識出，以1979年陳映真原來的理想主義遭遇危機為背景的，陳映真重構後的理想主義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質。<sup>22</sup>

從這些文字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的是，陳映真在他原來以「以為是正確、光榮、偉大的真理」為支撐的理想主義崩毀後，他不能忍受沒有理想、信仰的現實與未來，而一直在摸索。雖然他一直未能找到像

22 這幾段文字當然還牽涉到，1979年陳遭遇的社會主義危機，與此時陳的理想主義開始重構，對陳的台灣現實感，陳的文學意識帶來的影響問題。關於這方面，我接下來陳映真論文會特別加以討論，此處從略。

他原來信仰那樣，有關更好的未來的系統真理，但有一點是當時的他有著真理般確信的，就是只要有對人真誠的愛、只要有對人性、人類社會改善的堅強信心，那世界就有希望，就能不斷改善，就能讓人們走出充滿著「崎嶇、孤單和黑夜」的現在。明白了未來有希望和對人類有信心與愛對重構理想主義的陳映真如此重要，便也就不奇怪，八〇年代讓陳映真投入最多、寄望最大的《人間》雜誌，為什麼其發刊詞的題目一定是：「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受過嚴重打擊的陳映真並沒有因自己過去過於完滿的理想社會想像遭遇挫折，便陷入懷疑主義，否認理想社會和有關理想社會系統真理的存在可能；也沒明確表示有關理想社會的系統真理和此真理所對應的理想社會一定能存在。此應該是他在堅定地說，「只要還有愛和希望，人們就能走出這漫長的崎嶇、孤單和黑夜」後，說到「真理」時，便語氣猶疑起來的原因——就是雖然有愛和希望為背景，仍然是語氣和緩地「終於於迎見真理罷」，而不是語氣堅定地「並將最終迎見真理」。

不過，正因為愛和希望對陳映真重構後的理想主義如此重要<sup>23</sup>，如何擁有「愛」和「希望」，如何在擁有「愛」和「希望」後，永不背叛「愛」和「希望」便都成為了重要課題。也正是在這一狀況下，陳映真推崇著

23 在不能通過革命的方式改造人和社會的情況下，在不認為經濟等物質發展必然帶來人性和社會改善的情況下，對未來抱持希望，也就意味著對人有信心。在這一意義上，「賀大哥」對「小曹」所說的「愛」和「相信」與陳映真此處所強調的「愛」和「希望」同義。不過，和陳映真當時與現在不同的心境有關，看似可以代換的這兩者其實對應著心境的差別。在1978年陳映真的心中，新世界和有關新世界的系統真理的已經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也就是，希望的目標已高高樹立在那裡，這種情況下，沒條件發生革命奔向新世界，而需走改良之路的社會，關鍵當然便在對該社會中人性有信任，要不，改良之路走不下去。而到了中國社會主義遭遇危機之後，問題首先是新世界和有關新世界的系統真理還不存在，這種情況下，要努力樹立的，當然首先是希望，有了希望，又有了對人類的愛，「相信」才將現身。

可以讓我們擁有「愛」和「希望」，保持「愛」和「希望」的文學與藝術，並期盼著更多作家藝術家重返這種可以幫助我們擁有「愛」和「希望」，保持「愛」和「希望」的文學與藝術。

而這些話也是在講給陳映真自己。陳映真是一個從不缺乏愛和理想主義衝動的作家。但確實有相當長的階段，也就是陳映真以為對中國共產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是「正確、光榮、偉大的真理」的階段，陳映真實際在自覺以促成革命在台灣發生為自己中心寫作意識，用他當年限於環境隱晦的話說，就是他的創作目標是「欲要藉以激發」讀者「曠然的寂寞和恍然的反省」。但到今天，因為過去革命所依靠的「正確、光榮、偉大的真理」自身已「崩壞為尋常的塵泥」，文學當然必需重新尋找自己的新意義所在。

但與希望文學藝術成為讓我們擁有「愛」和「希望」，保持「愛」和「希望」的熱源，不無張力的是，正如，我們此前所討論，無論是「賀大哥」對「小曹」所說的「愛」和「相信」，還是陳映真此處所強調的「愛」和「希望」，其目的都是歷史、社會、歷史和社會中人與制度的改善。而他們兩者所處的非革命脈絡，都使他們所希望的進展只能以現有狀況為基礎，一點一滴的改善、積累，積累、改善，再改善、再積累，而為達到改善的有效性和積累的穩固性，需要在認知上對自己所工作的脈絡，這脈絡所處的社會、制度結構，這脈絡、結構中人的狀況的複雜性，等等，有細緻、深切的認識。而相比，這些都和革命路徑要求的目標指向和認知著重不同，而必需更細膩地伸進許多有革命路徑可走時不需伸進的課題，處理相同課題的角度和方法也不完全相同。<sup>24</sup> 此陳映真所以講，企業問題所以對今天的他變得更加艱深，「是

24 為免滋蔓，應該討論而此處沒有討論的是：此時摸索中的陳映真理想主義因為沒有當年「賀大哥」理想主義那樣一個真實可依的新世界和組織新世界的系統真理在遠處閃亮，所帶來的——要很好配合陳映真今天的理想主義的認知，與很好配合「賀大哥」理想主義所

因為沒有了清晰的答案之故」。也就是說，新世界和有關新世界的系統真理的不存在，讓他認為他必須摸索——和他過去以為新世界和有關新世界的系統真理存在時，所習慣的對待世界、處理問題不同的——新的探問、把握方式來對待世界、處理問題，他才在他的文學和思考中實際面對了，新世界和有關新世界的系統真理不存在這一新境況所帶給他的挑戰。

相對〈企業下人的異化〉觸及到，但未正面點出陳映真重構後的理想主義要求相應認知配合問題，比這篇序早兩個月定稿的小說〈萬商帝君〉則用文學的方式更正面點出了這一問題。<sup>25</sup>

在〈萬商帝君〉中，Rita劉是一個外表樸素、內心善良、對別人的困苦很關切的基督徒。在小說主要著墨的台灣莫飛穆國際公司中，她是被提到的公司諸多人物中唯一一個——對出身淒苦，在公司極邊緣，進入不了狀況，但又千思萬想想升入公司管理階層，以致最後精神崩潰的林德旺——報以關切的人。她的關切給林德旺以安慰，卻因對林德旺陷入的問題鏈沒有理解，使得她的關切對林德旺不能產生實質效用。

在林德旺因精神病超假未歸，她給林的兩封信又未見回覆的情況下，她利用星期天去林的住處看林。在路上她想起了她過去在台中時的中學同學，帶動她加入了基督教，又和她同一個團契的聰明、美麗、純潔而又熱切、虔誠的瓊。然而，到台北上了大學之後的瓊開始發生變化，先是不來教會和團契，繼之，瓊輟了學，改宗天主教，後來又立志當修女，去了羅馬，再後來，Rita劉在接到瓊從拉美玻利維

---

需要的認知——兩者間的差異問題。這一問題和本文的討論主脈有一定距離，但本身卻是一個非常值得討論的問題。

25 〈企業下人的異化〉寫於1983年元月，〈萬商帝君〉則於1982年11月15日最後定稿，1982年12月出版。故此處有「比這篇序早兩個月」之語。

亞寄來的聖誕卡後，便再沒有了瓊的音信。而瓊所以有後來這一系列變化，核心原因便在瓊發現，許多基督徒其實都在作只會向上帝要棒棒糖的乖寶寶，什麼事都不懂，許多無神論者都視為滔天的罪行的，教會卻噤默不語。對此，瓊悲感地說：「許多世上的苦難，是我們這兒的教會和信徒所完全不理解的。」（〈萬商帝君〉，洪範版小說集6：頁210-216）

Rita劉在林的住處沒有看到林德旺，但她看到了林「破舊、陰暗、飄著腐味」的住處，也看到林在瘋狂中所收集的有著徵求MANAGER廣告的中英文報紙等等讓她深感驚異不可解的事。對這些，「她的心中充滿著悲楚。她想祈禱。她於是坐直了身，低下了頭」。但由於她完全不能「理解那只憑著感覺去發現到的，林德旺的整個悲苦的內涵」，她的禱告在呼了主後，進行不下去，對此，「她想哭，讓淚水洗淨她的悵悶和酸楚，但她只覺得眼熱，淚水卻怎麼也流不出來」。痛苦中，她想起瓊說的：「許多世上的苦難，是我們這兒的教會和信徒所完全不理解的。」而這讓她幾年來，「從不曾像現在這樣心痛地想念過瓊」，並讓她在離開林德旺房間終於哭出的淚水中喃喃念著：「瓊……你，在哪裡，呢？……」（同前引：頁217-222）

很清楚，小說通過這兩個人物，處理的是在陳映真重構後的理想主義中具有中心位置的「愛」，如何才能更有效地面對世界、世界中苦難的問題。

顯然，小說中Rita劉不是一個只顧在教會內，「教友間彼此和善親熱，而對『罪惡的』、『墮落的』、『外邦』的、『世俗』的教會外社會，不予聞問」的，陳映真所特別批判的那種基督徒（〈台灣長老教會的歧路〉，人間版作品集11：頁65）<sup>26</sup>，而是一個對他人的困苦有真誠的關愛的基督徒，

26 早在寫於1978年的〈台灣長老教會的歧路〉一文中，陳映真就對台灣基督教所存在的種種問題作了極其犀利的分析與批判。上引語便出自該文對台灣大部分基督教宗派的信仰生活存在問題進行概括的一段。

這從她對林德旺的真心關切可以清楚看出。但由於她所處的工作環境，她工作外所處的宗教環境又是——無神論者都視為滔天的罪行，教會卻噤默不語，教友們則許多都表現得像是只會向上帝要棒棒糖，什麼事都不懂的乖寶寶——這樣一種氛圍，而她對她所依恃的宗教又沒有反省，使得她當在林德旺的住處因所聽、所視而有所感，想祈禱時，卻因不能「理解那只憑著感覺去發現到的，林德旺的整個悲苦的內涵」，而陷入了使她深感打擊的，不知道祈禱什麼的窘境。

這樣，無關於自私與虛偽，有著真誠的愛心的Rita劉的窘境，所提出的問題便不只是對台灣一部分基督教宗派信仰生活所存在的不足的批判，而更關涉到，「愛」若想在這個世界上有真正撐起世界、撐起困難的能力，必須有相對世界、對世界苦難的認知。此Rita劉所以在陷入不知道祈禱什麼的窘境後，想起的是瓊「許多世上的苦難，是我們這兒的教會和信徒所完全不理解的」的責備，而這，讓與瓊不見已幾年的她，「從不曾像現在這樣心痛地想念過瓊」。因為，到現在，她才開始真正懂得，瓊和她所以分途，所以有分途以後一系列摸索，所以會熱心閱讀《變動社會中的教會》、*CHURCH AND ASIAN PEOPLE*這類書籍，正源於瓊不想讓信仰和愛在真實的世界面前，在世界各種各樣苦難面前陷入Rita劉在此所陷入的窘境。

趙剛在他精彩論文〈青年陳映真：對性、宗教與左翼的反思〉中，敏銳地通過小說中瓊到玻利維亞，給Rita劉只留下*CHURCH AND ASIAN PEOPLE*這一本書等細節，指出：這是陳映真通過「曖昧地牽動南美洲『解放神學』的意象，以點出一個核心意思：第一世界的基督教需要重新反省自身和現實世界的問題與罪惡之間的關連。它不能背對苦難以尋得自身靈魂的安適或救贖。基督教要直面它與帝國主義以及第三世界之間的關係，並重新出發」，而「第三世界的基督徒應該要拒絕第一世界對於基督教或任何宗教的詮釋權，而發展出自己對社會改



造與宗教的、人道的情操，兩者之間的新的關連」。<sup>27</sup>確實，如果我們熟悉陳映真有關基督教的思考文字，我們會清楚地看到，趙剛並非推導過度，而是小說中有關瓊的對話與細節確和陳映真有關基督教的觀察與理解密切相關。

在後來的一次演講中，陳映真坦承，「基督教跟社會主義的關係，跟人的解放的關係」，對他是個非常重要的貫穿性主題。（〈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北京三聯版：頁52-53）而能讓他把基督教和社會主義和人的解放貫穿起來理解的原點，是他激進理解的耶穌基督。正像他在「教會及基督徒文字工作者所面臨的社會責任」的演講中所倡言的：「如果一個教會作家不理解現代社會和世界的不義、掠奪和壓迫的結構，不以弱小者、被迫害者、被凌辱者的立場——如耶穌當年以盲人、麻瘋、娼妓、稅吏、漁夫……的立場去看待真理、看待社會和人，他就無法把握今日基督教最核心的問題。」<sup>28</sup>而在〈基督徒與大眾消費文化〉文中，他同樣嚴厲地強調：「永遠有兩種形態的教會：一個教會是穿著華麗、引經據典、談天說地、有地位、有名聲的教會。但耶穌永遠站在另一個教會——引導那些不受現代文明祝福、受欺壓、侮辱、踐踏、不幸者的教會。而我們選擇那種教會？」<sup>29</sup>

這樣一些激進理解，當然使得陳映真在當代諸基督教思想流派中與解放神學高度共鳴。寫於1990年代初的〈主，我們這樣子就可以嗎？：「1990年平安禮拜」的隨想〉中的一段話，扼要地概述著陳映真

27 見趙剛，〈青年陳映真：對性、宗教與左翼的反思〉，《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會議論文集（2009年11月，新竹交通大學），頁119。趙剛為集中論點並縮減篇幅，將原先關於宗教的部分抽出，改寫為〈頹頹於星空與大地之間：左翼青年陳映真對理想主義與性／兩性問題的反思〉一文，收入本書上冊。

28 陳映真，〈基督徒文字工作者的社會責任〉，陳映真等著，康來新、彭海登合編，《曲扭的鏡子：關於台灣教會的若干隨想（陳映真的心靈世界）》（台北：雅歌出版社，1987年7月初版），頁102、112。

29 陳映真，〈基督徒與大眾消費文化〉，《曲扭的鏡子》（同前引），頁141。

七〇年代以來的解放神學理解：「如果19世紀基督教會向東方、或者在16、17世紀向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太平洋以醜惡的強權布教的歷史，在神學上有什麼意義，答案也許是在六〇年代以降崛起於受苦的中南美洲、非洲、太平洋和韓國的，主張有祝福的平均分配、和平與愛德的、脫西方、脫白人中心的、人民的神學與人民的教會在基督中謙卑卻堅定而勇敢的成長〔……〕。」<sup>30</sup>也就是，在陳映真看來，解放神學才真正繼承了耶穌基督當年的激進性，從而對產生於世界不平等結構的最被不公正、不義損害的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下層人民苦難有真正的理解和承擔。而這一解放神學面向，不僅可為陳映真強調的，用以串連他的社會主義價值取向和激進的人的解放理解的耶穌基督的激進性，提供著當代論述形態，而且還自然串連著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立場，和他以民族獨立、民族解放為首要關懷前提的民族主義理解。

不過，在此不避辭費之譏，要再度強調的是，陳映真對解放神學的推崇，不僅僅因為解放神學跟他已有的價值取向、思想立場有很深的內在契合，也不僅僅因為解放神學非常適合成為，陳映真分析、批評他認為保守的、實質以西方視野為視野的、中產階級取向的、對很多世間苦難加以回避的台灣基督教會的方便利器，而更因為陳映真發自內心認為，解放神學繼承了耶穌基督的真精神。因為，在陳映真那裡，耶穌站在弱小者、被迫害者、被凌辱者一邊，在一個社會內部，當然意味著社會主義取向；看現代世界史和現代世界不平等結構，當

30 上引文字後面的「……」，在文中是「和幾百年前污穢了的基督的旗幟，向廣大『落後』地區殘酷掠奪與加害的西方國家的教會在今日令人震驚和悲憫的腐敗」。顯然，這段文字讓我們看到八〇年代後的陳映真對他認為保守的台灣基督教更為嚴厲也更為不耐了。這麼說，是因為在〈主，我們這樣子就可以嗎？：「1990年平安禮拜」的隨想〉文脈中，台灣基督教顯然被看成不能跟殖民脈絡劃清關係的西方國家的教會向台灣擴展，而台灣教會卻對這一切沒有自覺和反省所發展出的結果。引文見〈主，我們這樣子就可以嗎？：「1990年平安禮拜」的隨想〉(二)，刊於1991年《曠野》雜誌(台灣)第27期。

然是第三世界立場；具體到國家間關係，當然是民族獨立、民族解放的民族主義理解。

閱讀陳映真五篇集中論說基督教的文字：〈台灣長老教會的歧路〉、〈基督徒文字工作者的社會責任〉、〈由「出走」談起：陳映真對當今台灣教會之觀察與諍言〉、〈基督徒與大眾消費文化〉和〈主，我們這樣子就可以嗎？：「1990年平安禮拜」的隨想〉<sup>31</sup>，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我上面所述的，陳映真對耶穌基督激進性的強調，對解放神學的正面使用，對台灣教會的針砭，和社會主義、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取向，在這些文章是始終如一的（雖然有強調的語氣程度、強調脈絡和批評嚴厲尖銳程度的差異）；但相對不那麼突出的，我們需仔細推敲，才會發現，在這五篇觀點「始終如一」文章的背後，寫於八〇年代理想主義重構之後的〈基督徒文字工作者的社會責任〉、〈由「出走」談起：陳映真對當今台灣教會之觀察與諍言〉、〈基督徒與大眾消費文化〉的三篇，相比寫於陳映真遭遇社會主義危機之前的〈台灣長老教會的歧路〉，和寫於八〇年代之後的〈主，我們這樣子就可以嗎？：「1990年平安禮拜」的隨想〉，在同樣強調基督教激進、批判，應該更正視、承擔人間苦難和反抗世界、社會不平等的結構時，也同時注意強調基督教的批判、激進、反抗、承擔，所應該具備的與世俗激進、反抗不同的特點。

比如，〈基督徒文字工作者的社會責任〉在強調教會應是激進的之後，接著強調「但它與世俗的不同點在於教會的激進是溫和的、安靜

31 〈台灣長老教會的歧路〉（人間版作品集11：頁55-73）刊於1978年6月《夏潮》雜誌4卷6期；〈基督徒文字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收入《曲扭的鏡子》（前引註28），頁102-115；〈由「出走」談起：陳映真對當今台灣教會之觀察與諍言〉（人間版作品集6：頁112-118），收入《曲扭的鏡子》，頁116-122；〈基督徒與大眾消費文化〉，收入《曲扭的鏡子》，頁123-141；〈主，我們這樣子就可以嗎？：「1990年平安禮拜」的隨想〉刊於1991年第26、27、28期《曠野》雜誌。

的、堅定的，來自上帝的啟示，而非出於人的仇恨、反抗」<sup>32</sup>；比如，〈由「出走」談起：陳映真對當今台灣教會之觀察與諍言〉，一方面強調「信仰上帝，不是像台灣的許多基督徒一樣，那麼快樂、無知、自足、物質化，有時甚至是輕慢的……。事實上，很多時候，信仰是拼命的事，要被綁赴刑場，唱著詩歌被送進獅子口；信仰有不得已的時候，必須慷慨赴死。台灣許多基督徒，像是8、90歲的人，仍然快樂的含著棒棒糖。基督是到世上來受苦的，基督徒活著，也並非為了享受……因為基督自己道成肉身的30多年來生命中，就充滿了饑渴、風雨的吹打、焦慮、憂傷、摧折甚至酷刑和拷打，為的是人的肉體與心靈的解放與自由」；一方面強調「教會中的反抗有一個特點——與世界上所有的反抗與決裂不同的——是我們有一很大的力量：信靠與謙卑」<sup>33</sup>；比如，〈基督徒與大眾消費文化〉強調「基督的反抗是安靜的、溫柔的、虔誠的，是不得已的」<sup>34</sup>。而這和寫於陳映真遭遇社會主義危機前的〈台灣長老教會的歧路〉，寫於他對台灣、大陸、世界的現實都更憂心忡忡的1990年底的〈主，我們這樣子就可以嗎？：「1990年平安禮拜」的隨想〉，都很不同。比如，在寫於1978年的〈台灣長老教會的歧路〉中，陳映真強調「宗教的力量，來自深刻內省的生活」，強調教會「應該心懷謙卑」，其目的卻都在促使教會傾聽、同情、理解、接受「教外的、無神論的、愛國主義的和民族主義的智識分子和民眾」的思考和實踐（〈台灣長老教會的歧路〉，人間版作品集11：頁65-72）。〈台灣長老教會的歧路〉的這一「內省」和「謙卑」強調，固然為針對包括台灣長老教會在內的台灣基督教一劑關鍵良藥，卻不能否認，這是圍繞外在價值

32 〈基督徒文字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曲扭的鏡子》（前引註28），頁113。

33 〈由「出走」談起：陳映真對當今台灣教會之觀察與諍言〉，《曲扭的鏡子》（前引註28），頁122、119。

34 〈基督徒與大眾消費文化〉，《曲扭的鏡子》（前引註28），頁140。

強調「內省」和「謙卑」，而非著重基督教「內省」和「謙卑」自身所具有的基點性的獨立價值。

也就是，雖然無論是在摸索理想主義重構的八〇年代，還是在這前後，陳映真都會一貫地追問，「在變動中，充滿矛盾、痛苦的世界裡，教會要扮演什麼角色？」<sup>35</sup>這一問題，但回答中是一貫中有差異的，而這差異，對理解陳映真重構的理想主義是重要的。差不多可以斷言，只有在他理想主義重構，並對此重構的理想主義抱有相當信心時，他才可能公開提出如下兩種路向的比較問題，就是：「一種是從教會中走出來，成為無神論者、馬克思主義者；另一種是秉持非常簡單卻又深刻的福音，去從事抵抗」。<sup>36</sup>前者是他過去毅然選擇的道路，後者則是他重構理想主義的八〇年代中所深切共鳴的道路。所以，〈萬商帝君〉中的瓊，看到「許多無神論者都視為滔天的罪行的，教會卻噤默不語……」，卻並沒有像早年陳映真那樣成為無神論者，而是仍留在耶穌基督和上帝內探索，實和陳映真遭遇社會主義危機後對馬克思主義的反省，和他因應這危機的理想主義重構，及因理想主義重構所引發的對基督教意義的再定位都有著密切關係。

那在此處，陳映真此一不是把「無神論者、馬克思主義者」，和秉持福音去承擔苦難、改造社會者相扣連，而是相對照，他要傳達的是什麼呢？對比時，對兩者都下過很深功夫的他，為什麼說兩者之間「分際是十分微妙的」？他這個「十分微妙」可能何指呢？而這，和使陳映真把瓊和Rita劉寫成基督徒，並在瓊棄絕台灣基督教會後，仍留在耶穌基督和上帝內艱苦探索，又可能是一種什麼樣的關聯關係呢？熟悉左翼文學傳統的讀者知道，陳映真通過寫瓊和Rita劉所清晰傳達的，

35 〈由「出走」談起：陳映真對當今台灣教會之觀察與諍言〉，《曲扭的鏡子》（前引註28），頁120。

36 同前引，頁121。

對社會、他人質樸的愛，對世界意義有限，只有理解、把握了苦難的生成機制，認識到改變這機制的原理，愛，才能對不公不正的社會負起有效責任，是太多左翼成長小說處理過的主題。在相當的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就是一個有關正視苦難、認識苦難、承擔苦難的學說；而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就是接受馬克思主義對苦難生成的解釋、對如何消滅苦難的解釋，而不避犧牲自己，去努力通過實踐把這些解釋在這個世界上實現出來的人們。在這一意義上，很多堅定的共產革命的參加者，就其起源來說，當然都是對世界的苦難、不義深為不安，對社會、民族有著深切責任感的人，而這當然源於愛和良知。所以，陳映真把「無神論者、馬克思主義者」，和「秉持非常簡單卻又深刻的福音」去承擔苦難、改造社會者（當然包括因對世界的苦難、不義深為不安，而開始對所在台灣教會發出批判的瓊）作對比，不是因為他們在出發點上不同（也就是，瓊和共產主義者的不同，不是共產主義者不注意對苦難的認知，不是共產主義者在核心動力出發上缺少愛和良知）。所以，陳映真所對比的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秉持」「福音」去承擔苦難、改造社會者（包括瓊），不在他們是不是對人類抱有大愛和有關理想世界的想像與追求（這些在陳映真重構後的理想主義中具有著核心位置，也即他在小說集《雲》序中所講的「愛」與「希望」），也不在認為他們在「愛和責任感—努力認知—自認負責任（也就是經過「愛」和「認知」保證）的行動」這一結構自己的基本方式上有差異，他們的差異在更進一步的——有關如何才能達到新世界的路徑問題，而這又涉及到既然陳映真原來所信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社會主義不缺少「愛」和「希望」，為什麼他在重新摸索一種理想主義時會這麼強調「愛」和「希望」的問題。

推敲陳映真八〇年代上半和中期的有關「愛」和「希望」、「福音」的文字，可以基本推知，他這時把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秉持」

「福音」去承擔苦難、改造社會者作對比，首先關涉的是他們在如何才能達到新世界的行為方式理解上所存在的差異：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者由於相信他們掌握了歷史和現實的構成原理，和如何真正改變舊世界達到新世界的設計上的秘密，使他們在為了達致這一認為能改變一切的大善的過程中不迴避恨等人類心理與情緒，乃至有意利用、動員這些心理和情緒；而秉持福音者，則一方面相信人性有極大的改善空間，另一方面又對通過一次性制度和社會生活的重構就對人性可發生根本改變不樂觀，而認為只有通過善才能有效激發善、護持善，通過愛才能有效激發愛、護持愛。

從這樣一個分疏角度看——瓊在震驚於教會對世界苦難的麻木時，並沒有像早年陳映真那樣成為無神論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仍留在耶穌基督和上帝內探索，其隱含的思想方向是，在一個對世界真正負責任的行為中，愛僅僅是出發點是不夠的，它必須也同時是目的和手段。也就是，我們不能因為我們出發點的正義和愛，不能因為我們以這正義和愛出發的嚴肅、努力的認知，便在我們因應我們出發點和認知的自認負責任的介入行動中，突破良知和善，而應反過來，因發現自認負責任的介入行動和良知、善的矛盾，重新檢討自己的認知把握和行動設計。而這也是陳映真重構後的理想主義題中之意，因為前引小說集《雲》序〈企業下人的異化〉中關於「愛」和「希望」的強調，便不僅僅是拒絕在社會主義遭遇危機後放棄理想主義，而是一方面拒絕因此走向虛無、幻滅、隨波逐流，另一方面則強調，愛不僅僅是出發點，也是目的和手段。

而也只有從這一角度，我們才能有效釐清陳映真理想主義重構後的基督教論述，和此前論述不同的思想意義。比如，在陳映真〈台灣長老教會的歧路〉文中，解放神學的提起，主要用意在用社會主義、第三世界立場、反殖反帝的民族主義重構基督教；而在陳映真重構理想主



義後，解放神學的提起，就不僅僅是在用社會主義、第三世界立場、反殖反帝的民族主義重構基督教，陳映真同時也強調「基督的反抗是安靜的、溫柔的、虔誠的，是不得已的」的，等等。這樣，社會主義、第三世界立場、反殖反帝的民族主義，在被陳映真引進他的基督教思考時，反過來基督教的福音立場也在重構著他的社會主義取向，第三世界立場和民族主義理解。也就是，以人的充分解放這一大愛出發的，以追求公平、正義為目標的社會主義、第三世界立場、反殖反帝的民族主義，也不得缺少對自己行動從起點到手段到目的的愛和良知的認真審視，並以之作為判定反省自己的思考和行動的必需基準之一。這樣，先前通過中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所緊密接合起來的陳映真的社會主義關懷、第三世界立場、民族主義理解與他的理想主義，在原有的關聯方式崩解後，現在又通過他對基督福音的理解、詮釋，和他重構後的理想主義進行著接合。

但以上分疏和引申，所能回答的最多只是為何先前倒向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陳映真，現在更傾向「秉持」「福音」承擔苦難、改造社會者，卻不能回答，陳映真在講到「福音」時，為何要加上「非常簡單卻又深刻的」定語。要深入此，不僅進一步涉及到陳映真對重構後理想主義應有的介入形式的理解和感覺問題，也關涉到陳映真對他新理想主義應有的認知意識、認知努力的理解與感覺問題。

對當年陳映真這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社會主義的信仰者來說，既然馬克思和一些後續的偉人已經對有關過去和未來的原理有了指明，所以當前的主要任務，便在促成從舊世界到新世界的革命的發生。這樣，現實分析的重點當然便在如何激發革命的動力，如何把這些動力和可以為自己所用的力量有效組織起來，同時如何削弱反革命的力量。而「秉持非常簡單卻又深刻的福音」去承擔苦難、改造社會者，由於他們路徑的根本在真實有效影響、改變人，因此，他們認知



的根本目標當然便在找到能有效把人類苦難和困境包納進來，但出之的時候，確是一種樸素、直接、能直接抵達人性深處的語言和實踐形式。而這一方式最典範的榜樣，在理想主義重構後的陳映真，便是看起來「非常簡單」實際「卻又深刻」的基督福音（在20世紀，則聖雄甘地給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詳下）。而要做到「非常簡單卻又深刻」這一點，不僅要對人類苦難和現代社會的困境有深刻認識，有大悲憫和承擔心，還要對生活於其中的人的狀態有深刻的洞察——就是既要對這當中人和他所生存的歷史和社會互相生產的一面有深刻認識，又要對生存於此互相牽扯的鎖鏈中人的向上衝動和蘊蓄潛能有準確深刻把握，並對在現有歷史條件下如何調動這些向上衝動和蘊蓄潛能以重構和改善我們的生命狀態、生活狀態、社會狀態有深刻的解悟，才可能找到陳所說的「非常簡單卻又深刻的」理想的介入方式——即在直接訴諸人的向上衝動和蘊蓄潛能的同時，通過賦予這些被調動的衝動和潛能以恰當的精神、生活和社會形式，來達到苦難的承擔，困境的突破，和我們生命、生活、社會狀態的真實改善。

而所有這些展開，無論是對有關理想主義行為中愛和善位置問題的進一步思考；還是對陳映真所希望的理想主義，如何認知——才能既正視苦難、正視現代社會結構性困境，又能把這些正視所開展出的把握、理解，自然收束於以愛和善的有效激發為核心的介入實踐——的進一步思考；還是重構後的理想主義與對陳很重要的社會主義取向，第三世界立場和民族主義理解間，該是若何一種關係，都是陳映真理想主義重構繞不開的關節問題。

八〇年代中陳映真對所有這些對他新理想主義重構甚為重要的問題的展開，密切涉及他了解甚深、感慨甚深的基督教思想資源。<sup>37</sup> 這

37 陳映真在小說集《雲》的序言〈企業下人的異化〉中曾特別寄望「為我們留下永不疲倦的愛，和永不熄滅的希望」的「偉大的、啟發人心的文學和藝術」，卻沒有成為陳映真後來

固然因為陳映真熟悉基督教思想資源，但更因為陳映真的新理想主義和他這時理解的基督福音確有著甚多契合。而這可幫助我們理解，不是苦難、挫折時，而是他理想主義漸趨充實時，他反而公開表達：「如果有一群人不在現行教會組織內，真誠的研讀聖經，切實實踐耶穌的教訓，我願意參與這樣的聚集」。「雖然我今天還在外面流浪，但總是覺得背後有一隻有力的手，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把我抓回來呢！」<sup>38</sup>

如果我們知道陳映真對信仰問題是多麼嚴肅不苟，就知道說這話時基督福音在該時他的心裡位置是多麼突出了。2002年陳映真經歷了一次真實而非比喻意義上的出生入死。這一經歷，加上當時周圍親友的虔敬氣氛，尚未離開病房的陳映真便開始每晚向「上帝」訴說，開始重新認真思考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意義，等等，但因為在訴說和追問中，「沒有『聖靈』的火熱。沒有回答。」而他自己用過去欽仰的日本基督徒矢內原忠雄的榜樣來說服自己，亦未成功，他便仍然選擇留在教外（〈生死〉，洪範版散文集1：頁191-200）。<sup>39</sup>以這一例子為參照，我們更可知道八〇年代中期基督福音在該時陳映真的思考和感受中是多麼特殊了。

但八〇年代中期的陳映真終究沒有重返他當年出走的基督福音，固然是因為台灣基督教的現狀，固然是因為缺少2002年這樣特殊的契

---

展開他的新理想主義的主要資源，是僅僅因為陳映真後來認為他所熟悉的基督教資源和下面所談的甘地經驗更適合探討以「愛」和「希望」為中心的理想主義嗎？這是一個很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希望有志者加以探討。

38 引文見1987年1、2月的《曠野》雙月刊創刊號「出走檔案」〈陳映真〉中的「心聲一二」。

39 陳映真八〇年代中期對矢內原忠雄的表彰，見〈由「出走」談起：陳映真對當今台灣教會之觀察與評言〉，《曲扭的鏡子》（前引註28），頁121-122。相比八〇年代的陳映真，八〇年代以後的陳映真跟基督教更拉開了距離。此陳映真所以出生入死之際仍會要求更明確直接的宗教證據「聖靈的火熱」「回答」，和當這證據沒出現，他在要求自己能說服自己再信上帝時，他對答案要求的程度極嚴厲、決絕的背景。否則，我們很難理解，他當年特別表彰矢內原忠雄20世紀三、四〇年代公開批判日本對中國和亞洲的侵略，此時為什麼卻隱含追究矢內原忠雄「為日本帝國『開明』的殖民地統治政策服務」。

機。但更深入推究，陳所以如此，也和他理想主義重構雖然在事實上得益於基督教思想資源，但就其根本構成來說，其成立並不需非得仰賴基督教思想資源這一內在特質相關。有關此方面，可從同樣讓陳映真的新理想主義摸索深感親和的、非基督教的聖雄甘地所帶給他的震撼，清楚看出。

陳映真所受到甘地震撼和他從這震撼引申出的思考，集中表現於陳映真確信以愛和希望可以重建理想主義之後不久，他一次《甘地傳》觀影後所寫的影評中。<sup>40</sup>在這篇影評中，陳映真認為，聖雄甘地的偉大力量，來自他「對於單純的真理的單純的信仰——和毫不妥協的實踐」。對此，陳映真以他文字中少見的激情排比，來強調表達自己所受到的多方面震撼：

他單純地相信：人，包括壓迫者在內，有不容任何差別的尊嚴。他單純地相信：壓迫、掠奪，不只是施加於奴隸和被壓迫人民的罪惡，也使壓迫者墮落，成為罪人。他單純地相信：壓迫，不但對於被壓迫民族造成道德、精神的淪喪，物質和社會的滅破，壓迫的毒汁，也同時深深地攻入壓迫者的心臟，敗壞他們的文明、精神與道德。他單純地相信：手段與目的是合一的。為了達成自求解放的道德目標，他嚴格地、不容妥協地要求抵抗和鬥爭手段的道德性格。他單純地相信：暴力、流血、互相殘殺，徒然使一個道德的抵抗者矮小化，與壓迫者同樣淪為罪人。他也單純地相信，同英國殖民體制做鬥爭，不單只是為了求得印度人民的解放，也為了拯救英國人民，不讓英國人民被自己施於別人的殖民

40 小說集《雲》序寫於1983年元月，這篇《甘地傳》影評〈自尊心和人道愛〉（人間版作品集9：頁125-129）發表於該年5月的《中華雜誌》。《中華雜誌》刊登陳映真的文章向來及時，這句「不久」敘述便是根據這些情況推得的。

主義的毒瘤散播出來的毒素所毒害。他單純地相信愛。為了愛殘破的祖國和水火中的人民，也為了愛在壓迫的罪惡中墮落的統治者，他堅定地走上不抵抗的抵抗之路。（〈自尊心和人道愛〉，人間版作品集9：頁127）

激情排比完他對甘地的信仰理解之後，他接著激情概括到：

甘地的信念，或者有印度傳統哲學的神髓，卻絲毫沒有它的繁瑣。甘地的信念，受到職業革命家的嘲笑和蔑視。然而，恰好是甘地對人應有的單純至極的信念，恰好是甘地那排除了一切權謀、得失和厲害而信守著萬古常新、簡單而又深刻的信念——愛和真理，使一個本身袒裸，裹著自織的土布，瘦小甚至佝僂的印度老人，動搖而終於崩壞了巍峨的、堅固的、龐大無比的英帝國主義的大廈；使相互對立、仇視、紛爭的民族重新團結；使處在文化解體、信心淪喪的人民重新找回自信和自尊……（〈自尊心和人道愛〉，人間版作品集9：頁127-128）

顯然，陳映真是從影評標題「自尊心和人道愛」的角度來總結電影《甘地傳》的，顯然，在陳映真，甘地的一生為「自尊心和人道愛」這兩個已經被用濫的詞賦予著可把人生、社會、世界舉起的力量。在確認以愛和希望可以重構出理想主義之後不久，看到「這樣」（指陳映真所看、感到的《甘地傳》）一部因一個人堅執人道愛和人的尊嚴以致改變了現實與世界的電影，不免會有自己的信念得到最有力證明與支撐的感覺。所以，陳映真看電影時的震撼和感動，不是通常的震撼和感動。陳說自己「數度簌簌地留下眼淚」，並整理說，「那是自己羞愧的淚，是自己責備的淚，是尊敬和感銘的淚。把愛和真理習慣地掛

在嘴上，卻經不起甘地一生行蹤的深刻的批判和責備的我，是何等的不堪。」（〈自尊心和人道愛〉，人間版作品集9：頁129）顯然，作者關於自己流淚的解釋裡包含著把自己的觀念狀態歸入和甘地同類的意思。確實，在為自己的理想主義重構確定愛和希望的基點時，陳映真可說和甘地同類。不過，由於陳映真的理想主義還缺少我們上面所討論的、他後來的充實和發展，我們看到，像更早陳映真願意強調耶穌基督的激進性，而少注意福音深刻的一面，在本影評談甘地時，則把甘地的有效性過快歸於甘地對愛和人的尊嚴的執著，而未去注意陳映真所指出的這些甘地信仰的有效性，和他對所激發的人的人性條件洞察，與他對他所要對峙的現實的智慧的整理間的複雜關係。這樣，陳映真在講甘地所信守的「萬古常新、簡單而又深刻的信念——愛和真理」時，這之中的「簡單而又深刻」便和我們上面討論的，他後來所說的「非常簡單而又深刻」有所不同。因為連繫上下文，就可明白，此處的「簡單而又深刻」，實際沒有以真正進入甘地這看起來的簡單何以至為深刻這一問題的艱難性為前提；而他後來所說的「非常簡單而又深刻」，則是對福音看起來樸素、直接，實際是很難企及的智慧，有相當的體悟，才說出的。

當然，電影《甘地傳》對陳映真的意義，不只是強力支持了他對自己初具形狀的理想主義的信心，不只是使他受到一次強烈地精神、情感洗滌；而其分析上的意義，也不只是有助於我們更清晰地掌握陳映真新理想主義初構時某些方面的觀念狀態。這些之外，電影《甘地傳》對陳映真，對陳映真新理想主義發展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這部和陳映真思考、關懷密切相關的甘地電影，促發陳映真更自覺思考：二次大戰後獨立的殖民地所存在的種種讓人傷懷的問題，新式殖民主義固然要負主要責任，但這些獨立後的地區人民，「失落了一種如甘地那樣對人的真誠的信念，失落了對真理和無差別的眾生之愛，——而這

些，在整個第三世界的傳統文化中，一直都以不同的樣式豐盛地存在著——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罷。」(同前引：頁128)

這樣一種思考結論，意味著陳映真清楚認識到，廣大第三世界要根本改善，除要對世界不平等結構進行變革，還必須在它內部產生有力的精神運動。從這一視角看甘地，陳映真認為甘地經驗對此給出的重要教義是：

從自己民族的傳統和文化中尋找像甘地那樣單純而又萬古常新、簡易而又深刻的信念，重新為自己建造對人、對生活和對世界的信念，並且像甘地自紡自衣一樣，批判地拒絕西方以強大的組織加於我們的消費商品和消費文明，堅定地相信眾生之愛，堅定地拒絕相互殺戮和猜忌，為民族團結，世界和平和正義，頑冥不懈地奮鬥……(《自尊心和人道愛》，人間版作品集9：頁128-129)

而這些強烈震撼中的思考對陳映真的重要性在於：

首先是，這可作為陳映真新理想主義根本榜樣的甘地經驗，事實上在加強陳映真把對民族傳統和民族文化的領悟和重構，看成以愛和希望為中心的新理想主義要在第三世界獲得有力的在地實踐形式的重要基點性前提之一，而這是通過基督教資源來探討以愛和希望為中心的理想主義不易獲致的結論。在用基督福音、解放神學來充實、展開自己的新理想主義構建時，陳映真從不喪失對在地苦難、在地在世界不平等結構中的位置和民族主體性問題的關心，但這些資源所有的基督教框架，當然不易像甘地經驗那樣，讓陳映真可這麼清楚意識在地民族傳統和民族文化對他新理想主義思考和實踐有著如此突出的重要性。而這當然有助於校正、平衡過多浸淫在基督教資源中不免對陳映真理想主義所產生的影響。<sup>41</sup>

其次，陳映真此處從精神角度對第三世界問題與出路的整理，也有助於校正他此前把握第三世界問題時，常常過於著重從世界政經結構（也就是他此影評中所講的「新式殖民主義」）來解析問題、界定問題的把握方式。比如，陳發表於1982年7月的極富穿透力的〈色情企業的政治經濟學基盤〉一文的結尾處，總結說：

在工商經濟的社會中；在第三世界，色情已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它顯示了深刻的政治、經濟學的意義。外來的消費文明，外來的色情意識，越戰，美軍基地等軍事、色情結構，以及「先進」日本經濟和跨國企業的陰影下，日本男性群集傾巢向東亞、東南亞推進性的侵略，這些，都應該在戰後30年來權力和利益分配下的第三世界這樣一個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課題中，去思索正確的答案。第三世界的批判的一代，已不從傳統的道德上去取得忿怒和抗議的理由。他們更不會把第三世界精神和社會的荒廢，視為「進步」、「現代化」所不可分離的「必要之惡」。不，他們正要學習從全球的南北結構中，從世界的政治經濟學觀點中，批判現存的世界，從中學會最好的教訓，為自己的民族和世界的出路，尋求最好的答案。（〈色情企業的政治經濟學基盤〉，人間版作品集12：頁11）

- 41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甘地對此前的陳映真就有影響。在更早接受琳達·傑文的採訪〈論強權、人民和輕重〉中，陳映真便把眼光注目於印度人民的甘地和只會翹首希望的知識分子進行對比，認為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應該學習甘地，回到人民中，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並認為「絕不能以亞洲傳統之價值去換取西方的物質主義，不論它看起來多麼甜美，也不論西方的生活看起來多麼舒適」，為此，第三世界知識分子還應負起批判性的「評估自己的傳統文化，對傳統文化進行再認識的責任」。（〈論強權、人民和輕重〉，人間版作品集6：頁5）對比這先前採訪陳有關甘地的使用和陳此篇影評中的甘地使用，我們可以看到，此次觀看甘地電影，不僅進一步推動陳映真的甘地理解和第三世界思考的深化，而且得以直接讓陳映真把甘地經驗和他的新理想主義摸索接合。

確實，要理解、把握台灣、菲律賓這些東亞、東南亞地區戰後色情業的存在和演變，離不開「戰後30年來權力和利益分配下的第三世界這樣一個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課題」視角。但不能否認的是，過於強調這個視角，以之為全部正確答案所在，就不會有甘地經驗所昭示給陳映真的，還應該對眾多第三世界問題進行在地的精神、文化機理進行審視與分析的清晰意識，當然，更談不上從在地精神和文化機理的審視與分析進一步發展出對生活、社會、制度機理的審視與分析。而沒有這些審視和分析，把一切過快歸結為不平等不公正的世界結構、地區結構，當然會引發第三世界批判陣營對這一世界結構、地區結構的反省與批判（包括對內部被視為這些國際性剝削提供服務的人與機構的批判），並思考對這一不平等、不公正結構的變革可能；但「把一切過快歸結為相關不平等不公正的世界結構、地區結構」，也常會因這一國際性結構過於龐大，而引發很多人的無力感，以致給「把第三世界精神和社會的荒廢，視為『進步』、『現代化』所不可分離的『必要之惡』」論者提供著發揮影響的空間，而這一切當然又可為懶惰、麻木不仁的政府和個人迴避問題和良心的責難提供著理由。

而有了甘地觸發的，「從全球的南北結構中，從世界的政治經濟學觀點中，批判現存的世界」之外的內部角度，來審視和分析這被許多人「視為『進步』、『現代化』所不可分離的」第三世界精神和社會的荒廢」問題，則可發現，即使一時撼動不了相關不平等不公正的世界結構、地區結構，現在的「精神和社會的荒廢」現狀仍不是必然的，而是還和這社會、特別是這社會中的菁英的精神與思想荒廢有關的，而這內部的精神與思想荒廢狀況，則不是用國際結構的理由可以推托掉的。

意識到了「第三世界精神和社會的荒廢」得以形成的內部精神與思想荒廢的條件問題，特別是內部菁英的精神與思想荒廢所應承擔的責任問題，對陳映真重構理想主義非常有意義的是，不只可把他以精



神、情感、心理改善為世界改善媒介的重構後的理想主義視野，直接擴及到過去他認為主要被不平等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所犧牲的階層和領域，而且有助於推動他——把看起來進入並享受了這個社會「進步」、「現代化」的人們的精神與思想荒廢的改善問題，與這個社會被損害、被犧牲人們狀況的改善問題有機地連繫起來。

而陳映真重構中的理想主義和這樣一些現實、這樣一些意識連繫起來，便意味著在面對被不平等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所犧牲、損害的人們時，不只是著眼他們被不公、不義犧牲、損害的苦難，而還著眼挖掘他們承擔苦難、堅於責任、享受生活、享受愛的強韌和能力，著眼從他們所執守的價值與具有的能力中，找到可讓這被犧牲和被損害的階層突破自身「精神和社會的荒廢」的決定性契機，而非把他們擺脫不公不義的犧牲和損害，自覺不自覺處理成使他們擺脫原來處境，讓他們進入精神和思想都存在某種荒廢狀況的菁英和中產階級所理解的「進步」和「現代化」。

而陳映真重構中的理想主義一旦和這樣一些現實、這樣一些意識連繫起來，還意味著在面對台灣看起來進入並享受了這個社會「進步」、「現代化」的人們的精神與思想荒廢時，不能過快把這些人的這些問題僅僅定性為現代社會經濟組織形式和行銷形式等帶來的異化問題。有意思的是，最具思想活力的八〇年代的陳映真，其新理想主義所推動出的最具創造性和實際歷史貢獻的介入實踐《人間》，其發刊詞看起來卻在把——進入並享受了這個社會「進步」、「現代化」的人們的「文化生活越來越庸俗、膚淺」、「精神文明一天比一天荒廢、枯索」的問題——直接歸給了現代社會「高度的分工組織化」和消費主義的作祟。<sup>42</sup>但更有意思的是，《人間》不是以膠著於這些人的荒廢感、枯索

42 陳映真，〈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創刊的話），《人間》創刊號（1985年11月2日），頁2-3。

感，等等可歸入現代社會異化主題的名目，和種種自認對這一異化感的反抗，而是跳開到這一亮麗、耀眼、氣派的「進步」、「現代化」之外的台灣人們的世界，主要從他們的故事、視角與立場，記錄、見證、報導台灣的人、生命、生活、自然和世界，卻成功做到了使很多「進步」、「現代化」中人產生對這一切的深切關注，產生對台灣受損害、傷害人與自然深切的責任感，並把這些關切和責任感進一步發展為對台灣歷史和現實的建設性反省。而這意味著《人間》通過把看起來亮麗、耀眼、氣派的台灣「進步」和「現代化」，與這亮麗、耀眼、氣派中人的枯索感、荒廢感以相當感性的方式置入台灣的社會實質機體存在結構的努力，反相當有效對治了陳映真在《人間》發刊詞中聲明要對治的台灣「現代人」精神和思想的荒廢病症。

陳映真在雜誌創辦時曾這樣界定《人間》的內容取向和價值關懷：「記錄，因為台灣在文化、社會、經濟上處於急遽變動的時代，許多外來的、傳統的和自己的東西，正在以令人震驚速度，毫不留情，毫不顧惜地崩潰、消滅與渙散。我們想記錄這些一去不返的東西。見證，是我們想見證台灣生活的驕傲與挫折、光榮與羞辱、進步與落後、發展與停滯。報導，則是以我們各自的觀點與立場，去凝視我們的生命、價值和生活」。而「在这一切之上，《人間》把注意力集結在人的身上。人，是《人間》興趣和關心的焦點」。（〈擁抱生活，關愛人間〉，人間版作品集6：頁58）<sup>43</sup>

仔細讀《人間》雜誌，當然會承認，在大部分時間《人間》最核心關心與聚焦的都是「人」<sup>44</sup>，這毫無問題，但《人間》關心與聚焦人的方

43 姜郁華採訪陳映真，〈擁抱生活，關愛人間〉，注意這篇訪問的刊登時間是1985年11月3日的《自立晚報》副刊，和《人間》正式出刊只相隔一天。

44 說大部分時間而不說全部，是因為近四年47期《人間》，前後有很多變化。這當中，特別是從楊憲宏開始總編的1989年2月的第40期開始，我認為《人間》在「解放與尊嚴」的名

式，則是具體著眼亮麗、耀眼、現代、氣派的另一面來切入和聚焦人的。也就是，在「驕傲與挫折」中，《人間》選擇的是「挫折」；在「光榮與羞辱」中，《人間》選擇的是「羞辱」；在「進步與落後」中，《人間》選擇的是「落後」，在「發展與停滯」中，《人間》選擇的是「停滯」。

但不能因為《人間》著眼的是「挫折」、「羞辱」、「落後」、「停滯」，便把《人間》對治台灣「現代人」精神和思想的荒廢病的有效，簡單歸為苦難對空虛的療治。因為，在一般傳媒上並不缺少苦難的報導，何況《人間》對台灣亮麗、耀眼、現代、氣派的另一面「挫折」、「羞辱」、「落後」、「停滯」的報導，並不著重於這當中苦難、不義的渲染，而著重「挫折」、「羞辱」、「落後」、「停滯」中對人的生活、對人的人性的影響，並且尤敏於這當中人性的光輝，敏於挖掘報導物件的承擔苦難、堅於責任、享受生活、享受愛、給予愛的強韌和能力。而這不光有助於《人間》被報導者的自我培力，更幫助《人間》在凝視具體的生命、價值和生活時，找到一種呈現方式，從而使《人間》對具體生命、價值和生活的凝視直接抵達讀者心中最柔軟的部分，在激發出眾多讀者愛和責任感的同時，也讓他們因《人間》貫穿於具體報導中的對生命、價值和生活的特別凝視，反觀自己的生命感、和倫理生活，並因之調整和重構自己的生存意識狀態，生活存在形式和價值聚焦方式。

因此，《人間》實踐的成功，在於它成功地找到了一種對當時台灣現實和這現實中人性的呈現和把握方式，這方式對現實中人性的調動和改善，和因這人性的激發所產生的責任感與觀念調整，與伴隨這責任感與觀念調整所產生出的關懷實踐和責任參與，在在都有助於台灣現實的改善。也就是，通過《人間》實踐，陳映真在相當成功地把他社會主義遭遇危機後重構的理想主義，開展為有效的現實介入實踐。

---

義下，主要焦點轉向了鬥爭。有關《人間》這一變化的分析，我接下來的陳映真論文會有討論，敬請有興趣的讀者注意。

《人間》的成功，無疑和陳映真其時的理想主義狀態有關，也和其時其理想主義與他的社會主義取向、第三世界立場、民族主義關懷與民主想像間的張力能維持相當平衡有關，也和配合他進行《人間》實踐的——他其時特有的把握台灣社會與社會中人的方式，與其時他政治經濟學分析方式、過於結構性地把握問題的方式之間的緊張沒有發展為衝突有關。<sup>45</sup>

但僅此還不足以讓我們把握《人間》實踐所蘊含的多方面思想理論意義。比如，《人間》讓看起來進入並享受著台灣社會「進步」、「現代化」的人們的視線，通過《人間》對生命、價值和生活的凝視，聚焦於他們自己看不到，或看到亦不能體會和發現的——歷史、社會、自然、文化和這一切之中人的脈動，而有效克服著他們自己心靈和思想的荒廢。讓我們知道，把看起來進入並享受著台灣社會「進步」、「現代化」的人們曾有的「文化生活越來越庸俗、膚淺」、「精神文明一天比一天荒廢、枯索」問題，過快歸給現代社會「高度的分工組織化」和消費主義作祟的結果，會讓人們過快把台灣「現代人」、「進步人」的這些問題，和西方的現代人異化問題掛鉤。而如此，不僅會影響人們去對台灣這些「進步」、「現代化」人們精神和思想荒廢問題所由以形成的真正機制進行認真的探查、分析，而且也影響人們從台灣內部挖掘可以幫助克服這些問題的社會、文化、人性資源。而《人間》的可貴便在於，《人間》不見得在許多問題上有理論和知識上的自覺清晰意識（前面提到的，陳映真《人間》發刊詞上把台灣「現代人」、「進步人」的精神和思想荒廢問題過快歸給現代社會「高度的分工組織化」和消費主義作祟，便是一例），但它的實踐卻實質包含著對這些困境極富靈感的回應。

而如何從《人間》的實踐所蘊含的潛能中進一步釋放出思想和理

45 關於這些，我接下來的陳映真論文會有詳細討論，也請有興趣的讀者朋友關注。

論的力量，並用這些釋放來充實發展陳映真所開啟的理想主義重構摸索，從而使我們在沒有一個完滿新世界可盼望時，仍然可以對他人、社會、世界乃至我們生存於其中的自然有意義，同時自我亦得以身心安定、充實。就此而言，《人間》實踐無疑是陳映真和《人間》全體同仁留給知識、思想界的寶貴資源，當然也是對中文知識、思想界開掘能力的重要挑戰，而這，當然更是——深受陳映真理想主義重構吸引，深受此理想主義重構推動出的《人間》實踐吸引的思考者們——不能推卸的責任。

在《人間》正式創辦四個月後陳映真所寫的〈兩鬢開始布霜〉中，他講到《人間》籌備了19個月，終於在1985年11月公刊後，社會對《人間》的種種熱烈支持；講到《人間》出刊後，他陷入不可思議的忙碌裡；也講到在過去的一年裡，他「形容開始枯老，兩鬢開始布霜」；但就在講完「兩鬢布霜」後，他語氣一轉：「然而，我卻有這時代中難有的希望和幸福之感」〈兩鬢開始布霜〉，人間版作品集8：頁167-168。

無疑，這種當眾講自己的幸福感在陳映真是極少有的。我總覺得，這一讓他當眾表達幸福，並和「難有的希望」一起說，既和他遭遇社會主義危機後，艱苦的摸索心血在實踐上終於開出了新的成型花朵有關，也和他因這花朵所受到的歡迎，從而對他所深愛並因為深愛而常常深責的台灣湧起強烈的希望有關。

在思想和思想的介入實踐中有過如此感覺的陳映真，有福了！

但如此，考驗我們的問題也就成了：我們能接過這福嗎？！

#### 參考書目

- 文訊雜誌社(2009)《陳映真創作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訊雜誌社。  
呂正惠(2010)《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北京：三聯書店。  
春雷聲聲編輯委員會(2001)《春雷聲聲》，台北：人間出版社。  
陳映真(1983)〈迎接中國的春天〉(為陳映真在台灣舉辦的「『中國之春』討論會」上的發

- 言講演稿)，《中華雜誌》第21卷234期(1983年1月)。
- (1988)《陳映真作品集》6-15卷，台北：人間出版社。
- (1991)〈主，我們這樣子就可以嗎？：「1990年平安禮拜」的隨想〉，連載於《曠野》雜誌第26、27、28期。
- (1996)〈我在台灣所體驗的文革〉，《亞洲週刊》(香港)第10卷20期(1996年5月26日)。
- (2001)《陳映真小說集》1-6卷，台北：洪範書店。
- (2004)《陳映真散文集1：父親》，台北：洪範書店。
- (2009)《陳映真文選》(薛毅編)，北京：三聯書店。
- 陳映真等著(1987)《曲扭的鏡子：關於台灣基督教會的若干隨想(陳映真的心靈世界)》(康來新、彭海瑩合編)，台北：雅歌出版社。
- 陳映真等著(2009)，《人間風景·陳映真》(文訊雜誌社編)，台北：文訊雜誌社。
- 郭紀舟(1999)《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 黃繼持(2002)《魯迅·陳映真·朱光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黎湘萍(1994)《台灣的憂鬱》，北京：三聯書店。
- 《人間》1-47期，台北：人間雜誌社，1985年11月至1989年9月。
- 《文訊》2009年9月號專題「人間風景：陳映真」。
- 1987年1、2月的《曠野》雙月刊創刊號「出走檔案」〈陳映真〉。
- 2009年11月21日-22日新竹交通大學《「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會議論文集》。



# 陳映真在《人間》

王安憶

## 引言

台灣《人間》雜誌於1985年出版創刊號，發行人為陳永善，召集人陳映真，文字編輯中的一位名許南村，這三人其實均為一人，即陳映真。陳永善是本名，陳映真為筆名，許南村則是另一個筆名，多半用在批評性文章。因此，將《人間》視為陳映真主辦，大概是沒有疑義的。

創刊號上，由陳映真撰寫的「創刊的話」，題目叫做〈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陳述了辦刊的宗旨，是要以愛豐潤社會。這個「富裕，飽食」的社會正在變得「彼此冷漠」，於是，它要做的就是：「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熱絡起來」，這是內容。形式是「以圖片和文字從事報告、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也就是說，這是一份紀實性的刊物，然而，卻有著鮮明的思想主導，使它有別於新聞報導。這些客觀性質的材料，在自覺的主觀意識之下，編輯成另一種現實，警醒起人們某一部分已經遲鈍的視覺與感情，重組成新的視野。

《人間》雜誌是月刊，始自1985年11月，終於1989年9月，總47期，四年缺一個月。這不足四年的時間，台灣的社會政治發生了急劇



的轉折，如《人間》這樣一份重視「現場」的雜誌，是無法規避反應的，因此，演變宗旨，越行越遠。在初創刊的一年裡，對於社會弱勢的關懷占據主要部分，那些消失在現代化圖景裡，被遺棄的人和地方，在《人間》的舞台上徐徐鋪陳。舉第1期為例，創刊辭之後，正文頭條為「人間燈火」欄目，文章題為〈李天和葉美惠：一個愛情故事〉，這題目看起來具有象徵性，直接打出姓名，是立傳的意思。李天和葉美惠何其人也？從屏東鄉下來台北謀生的收舊貨人，一對單身的中年男女，因兒女不通融，無法結成合法夫妻，只能在公寓頂層的簡易棚屋內同居著，這多少是苟且的生活，卻被他們過得頗有聲色。就在這一期上，欄目「人間環境」裡，標題〈台北內湖垃圾山的小世界〉，應是李天和葉美惠們同業中更下層的階級；「人間報告」欄目，標題〈我不是小丑，我僅僅是一個矮子！〉寫的是侏儒的生活；「人間社會」欄目，〈妳是外國人嗎？是。妳是中國人嗎？是！〉，越戰期間，台灣成為美軍的休憩地，於是留下千餘混血兒，處境窘迫；「人間封面報導」：〈百分之二的希望與奮鬥〉，是關於山地原住民社會解體後，向平地城市遷徙，有一部分阿美族人，在基隆和平島附近，名為「八尺門」的丘陵地安營紮寨，以捕撈為生計；其後，「人間訪談」欄目下，是陳映真親自採訪「八尺門」報導者關曉榮的文章：〈記錄一個大規模的、持續的靜默的民族大遷徙〉，這一主題，將在以後四期，總共五期中連續發表。還有一個欄目極為醒目，就是「人間世界報導名作選讀」，這一期是日本攝影家的作品：「饑餓」，拍攝衣索比亞饑民，這一欄目將貧弱的關懷拓展到更廣闊的空間。第1期的內容設計，可說集中體現了《人間》的辦刊初衷，但在大約一年之後，情形發生了改變。

我以為最鮮明的標誌是在1987年1月的第15期上，新開一個欄目「人間歷史」——在此需要說明，《人間》的欄目並不很嚴格，一個欄目出現一回即退場不在少數，似乎是為文章專設欄目。粗略計算，欄目

名有七十多以上，卻無一貫之始終，多是常開常關。在這亮相一回的「人間歷史」中，發表的文章為〈30年漫漫組黨路〉。這篇文章的發生，源於前一年，也就是1986年12月，台灣增額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的選舉，民進黨選票上升。文章回顧了台灣五〇年代中期以後的新黨運動，經歷《自由中國》、「美麗島事件」，在1986年9月倉促成軍「民進黨」，自此，台灣戰後第一個反對黨產生。就在同一期上，陳映真親筆撰文「人間封面故事」，對封面人物——《自立晚報》總編輯顏文門作獨家專訪，題目為〈石破天驚〉。在上年底，中正機場發生警民衝突，台灣報界同業，僅只《自立晚報》刊出事件報導，打破了台灣報禁的堅冰。緊隨其後，《人間》新開闢專欄「人間媒體」，連發兩篇文章，一為〈當人民要掌握他們的媒體……〉，二為〈媒體的反叛〉——一切顯示，台灣的政治社會，正發生著大事變，而《人間》亦將目光舉向風起雲湧的中心舞台。「人間燈火」的欄目漸漸停止，「人間世界報導名作選讀」也漸漸停止，又有許多新欄目開闢出來，新欄目往往以專輯形式出場，同時，單純的專輯日益增多，系列報導也增多，兩者漸漸取代欄目，表明專題性質加強。可以見出，問題漸變得具體和集中。在眾多的主題中，漸漸提煉出主要的項目，其中猶為彰顯的就是回顧檢討台灣歷史，不止是歷史事件本身，族群生存、兩岸分離、環境損害、經濟畸形，都企圖從中找出根源。1988年11月第37期，通篇為「《人間》三周年特別企劃」，總題「讓歷史指引未來」，將台灣自1945至1985年的歷史梳理剖析，重新認識。在此，《人間》公然表明擔負歷史進步的自覺性。其時，回顧陳映真「創刊的話」，不禁能體會到那時期《人間》的款款溫情，在社會劇變中，磨礪得越來越尖銳，而且強悍。

1989年2月第40期，《人間》雜誌社進行了人事變更。陳映真以發行人身分宣布由楊憲宏任總編輯，張志賢任社長。之前不立社長，只有召集人，由陳映真擔任，此時，「文字編輯」已不在版權頁上刊登，

於是，陳映真的職務就單純為發行人。就是從這時候開始，陳映真的文字頻繁出現，身影分外活躍。第44期，他獨立擔綱一輯13篇的「現地報告：激盪中的韓國民主運動」，接著，第45期，開出「陳映真專欄」，看起來，他是擺脫冗務，全力以赴赴《人間》的採寫第一線。很顯著的，在新的總編輯方針下的《人間》，欄目幾乎全退，替代上場的是專輯，主題重大，直入政治體制，體量也很大，每輯文章可達十數篇，基本覆蓋全本刊物。在前面第20期，有陳映真小說〈趙南棟〉開山的「副刊人間」，連續16期之後停輟，由副刊的文學特性輻射出來的情暖光暈，便在犀利堅硬的現實強度裡中止。自此，《人間》實際已成本政論性刊物，而陳映真也從一個作家轉向社會學者。而在「陳映真專欄」僅開出三期，《人間》發行1989年9月第47期之後，嘎然而止，終結了不足四年的壽命。

根據以上所述，我將《人間》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85年11月創開始，至1986年11月總13期止；第二階段自1986年12月總14期始，至1989年1月總39期止；第三階段為1989年2月至1989年總47期。逐段進行描繪，從中辨析台灣八〇年代，一個知識分子群體的思想脈絡與情感天地，裡面就有著陳映真的身影。

## 第一章 人間燈火

### 李天和葉美惠

我以為，無論是「人間燈火」的欄目名，還是其內容，都與《人間》創刊的主旨最貼合。在開始的日子裡，這一主題發揚得極為醒目，那些貧弱的人們，從來生活在社會的負面裡，此時登上場來。他們竟不像我們通常想像的那樣，是卑下的，正相反，他們表情軒昂。《人間》沒有濫施同情心，而是懷著敬意，並不是說他們所受對待是公正的，

我想《人間》要說的是，即便在這樣不堪的境遇裡，他們的人生依然是有價值的。

在我人為劃分的第一階段，總共13期裡，「人間燈火」欄目出現11次。在引言中介紹過的〈李天和葉美惠〉，副題是為「一個愛情故事」；第二期上，〈我的朋友范澤開〉，這位老兵范澤開，流落異鄉，人到中年方才結婚成家，年輕的媳婦經常出走，找回來，再出走，就在這樣不穩定的生活中，拉扯著兩雙兒女，然後又迎來媳婦最近一次出走帶回來的私生子，切莫以為范澤開懦弱可欺，他只是憐惜這女子年輕無頭腦，幾番原有，終立下底線：「如果三個月內她再胡來出走，我就正式跟她離婚」；第4期「人間燈火」——〈阿德，加油啊！〉，不良少年阿德有了妻室，向女兒發誓：「我要給你們最好的」；第5期為〈斷臂中升起的聖歌〉，主人公在「八二三」炮戰中失去雙臂，沒有頹然，而是以認真誠懇的生活姿態贏得人們的尊敬；第6期裡〈焊槍，電鑽，腳踏車……〉，寫的是台北貧民區，靠修理日用品為營生的家庭，男孩從小幫助家中生計，練就技工手藝；第7期，〈讓我牽著你的手〉裡，大陸老兵和山地女人各有不幸的遭際，半途結為夫妻，女人要年長11歲，又有一群兒女拖累，男人說的是：「她不嫌我，我不嫌她，剛好配成一對」；第8期這一欄內，出場的是兩個造琴人，和以前「人間燈火」裡的階層似有不同，他們操的是造琴的手藝，琴這一樣清雅的古物，使得他們的生活有了名士的氣息，可在這一個喧囂的社會裡，不也同樣的孤寂和荒涼？所以，文章就叫做〈叩寂寞，以求音〉，如此，點亮又一隅邊緣人生；第9期說的是〈計程車上的藝術家〉，一所殘障學校的美術老師，為了養家，辭職開計程車，在台北街市梭行，人世眾生從車窗前流過，為他速寫下來，拓寬著繪畫的題材面；第10期，〈在黑暗中為別人點燈〉，記首位盲人大學英語系畢業生陳國詩，他用五年時間點譯完成盲文《英漢漢英大字典》，文章中有一句話，可用來為「人間

燈火」欄目作注，當問他：「燈光亮不亮，對你有關係嗎？」回答是：「我開著燈，讓朋友知道我在，我正醒著——」，所以，「人間燈火」並不是從外照耀，而是華升在內裡，讓斂聲靜息的人生響起聲色。接下來的第11期，〈「豬師傅」阿旭〉，這一個阿旭十分的倒楣，從海灘撿來一顆槍榴彈，蠻力拆卸時爆炸，手腳傷殘不說，雙眼都瞎了，可這壞運氣並沒有挫傷阿旭風流倜儻的天性，他是「相褒」的高手，據文章描寫，「相褒」就是對歌，詞曲全憑即興，即情即景，信手拈來，需要快速的反應，還有協韻的天才，阿旭一上場，全場皆歡。在第12期「人間燈火」欄目，所描寫的三重市，其實就是城鄉結合部，在「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之下，農人從荒疏的村莊湧向城市，卻又進入不了主體，便在城郊滯留下來，形成一個弱政的區域，在媒體和傳聞中已成流氓、色情、犯罪的群落，而這裡，卻展現給人們三重另一番面目：勤勞、自信、友愛、尊嚴，在自行調節中建立起自己的社會。第13期欄目中，所出示的也是這麼一個被歷史拋棄的角落，二十多名大陸退伍老兵，在河川地區開闢一個農場，這些無家無業的外省人，誰願意把女兒嫁給他們？迎娶的多半是有缺陷的女人，當地人便管農場叫「啞巴農場」、「矮狗莊」、「醜人村」，可那裡也有著蒸騰的生活：媳婦串連起來主張權益，孩子們為維護自己母親發起戰爭，男人們繾綣著戀戀鄉情……

在「人間燈火」欄目之外，「人間報告」、「人間社會」、「人間封面故事」，這些欄目的內容，不同程度地與其相近。比如引言中提到過的〈我不是小丑，我僅僅是一個矮子〉，屬「人間報告」，這一欄目只此一回，以後再沒出現。「人間社會」欄內的越戰期間美國兵留下的混血兒童命運，以後還有〈望鄉的礦夫〉、〈捆工阿榮伯的故事〉、〈鎗鋼鎗鋼上摩天〉——南投的摩天菜園，布農族的農人們的生活變遷；第7期「人間封面故事」裡的〈山嶺頂的囚徒〉，瘋人買主生被囚在密封的小屋，

只留一個小小的窗洞，窗洞外面坐著殘疾人，鄉黨稱「跛腳宗仔」，一裡一外作伴，如同一對遺世的孤兒——這一節頗具「人間燈火」的光暈，所以，這些篇章雖沒有納入「人間燈火」，而是以另一些特質歸屬於其他專欄，但可視作為旁支。在這最初的時期中，有一輯特稿，我以為典型而全面地表現了「人間燈火」的精神，那就是1986年7月第9期上關於曹族青年湯英伸案的「悲劇的背後」。

### 不孝兒英伸

1986年1月，台北新生北路一家洗衣店裡，老闆、老闆娘及女兒慘遭殺害，案發當日下午，警察局就接到自首電話，兇手是店內的洗衣工，一名18歲的曹族青年，這就是湯英伸。1月9日，湯英伸離開阿里山下的家鄉，去到台北謀職打工，1月25日便發生慘案，其間16天裡，究竟發生了什麼？湯英伸是從報紙上看到台北「天祥西餐廳」新開張急募人工的廣告，投奔而去。事實上，這則廣告已在報紙上刊登一年有餘，在廣告標明的地址上，並沒有「天祥西餐廳」，相距一段距離，倒有一家「天祥」，但不是「西餐廳」，而是「自助餐廳」。派出所裡的回答則是「天祥西餐廳」並無登記，按電話打過去，卻有人接聽，並說：「隨到隨做，帶身分證來登記就行」，到了那邊，才知是職業介紹所。事情就這樣詭異地開始了。職業介紹所的傭金為3,500元，湯英伸摸空了口袋只有1,500元，於是由雇主，即洗衣店老闆墊付餘下的2,000元，加上去洗衣店上工的200元計程車費，湯英伸正式就業之前，已經簽下2,200元的欠條。這是一個家庭式作坊，慘澹經營，湯英伸是唯一的雇工，勞動相當繁重，一日工作十幾個小時，晚上擠住在老闆孩子臥房的一角，可以想見心情的灰暗。於是就起意辭工回家，老闆不允，因他工作8天，每天200元的報酬，總共1,600元，賬軋下來，尚負老闆600元。兩下裡言辭激烈，很快過渡到肢體衝撞，一怒

之下，失了理智，出手捅殺老闆，又一發不可收拾，接連殺死老闆娘及其女兒。事發近一月，台北法院以公訴案，判決死刑，被告則提出上訴。

就在湯英伸命懸一線之際，《人間》推出案件的深入報導，依從慣例，配發大量照片。那俊美的少年，天真無邪，從照片上看著我們。還有他的家人們，顯見得是正直善良的人，過著本分有公德的生活。這孩子，從來乖巧，鄉鄰暱稱為「弟仔」。案件中的凶嫌，從枯索的法律行文中顯現出生動的面容，發生於旦夕之間的事故，則演化為漫長的生活，幾可涉及歷史淵源。

湯英伸家在嘉義縣吳鳳鄉，「吳鳳」這名字，幾乎就是一個「隱喻」。在之後11個月第20期《人間》，為湯英伸伏法所做一欄「人間少數民族」，文章題目為〈我把痛苦獻給你們〉，其中有詩人蔣勳的一段感言，他說：「湯英伸的案件，絕不是單純的刑事案件，多年來，達邦的曹族背負了謀殺吳鳳的歷史罪名……」，再後的第22期，刊出系列專題「曹族三部曲」第一部〈一座神像的崩解：民眾的吳鳳論〉，專為破除吳鳳的迷信。吳鳳原本是清末的台灣商人，在平地與山地之間往來買賣，傳說中卻成為一位漢人英雄，為和睦山地曹族，殺身成仁。這一帶，設有吳鳳廟，民間又有吳鳳神位，再有吳鳳傳編入小學課本。追溯其源頭，是源於台灣日據時代「理番政策」需要所虛擬的神話，又在戰後為制服山地民族運動而強化擴張。不知什麼原因，「曹族三部曲」只此「第一部」，並不見後續的兩部，但關於台灣原住民地位權益的爭取，是《人間》貫穿首尾的命題之一。湯英伸所生長的吳鳳鄉達邦村，是一個淳樸的山村，從專輯線索一〈不孝兒英伸〉文中，案件初審時，族人們擁在法庭外的情景就可看出，他們路遠迢迢趕來，「木訥、謙恭，不住地抽搐流淚」，這大約可視作他們面對著以漢人為主體的平地社會的集體表情。現代化生產與生活的方式，開放了空間，如同文中



所說，湯英伸的族人集資修建公路大橋，打通了隔離屏障，外面的大世界確實有著富裕和成功的機會，問題是能不能接受它的馴化。湯英伸在嘉義師專三年求學期間，總共犯下三次大過，三次小過，四次警告，事由是自行車載人、制服不繡學號、抽煙……但嘉獎也是不計其數：才藝、田徑、優秀山胞聯誼會……但最終還是因為打麻將違犯校規勸退休學，然後離家赴台北，走上不歸路。這些獎罰大致描繪出一個自由率性的男孩子，如何在紀律中掙扎，終於失敗的經歷。在此引發的教育問題，在之前第6期上曾做過一個專輯「怎樣的兒童，怎樣的未來」，討論現行教育損失了孩子的快樂個性，在鄉間山村，那些教育制度鬆弛的環境裡，孩子依著本性成長，卻將在未來的競爭中處於弱勢。湯英伸在學校生活中的遭際，已可提前反映這樣的兩難處境。失意的心情使得台北之行更陰沉了。很難說，在台北的不順遂裡有多少成分應歸因於社會成見，與洗衣店老闆衝突時，老闆脫口而出的那一聲「番仔」，是可窺見對山地人根深蒂固的歧視，但與所受挫折相比，亦算不上什麼，不幸是發生在這個節骨眼上，湯英伸的承受力與控制力都已到了末端。他冒冒然投身進台北，這個城市的大與陌生，荒漠與喧囂，蠻橫與曖昧，對他柔軟的天性幾成暴虐，十數天內，「弟子」就像換了一個人。事後有多少人扼腕，湯英伸要不來台北就好了！可湯英伸這一次不來，還有下一次；他不來，還有別的人來，誰能擋得住人們走向現代化的腳步？就像始於創刊號的「八尺門」系列報導，一個族群整體性地遷徙到基隆，為發達的都市開闢一個貧民窟，湯英伸的偶然事故背後其實是大趨勢。這就是《人間》對湯英伸案報導的立場，它從這一件個案出發，進入到山地民族命運的思考，這思考在以後的《人間》，將會越來越嚴峻。

關於湯英伸案所引發的社會剖析還沒有完。在「悲劇的背後」線索二，〈隱藏的陷阱〉裡，專門調查北市的傭工介紹所，有執照或者



無執照的，一併剝削著外來的尋工者，為這城市的經濟生產推銷廉價勞動者。線索三〈冰凍的春天〉，是關於苦主一家的遭遇。這一個洗衣店也積蓄著台北人生計的哀戚，亞洲經濟起伏，使得台灣中小企業動盪不安，胼手胝足地積累、創業、萎縮、蕭條、破產，再創業……總之，從湯英伸案是可輻射整個社會和時代的不良，從某種程度說，這一起慘案是在替社會抵罪。在〈冰凍的春天〉的最後部分，筆者對苦主留下的兩個孤兒的概況作了描寫，孩子由其伯父一家收養，伯母是個心慈的女人，對兩個侄兒真心的喜愛，這是慘劇中的一點溫馨之意，我以為頗能反映《人間》的情懷，那就是陳映真「創刊的話」的題目：「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當事情已經發生，能挽回一點是一點，湯英伸終是一死，那麼還有活著的人。在第24期《人間》，「人間追蹤報導」欄目中，寫道湯英伸伏法四個月後，其父與苦主的父親淚眼中相擁。湯英伸父親將《人間》發起募捐善款中湯家應得的部分贈送與那老人，作兩個孤兒的教育費，老人則表示放棄對湯家的民事賠償，誠摯邀請道：「以後，你到台北來，一定要到我家奉茶……」悲劇終於落下帷幕，在這遺世的苦難中相濡以沫，生出些許暖意，點亮人間燈火。

### 空虛啊！空虛

《人間》所主張權益的弱小者中，還有一類更不為人們注意的群落，就是第7期中，那一輯特別報導：「不敢說出口的愛」。從一輯四篇文章的題目即可瞭解那是一群什麼樣的人：〈斷袖的青春〉、〈超越在挫折與障礙之外〉、〈一個同性戀者的形成〉、〈寫給阿青的一封信：不是孽子〉——他們遊走在城市的暗夜裡，孤獨地忍受倒錯的情欲的煎熬，前途茫茫。衛生署正式證實台灣第一例愛滋病患者去世，其時，已有調查資料顯示，愛滋病與男性同性戀者有密切關係，更增進了這

不齒的情欲的恐懼。有誰能知道他們的所思所想？他們隱蔽在人間一隅，不能像貧病孱弱得到公義的支持，《人間》卻嘗試著進入他們的社會，站在他們的境地瞭解他們，伸出援手。之後第8期上，「人間座談」刊出「青少年同性戀現象討論會」紀實，題為〈不可兒戲，真誠之必要〉，座談的宗旨是宣導科學的態度，不以大多數人行為作規範標準強行矯正，而是「尋求一個更合理的社會價值的建立」，給同性戀者平等對待，使他們走到社會的正面。

這自古就有的特殊生理現象，到了現代消費社會，它所包含的不與主流融入的邊緣性質，便被時尚攫來作元素，製成一種頹廢的流行。「人間次文化」的欄目名，可說是為此作了一個命名。第2期，「人間次文化」開欄之初，寫的是台北「龐克」一族，題目〈空虛啊！空虛……〉，那主人公小傑，是公認的同性戀者，可誰知道呢？也許他只是受這前衛性風尚吸引，怪異的裝束，妖冶的作派，另類的身分，放縱的聲色，離經叛道的行為——這使得空虛的精神得到歸宿，但當藥品不能及時提供，毒癮發作，那崩天裂地的時刻，身體終於忤逆了表象，透露出生存的哀痛。

「人間次文化」欄目出場不多，前後總六期，相對集中在《人間》雜誌的前期，描繪都市圖畫，以夜景為多，大約可看出《人間》視野裡的都市景象。〈空虛啊！空虛……〉之後，第二次出場是第5期，〈漂泊者之歌〉，寫高雄市一間卡拉OK餐廳，規模相當大，裝飾華麗，價格卻意外地公平，屬中等消費，於是，光顧者眾多。有流水線上的操作工、寂寞的陪酒女、模仿電視上歌星表演的兒童、自得其樂的老人，入夜越深，人群越雜，氣氛亦越熱烈。似乎沉澱在白晝裡的各色欲望全聚集在這自娛自樂的歌喉中，一併宣洩出去。相隔若干期的第11期，「人間次文化」欄內文章〈招貼文化解讀〉，專門描寫台北市街頭小廣告：租屋、徵工、求職、售樓、色情媒介、推銷商品……筆者企圖

從中管窺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壅塞的又是分離的人群，局促又動盪的生計，卑微的鼓脹的欲望，像不像湯英伸徬徨其間的台北街市？這些四處張貼的小廣告，包藏了隱喻，隱喻著一個完整的社會體系被解散，分崩離析成碎片。幾乎是可作為對照，第4期「人間封面報導」的文章〈當一個村落從地圖上消失……〉，所報導的是台北縣的洲後村。這是一個有著300年歷史，1,000人口的宗族村莊，99%人共一姓，彼此間有著或近或遠的血脈，據老人稱，是乾隆中期，福建同安移民而來的家族，歷經日據、光復、行政改變、工業化發展，洲後村一直保持著凝聚力。然而，在台北疏通水道的建設計畫中，洲後村面臨遷徙。在失地、失業的普遍遭際之外，洲後村另有一個更大的危機，那就是宗族離散。洲後村一再要求集體遷村，環境差，他們不計較損失，土地貴，他們願意自補差價。在拉鋸式的談判中，終於還是讓出舊村，各自過渡，遙遙無期地等待新村撥地，不知何時重建家園。

### 日頭要下山……

在《人間》紛繁的欄目中，有一個「人間民俗」，在前階段的13期中，登場4期。相比較絕大多數欄目僅出席二、三次，甚至曇花一現，這樣的頻率就可說有一定的密度。這四期文章分別是〈逐廟會而居的歌仔戲班子〉(第2期)、〈山將入相，掌中滄桑70年〉(第3期)、〈日頭要下山，是誰也擋不住的〉(第11期)、〈岡山籬筐會：台灣傳統市集的沒落與蛻化〉(第12期)，全是報導日益蕭條的民間技藝，那是從多少年多少代的社會組織形式裡形成流傳下來。台灣本土的歌仔戲，曾經有過極興旺的景象，全省有三百六十餘所戲院，如今流落在鄉野草台，為婚喪嫁娶或者祭祀祝禱捧場，其間還必穿插流行歌舞；「掌中滄桑」指的是布袋木偶，文中所寫王炎老師傅，自小生活於布袋戲班中，集70年生涯，這樣手工業式的藝術，哪裡經得住產業化影視的洪

流；就是與「招貼文化解讀」同第11期的〈日頭要下山，是誰也擋不住的！〉，寫的是宜蘭市一個街角，現代化高樓叢中，「瑟縮著六家打鐵鋪子」，文中用了「瑟縮」的字樣，屈抑的表情躍然而出。鐵匠鋪子裡叮叮噹噹的捶打聲，滋滋的淬火聲，往往代表著繁榮的集市生活，在文藝復興時期，鐵匠幾可是藝術家，那是多麼矯人的行業，卻已夕陽西下。

在「人間民俗」哀悼的傳統文明逝者如斯夫背後，還有一個更巨大和徹底的頹圮，就是環境，方才說過，這是《人間》貫穿首尾的大主題，「人間燈火」中的人們，就是在這大崩塌中的小命運，以幽微的燈火去照耀，有能照亮幾許？在這第一階段的13期中，第10期關於杜邦事件的專輯「激流中的倒影」，我以為是環境保護題目的重量級出擊。面對急迫的現實，就是美國杜邦公司要在鹿島開廠生產二氧化鈦。引進「杜邦」這一項目，可為八〇年代台灣帶來最大一宗外資——60億台幣，這還不算，「杜邦」還會吸引其他的外來投資，於是，視污染於不顧，也視民意於不顧。專輯總共做了七篇文章，描繪了這場反杜邦群眾運動：事發起因與過程、民眾領袖人物、知識分子人文思考、杜邦與台灣關係的淵源回顧，照慣例配發大量攝影圖片——順便說一句，《人間》雜誌的攝影占很大比分，是為加強現場感，許多系列與專輯是由攝影人策劃製作的，「世界攝影報導名作選讀」，亦是介紹著名的現實主義攝影家與作品，圖片的寫實性使人們身臨其境。第12期的「人間像」欄目裡，就有一篇文章，題為〈好的照片可以成就新事物〉，這一特質在以後的日子裡，還將形成具體的行動，比如開設攝影班、舉辦攝影展。《人間》不止是把攝影當作表達的手段，而是一種立場態度，就是面向現實。

台灣的環境是《人間》心頭的恨痛，除第10期「激流中的倒影」外，之前第8期上有「核電廠就在我家後院」專輯；更前的第3期，「人

間環境與生態」欄目的〈水不能喝，雞不下蛋，豬養不大〉，報導台中三晃農藥廠污染事實；同樣的欄目在第12期的文章為〈消失的蝶道〉。關於水源污染的專輯有第7期「悲泣的河海」，報導東西岸河海在工業的擴張發展中瀕臨危機；第11期和第13期，分上下兩輯進行系列報導「一條河流的生命史」，上輯為穿越台北的基隆河做了一部污染的編年史；下輯呈現的是位於中部台灣第一大河濁水溪，與基隆河不同，它養育著一片肥沃的平原，依天地生息，自給自足，然而，就像那句話「日頭要下山，是誰也擋不住的」，外面的資本力量侵蝕進來：美國傾銷進口玉米使得穀賤，農藥化肥讓土地板結，現代生活垃圾堆積，年輕人外流……一個自然和諧的世界逐漸凋敝，終至崩陷。

### 德蕾莎姆姆

在1986年5月第7期上，「人間對話」欄目裡，陳映真親力訪談日本現代舞團「白虎社」社長大須賀勇。同年3月，「白虎社」來到台灣演出，十分轟動。從照片看，演出的畫面極為怪誕酷烈，感官性極強的肢體和動作，似乎是要表現一種絕望。訪談中，很明顯可見出陳映真的熱忱，他努力要對這些頹廢的圖景作出正面積極的理解，他引導著受訪者回應他的詮釋，希望得出戰後日本的現實批判以及現代主義批判的結論。而受訪者則另有一辭，主張「用異物去異化現實」。陳映真繼而又提出「超現實主義是你們的目的自身呢？還是一個手段？」回答是「我們注重的是實驗和創造的本身」。陳映真再進一步問：「能不能說，白虎社的意識，並沒有現實改造的意圖」，回答是「我們不是政治家，我們是原創者」。好，那就不談政治，談藝術，談白虎社舞蹈中的「殘虐主題」，但在陳映真，如何百回千折，終還是要回到社會現實的節骨眼，他問的是——「白虎社的『殘虐主題』是對於20世紀結構性的殘暴的批評呢？」這一次受訪者沒有躲閃，回答「『殘虐』是潛藏在人性

深處的激情」，談到人性，尤其是色情的部分，受訪者顯然興奮起來，放鬆了警戒，讓陳映真引到了「富裕化的近代日本人的問題」，在此，訪談流暢地進行了一段。受訪者接受了現代化批判的思想，當然，還是用色情的概念，「現代化使日本人在創造性上陽萎了」，日本戰後社會變異發展的觀念也接受了，亦同意拯救的觀念，依然是用色情——「一種人與大自然交媾的那種色情……」但當提出陳映真最迫切要求回答的中日戰爭，受訪者便遲疑了。

在《人間》的初始階段，陳映真很少親筆而為，經統計，前13期中，總共有五次出場，前三次均在創刊號上，一是「創刊的話」，二、三同為訪談，前者訪問「八尺門」系列報導主持人，後者是香港影星鍾楚紅——這一個訪談進行得很輕鬆，鍾楚紅表現得樸素、單純，在陳映真，當然要提出較為嚴肅的問題，不過也止於「九七回歸」和「制度化的婚姻」，鍾楚紅則頗解人意，說：「用我的照片做封面，可以幫你們多賣幾本」。這一篇很可愛的訪談，使《人間》的氣氛有張有弛，變得明快了。第四次出場就是日本白虎社訪談，之後的第五次，是在第9期，「怒吼吧！花岡」特輯裡譯寫文章〈血腥的建設〉，聲討花岡慘案的始作俑者——日本鹿島建設公司。

可以見得陳映真對日本現代舞團白虎社的重視，他努力從中挖掘出批判現代資本社會的武器，就像標題所說：〈用舞蹈向「現代日本」叛變？〉，可結果是一個問號。他的問題不是讓對方茫然，就是抱審慎的態度，多少是規避的。面對如此強大的歷史趨勢，陳映真企圖尋找反抗的力量，可是，上哪裡去找呢？在那些人間燈火的光暈裡，哪裡隱藏和積蓄著銳度，待日可發？仁慈如德蕾莎修女——第3期的「人間封面報導」，這一位獲得1979年諾貝爾和平獎金的姆姆，來到台灣，媒體蜂擁而至，《人間》避開了熱鬧，封面上的德蕾莎姆姆是背影，就好像一個清掃的女工。《人間》尋找到她的「仁愛傳教會」在台灣的兩

個分支組織：「仁愛修女會」和「仁愛修士會」，對其間兩名修士做了報導。這兩名修士分別是印度籍的馬立德和韓國籍的林采洙，他們每週三天，來到台灣「愛愛安老院」，為那裡孤寡病殘的老人服務，每週的另一天下午，再到痲瘋病樂生療養院陪伴病人。在這篇報導中，引用了馬太福音第25章35節的話——「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來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文章還引用耶穌基督回答善心人的話：「這些事你們既然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是否可將拯救的希望寄予在這利他心上，它面向普世的苦難——在「人間世界報導名作選讀」這一欄目裡，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台灣，而是亞洲、非洲、東歐、美國，遍地的受苦的人，這個世界一定在某個地方弄錯了，繁衍了罪行。如同上帝選擇了耶穌，人世間總有人挺身被無形選擇來作救贖，堪稱博大，卻也是渺茫的救贖。

## 第二章 讓歷史指引未來

### 啊！美麗的台灣

1986年12月的第14期《人間》上，開始系列報導「啊！美麗的台灣」開篇題為〈莫讓貪欲的手臂摧毀台灣聖山之美〉，說的是從能高北峰向南至安東軍山，十座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山嶽，位於台灣中央山脈主脊，合稱為「能高安東軍」。台灣兩大河系：濁水溪與木瓜溪便發源於此，懷抱遼闊的高山草原帶和高山湖泊，分布無數巨木群，經歷多少光陰的地質改變，形成奇峻險拔的岩形山貌，著名的旅遊景點「太魯閣」，只是一隅。「能高安東軍」是當地原住民傳說中的聖山。自光復以來，台灣為發展而砍伐森林、污染水源，趨勢不可逆轉，於是，《人間》發出呼籲，要求「能高安東軍」一併納入太魯閣國家公園，列為「自

然生態保護區」，不至摧毀在「我們飽食的一代手中」。

「啊！美麗的台灣」系列自第14期始至第23期止，總共有八篇報導，依次為〈高山之雪：亞熱帶台灣的雪境〉、〈台灣熱帶雨林低地的黃昏〉、〈山的女兒〉、〈七彩湖的悲歌〉、〈紅檜族群的挽歌〉、〈保衛台灣最後的原始森林〉、〈丹大林區砍伐現場報告〉。從題目可看出台灣的地貌環境的豐饒，以及遭受毀壞的情急之態。之後1988年元月的第27期上，應對末篇〈丹大林區砍伐現場報告〉作出深入報導的專輯「來自台灣森林的緊急報告」；接著是「保衛森林的緊急呼籲」；然後，「搶救台灣原始森林報告」；再然後，「台灣森林續絕生滅的關頭」；再「搶救台灣森林」；再再，「搶救台灣森林」，聲聲切切，一總六期。可視作「啊，美麗的台灣」的後續，亦是為其激發，行動起來，介入到現實中去。專輯調查並揭發越規墾伐的個中內幕，是以私營資本與政府林務部門互通。比如，利用「租地造林辦法」條文，允許租賃的造林地中，三分之一以內面積可用於粗放種植，卻有意忽視租地條文的前提是低海拔山區：先出租了超規定海拔線的造林地；而後栽種果園；繼而改為高麗菜園——高麗菜是生長在高海拔地區的高利潤蔬菜，必得精耕細作，設立灌溉系統，大大違背「粗放」的原則，破壞了表土。面對事實，林務部門卻一味搪塞。專輯一邊檢討歷史，七〇年代台灣唯發展論的經濟政策，一邊再接再厲，繼續勘察，暴現更驚人的舞弊，林務局檔案所記更新造林基本是虛詞。其時，關於台灣森林的濫伐已驚動社會，各界人士發出「十大呼籲」，要求嚴格法規，整頓林務。就當全島矚目，群情激奮之際，卻又發生盜林大案，政策與機構的弊端彰顯於此。在「搶救台灣森林」的文末，筆者嚴正道：「對森林而言，統治並轄管台灣達43年的國府，是對不起這片土地的」。



## 邁向工運之路

我將《人間》自1986年12月第14期起，視作進入新階段，可說緣於此理由，那就是，在這時開始，深究台灣歷史社會，已成為《人間》的母題。「人間燈火」欄目，自此往後，斷續出現六期便結束了。但這些處於社會底層的弱者，並沒有完全銷聲匿跡，而是以另一種姿態，變身在其他欄目中。他們似乎成長起來，有了自覺性，更為積極，為爭取自身權益而戰鬥。比如「人間社會」欄目，在上階段出場五期，延至這一階段，尚有三次出場，第23期中，文章名為〈真「戰士」，假「授田」〉。文中報導的群體，是「人間燈火」，也是之前「人間社會」中的主角，就是大陸老兵。他們通常是不幸的面目，遠離故土，漂泊在異鄉，兩手空空，將就著婚配和成家，懦弱而認命地度著餘生。而在〈真「戰士」，假「授田」〉中，他們卻憤然而起。文章記敘了「大陸來台官兵聯誼會」在1987年7月的一次會議，內容為籌劃前往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要求政府給予公平合理的生活待遇。中央黨部事先知道消息，派出社工會總幹事到會聽取意見。筆者詳細分析了在台老兵遭際背後的歷史原因，追根溯源，可追至1945年「杜魯門圍堵政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以美蘇為首兩大陣營形成冷戰格局；1954年，台灣正式接受美援，進入美國在亞洲的權力秩序；1959年，美軍顧問團向國民黨提出精兵計畫，目的是使台灣軍隊本土化，淡薄民族統一意識，於是，大批大陸來台士官生現役退伍。然而，由美國提供的巨額退伍費卻被瞞天過海用於工程建設，代之以一張空頭支票，名曰「戰士授田證」，外加400元台幣和少許衣物，開始了慘澹人生。來台老兵和社工會的溝通破裂，翌日的請願也無功而返，然而，老兵臉上的戚容就此改成了激昂憤慨的表情。

再看「人間像」欄目——「人間像」早在第2期開張，姍姍於第12期二度出場，而在第二階段的25期內，總共有七次登場，在《人間》

欄目漸趨稀疏與淡化中，「人間像」幾可算得上正常了。1988年5月第31期，「人間像」欄中文章，題目為〈羅美文和他的兄弟們〉。羅美文是新竹客家人的後代，高中畢業，服過兵役，經幾番擇業，最後考入遠東化纖總廠做工人，在上年底工黨建黨大會當選工黨副主席。他積極參與組建工會，發動大罷工，爭取提高年終獎，最終獲取勝利。這一個家道中落的農戶的兒子，對朋友經常會說這麼一句話：「我們在有生之年，要在工作崗位上，劃下一道有意義的痕跡，越深越好。」他令我想起1986年4月第6期上，「人間燈火」欄目，〈焊槍，電鑽，腳踏車……〉裡的那一個少年宋文章，出生在台北貧民窟裡，父親擺攤為人修理日用品，他從小替父親打下手，與廢舊物品交道，這些器物的毛病大多不見經傳，於是他也練就一手旁門左道的技藝，以他老師的話：「技術怕都在專科生以上了」，自然，對書本上的知識他就缺少熱情了，學業平平。這個自小擔負著家庭重任的孩子，並無遠大的夢想，略微有閑一些的期望，就是參加學校救國團的寒訓活動。筆者對宋文章充滿了同情、喜愛和擔心，不知會有什麼樣的未來等著他，文末寫道：「在憂慮中，我焦急的渴盼著。」自學的小技工宋文章，也許有一天，會進入大工業的體系做一名操作工，那麼，他會不會有著羅美文那樣的未來呢？

1987年5月的第19期上，新產生一個欄目「人間勞工」，先後出場四期。在第27期上有獨一期「人間工人」欄目，從名稱和內容看，都可歸入「人間勞工」，這麼算，就有五期。第23期欄目文章題目〈邁向工運之路〉，可用來概括「人間勞工」的主題。第19期開欄，是為勞動節特別企劃，文章名〈電視·電視公司·演藝勞工〉，從四位藝人與簽約公司勞動糾紛的個案出發，揭露台灣電視演藝界的侵犯權益事實；同時指出新成立的「台北市電影電視演員業職業工會」有名無實，不能聲張正義；要求電視公司根據政府公函中「電視演藝人員適用勞動基準

法處理原則」的條文，確切履行，還藝人們公正。第23期的〈邁向工運之路〉，報導台塑企業仁武廠區的南亞總廠顏坤泉，競選工會理事長，在選舉前夕收到公司「人事通知單」，以「煽動勞資對立」而被免職，但顏坤泉不為屈服，與工友們繼續努力，為勞方在工黨理事會中爭得絕大比例的席位，掌握了自主權。第27期「人間工人」欄內文章〈一個溫暖的家，一份安定的工作〉，記錄的也是工運的故事，發生在高雄的造船公司，主角名劉珩。劉珩的背景與羅美文、顏坤泉有所不同，羅美文和顏坤泉均是農家出身，劉珩則是眷村第二代，但所行卻為一事，就是領導工人，建設工會。劉珩們的任務是罷免當任理事長，讓工會回到工人的手裡。在這一時段裡，幾乎遍地烽火，勞工們覺醒了，紛紛要求主張權益——七個月後的第34期，「人間勞工」再次登場，報導〈中正機場大罷工？〉，題目中用了一個「問號」，是因為「大罷工」在千鈞一髮之勢收住。風波起於中正機場獨家地勤服務業的桃勤公司，經多時拉鋸，勞資雙方舉行最後談判，倘若談判破裂，便舉行大罷工。屆時，美國、香港、日本、東南亞，多條中轉航線將停運，成為國際性事件，而公司將承擔各航空公司的巨額索賠。談判的條件看起來很簡單：一是清償30分鐘超時加班費；二是19名未繳會費被免除的會員，公司不可追補空額。第二條的內容比較微妙，這19名會員實際是資方安插入會的人員，如此便杜絕了資方勢力再次進入。將勞資雙方長期的矛盾衝突歸納成適度的兩條，體現了工運的成熟。不久，僅隔一月，第36期《人間》，「人間勞工」的題目為〈不開車，上街頭〉，中正機場未遂的罷工，由苗栗客運的員工們實現了。也是談判在先，工會要求公司遵照勞動基準法，補償解決以往的違規，遭到拒絕，於是全線罷工。台灣各地的工會團體都派代表現場支援，發動捐款，作為「罷工基金」，堅持28天，資方全線退讓，大獲全勝，在台灣工運史中，創下歷史性的記錄。

工潮連天的同時，農潮也在興起。《人間》1987年2月第16期開闢「人間農業」欄目。這個新欄目以專輯的形式出場，包括兩篇相關的文章：〈洋酒、公賣局、葡萄農〉和〈褪色的金葉子〉，顧名思義，是關於酒和煙這兩項高利潤的經濟作物。台灣和美國進行煙酒進口談判，美國於台灣，似乎沒什麼可商量的，所謂談判，只是知會，而台灣公賣局只有將損失轉移。於是盛傳要壓低葡萄、煙葉的收購價與收購量，一時人心惶惶。事實上，這不僅是農潮，也是工潮雲湧的背景，對美國政治經濟上的依賴，開始顯現代價了。第27期《人間》上〈一個溫暖的家，一份安定的工作〉裡，高雄中船公司與勞工的矛盾爆發，也是與這大形勢有關。中船公司的發展，很大程度是借助日本對世界造船前景的預測，以色列埃及問題逐步緩解，蘇伊士運河勢必開放，商船無須南繞非洲大陸，超級油輪的生產就會相應降低，因此，適時將技術、器材傾銷到台灣。事情在開始階段，氣象興旺，但好景不長，未及十年，中船公司已走上下坡路，連年虧損。在衰退的經濟形勢中，勞資關係格外地尖銳起來。

《人間》1988年4月第30期「人間農村」欄目——「人間農村」欄目開張於1987年4月的第18期，而後又第19期，報導台南縣佳里鎮一個古樸的村莊，看來欄目的初衷是為台灣本省的鄉村和人畫像，但相隔近一年後再次登場卻旌旗招揚，與「人間農業」欄目主題合流，陳映真親筆撰文：〈台灣戰後最大的農民反美示威〉。人稱「三一六」大遊行，共有來自全省13縣市五千餘農民參加，在陳映真賦予了高度歷史社會的思想意義之下，就是農業蕭條的現實處境。

工潮與農潮在《人間》湧動推進之前，1986年12月第14期上，新開闢「人間校園」欄目，刊登文章〈讓我們誠實，讓我們關懷！〉，副題是「台大學生搖動了校園自由的鼓聲」，能否將此作為先聲？年輕的學子總是領革命之先，這也是我將《人間》第二階段在此開端的考慮。這

就像是一個徵兆，徵兆《人間》進入風生水起的時代。

〈讓我們誠實，讓我們關懷！〉記錄的是台大學生社團「大學新聞社」處分事件。大新社受處分的理由是「大學新聞」有三期上文章與圖片「未經審查程序即行刊登」，懲處停社一年。社長、總編輯、文字編輯各記過兩到一次。處分下達，大新社即刻散發了「台灣大學各刊物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聯合宣言」，宣言中回顧了校方彈壓民主的歷次事件，而這一次，台大學生不願沉默了。兩天後，大學新聞社在校門口的廣場上舉辦惜別演講會，名為「自由之愛」。七個月之後，第21期《人間》，「人間校園」第二次登場，題為〈挺舉「教師工會」的火炬〉。表面上看起來與勞工們的訴求同樣，亦是維護權益，但因教師是傳遞知識的人文工作者，所以事實的性質便有所不同。文中採集三名籌組「教師工會」的參加者，各自遭遇校方的解聘，理由都與思想有關。石文傑老師被教務處認定「造成學生認知上偏差」；李勤岸老師抗議學校上層腐敗，為政治詩集執筆寫序；盧思岳也是文藝青年，同時是社會活動積極分子，參加過反杜邦運動，又當選「彰化縣公害防止協會」候補理事……這一項由教師發起的校園改革，提出的理想是「民主的老師+進步的學生=自由的校園」。又隔三個月，第24期，「人間校園」欄目：〈青春的火焰〉，專訪台灣第一個全學聯組織——「大學法改革促進會」成立。全社會都在動起來了，像開了鍋一般，積累多年的事端成因，為何選擇這樣一個時間點裡噴發？自然有其原因，就是1986年10月解除戒嚴，開放組黨。《人間》1987年12月的第14期就作出反映，從組稿、發排、印刷、發行計算，可說即時即刻就行動了。

### 30年漫漫組黨路

翻過一個年頭，也就是下月，1987年1月的第15期上，《人間》開出新欄目「人間歷史」，刊登文章〈30年漫漫組黨路〉。1986年9月，台

灣正式成立「民主進步黨」，在當年12月增額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的選舉中獲取意外的席位，在此，《人間》回顧和梳理了台灣民主人士三十年來為解除黨禁奮鬥的歷程。國民黨動員勘亂的戒嚴體制之下，其實潛藏著各種反對力量，漸漸匯集，於五〇年代中期浮出水面，形成「新黨運動」，醞釀成立反對黨結構健全的政治。據文章稱，「新黨運動」大體以兩個事件劃分階段。一個「自由中國」事件。自1957年，《自由中國》雜誌直接提出反對黨概念，先是在「今日的問題」總題下推出系列文章，一一檢討社會的弊病；接著，從美國回來的胡適之發表演說，主張「在野黨」，《自由中國》立即回應，發表社論〈積極展開新黨運動〉；然後，1960年《自由中國》成員等人組織「選舉改進座談會」，籌組「中國民主黨」，《自由中國》發表聲明，宣佈新黨即將成立，然而，這便成了《自由中國》的閉刊號；不日，《自由中國》首領人物雷震以涉嫌叛亂被捕，判刑10年。這是一，二是「美麗島事件」。《美麗島》雜誌創刊於1979年，集合了全台各地黨外人士，卻十分短壽，不出一年便出事，所有重要成員悉數入獄（順便說一句，其時，為被告擔任辯護律師之一，就是陳水扁）。就此，新黨運動走入低潮，但力量並未消解，而是暗中積聚、等待，適時而起。所以，側又是一個韜光養晦的時期，終在1986年5月，黨內外進行了第一次溝通，為日後解除黨禁打下基礎。文章裡洋溢著對新成立的民主進步黨的熱情，期望能解決台灣的積疴，同時也不失清醒，指出這個帶有草莽民主色彩的新黨先天的缺陷：體制上的山頭派系性質，綱領和紀律的粗疏，思想的孱弱與短視——這些遺憾在以後的日子裡，將如何演變？《人間》一直沒有放棄對它的監督。一年多之後，1988年4月第30期「人間農民」，就是方才提起過的陳映真的撰文，〈台灣戰後最大的農民反美示威〉，對這新成立的在野黨，失望已是明顯的，因它反對執政黨是以「向美國爭寵爭愛」為方略。在這一場陳映真謳歌的「三一六」農民運動中，「向來高

舉『台灣民族』，高喊『自決』、『獨立』的闖將悍將們」，卻看不見了他們的身影。惡果已經顯現。但在草創階段，它的粗野的新鮮的生氣，依然給《人間》以希望。

## 二二八的民眾史

我很難不將此看作是一個發軔，之後，《人間》就開始了對台灣光復之後歷史的批評。隔兩期的第18期，「人間歷史」欄目再次登場——我也將「人間歷史」欄目看作一個標誌，雖然它在二次開欄之後沒有下續，但其中的主題卻以不同格式一次比一次嚴肅地展現。第18期上的「人間歷史」欄目，同時也作為「特集」，總題是「『二二八』的民眾史」，由陳映真撰文「特集卷首」——〈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這一特集的背景，是民進黨「打破了台灣向來最大的禁忌」，立下「二二八紀念日」，於是，台灣便面臨了探究歷史真相的時機。陳映真文的主要立意，是要將「二二八」這個偶發事件，放置於整個中國在近代史的命運裡去看，而並非局限在一個台灣。在這貌似本省與外省的地方關係中，累積著從19世紀以後東西帝國主義欺凌中國，中華民族掙扎、抵抗、鬥爭的哀傷故事。顯然，本省和外省的裂隙，是陳映真特別留意避免涉入的二二八回顧的歧途，他在這場清算運動起始時候就懷有著的擔憂，不幸在以後的日子將被證實。陳映真「卷首」之下，第一篇文章是由戴國輝訪問丘念台私人秘書林憲——戴國輝這名字還將在我劃為第三階段的最後九期《人間》中出現，依然是有關二二八，看起來這位台灣歷史學家對二二八有著特別的注意，抑或是，二二八已經超出事件本身，成為台灣歷史正本清源的一個標誌。此時，戴國輝因其身在日本的便利，訪問了在也日本的林憲。林憲在1946年上半年起任國民政府委派台灣的監察委員丘念台的秘書，在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中，丘念台以他的地位身分，活動於台灣軍政上層，為緩和事態做



出大量的工作，而林憲秘書便藉此目睹並且經驗了事件的諸多內情。接下來，是當年「台中市學生治安隊」的成員，經過鐵血的動亂以及政治肅清，最終成為一名商人，度著保守的人生，他的回憶比較林憲，自然是局部和表面的，但更具體生動。第三篇寫的是烈士蔡鐵城，他以記者身分參予二二八，被拘3年出獄，卻沒有逃脫五〇年代的大肅清，再次緝捕，終被處決。第四篇記錄了台中民眾武裝抗擊國民黨21師靖亂部隊的「烏牛蘭之役」。第五篇的題目充滿激憤之情——〈別忙著歪曲歷史，我們都還活著呢……〉是三位「烏牛蘭之役」倖存者的講述。就此，塵封40年的事件，從上層到低層，從週邊到中心，從集體命運到個人遭際，鋪陳開來，五〇年代的大肅清隨即揭開遮罩。

### 幌馬車之歌

再隔兩期的第21期，「人間民眾史」欄目——我以為這個欄目是從「二二八的民眾史」特集題目中脫胎而出，從此至終有四次出場，這期欄目內文章為〈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秀琮的足跡〉。郭秀琮這一名醫生，和蔡鐵城的命運相同，在二二八事件中擔任了領袖式人物，倖免於逮捕，卻在政治肅清中入獄，然後處決。

《人間》第20期，以陳映真的小說〈趙南棟〉打頭陣，開闢「副刊人間」欄目，至第38期止，總共發表15期，總量僅少於「人間燈火」欄目。但「人間燈火」欄目的17期是分布在38期之中，幾乎貫穿《人間》發刊的首尾，「副刊人間」顯見得要頻率密集，自開欄到閉欄的19期內，只間隔有四期，而且每一期都占有相當的比份。看起來《人間》雜誌的文學特質變得更為顯性，《人間》開始刊登虛構的作品，但這裡的虛構作品，無一不是面向現實，涉入社會問題，並且有一定比份的紀實寫作，大陸稱報告文學，台灣稱報導文學。其中，又有相當的比份介紹大陸當代文學——我以為這是一個有心的設計，以文學來推開



面向大陸的視窗。在大陸開放之初，人們常是從文學作品瞭解中國大陸，而中國大陸的思想解放，亦在很大程度上從文學出發以及推動。我想說的是，「副刊人間」在這一個時期開欄，是要承擔更廣大的歷史使命，這其實也是陳映真的文學觀。

第35和36期的「副刊人間」，分上下兩部刊登〈幌馬車之歌〉，我應該稱它作什麼呢？小說，還是報導文學？倘若是小說，他寫的是真人真事；要說報導文學，貫穿其間的綿綿哀痛，且已溢出了客觀性。〈幌馬車之歌〉是烈士鍾浩東喜歡的日本歌曲，他唱著這首歌走向刑場，歌詞大意是說一輛馬車在黃昏時分永遠消失的背影。鍾浩東原名鍾和鳴，原籍廣東梅縣，出生屏東農家，與台灣著名作家鍾理和為同父異母兄弟，在高雄中學就讀期間，接觸三民主義。台北高校三年級時，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向學生徵兵開往大陸廣東戰區與中國作戰，鍾浩東為逃兵役跑往日本，考上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其時，日本侵略中國的戰事越烈，鍾浩東中止學業，與新婚妻子一同赴大陸參加抗日戰爭，輾轉復輾轉，終於投奔到丘念台先生的東區服務隊。抗戰勝利後，回到台灣，也是由丘先生推薦，任基隆中學校長。不久，二二八事變爆發，鍾浩東及基隆中學安然度過，沒有發生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衝突殺戮事故，是因鍾校長一貫在校內實行民主。事變之後的台灣進入戒嚴狀態，鍾浩東卻依然活躍著思想的活動，主持知識青年「時事討論會」，編輯油印《光明報》，就這樣來到了1949年。8月裡的一日，鍾浩東的家門被拍開，憲兵以這樣輕佻的口吻闖入：「我們是人民解放軍，要來解放你們」。1950年10月，鍾浩東被執行槍決。

第37期，《人間》推出一整本版面的三周年特別企劃，將台灣自光復到八〇年代的40年歷史，以序作詳細的整理，關於五〇年代，《人間》認為是一個政治上的重要年代：韓戰爆發，美蘇兩大陣營對峙達到高峰，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分裂隨之成為事實，從國土，民族，到體

制，再到意識形態，分頭趨往各自的命運。在此背景下進行的政治肅清，則是從組織、人事，以及思想，消滅了任何異己的存在。從此，台灣與大陸海角天涯，遙相兩隔。

## 祖父的原鄉

《人間》起始之初，便流露了對大陸的關注，創刊號上，「人間特別約稿」欄目，題目就為「沈靜，大陸中國1981」，刊登法國籍旅行攝影家包德納(Bernard Bordenare)拍攝大陸的照片；第2期上，「人間特別約稿」依然是「大陸中國」，刊登日本攝影家白川義員的大陸照片；停息了一段，到第9期，新開「人間山河」欄目，內容是報導廈門的文章與圖片，雖然僅止於風光，卻可見出望鄉的情懷。自第20期開出「副刊人間」，接陳映真小說〈趙南棟〉之後，第21期便刊出大陸作者馬建的小說〈伸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第22期，是韓少功的〈爸爸爸〉；第24期，香港作家施叔青的「香港新移民系列」，新移民是誰？大陸客！大陸主題的出現急驟起來，到了第25期，兩周年特大號，「副刊人間」繼續施叔青的「香港新移民系列」；同時推出陳映真速寫大陸作家：吳祖光、張賢亮、汪曾祺、古華；作了專輯「海峽隔離症」，上篇名「彼岸」，下篇為「此岸」；還是在這一期上，「人間訪談」欄目裡，題目〈如果對立可以結束〉，訪談首位出行大陸的台灣媒體人，《自立晚報》記者徐璐——我以為這是重要的徵候，它意味著不僅在文字上，而是在實踐中，大陸台灣海峽兩岸開始了打通與走動。

下一月的第26期《人間》，本刊記者鐘俊陞步徐璐後塵去往大陸，發回首篇報導〈祖父的原鄉〉，文章最末一句為「親愛的阿公，我已經回到您晚年朝思暮想的原鄉了。」這篇短文如同一個序言，接下去，正文開始了。第27期，做出專輯〈海峽兩岸的客家人〉，其時，有關大陸的話題，已不止於風物或者文學，而是涉入歷史與現實。這一輯五

篇文章，分別描繪客家人在台灣與大陸的遭際，在分離的命運中同與不同地守持著群體的性格。第一篇〈客家：台灣生活中的「隱性人」〉，以新竹縣境內的客家山村新埔鎮為調查，剖析客家人在台灣境遇，由於客家人在近代移民台灣的歷史中，處於微妙的時間段：晚於閩籍人，多是在康熙22年「渡海禁令」之後偷渡來台，於是他們一方面向原住民掠奪土地資源；另一方面，又受到閩籍人的剝削，他們入不了台灣政治社會的主流，又為本土人敵視，還鄉的道路且迢迢遠矣。這個夾縫中的階層，在複雜的局面中生存，以宗族為中心，自成一體，是個獨立的小社會，憑藉著頑強的生命力，代代繁衍。專輯的第二、第三篇，均為鐘俊陞所寫，記錄在大陸廣東梅縣，蕉嶺一帶客家人的聚居地的見聞，形成一個小專輯，名「鐘俊陞大陸攝影紀實」，一篇為〈蕉嶺客村一瞥〉，二篇為〈丘逢甲的故鄉〉，這就引出丘逢甲這個人，而總輯的第四篇正是訪丘家在台一支的後裔，丘秀芷女士。丘逢甲即丘念台的父親，丘先生出生於1846年台灣，科考進士。甲午海戰失利，滿清政府割讓台灣，丘先生立即變賣家業，籌組練兵團，是台灣史籍上的民族英雄。丘逢甲的同父異母長兄丘先甲，即丘秀芷女士的祖父，丘秀芷女士是台灣史研究學者。總輯第五篇〈苗栗的巒泰磚窯史〉，寫客家老磚窯師父在台灣苗栗開磚窯的故事，前第二篇，鐘俊陞的〈蕉嶺客村一瞥〉，也寫到了磚窯，離散的客家人卻守著同一種營生與技藝，可謂打斷骨頭連著筋。這大約就是專輯的立意所在，以客家人這一特別族群寫照大陸與台灣血脈相連，同出一根。後來的第39期，再次做出同一主題的特別企劃——「台灣客家：隱形的族群」，總共九篇文章，涉及歷史、現實、文化、藝術，從個案到全面；「企劃」之外，又刊登有長達353行的客籍史詩「渡台悲歌」，以及介紹客家習俗的專文〈阿逢牯看相撮〉。因此，我更有理由相信，客家人的主題是《人間》用以彌合大陸與台灣，本省和外省長久割裂的離隙，澄清歷史

造成的謬誤。

就這樣，大陸的主題彰顯於《人間》，鐘俊陞繼續撰寫刊登大陸採訪專題，「副刊人間」繼續選載大陸作家的作品和言論，又在第28期專開出一期欄目「人間文學」，美國漢學家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撰文介紹沈從文——〈沈從文和他的「家鄉論」〉，「家鄉」這兩個字在此帶有著一種明喻的性質。也是在這一期上，「人間事」欄目刊出「想家，就真的回家了……」，記錄「外省人返鄉促進會」奔走呼籲一年有餘，第一個探親團終於從中正機場出發了，團員們身穿的上衣前襟，寫著碗口大的字：「回家」。接下去，第29期，漸以疏闊的「人間燈火」欄目，刊出文章〈好複雜的心情〉，報導「外省人返鄉促進會」的領袖人物何文德的回鄉經歷。兄弟姐妹都年邁，兒孫繞膝，爹娘已經作古，只能夠栽在墳頭喊一聲「兒回來了！」當年擔水的水井依然還在……件件種種，情何以堪？同期《人間》，以顧問身分隨探親團來大陸的作家王拓開張了他的「王拓大陸探遊筆記」。第31期，開出獨一期欄目「人間文藝」，專記錄台灣戲劇家姚一葦的話劇《紅鼻子》在北京、上海、山東、大東北演出，好評如潮。順便說一句，《紅鼻子》在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演出，是由筆者的父親王嘯平執導。台灣與大陸的接觸在《人間》的演進越來越深入、熱烈，我以為高潮是在1988年9月第35期專輯「人間海峽兩岸對談系列」。「系列」報導香港大學舉行「陳映真文學創作與文化評論國際研討會」的情形，此間所發生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陳映真與大陸最具社會批判自覺的作家劉賓雁的會面。專輯第一篇，題為〈歷史性的對話〉，由王拓撰文。王拓並沒有正面描寫香港大學與中文大學聯合主辦的陳映真、劉賓雁對談會，而是著重介紹對談的背景、起因，以及這兩人在不同社會間的同同性，看起來，對談本身的意義是要多過於對談的內容。專輯第二篇為陳映真所寫，題目是〈親愛的劉賓雁同志……〉，真摯動人，不止是向劉賓雁本人，還是向著他

所屬於的地方和理想。文章中寫去啟德機場接機，遠遠看見劉賓雁出現，「『看哪！這個人！』我站遠處，激動卻無聲地對自己說。」陳映真寫道。專輯第三篇，也就是陳映真在研討會結束之際發表的致謝辭〈民族文學的新的可能性〉，回顧也是梳理了自己的文學生涯，描繪其發生和處於的台灣社會歷史，當談到面臨的現實，是將大陸納入進來同構背景，並且提出任務——「新的兩岸啟蒙運動」。

一直在尋找進步力量的陳映真，在兩岸關係趨向緩解的時刻，將希望的目光投向了海峽對岸的大陸，那裡不僅含有著故土與根源的概念，社會主義中國且應合著他的烏托邦想像，即便在逐漸開放的資訊中，瞭解到彼岸不能盡如人意的事端，也是作為代價被解釋和接受的。苦命的中國人，苦命的亞洲，處在憂鬱的亞熱帶，後發展的時間階段，拿什麼來拯救你呢？

## 美好的革命

「人間亞洲」欄目開在第13期，也就是我所劃分的第一階段的最末一期，結束在臨近尾聲的第45期，總共11期，九期出場於第二階段，可以證明是這一時期的主題之一。是否意味著這樣一個順序？就是台灣的問題必得放在中國的歷史中認識；中國的問題，必得放在亞洲的歷史中認識，這也是救贖的途徑。縱觀這11期「人間亞洲」欄目，主要的內容在三個方面——第一，也是占篇幅最大，態度亦最為熱情的是菲律賓革命；其次，是日本，這個力求脫亞入歐的國家，在此欄目出場有限，但對它的批判卻貫穿了《人間》整個辦刊的過程；第三，韓國學生運動，雖然只露面「人間亞洲」一期，但卻是一個預告，在《人間》的後階段，將成為重要課題。

先來看菲律賓革命。關於菲律賓，之前1986年10月第12期《人間》，一併推出兩個專輯，一是「向亞洲富鄰傾訴的菲律賓女傭」，報

導遍佈東南亞的菲律賓女傭的生活和情感，由此觀照勞工輸出背後的國家經濟狀況；二是「來自菲律賓·尼革洛斯島的獨家緊急報告」，尼哥洛斯島在殖民經濟制度下，成為單一種植的甘蔗產地，1983年國際糖價暴落，陷於大饑餓。隔月的第14期上，《人間》刊登滯台菲傭問題座談，題目為〈亞洲人民間的團結、交流與共生〉，依依可見《人間》辦刊初的溫情博愛。到了第16期，形式和態度則漸呈激烈，「人間亞洲」欄目裡，專做「菲律賓革命一周年特輯」。特輯一總兩篇文章，第一篇為〈「菲律賓模式」？〉題目中的上下引號以及問號，是對這模式能否成立而有效坦言之懷疑；但是緊接的第二篇題目為〈美好的革命〉，又給予積極正面的評介，它以相當慷慨的篇幅描述了這場以人民意志戰勝獨裁的革命。非暴力的，和平的，不流血——除去引發革命的阿奎諾（Ninoy Aquino）被暗殺事件。這場革命真有些像馬克思主義經典所說的「盛大的節日」，和歷史上許多「盛大的節日」最後以悲劇收場不同，它竟然成功地更替了政權，於是，便有了《人間》的不安。在〈「菲律賓模式」？〉一文中，回溯了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政權產生的過程，在某些方面奇異地和台灣相似著，都是在二次大戰之後，以接受復興資金為條件進入美國經濟體系，因而開始依賴型模式，奇跡般的菲律賓革命，能否改變這個畸形的構造呢？這就是《人間》的遠慮。自此，《人間》便將關注的目光投向這個面臨轉折的國度。

下一月的第17期，「人間亞洲」刊出文章〈為了這一天，在馬尼拉……〉，記錄菲律賓憲法草案公民投票；第20期，〈社會火山〉，描寫的是馬尼拉的垃圾山，在那裡，居住著成千上萬流落在馬尼拉的破產農民，記者採訪了一位「垃圾山居民」——柯蓉（Corazon）的支持者，記者問：「如果，再過10年，她仍然沒有改善你的生活呢？」回答是：「我相信人民的力量」；第25期，〈呂宋島的傳奇人物〉，訪問菲律賓人民軍領袖丹地（Kadante）；第45期，〈不要開火，我們是主內兄

弟……)寫菲律賓天主教的入世和出世。

菲律賓到了這麼一個節骨眼，它的積扁和希望全都放大了，像一面鏡子，映照著多災多難的後發展地區，《人間》就在其中尋覓著自己的影像。

日本，提供給《人間》的研究材料相當特殊。在本文第一章裡，寫到日本現代舞團「白虎社」的訪談，陳映真極力要辨析出日本現代社會的弊病；在「人間亞洲」開欄第一期，文章題目為〈掙脫管理社會的黑紐帶〉，訪談日本攝影家鈴木邦泓，鈴木邦泓拍攝了一組流浪漢照片，出其不意的是，拍攝者對流浪漢的解析並非通常以為的貧富不均，而是視作對資本主義嚴格制度的逃離——這也是脫亞入歐的表徵吧，日本已經幸運地離開了亞洲經驗，在二戰後飛速完成資本主義體制建設，並且進入意識形態潮流。但《人間》對日本的批判並沒有就此一概而論，依然洞察了它的亞洲屬性。第18期「人間亞洲」欄目，文章題為〈遺忘道義和人權的日本，是人間之恥〉，寫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從台灣強征數十萬青年，充作軍夫和勞工，如今，倖存者正發動向戰敗國日本索賠的民間運動。

關於民間索賠運動，早於《人間》第9期，便作過特輯「怒吼吧！花岡」，為「花岡事件」作41年祭。這一特輯內容詳實，情感強烈，構成有當年花岡起義策劃人，原國民黨上尉耿諄所作回憶文字；報告劇《花岡事件》演出記錄；日本侵進東三省，立偽滿洲國，對中國、朝鮮鄉村施行奴工政策的真相；以及陳映真譯寫的〈血腥的建設〉，追溯日本鹿島建設公司起源。這創建於1840年的土木建設公司，可說脫胎於日本擴張政策，花岡事件就是發生於鹿島的工程。日本戰敗，它卻因企業的身分脫解罪衍，在承包海外專案中繼續積累資本，再將資本蔓延到亞洲——《人間》向日本侵華索賠的支持背後，是對資本主義擴張的警覺。就在第20期的「人間亞洲」欄目內，〈天皇，日本人的守護神〉一



文，指出日本天皇制與資本體制的結合，乃是軍國主義的根源。這個懷有脫亞入歐野心的國家，究竟要將它所離析的亞洲放置於什麼關係中？或者說，與亞洲之間重建一個什麼樣的構架？是《人間》屢屢不能釋懷。

1987年8月第22期，「人間亞洲」欄目，韓國民主運動登場了，文章題為〈從漢拏山到白頭山〉，記錄日本田川信雄與韓國文字哲的對談。其時，距「六一〇」學生運動發生不久，這場由漢城〔首爾〕點燃，然後遍地烽火的示威，前後進行二十多天。二人由「六一〇」生髮，縱觀韓國學生運動，由來至今，始終貫徹同一訴求：民族統一和民主主義，兩個目標的背後，包含著反美與反集權的內容。田川信雄也回顧了六〇和七〇年代，日本興起的兩次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學生市民運動，遺憾地承認，日本在擴張與資本化的過程中，已經失去了「日本民族主義」，於是，寄誠摯的希望於韓國。這位田川信雄先生指出：「韓國、台灣、新加坡和香港這『亞洲四小龍』中，有一個『權威政治下的發展』的共通點。」我想，這就是陳映真更將韓國視為同道的理由。台灣與韓國有著相似的處境，這兩者都是資本主義實踐成功的地方，有著與菲律賓革命不同的動因。而大陸，在歷史的隔離與隔離的歷史中，情形大不相同，積累的是另一路經驗，何況，感情交織，很難客觀，在會面了「親愛的劉賓雁同志」之後，陳映真把目光投向了另一處亞洲近鄰——韓國。

第32期《人間》，隆重推出「黃皙暎·韓國民眾文學專輯」。專輯的首篇，〈民眾和生活現場的文學〉，是黃皙暎·黃春明·陳映真三人對談，由陳映真親筆記錄成文；之二與之三是發表黃皙暎的小說〈壯士之夢〉與〈寫給弟弟〉。黃皙暎是七〇年代韓國「民眾文學」運動中的作家，經歷了朴正熙政府的文化鎮壓，又在八〇年光州事件之後文學復興中再次寫作，他不只是以筆，而且以身心命運投入韓國動盪不安的



現實中，積極主動地擔負起正義的使命。陳映真要的就是這樣的人和寫作，還有生活，果然，後來他前往韓國，親身體驗那個國度裡的民主運動。

### 洩忿的口香糖

然而，資本主義的覆蓋性以無法控制的速度和力度擴展。無論是原生還是外來的驅策，一旦啟動，便自行納入軌道，以後的事是誰也左右不了的。在1987年6月第20期，「人間對談」欄目——同樣內容的欄目有時為「人間訪談」，有時為「人間對談」，或者「人間對話」，一總算起來，不過五次，三次由陳映真親為。這一期亦是由陳映真主持，對談者是著名美國華裔數理邏輯教授王浩，題目為〈「非理性」力量下的科技〉。這一回的對話不像和日本白虎社社長的那一次，帶著逼迫和脫逃的意思，陳映真多少是自吟自歎，自圓其說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這一次，他們相談甚洽，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共同剖析了科學技術實用主義趨向中的政治經濟動機：利潤效益追求；冷戰局勢下兩極對立的軍事競賽、太空競賽，結果是揮霍了科學發現的資源，影響世界科技研究方向。王浩教授顯見得是思辨性極強的學者，對世界持有正直的看法，體現了科學的道德觀，與陳映真從出發的社會理想不謀而和。只是在一個問題上沒有談起來，那就是陳映真所提議的「人的斷裂」，他提出現代科研的工作方式，分工太過精細，「結果大部分人成了單一、重複工作的奴隸，只有少數菁英有調整、規劃、思索……的機會，從而產生了勞心、勞力的永久的分化……」我想，他擔憂的是科技領域裡的階級分野，人格異化。對於此，王浩教授沒有作出太積極的回應，他只是非常數理邏輯地解釋說：「這是科學與倫理、技術與價值分合的程度與技巧問題了。」然後簡單歸到「非理性力量」之下，完成了主題。這顯然不是王浩教授特別在意的東西，而在陳映真，卻

是切身的焦慮。剖析開所有的現象，陳映真最終看到的總是「人」和「人間」，對此，他抱著不無溫情的關懷。這關懷最合理的去處是文學，可文學遠不及對付兵臨城下的殷切急迫，於是，他必得面向更實際的存在——社會，社會的回應總是冷靜的，那裡有無數條例規範，總體上是秩序的保障，到局部難免情薄，於是，又要到文學中去尋找寄予。我想這也是在《人間》開闢「副刊人間」的用意之一吧！在現實面前，文學還是顯得孱弱了，就再一次走出來……

「非理性力量」是一種什麼力量呢？它在某些方面遵循本能，但前提卻是被置換的，在這被置換的前提之下，本能呈現了原始的能動力，無可阻擋，這前提的名字叫「資本」。第33期，「人間文化」欄目裡，陳映真親筆撰文〈洩忿的口香糖〉，寫一家新成立的「意識形態廣告公司」的創意產品——口香糖廣告。「人間文化」總共開欄兩次，一次是第12期，〈衣索匹亞古建築巡禮〉，刊登非洲衣索匹亞(Ethiopia)的圖片與報導，與這一期上的同名欄目內容不怎麼相合，這一篇〈洩忿的口香糖〉卻有些接近「人間次文化」，或者「人間青年」。而由「人間次文化」和「人間青年」變為「人間文化」，很可能是出於無意識，但也可以視作一個徵兆，那就是文化的支流上升為主流。在第17期的「人間青年」——這可作欄目，也可作專輯看，其中第一、二篇分別是對上世紀二〇、三〇年代青年運動領袖嚴靈峰和胡秋原的報導，是不是有意作為對照，第三篇寫的是現代台北都市青年，題目為〈「新種族」，一個隨機開卷的分析報告〉。「新種族」是陳映真的命名，專指物質過剩社會裡生長起來的消費性格一代人，到了1988年7月第33期，〈洩忿的口香糖〉裡，這消費性格已經「意識形態」化了。

從《人間》創刊至此時，陳映真所執筆多是評述與訪談，親自採寫，並且以如此篇幅，可說是第一回，所以必定是有迫切要說的話。文章是從一則口香糖廣告說起，這一則30秒鐘的廣告，標題為「我有

話要說」——高中男生受了父親與教官的訓斥，無從回嘴，爆發地喊一聲：「來一顆某某牌的口香糖吧！」字幕打出：「愛他就請聽他說」。一位公司白領被庶務纏身，忍無可忍，陡然起身衝出門：「只是想買包某某牌的口香糖」，旁白為：「生活不一定要永遠妥協」。歷來的廣告中，口香糖總是在標誌了現代生活的畫面中登場，而在此，卻以反抗體制的面目出現了。在前面第32期，與韓國小說家黃皙暎的座談中，台灣鄉土派小說家黃春明說過這麼一句話：「在我們台灣，還有一個把反體制的東西商品化的問題」，說的就是這個。資本市場有著如此強勁的吸納力，將所有合與不合，相同與對立的存在統統納入消費的概念，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無產階級理論誕生之際始料未及的。接下去，陳映真便走入口香糖創意廣告產地，這是由一群年輕人自行結合，成立年許的公司，「意識形態廣告有限公司」，這名字也很有喻意：「意識形態」。創意者對陳映真說，廣告的目的是為促銷，可這一則卻有著另外的「副作用」，副作用是「使人反省，思考自己的生活……」不曉得是因為面對陳映真這一個長者，以現實批判思想者著稱，年輕人不自自主地要回應他的「意識形態」。這解釋聽上去終有些牽強附會，當然也瞞不過前輩，前輩看見的依然是遠超過自然需求的「大眾消費社會」在人類歷史上豪華燦爛的登場，「反省」的主題不過為它增添了一個別緻的符號。陳映真當然要指出「批判的破綻」，他卻不由地被這夥年輕人吸引，是不是有些類似魯迅對年輕人的心情，因知道他們是未來，於是便理性地愛他們？但陳映真是個溫情主義者，這使他不致過於嚴厲。他喜歡「意識形態」公司裡的風格，逼仄、簡樸，甚至有些凌亂，書架上，西方廣告刊物中間夾雜著一摞《人間》；沒有一般寫字間的區隔，職員也不穿西裝打領帶，年輕人勤奮認真，朝氣蓬勃。對「意識形態」這個詞，他們並不企圖以偷換概念來標新立異，確實注入了嚴肅的思考，「副作用」的說法不完全是搪塞之言，他們自身亦處在激

烈的社會競爭中，對社會有著不謂不深刻的認識。但他們這一代顯然要比陳映真們現實，用負責人鄭松茂的話，就是「一個人活在世上，如果一定無法脫離現代資本主義消費體制，我還是喜歡做一個竭盡心智，以消費者的福祉為顧念的廣告人。」我想，陳映真的心情相當複雜，他失望，又不忍失望。他們當然說服不了他，可卻也讓他尊重。他們對陳映真的態度大約也是同樣的，不忍讓他失望，可卻不能違心地服從。這是一個讓他們敬重的人，可不妨礙他們持自己對生活的態度。他與他們，彼此喜歡，可無奈於世界觀不盡相同。相比較之下，陳映真的失落更嚴重一些，這世界更可能按他們的觀念發展，他們是年輕人，比他更遠地走向未來。陳映真總是將希望寄託在青年身上，因為他就是在青年時代培育了他的理想。回顧一年半前，第14期上的「人間校園」欄目，〈讓我們誠實，讓我們關懷！〉，台大學生運動，自由之愛，此時多少是塵埃落定的意思。台灣解嚴，新聞自由，新黨建成，一切都在好起來，而資本主義體制日臻成熟，可收服任何尖銳的抵觸。他將目光投向開放的中國大陸，大陸似步後塵趕來。菲律賓的革命不也正趨向更完善的資本主義。那麼去往哪裡找尋進步的力量呢？哪裡都有，「人間世界報導名作選讀」欄目裡，美國的桃樂西亞·蓮恩(Dorothea Lange)、瑪麗·愛倫·馬克(Mary Ellen Mark)，日本的桶口健二、福島菊次郎，印度的艾許文·梅塔(Ashvin Mehta)，法國的昂利·卡提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對世界與人持有著正義，公平，良善的觀念，如星星之火，遍布四野，怎樣才能集合起來，成燎原之勢？現實迫人，陳映真在「創刊的話」裡宣布的信心，希望和愛，都變得過於溫婉和間接，必要有更為實際的主張，才能拯救。

### 第三章 要拚才會贏

#### 解放與尊嚴

1989年2月第40期，《人間》進行了人事的變動。陳映真在「發行人的話」裡對此作了解釋。他介紹了從本期開始擔任總編輯的楊憲宏先生，楊憲宏原是台灣巨大資本報業的著名編輯和記者，曾在上年，即1988年12月，於《自立晚報》發表〈台灣報紙的最後黑暗時代〉，斥責報禁解除後，新聞傳播卻走向墮落。發行人陳映真期待楊憲宏能承起《人間》的接力，「回答解嚴以後的歷史交給第三代新聞人、傳播人和文化批評工作者艱鉅的任務」。同時，也介紹了《人間》雜誌社新任社長張志賢先生，張志賢曾在《新新聞》社的管理發行中，取得良好的業績。看起來，陳映真為自己物色了接班人。這兩位來自主流媒體的新聞人加盟《人間》雜誌，是不是還意味著《人間》將走上社會的中心舞台，挺身加入台灣的宏大歷史在這一期刊首，發表了「人間宣言」，題目為〈解放與尊嚴〉。如果我們還記得三年前，《人間》第1期「創刊的話」，題目是叫做〈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到了此時，《人間》顯然以為「相信」、「希望」、「愛」是不夠的。〈解放與尊嚴〉不惜嚴格地檢討道：「《人間》不應該只沉迷在『反壓迫勇者』、『弱者的代言人』之類的社會造型中」，它為自己豎起新的標竿：「在批判國際冷戰歷史尋求解放與尊嚴的運動中，重新建設新歷史時期的台灣——從而中國以及亞洲的新人和新文明。」我們應該視作為《人間》有了更大的抱負，將更大的使命負於己任。然而，在它全身心介入現實鬥爭的時候，似乎也隱藏著蹈入激進政治的危險，但事情這才剛剛開始，《人間》放開眼量，要從頭說起。

就在這一期，《人間》實踐了「批判國際冷戰歷史」的宣言，推出特集「NO PASARAN」，回溯報導西班牙內戰。在上世紀三〇年代，西

班牙共和政府與法朗哥政變軍戰爭，希特勒、墨索里尼派兵支持法朗哥，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者組織聯軍增援共和國，奏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世界終劃分為兩大陣營。「NO PASARAN」是「不讓法西斯過關」的意思，是當年西班牙人民保衛馬德里的口號，用作此特集的主題，自然是輻射出象徵的意義。也是在這一期上，按序排出三篇文章：〈台灣的天皇論〉；〈大場面，好看頭？要拚才會贏的年代〉；〈後蔣經國時代第一年，慈湖發燒1·13〉。

〈台灣的天皇論〉事由當年元月，日本天皇裕仁去世，台灣媒體的報導評述多有偏倚，因此來剖析台灣戰後體制下所形成的天皇觀念。〈大場面，好看頭？要拚才會贏的年代〉，回顧自蔣經國於上年，即1988年元月13日去世，一年之間，統治鬆動的台灣社會所發生的種種事端：農民抗議，工人罷工，歷史冤案撥反，李登輝上台，原住民訴求請願，股市起落，民進黨「閩南沙文主義」……歷數羅列之後，「人間放談」舉出〈後蔣經國時代第一年，慈湖發燒1·13〉，對事件的意義進行評價和討論。整個座談紀錄給人的印象難免是操之過急，似乎每一件事都沒有達到期望值，主持人楊憲宏開首第一句話便是：「蔣經國已經過世一年多了，台灣的政治界仍未建立新的政治觀……」倘若從西班牙內戰往下延續，經過兩次大戰，戰後體系形成，終至蔣經國辭世，強人政治解體——經過如此漫長的過程，裕仁天皇去世不能不說適時提供契機，檢討日據五十年來的文化與思想，自由、民主、民族的理想就全到了噴薄之處。此時此刻的台灣，所有這些概念全具體為生存處境，知識分子的焦慮完全可以想見。

還是在這一期上，再次推出「二二八系列」，文章摘自台灣歷史學家戴國輝在日本岩波書店出版《台灣：人，歷史，心性》書中的兩個章節，分別題為〈希望、幻滅與悲劇〉及〈二二八事件的悲劇與傷痕〉，進一步詳盡描述事件發生的背景，過程，後續，偶然和必然的因素。

看起來，二二八事件是台灣近代史中的一個關隘，許多事情是以它為總結，又有許多事情從它生髮，不將其搞清楚，台灣的問題就不能水落石出。這是歷史，現實呢？本期又推出「黨外執政系列」，報導兩位非黨縣長：宜蘭縣長陳定南和高雄縣長余陳月瑛，後一位是由陳映真執筆。我們將發現，陳映真辭去《人間》總編輯，又有社長處理行政，撰文便見積極頻繁，每一期都有他的文章。其時，陳映真所報導的余陳月瑛，是頗具戲劇性的人物，尤其是在這當口，國民黨與新黨力量較衡的時刻，幾乎是帶有風雲際會的隱喻。余陳月瑛的夫家，公公余登發是高雄縣著名政治家，本期《人間》，亦發表有專寫余老先生的一篇，題目極有趣，為〈余登發為人民服務〉。余老先生從日政時代便積極參予公益事業，競選鄉議會議員，主張正義，曾當選光復後高雄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以及里長、鄉長、縣長。然而因其正直的秉性，不能通融俗情，他的從政道路並不順利，幾回當選，又幾回落選，甚至至於幾回入獄，卻獲得民眾極高的擁戴。媳婦陳月瑛，便是在余老先生的推動之下，競選省議員，並且連選連任四屆，直至1986年，以超高票當選高雄縣長。

這一期《人間》，可說遍地開花，從歷史到當下，從世界到本土，從理論到實踐，都是要求進步的呼喊，真是應了街頭的歌聲：「要拚才會贏」。如火如荼的1989年，等待人們的將是什麼？

### 徬徨的武裝

首先，歷史清算在深入。第41期的專輯「台灣職業軍人」，在封面與目錄頁，都以大號字醒目地印出標題；總編輯楊惠宏撰寫導言：〈徬徨在戰爭與和平之間〉，說明專輯的背景，即2月11日——出刊之前一月，台灣空軍中校林賢順，駕戰鬥機從台東飛往廣州，《人間》決定以此為出發，討論台灣的軍隊、軍事，以及軍事社會學；專輯除導言

外，總共九篇文章，第一篇便是由陳映真操筆：〈徬徨的武裝〉，副題為「美國遠東基地國防與國共內戰國防的重疊與崩解」。

關於台灣職業軍人，第30期的「副刊人間」，曾經發表一篇小說，題目〈連長劉國軍〉，描寫服役的生活。其中對人事、倫理、世情的表現和批判，通過「劉國軍」這一個虛構人物，顯得十分生動活潑，令人感慨。現在，虛構已經結束，要來真格的了。

在〈徬徨的武裝〉裡，陳映真解析了台灣軍事武裝的構成，大體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來自於本土，光復時期國民黨第70師進駐台灣，二二八事變，21師來台鎮壓，第三是1949年，數十萬國民黨軍隊撤至台灣；第二部分則是美國介入台灣，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太平洋第七艦隊封禁海峽，然後從1951年至1965年，向台灣派遣軍事援助顧問團，提供軍費，1965年以後，美援變通以軍事貸款的方式。在這樣的軍事組成背後，實際上埋藏了國民黨台灣的政策結構——「冷戰，民族分裂，所謂國家安全，對美國附從」。陳映真文章認為，1950年以後，除了1959年金門「八二三」炮戰，以及其後金馬象徵性的互相炮擊，台灣現代化的軍隊並未進行過任何具體的實戰，卻在社會財富中合法占有極大比份，形成一個軍事政權。在陳映真對台灣軍事作出全局性的定義之下，是各個局部的呈現——〈無可奉告：一份被封存的軍校報告〉，談軍校學生普遍期望轉校；〈我不幹軍人了！〉則具體為一名軍校四年級生的所思所想；〈現代版拉伕〉，是說軍事教育宣傳片裡的政治，霸權意識形態與電影工業經濟體系令人迷惑地交織一起；然後，事情又返回到過去，「卅年前的歷史」，一夥退訓的軍校生，軍校履歷不受承認，被迫重複服役，耽誤了學業與就職的機會；繼而，再重溯淵源，〈誰的國民革命軍？〉副題是「被日俄美軍事顧問團強行輪番改造的苦難中國職業軍人」，指出先天失調，又遭際派系陰影，分裂，受利用，被拋棄……命運多舛而不濟；又從軍事到所謂「國



防」——〈國防是怪物，政工亦然〉，在動盪變革的局勢中，台灣軍隊的征戰目標究竟是什麼，無可避免地，軍事意識形態喪失基礎；這是政治體制的命運，那麼個人呢？〈跳太平洋也摸不著路〉，老兵們述說著他們的故事……專輯的最後一篇，也是作為總結，是「人間放談」，仍然由總編輯楊憲宏主持，陳映真也參與訪談，標題為〈軍隊國家化與國防預算監督〉，放談的主要精神大約可歸納為：減弱軍事，實現民族憲政。

軍隊於政權政府意味著命脈，這一集專輯可說直搗體制的心臟，而《人間》並沒有就此罷手，而是越戰越勇，連連出擊，有點端老底的意思了。第45期上特別企劃「民眾史：『赤獄』國特」，說起來頗為傳奇，好比六〇年代中國大陸的特工片，當然，我們看到的只是故事的一側，其時其地，故事的那一側浮出水面。主人公為國民黨高級情報員林坤榮，經過「甲級萬能特工」的訓練，1956年被委派進入大陸江西山區架設電台。事先大陸方面得到情報，登陸廣州便被捕入獄，判處徒刑，從此經歷11個監獄的服刑勞改，1980年，中國大陸實行釋放國特政策，假釋回到老家福建，1983年，終於回去台灣與家人團聚。從1956至1983的27年間，他的家人際遇了什麼呢？先是安家費被人私吞，再到1960年國防部頒發「旌忠狀」，證明人已於當年「廣州陣亡」，而家人拒絕接受此項榮譽，堅持於無望中等待，等待中子女長大成人，最具諷刺意味的是，第三子林正傑成長為反對黨一員，公然突破戒嚴令，聚眾向國民黨政府最高法院示威，最終加入民進黨。特別企劃「民眾史：『赤獄』國特」報導之三，是為陳映真撰寫，題目〈一個獨特的「間諜故事」〉。文章分四個段落，小標題分別為「一個真摯的愛國者」、「報復還是教育」、「國民黨手下政治犯的待遇」、「偉大的母親和妻子」，從小標題可窺見，陳映真的理想社會主義和良善人性信賴，他力圖從各個角度對林坤榮事件作出正義性的解釋，而在第四個段落，

他所表達敬意的這位女性，則是可代表中國命運裡的無數母親和妻子，她們不屬於任何意識形態，卻合乎陳映真最本質的人道主義景仰。

下一期，第46期，一併兩個專輯，其一為「人間特別企劃」——「張友驊：一筆當關」；其二「等待解嚴的土地系列」。事情還是在軍政界中，就好像開膛破肚，五臟六腑全大白於光天化日。張友驊是一名軍事記者，父親曾是國民黨高級軍事將領，所謂的「老總統的人」，因是這樣特殊的「高幹子弟」出身，他自小對軍旅中人和事熟如家常。1988年台灣報禁開放，於他真可謂如魚得水，他的一支筆，揭開多少沉案，石破天驚。「張友驊：一筆當關」第一樁是台灣中科院核研所「張憲義棄職潛逃疑案」；第二樁是「雨田專案」——「雨田專案」是1959至1960年逮捕雷震，即《自由中國》事件工作小組的代號；第三，1987年「三七事件」，亦稱「小金門事件」。三樁案子，均直指國民黨執政機要，不僅是過去，更是針對現在。張憲義案就發生於一年多之前的1988年1月；雷震案是思想案，關係整個意識形態的立意；「三七事件」發生不過兩年，受處罰軍官在李登輝時代全又復出，張友驊在文章中發表了「新職表」，不曉得朝野上下將引起如何的反應。

特別企劃「張友驊：一筆當關」剛收尾，「等待解嚴的土地系列」便起句了。系列的首篇是由陳映真執筆，這一階段的《人間》多是將帥親征，每一期刊首都有「發行人的話」，或者「總編輯的話」，抑或同時有話，凡重大戰線，必拍案趕到。這一回，陳映真文章題目為〈虛構的珍珠港〉，副題「美國干涉主義下的金門與馬祖」，細述金門馬祖戰區由來。韓戰爆發，冷戰達到高峰的五〇年代初，美國有兩個單位進駐金門，一是官方的軍援顧問團，二是民間的「西方企業公司」，名曰「公司」，實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活動機構，為大陸與台灣設起人為屏障，強化割裂的事實。聯想第41期上「台灣職業軍人」專輯中，陳映真文章的題目〈徬徨的武裝〉，再看〈虛構的珍珠港〉，約略見出陳映真對台灣

軍事批判的總體大意，那就是台灣的軍防實際是在世界冷戰格局中被誇張甚至預設出來的敵意，這誇張或者預設的首得益者美國，其次台灣國民黨政府，前者是為建立反對中國社會主義的遠東軍事基地，後者意在物質與意識形態以及體制獲得世界霸權的支援，這一筆交易之下，中國民族則承受著分裂、對峙、隔絕的代價，共同歷史文化的感情資源無謂地消耗著。

第42期《人間》，戴國輝先生繼第40期上「二二八系列」之後，再發表〈試論二二八事件研究之視角與方法〉，專談歷史研究的嚴格。文中有一句話：「最近，台灣掀起了一陣翻案風」，我想是可用來形容其時的台灣以及《人間》雜誌。坐在異國日本的書齋裡，故土的風雲無時不激盪著這位歷史學家的心懷，我想，這是中國近代史學家的獨特命運，歷史永遠處在活躍期，不知何時能夠平息波瀾，很難不受即時即地的感受影響。但戴先生依然保持著科學的理性，他提醒道：「翻案及平反必須經過調查研究和嚴密的學術檢討為基礎，才能對歷史作出無愧的交待。」可是，事情來得這麼急迫，尤其是在那樣長久的等待和積鬱之後，且慢談學術，先來個抽筋扒皮。就這樣，《人間》以凜然之勢，掀開清算歷史的一頁。

### 人民有權不要……

與此同時，是轟轟烈烈的廣場革命。第40期，〈看哪！澎湖潭邊村〉，記敘離島上的潭邊村民，自募經費成立「自救委員會」，抵抗台灣電力公司來建電廠；第41期，台灣各反核組織與環保社團聯合組成「關切核能危害委員會」，發表1989年聲明——「人民有權決定不要核電」；第42期作出專輯「公害政治學」，總編輯楊憲宏寫導言〈公害政治：彰濱與核電〉，陳映真作總論〈台灣經濟成長的故事〉，專針對經濟部門重新啟動兩項冰封開發計畫，彰濱工業區與核電廠，呼籲民眾起

來抵制；第43期，「台北病理學，都市住民運動大反撲」專輯，其中相當典型的案例為〈生存受威脅的中產階級〉，記錄敦化南路業主們抗議在巷道裝置變電所，意味著最保守的階層也起來了；第45期，報導台灣大學學生策劃演出「圖騰與禁忌」，嘲弄與諷刺的物件是大學活動中心的蔣介石銅像；也是在第45期，「遠化工潮」波濤連湧，早在第31期「人間像」欄目裡閃亮登場的工黨副主席羅美文，一年後的此時，帶領遠東化纖總廠工會發動戰後最大規模的罷工；第46期，揭竿的是小學教師，組織「無住屋者救援會」，號召全省三大都會城市，一同爭取社會住房福利，他們的口號是「一隻蝸牛一個殼」……公害、工會權力、公民利益，都不是新話題，一直是《人間》主張的宗旨，只是到這一時刻，如同火山爆發，激烈上演了。

### 韓國錐子

就像前面說的，第40期人事變更，楊憲宏，張志賢加盟，陳映真從此輕裝上陣，親臨前線。在這最末8期中撰寫的文字，遠超過之前39期的總和，凡著重推出的特輯、專集、特別企劃，都有他的點睛之筆，直切要害。「人間燈火」欄目早已闌珊，終至寂滅，「副刊人間」也在不知覺中停刊，在這一個家國情懷的時代，委婉的表達遠不夠用了，要的是更直接的行動，莫過於把血肉之軀投進去，義無反顧。然而，還是老問題，到哪裡汲取力量？西班牙內戰已成往事，只負責提供歷史的經驗與教訓，而世界變化成另一個樣子，經驗和教訓顯然不適用了。四顧茫然，何處可為參照，陳映真看見的一盞燈，就是韓國。不止是之前第33期「副刊人間」裡文學的韓國，而是鬥爭現場。

1989年6月第44期，封面照片即是一名韓國學生舉旗吶喊的形象，文字標出題目——「陳映真現地報告，激盪中的韓國民主運動」。從「發行人的話」裡，我們知道這一年的4月9日至23日，陳映真們到

韓國做了兩周訪問，從中得來頗多啟發和教益。發行人認為，在冷戰局部鬆弛，亞太地區面臨經濟與政治的重組之當下，台灣的反抗運動正處於「焦慮和徬徨」，大陸反腐敗求改革的要求尚欠深刻冷靜的理性，於是，更顯韓國民眾運動充滿活力與創造力，是亞洲的榜樣。這一組「現地報告」由13篇文章組成，第一篇〈民族的報紙為民眾發言〉，報導1987年盧泰愚「六二九民主化宣言」背景下，有民間集資而誕生的《韓民族報》；第二篇〈我們有韓國民族·民主運動的傳統〉，報導由韓國所有在野民主運動團體聯合組成的「全國民族·民主運動聯合」組織；第三，〈年輕又熱烈的無窮花〉，從漢陽大學的「漢城〔首爾〕地區大學生總聯合」為出發，介紹八〇年代學生運動發展經過：組織形式上由分散到集中，由學院到社會，知識青年和工人結合，思想上從簡單反美到認識「韓國社會構造性格」，因此開拓了廣度和深度；第四是工人運動與「漢城工聯」；接著是韓國社會學界，主張「知識和理論要從現場和實踐中來，也得回到現場和實踐中去」；然後，〈韓國文學的戰後〉，在此，文學是作為社會鬥爭實踐而登場，沿五〇至八〇年代，每一次左翼文學所面對的挑戰，都關係到民族獨立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爭取；之七，〈耶穌在窮人中興起新教會〉，受訪者是韓國民眾神學的創始人安炳茂，民族神學是從七〇年代中後的民眾運動中發展出來，1970年，一位身任紡織工業工頭的基督徒，目睹女工們受盡剝削的慘狀，無以名告，結果引火自焚，抗議社會，這能不能說就是「民族教會」最初的起因？之八，是天主教會，一個年輕的組織「天主教實現正義聯合」，如何將抽象的博愛與現實的處境結合起來？陳映真在文末引用了「路加福音」裡的話：「你們以為我來，是要叫地上太平嗎？我告訴你們：不是，乃是叫人紛爭……」；之九，〈在戰鬥中成長的韓國民族劇場〉，演出1982年韓國學生火燒釜山美國文化中心的故事；之十，〈為一切人的平等與自由的美術〉；之十一，〈韓國民族電影運動

的起步)；十二，教育；十三，反公害——從一系列報導，我們可以看見陳映真們奔赴韓國足跡所到之處，在時間上，正發生罷工工潮與文益煥牧師訪問北朝，1987年「八二九民主化宣言」以來的開放局勢又一次收攏，《韓民族報》的主筆、著名文化人被當局約談，「全民聯」代表拘留偵訊，「漢城工聯」領導人士不時遭受「安全聯合搜查總部」拘捕，神學家安炳茂博士痛心以為，「八二九民主化宣言」的虛偽性終於揭開真相……我不知道陳映真是不是被這形勢召喚而去，也許只是不意遭逢，但這一次邂逅後陳映真一定相當鼓舞，韓國的革命幾乎全方面地應合著他的理想：反美，反霸權，民族統一，勞工權利，知識分子到民間，藝術為民眾服務……而這一切，只有鬥爭方能取得，這就是——「你們以為我來，是要叫地上太平嗎？我告訴你們：不是，乃是叫人紛爭……」

### 我得到平壤去一趟了

最後八期的《人間》，便是紛爭的《人間》，陳映真是戰士。「現地報告」之後的第45期，正式開出「陳映真專欄」，可是，僅僅第45、46、47期三期，便與《人間》一同結束了。從刊物本身，我看不出停刊的原因，最後一期，第47期，似乎也沒有什麼跡象，只看見有許多新的和舊的欄目一併湧來：「人間評論」、「人間生態」、「人間媒體」、「人間芳草」、「人間歐洲」，好像急切中要回到原先的格式，不知是不是隱藏著某種徵兆。沒有停刊辭，也沒有「發行人的話」，回想創刊號上「創刊人的話」，不免覺得有頭無尾，終止於倉猝之間。當我寫作這篇文章時，盡力要避免的是，起用《人間》之外的材料。相隔海峽，資訊真偽夾雜，虛實難辨，我本又缺乏學術訓練，只有將自己規定在嚴格的限制中，犯錯誤的危險方能減少。我承認本文只用了一個其他來源的細節，就是擔任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中有陳水扁，這是一個不爭的

事實，可為台灣黨外的一路風塵多提供一個佐證。其餘所有，全出自《人間》雜誌本身。也因此，我不便對《人間》的停刊作任何猜測。總之是，發行人離去了。

最後倒數第二期的第46期上，陳映真專欄文章為〈文益煥牧師的一首詩〉。文益煥牧師在七十多歲高齡，於這年4月9日，公然違「國安法」不顧，取道東京去往他被分裂的祖國的北方，再從日本取道，泰然而歸，以一介肉身，走通南北兩韓，一出機場便被逮捕。他曾寫下一首詩，題為〈我得到平壤去一趟了〉，全文在「陳映真專欄」刊登。我知道，《人間》停刊不到半年，隆冬季節，陳映真第一次來到大陸。這已是題外的話，就作文章的結語，不再另闢章節，全文終。

2008年12月5日 上海

## 試談「九〇年代的陳映真」

曾健民

答應了陳光興的邀約後，開始翻出一包包塵封的資料袋，在重新整理閱讀、回顧省思時，才發現這是一項艱難的工作；開始懊惱當初答應了這個任務。

不是資料不夠，也不是不瞭解陳映真，而是十幾年來與陳映真一起埋頭工作，雖然不能說朝夕相處，至少是經常見面；他像兄長一樣的親近，像同志一樣的理念相近，因此，從來就沒有一刻拉開距離去觀察他、研究過他。現在，忽然要拉開距離，科學地、客觀地談論九〇年代的陳映真，就像要把他當作「他者」、「對象」一樣對待，真的，在心理上還未有一定的準備。

從1992年由日本返國後，我隨即與陳映真一起投入工作。在「後冷戰」（實際上，在東亞應是「新冷戰」）、「台灣意識」（指「分離主義」的）、「全球化」和「後現代」的洶湧時潮中，挑戰一波波襲來；在陳映真的前引下，兩人三腳地孤軍奮戰，只知奮力前進，無暇後顧。這期間，每完成一項工作，就匆匆把資料打包放在架上，再準備下一個工作，甚至有時連陳映真的文章也無暇細讀。直到2006年5月，陳映真要到北京人民大學任客座教職之前，兩人仍然數度一起談論要如何完成「台灣社會性質論」的問題，以及「左統」陣營的人才如何團結工作的



問題。因此，十數年來，已經習慣於與他一起工作，共同面對客觀環境的挑戰；甚至到今日，陳映真病倒北京，我仍然習慣性地朝著十幾年來未完成的共同工作，繼續往前走。現在忽然回首要討論九〇年代的陳映真，的確是一項從未有過的新挑戰。而且，這個工作就像要回頭整理這十幾年來自己走過的路一樣，有點遲疑，因為事情都還沒做好，就要驗收，有點太早了。書架上留下的一大堆資料又是太過龐雜了，不知到從何下手，真需要時間慢慢去審視、積澱。

九〇年代的陳映真，簡單地說，就是思想的陳映真。然而在台灣特殊的政治、文化環境中，直至今日，大多數的人，仍然只喜歡片面地談文學的陳映真，卻不熱衷思想的陳映真，也有些人不願或者忌談思想的陳映真，更遑論談論思想臻成熟熾熱的九〇年代的陳映真了。這在一個資本全球化、資本邏輯取代價值與審美、人被零碎化、心靈內向化、談「人的終極解放」被嘲笑的年代，特別又在反共意識轉化為台灣意識獨擅闊步的台灣社會，思想的陳映真的孤獨，是可想而知的。九〇年代的陳映真，暫停文學創作投入思想實踐的陳映真，到底做了甚麼？連陳映真自己都一直沒機會好好概括過，致使大家一直沒辦法具體地瞭解這時期的陳映真。

因此，本文只以試談的心情，依時間順序或者議題別，介紹陳映真在九〇年代的工作，透過他的這些工作和實踐去理解他的思想。基本上，此篇文章是屬於資料性的整理和介紹，至於更深入的闡釋或論述，則有待於後來者。而陳映真在這時期寫下的數量龐大的文化、文學、政治評論，則非本文討論範圍。

## 一、陳映真思想的磐石

### (一) 陳映真的文學與思想的辯證世界

對陳映真來說，思想與文學是一體的，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有必要先簡述陳映真的文學創作與思想的關係才能進一步去理解「思想」在陳映真的文學創作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陳映真在許多訪談錄、自剖文中，無數次自認為自己是一個「概念先行」的作家，譬如：

我這個人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思想沒有出路的話，我就沒辦法寫作。<sup>1</sup>

他大體上是屬於思想型的作家，沒有指導的思想視野而創作，對他是不可思議的。（〈後街〉，洪範版散文集1：頁68）

至於思想與文學創作的關係如何？他曾精采地自剖道：

文學創作像一場及時的、豐沛的雨水，使他因意識形態的烈日劇烈的炙烤而瀕於乾烈的心智，得到了浸潤，使他就能保持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知識與原理的信從，又能對人類心靈最幽微複雜的存在以及他所能噴發出來的創作與審美的巨大能量，保持高度的敬畏、驚訝與喜悅……。（〈後街〉，洪範版散文集1：頁57）

對這問題，陳映真也曾經更直接、簡潔地說過：

1 廖玉蕙訪談陳映真，〈讓所有受侮辱的人重新得到尊嚴〉，載2009年9月《文訊》第287期，頁96。

在我，形象和思想不應對立起來看，應該辯證統一地看。寫作是思想的表現。形象，藝術性為思想服務。<sup>2</sup>

雖然他強調思想的主導性，但不能把陳映真的思想與文學切割來看。實際上，他的文學創作有濃厚的思想性，但他的思想也充滿了文學性、藝術性，這是為什麼他的思想總是那麼令人動容之處；同時，也是為什麼他的文學總是那麼深刻動人，充滿了豐富隱喻和啟示的原因。因此，九〇年代的陳映真的思想實踐也有著濃厚的美學。

## (二)陳映真思想的磐石

在雷厲的反共肅清年代，陳映真的思想經歷了幾次大的飛躍，他形容為「思想的騷動和焦慮」。

1960年，他在台北牯嶺街舊書店裡，接觸到了中國三〇年代的左翼文學，使他「耽讀竟日終夜」；及至「從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為起點，命運在一個以馬克思體系為大罪惡、大異端的社會，把一個文學青年推向通往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世界，孤單地、亢奮地，而又恐懼地面對新思想所帶來的騷動和蛻變，並且決定性地轉變了後半生的我的軌道。」<sup>3</sup>

1963年，「他結識了一位年輕的日本知識分子〔……〕，他得以在知識封禁嚴密的台北，讀到關於中國和世界的新而徹底(radical)的知識，擴大了僅能從十幾年前的舊書去尋求啟發和信息的來源」(〈後街〉，洪範版散文集1：頁58)。此時，他從三〇年代的左翼世界進展到與當代世

2 趙遐秋、曾慶瑞，〈步履未倦夸輕翮：與當代著名作家陳映真對話〉，《文藝報》(北京)，1999年1月7日。

3 〈一個私的歷史之記錄和隨想〉，收入《台北記憶》(吳秋美總編，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7年7月)，頁68。

界的中國的左翼接上了頭。

1968年，「他和他親密的朋友們，受到思想渴求實踐的壓力，幼稚地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組織的道路」(同前引：頁59)。終至「我正是帶了文革的亢奮，在板橋寓所被捕，一路上看著窗外的街景，被送進台北市警總保安處隱秘的偵訊機關」。<sup>4</sup>接著：「在那個四面環山，被高大的紅磚圍牆牢牢封禁的監獄，啊，他終於和被殘酷的暴力所湮滅，卻依然不死的歷史，正面相值了。〔……〕五〇年代心懷一面赤旗，奔走於暗夜的台灣，籍不分大陸本省，不惜以錦繡青春縱身飛躍，投入鍛造新中國的熊熊爐火的一代人，對於他，再也不是恐懼、神秘的耳語和空虛、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同前引：頁60-61)。

於此，他與台灣歷史的第二波左翼運動的歷史和人相遇。

六〇年代、七〇年代有多少台灣的青年像陳映真描寫的一樣，被投入了反共暴力所監禁的地下裡。

在盛暑的囚房，陳映真對自己許下了虔誠的許諾：「為了世界上無數的，在遭人湮滅的角落裡，為著不肯釋手的生命中的一盞燈火，而正在受盡囚錮、拷問之苦的，被全世界遺忘的人們而活，而寫作……」。<sup>5</sup>

在一次接一次思想的衝擊和飛躍中，陳映真不但被推向通往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世界，且站入了三〇年代以來，中國的民主民族革命的歷史、思想和文學的隊伍中；又在泰源和綠島監獄，他與五〇年代被殘酷的反共暴力所湮滅卻依然不死的人與歷史相遇，而成為他們的一員。這些都成為陳映真的思想、信念和審美的最深沉的磐石。具體地說，陳映真已堅定地站在台灣左翼的反帝、民族民主運動的傳統中。

在「反共戒嚴」時期，甚至在九〇年代大家還憚於公然自稱「左

4 〈一個私的歷史之紀錄和隨想〉(同前引)，頁71。

5 〈被湮滅的歷史的寂寞〉，載1998年8月《聯合文學》第4卷第10期，頁10-13。

翼」，且直至2009年「主張共產主義」才被免罪化的台灣社會，陳映真站在這樣的磐石上，在喧囂又荒涼的文化界，以無比的勇氣和充沛的戰鬥力，通過文學創作、文化活動和社會政治活動，展現了獨特的、充滿魅力的批判力量，感動和啟蒙了無數的心靈。

另一方面，陳映真自稱：「他的思維和創作，在一定意義上，一直是被支配的意識形態霸權專政的對象」（〈後街〉，洪範版散文集1：頁68）。有一位專門負責調查陳映真的思想偵探，就曾公然指陳映真是一棵「毒蘋果樹」，樹上結滿了毒蘋果，這是反共戒嚴時期支配性的恐嚇語言，「不反共」的都是毒蘋果。這種情況，在九〇年後「反共意識」轉化為「台灣意識」，情況並沒有改變；只不過，霸權「話語」變成了「不愛台灣」或「賣台」而已，「不愛台」的都被當作毒蘋果。

### （三）九〇年代的世界變局對陳映真的質問

要談九〇年代的陳映真之前，有必要先談談九〇年代的世界與亞洲的歷史背景。

八〇年代末起，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自我瓦解，同時，中國社會主義開放改革10年後發生了天安門事件。一時，「歷史的終焉」、「意識形態時代的終結」、「資本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的歷史性勝利」等論說狂呼喧囂塵上；全世界隨著西方陣營大呼「後冷戰時代的來臨」。然而，事實上只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自我瓦解，美國的冷戰體制從未改變，世界進入了美國單極制霸的時代。美國的軍產複合體，以及美國在軍事、政治上的世界支配結構絲毫未改變，冷戰意識形態也依然未變；美國在全世界繼續維持著其單極的冷戰結構。所不同的是，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美國在世界各地掀起顏色革命，世界的民族分裂衝突與戰爭紛發；資本主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全球化，同時，西方的價值和意識形態進一步普世化。譬如：西方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

輯——後現代主義——其否定一切理性認識的存在、主張現象背後無本質、歷史中無規律，推崇主觀性、相對性的唯心主義的潮流，快速支配了全世界大多數仍處於「現代化途上」的國家的學界、文化界；瓦解了各地左翼的、民族主體的文化力量。

在東亞，美國不但繼續維持其10萬駐軍體制，且更進一步強化其在東亞冷戰的樞紐——日美安保體制，擴大日美安保對亞洲干涉的範圍（亦即所謂的「日美安保新指針」、「週邊有事事態法」等），更突破了日本的和平憲法，實現了日本對海外的派兵。同時，由日本保守政客所組成的「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新歷史教科書編撰委員會」等團體，積極美化日本帝國百年來的侵略、殖民歷史，鼓吹「帝國的光榮」史觀。

與此同時，台灣經歷了「解嚴」和短暫的「民主化」後，進入了李登輝政權的時代。李以「南進」阻擋「西進」，鼓吹特殊國與國關係，激化兩岸對立；大談「台灣精神就是日本精神」，以政權推動歷史教科書的「台灣意識」化。在政權的支撐下，分離主義的「台灣意識」或「本土意識」，成了霸權意識，所向披靡。所謂「後冷戰時期」的台灣，冷戰結構並沒有大改變，只不過，「台灣關係法」取代了「中美協防條約」，「台灣意識」取代了「反共意識」，本土政權取代反共政權，繼續維持著反中國的對峙結構。更有甚者，「台灣意識」不但壓抑了「階級意識」的發展，更再度湮蔽了台灣百年來，從日本殖民統治起到冷戰和內戰多層扭曲的歷史關部。

這一連串的世界巨變，對包括陳映真在內的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甚至仍相信人的終極解放的知識分子在內，都受到空前的衝擊；有人觀望、有人迷失、更有許多人轉向。在台灣，許許多多原本抱著朦朧的對左翼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嚮往的智識分子，一夕間價值崩潰，而紛紛轉向反中國的「台灣意識」中去。

從七〇年代起，原本為了反抗國民黨政權追求「民主化」，一起奮鬥過的同盟者——黨外運動以及後來的民進黨陣營，此刻已走到了對立面，陳映真陷入了更孤獨的境地。

為什麼在政治上「解嚴」、「民主化」後，台灣社會依然繼續惡化呢？兩岸關係卻更為對峙呢？為什麼「反共、反中國、親美」的意識形態依舊如故呢？對於這個新的時代提出來的嚴厲質問，批判的陳映真必須要有明確的回答。

利用天安門事件，西方陣營掀起了一波反共反中國的高潮；同時，40年間作為美國東亞反共前線的台灣，也興起了以民主人權為口號的反中國大陸的大波瀾。早在「六四」的前一個月，陳映真目睹「北京和大陸各城市的大學生市民和工人們壯大的絕食示威，心中極為複雜激動」，憂心「萬一發生真正飢餓致死的事件，後果何堪設想」；遂寫下了〈悲傷中的悲傷：寫給大陸學潮中的愛國學生們〉。該文下方寫了幾個大字：

反貪污、反獨裁、爭取民主自由人權，因為大陸學運正當而勇敢的要求，但對於當前大陸獨裁腐敗的構造缺乏較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則運動的動力和方向，是令人憂慮的。<sup>6</sup>

文末陳映真痛切地指出：

有誰具體分析過「開放改革」體制中國社會矛盾的本質呢？……歷史和全中國在等待著對於這些問題的思維分析和解答……而在中國大陸當前黨和批評黨的知識分子，顯然都已失去了思維、分

6 〈悲傷中的悲傷：寫給大陸學潮中的愛國學生們〉，載1989年6月《人間》第44期，頁19。

析和解答這些問題的能力。在遠遠沒有這些思維、分析和解答之前，同學們竟懷著單純卻毫無政治知識實體的虛渺口號與理想，虛弱以死，甚至引燃一場毫無進步實質的大亂，三度浩劫之餘，徒然讓新的一批特權化、買辦化和美國化的知識分子，繼續喋喋不休地咒罵自己的民族，歌頌西方的進步與偉大……這是何等的悲哀中的悲哀呢？<sup>7</sup>

陳映真懷著極大的悲哀，盡力說服廣場上的學生，在未有具體分析和解答開放改革體制的社會矛盾的本質之前，運動極可能會「引燃一場毫無進步實質的大亂」。在該文未刊出之前，六四天安門事件已爆發！

陳映真立即寫了〈等待總結的血漬：寫給天安門事件中已死和倖活的學生們〉，聲嘶呼喚：

有甚麼悖理比這些更其悖理？

有甚麼矛盾比這些更其顛倒？

又有甚麼悲愴比這些更為深沉？<sup>8</sup>

文末，陳映真前瞻地指出：「歷史彷彿已透過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血漬」，要求獨立思考的共產黨人、有民族主體意識的學生和知識分子、熱愛祖國的人民，「對天安門事件做出科學的總結，並且在這總結的基礎上，重新劃出中國社會主義的改革和發展的道路」。<sup>9</sup>

最後他從更大的視野提出，在這不幸事件中的另一啟發：

7 同前引，頁24。

8 〈等待總結的血漬：寫給天安門事件中已死和倖活的學生們〉，載1989年7月《人間》第45期，頁72。

9 同前引，頁73。



分散在大陸、台灣和香港的中國革命知識分子，有義務獨立地思考民族分裂時代中大陸、台灣和香港的社會性質，指出各社會中矛盾的構造，找到改革的力量和方向。從而找到民族統一的康莊大道。<sup>10</sup>

不管在天安門事件之前或之後，陳映真都痛陳了：思考、分析、批判社會矛盾本質及其構造的重要性；只有先解決這根本問題，才能找到社會改革的力量和方向，才不至於空有虛渺口號，而引燃一場毫無進步實質的大亂。面對世界社會主義的瓦解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混亂，在這歷史的新階段如何堅持信念繼續走下去，就成了九〇年代陳映真思想實踐的中心。

## 二、打開一個認識和改造台灣社會的論述

1987年陳映真發表了小說〈趙南棟〉後，文學創作的筆停了下來。1989年8月，也就是天安門事件的兩個月後《人間》雜誌又停刊，一直到1999年年底，他才又重提文學創作之筆，發表了〈歸鄉〉。在這整個九〇年代，陳映真到底做了什麼？雖然陳映真曾表示蘇東波（蘇聯、東德、波蘭）變局的「震撼很大」，而「要尋求思想出路」；而天安門事件的悲愴，啟發了他有義務更根本地科學地思考社會性質、社會構造的問題。實際上，陳映真的思想磐石並沒有大的動搖，只是必須在新的時代變局中提出更科學的更本質的思維和解釋；只有更進一步投入思想實踐，在實踐中回應時代的提問。

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消退和瓦解，固然「震撼很大」，但對陳映

10 同前引註。

真來說，更大的挑戰在台灣的新變局。因為台灣左翼傳統的弱小和艱困，致使八〇年代以後本土論、台灣意識取代反共意識迅速崛起，整個時代再一次大倒退，新的逆潮洶湧而來。在這個大倒退的時代，陳映真深感感情論和道德論已無法解決問題，只有重新從社會科學開始，致力於打開新的左翼的社會科學的論述體系，期待台灣長期被湮滅的左翼社會科學和歷史復原。這是陳映真回應大倒退時代的道路。下面將簡單介紹九〇年代陳映真的重要工作。

### (一) 出版「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

首先，他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撥開台灣政治、意識形態紛亂的現象，以政治經濟學的方法，開始深入研究台灣百年來的經濟史和社會史。然而台灣一向缺少左的知識，他只有自己來，他說：

台灣的社會，因為較缺乏左派的理論，台灣沒有歷史唯物主義討論台灣的社會經濟史、台灣政治發展史這一塊，在我們學界裡完全沒有，完全陌生……那段時間正逢解嚴，恰恰好我手頭上有幾本書，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將它們翻譯出版，這對我也是一個很大的幫助。<sup>11</sup>

這就是人間出版社從1992年6月開始，一連出版的7卷本的「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包括旅日學者名著劉進慶的《台灣戰後經濟分析》、涂照彥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等。<sup>12</sup>陳映真「花了很多的時

11 廖玉蕙，〈讓所有受侮辱的人重新得到尊嚴〉（同前引註1）。

12 人間出版社從1992年6月開始至今共出版「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七冊：《1·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涂照彥，1992）、《2·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劉進慶，1992）、《3·台灣戰後經濟》（段承璞，1992）、《4·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谷蒲孝雄，1992）、《5·台灣

間」翻譯出版這套叢書，當然不只是為了出版事業，也不只是為了自己認識的提高，而是希望藉此有更多包括知識界的人，開始用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去看台灣的社會與歷史。陳映真在該叢書的〈出版的贅言〉，以濃厚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語言，展開了他的批判與期許；在介紹了中國、日本和韓國經歷過的「社會性質論爭」後，他說：

在1950年以降，受到美國反共、保守系社會科學高度支配的台灣社會科學界……缺少把台灣戰後社會學從其物質的、經濟的構成，與其相應的政治、文化、思維的構成所結合的整體，去究明其性質，探索其構造矛盾的本質與內容，更從而把握揚棄這矛盾，使社會和生活向前發展的歷史運動與趨勢——這樣一個視野。<sup>13</sup>

接著他批判了八〇年代的「台灣熱」的問題：

八〇年代以後，台灣的歷史和社會，一時頗成為讀書界關心的焦點……然而，一般而言，這些出版物大凡都停留在感情論和道德論的水平，對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發生……都不曾做出科學的、理性的分析。<sup>14</sup>

最後，他期許這叢刊的公刊，「有助於台灣社會和歷史研究，早日離開道德論和感情論的幼稚期，從而進入台灣社會與歷史展開科學的

---

依附型發展》(陳玉璽，1992)、《6·台灣之經濟》(劉進慶等，1993)、《7·台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E. A. Wimckler S. Greenhalgh編，張苾蕪譯，1994)。

13 「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之〈出版的贅言〉。

14 同前引註。

自我認識的時代。」<sup>15</sup>

這篇〈出版的贅言〉，已表達了陳映真九〇年代的基本思想，以後大致上沿著這種脈絡不斷深化和發展。同時，它也是台灣「解嚴」後，但「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又還未除罪化的時期，第一次公然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語言，評論台灣社會科學問題的文章。

這個叢刊對台灣社會科學界或知識界的影響，雖然速度緩慢，但持續發揮著深遠的影響。

## （二）創辦「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1993年4月，在陳映真的呼籲和召集之下，結合了一批關心台灣社會歷史問題和參與社會運動的朋友，經過數次的討論成立了「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參與創會的人有：陳映真、汪立峽、曾健民、申正浩（韓國留學生）、金鴻文、官鴻志、陳國坤、舒詩偉、顏春賢；金鴻文擔任第一任會長，其後由曾健民擔任。研究會會員流動性大，但參與者前後不下百人。前後加入的人有如：林孝信、杜繼平、陳秀惠、黃德北、林深靖、施善繼、林一明等左翼運動的重要朋友；青年學生和社會人士更不計其數。〈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章程〉的「前言」部分採用了陳映真起草的文稿，經大家共同討論增刪而後定稿。「前言」先說明了台灣原有的進步的社會科學傳統：

1920年代後，日帝殖民地台灣前進的知識分子，為了克服當時台灣社會民族階級的矛盾，援引了馬克思關於政治經濟的理論，進行了對於台灣社會與歷史之科學的自我認識工作，並留下了一定的知識和理論的遺產。<sup>16</sup>

15 同前引註。

16 引自「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之〈研究會章程前言〉的「前言」。

然而，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中，「此一傳統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知識和哲學，遭到殘酷和徹底的破壞而完全中絕者凡40年。」<sup>17</sup>1980年代中後，台灣的政治經濟起了巨大的變化，但台灣的社會科學界對此一變化無法提出進步的、批判的說明。因此，「前言」指出：

我們有鑒於此，深感一方面批判地繼承二〇年代台灣社會性質論的遺產，一方面又進一步汲取二戰以後依附理論、世界體系論以及其它各種進步的關於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各理論新的反省與發展，同台灣社會具體現實結合起來，建構一個科學地、批判地認識和改造台灣社會與歷史的論述系統，誠為當務之急。欲達到這些目的，我們協議成立了這個研究會。<sup>18</sup>

這個「前言」與前述的〈出版的贅言〉是相呼應的；由此可鮮明地看出陳映真此時思想實踐的基本形貌是：繼承和發展五〇年代遭殘酷破壞「中絕凡40年」的台灣「進步」的社會科學傳統，並以此結合台灣的具體現實，建構一個「認識和改造台灣社會與歷史的論述系統」。

〈研究會章程〉的「任務」條項也規定：

- (1)以進步的社會科學，結合台灣具體現實，建設與發展關於台灣社會、歷史及文化之科學的論述。
- (2)在大專院校青年中，在社會科學界中，在社會民眾中發展和推廣此科學論述。

在1995年9月2日的研究會「年度檢討」中，陳映真的發言，指出了與此大概相同的意見後，更明確表示：

17 同前引註。

18 同前引註。

我們創辦本會的動機，是為台灣社會的性質找到知識、思想的依據。本會不在宣揚黨意或主義，而是以政治經濟學體系探索台灣的社會性質，目的是繼續探索台灣經濟史，做啟蒙和教育的工作。……我們非專業，希望各位以熱情，繼續展讀政治經濟學的書籍，探索台灣史。<sup>19</sup>

存續十多年的研究會，其「任務」可要約為：以「進步」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探索台灣的社會性質，並以此做啟蒙和教育工作。這也是九〇年代陳映真的思想實踐的中心目標。

研究會的活動，以每週一次的研讀、報告與討論為主；也請專家學者來會演講報告（如大家熟知的陳光興、呂正惠、金寶瑜、許甘霖……等，都曾應邀來過研究會報告）；更曾經舉辦過數次系列對外講座，如「帝國主義理論」、「新詮中國現當代史」、「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研究會也主辦和協助陳映真舉辦過無數次的文化活動、研討會，譬如後面將會分別討論的：

- 「五十年的枷鎖：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歷史照片展（1996年）
- 「香港：一個半世紀的滄桑」照片展及系列講座（1997年）
- 「回顧與再思——鄉土文學論戰20年」研討會（1997年）
- 舉辦「紀念『四六』事件」文化·文藝晚會（1999年）
- 舉辦六屆的「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1997至2002年）
- 創辦「人間思想創作叢刊」（1997至2008年）

19 作者之箭記，引自陳映真於1995年9月2日「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之「年度檢討」中的發言。

下面介紹一點研究會在1996至97兩年的一些活動片段。從我個人的研究會筆記來看：研究會從1996年6月就開始不斷討論發行「人間叢刊」的問題；同時，在8月又開始討論籌備「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研討會，並因此舉辦了許多次的有關冷戰的學習會；9月開始討論「鄉土文學論戰」的議題；11月舉行了「五十年枷鎖」的歷史照片展。

1997年3月22日的研究會活動，一面檢討和學習2月底舉辦過的第一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研討會，一面開始討論如何準備籌辦「九七香港回歸」的各項活動，以及「鄉土文學論戰20週年」研討會。4月，陳映真到北京接受中國社會學院「榮譽高級研究員」的頒授典禮，並發表〈時代呼喚著新的社會科學〉的演講<sup>20</sup>；5月17日，在研究會上報告了頒授的感想。8月3日，針對李登輝欽點杜正勝所推動的「認識台灣」歷史教科書問題，舉行了一次討論會，並分頭撰寫了糾正與批判的文章，由「台灣史研究會」出版了《「認識台灣教科書」參考資料》（9月25日出版）。11月19日，研究會參加了「亞太地區反美日帝國主義運動展望」論壇，陳映真發表了〈關於台灣國中歷史教科書問題〉的報告。11月29日開始，進入「帝國主義理論」的學習與討論，一直到1998年3月26日為止；在這天的會上，陳映真批判了台灣左翼變革運動的「一島變革論」（亦即，主張台灣左派亦只要搞島內的左翼變革運動，不管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認為台灣左翼變革運動與中國社會主義的歸趨是分不開的；並說：

我們說的「美帝國主義」不是罵人的髒話，它是實際存在的，是社會科學上實際存在的東西，如劉自然事件（1954年）就突出了台灣的「治外法權」問題，國民黨的以反共為大義名分的「國安國家」，

20 〈時代呼喚著新的社會科學〉，載1997年8月《海峽評論》第80期，頁58-63。

美國透過人員交換、基金會、獎學金、留學、美國新聞處……來進行意識形態的改造等等。<sup>21</sup>

他進一步對「台灣社會性質」問題提出了看法，他說：

如果台灣社會是「新殖民地社會」，那麼，變革的方法，要以「民族主義」去克服；如果台灣是「資本主義社會」，且在階段上已進入獨占資本主義，那麼，就屬於社會主義的變革了。<sup>22</sup>

在「帝國主義理論」的學習結束後，馬上進入了「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系列講座。

### （三）舉辦「五十年的枷鎖：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歷史照片展

從1996年11月23日至12月19日，在「力霸大樓」的「新生畫廊」，舉行了這個歷史照片展。

它是陳映真花了大約一年的時間，自掏腰包，從台灣、日本甚至中國大陸，官方或民間個人手中，四處搜羅到的將近350張極具歷史意義的日據時期歷史照片。它依時序分為九大部分：

- （1）兩岸人民反割台鬥爭。
- （2）台灣農民抗日武裝游擊、抗日起義。
- （3）苛烈的殖民統治。
- （4）非武裝抗日民族民主運動的展開。
- （5）台灣文學傳統上的抵抗。

21 引自會議上陳映真發言的作者簡記。

22 引自作者簡記。



- (6) 原住民族的抵抗與霧社事件。
- (7) 在中國大陸戰場上的台灣抗日革命運動。
- (8) 皇民化運動、戰爭動員與日帝戰敗。
- (9) 日帝統治下台灣的人與生活。

這是陳映真發揮他深厚的日據歷史知識和鮮明的殖民批判意識，並結合了他對影像藝術的高度修養，呈現出來的完美的展出。通過歷史照片對台灣殖民歷史進行了最有說服力的批判。

作者手頭留有一份當時一位記者江碧瑜對作者的訪問原稿，它比較完整地呈現了當時我與陳映真共同的展出觀點，故節錄如後：

很早以前，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成員便意識到，一般台灣人對於一百年前開始的日據歷史的認識相當不足，也相當混亂；因此，便開始從閱讀與研究史料開始，希望對這段歷史進行的比較客觀的理解。同時也認識到，除了從文學、文物中去認識之外，攝影術的誕生，也使歷史多了另一個觀照的方法。

這些歷史照片大多是日本人所拍的；當時他們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將它當作彰顯功績的方式、治績的工具。例如，當時日人將起義抗日的農民當作土匪，在處刑之前，都會留下照片，存做檔案；但從後人的眼光來看，就有不一樣的想法，這些照片就成了殖民者或其扈從者無容狡辯的罪証。當然，如今我們重新認識，絕不是站在殖民者、統治者的立場、而是站在被殖民者的立場來看的。

文字可以任意書寫，甚至生產出反歷史的潮流，帶來更大的混亂，因此「影像的力量往往超過了文字的書寫，是我們深深相信的」。他堅信最有說服力的，就是歷史的現場。歷史的真實總會恢

復它的正義，但歷史的正義並不是無條件就會恢復的，還需要靠我們繼承歷史的子孫，以及整個社會對文明、對正義的要求，歷史才有機會回復其真面貌，如果不是現實社會有一股積極追尋的力量，照片仍然很快會消失。

這次的照片展絕不是沙龍展、民俗展，而是真正的歷史展，因為所謂保存，如果沒有社會意義、歷史意識和現實意識，就只是個人的珍藏罷了。照片展主要是為彰顯歷史正義而做的。<sup>23</sup>

#### (四)舉辦「香港：一個半世紀的滄桑」照片展及系列講座

這個活動是為了紀念1997年7月1日的「香港回歸」。從6月28日至7月6日，在誠品書店敦南地下二樓的藝文空間，舉行了香港155年的歷史照片展，以及四場的講座。是由人間出版社聯合誠品書店主辦，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協辦。

為了照片展，陳映真寫了長篇「香港：一個半世紀的滄桑」照片展之〈展出的話〉，詳細介紹了展出的十個歷史主題的內容；它在開頭這麼說明：

這〔按：指香港回歸〕不僅是香港在社會、政治和經濟上擺脫殖民地性格的重大轉折，也標誌著中國和東亞新的歷史時代的開端，是香港人民的大事，是全體中國人的大事，也是亞洲各族人民的大事。<sup>24</sup>

台灣和香港歷來關係密切，為了紀念香港重隸中華，陳映真特別蒐集了350張從鴉片戰爭以降到今天的重要的、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珍

23 引自展出期間江碧瑜對曾健民的訪談原稿。

24 引自「香港：一個半世紀的滄桑」照片展之簡介文〈展出的話〉。

貴照片，有史觀有構成地展出，呈現給觀眾。展出分成以下十個構成部分：

- (1) 香港的前史。
- (2) 鴉片戰爭與香港的割占。
- (3) 殖民地自由轉口貿易港的形成。
- (4) 現代中國的胎動對香港的呼召。
- (5) 「三年零八個月」的夢魘。
- (6) 五〇、六〇年代；迎向戰後工業化。
- (7) 「亞洲四小龍」的鰲頭。
- (8) 香港的擴大和蛻變。
- (9) 香港問題解決的歷程。
- (10) 香港：1997年7月1日。

最後一個部分，即「香港1997年7月1日」的部分，在7月2日下午以專機，從香港帶回6月30日夜24時至7月1日夜24時，在香港當地所拍的紀實照片，向觀眾展出這歷史性一天的各個重要瞬間。

除了照片展外，還舉辦了四場講座：

- (1) 6月29日，施叔青(作家)，〈是什麼在牽動我寫香港的故事〉。
- (2) 7月1日，黃建業(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香港電影春秋〉。
- (3) 7月4日，陳映真·曾健民對談，〈從台灣看香港的歷史〉。
- (4) 7月5日，黃枝連(香港浸會學院社會系首席講師)、楊錦麟(香港快報兩岸新聞版主任)、宋東文(夏潮基金會董事長)，〈回歸後香港的未來〉。

整個活動的構成，從各個角度完整地呈現了香港的真實面貌。從歷史照片的形象到講座、對談的語言激盪；從150年的香港歷史到未來；從香港的歷史到文學、電影；從香港的社會、商業、產業到香港和台灣的殖民歷史的比較。整個活動展現了陳映真廣闊的世界視野，表現了他在知識、認識、藝術和策展各方面綜合的深厚的人文素養，以及審美的風采。

實際上，香港回歸的紀念活動，是和上一年舉辦的「五十年的枷鎖：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照片展相呼應的，是前者的進一步發展；兩者都是與中國現代史中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半殖民問題有關。譬如，作者與陳映真的對談〈從台灣看香港的歷史〉（未刊稿），是從香港殖民史和台灣殖民史、戰後史的關聯和比較去談的；從這個角度去談，不但豐富了中國現代史中有關殖民、去殖民問題的向度（dimension），也擴大了台灣的殖民、冷戰內戰問題的向度；直接、具體而生動地表達了陳映真對殖民、去殖民問題的看法。對談內容括了六大議題：

- (1) 台、港殖民體制之異同及相關問題。
- (2) 台、港殖民地化歷史過程的異同。
- (3) 台、港移民社會的比較。
- (4) 祖鄉中國內地對殖民地台、港的呼召。
- (5) 冷戰下的台、港。
- (6) 台、港經濟發展的比較。

#### （五）「回顧與再思：鄉土文學論戰20年」研討會

在研究會上討論籌備近一年的「鄉土文學論戰20年」研討會，於1997年10月19日，在台師大召開。會上陳映真作了主題報告〈向內

戰·冷戰意識形態挑戰》，總論了鄉土文學論戰在台灣文藝思潮史上的劃時代意義；在結論中他反省：「台灣左翼傳統的弱質，和戰後台灣左翼在知識理論，從而在實踐上的貧困和極端艱難的處境，是造成八〇年代以降大反動和大倒退的主要原因。」<sup>25</sup>並說：「擺在深切關懷歷史和生活的人們面前」，有下列「急迫地等待解答的問題」，它包括：

- 對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文藝路線的問題。
- 對來自西方高教校園的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全面結合台灣具體論題的總檢點。
- 展開台灣社會構造體性質的討論，以深入解決帝國主義、台灣殖民經濟、87年以後台灣「國家政權」性質和台灣社會變革理論等諸問題。
- 從台灣政治、社會史論的展開，對統獨問題進行理論探討。

這篇長文，表達了九〇年代陳映真思想的重要內容；表示此時九〇年代的陳映真思已達到了新的豐滿的高點。而他提出的「急待解答的問題」，也是陳映真10年來，甚至在那之後，一直致力解決的問題；特別是後面兩項問題，更是他思想實踐的重心。

研討會共有8篇論文的發表，也邀請了當年論戰參與者或《夏潮》編者與會進行座談，如尉天驄、王曉波、周玉山、高準、黃春明、吳福成……等，但因限於經費只辦了一天。

相隔數天的24日，另一場由王拓總監，春風基金會和文建會合辦的「鄉土文學論戰20週年：青春時代的台灣」，也於誠品敦南店連續舉辦了三天。基本上，這是一場突出泛民進黨系意識形態的研討會。當

25 引自〈向內戰·冷戰意識形態挑戰〉，發表於1997年10月19日台灣師大的「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年」研討會。後載於《人間思想創作叢刊·2003冬季號：告別革命文學》，頁162。

時《聯合報》報導，稱這兩場研討是「20年後烽火再起」。

會後，「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創刊號上，刊出了陳映真以〈一時代思想的倒退與反動〉為題，批評了王拓在他主辦的會上發表的〈鄉土文學論戰與台灣本土化運動〉。陳映真說：

如果七〇年的鄉土文學論是台灣思想史上的一個飛躍；是對反動的冷戰和內戰意識形態的一次顛覆；是台灣思想史上的第三波民族階級解放運動，那麼，八〇年代以迄於今日的台獨反共、親美、親日、民族分裂固定化、脫中國……的思潮，無疑是從七〇年代鄉土派進步思潮的一個到退、反動、右傾和保守化。<sup>26</sup>

這篇長文，可說是〈向內戰、冷戰意識形態挑戰〉的續篇。

對於八〇年代後期的《人間》雜誌，有一篇張文中對陳映真的訪問〈台灣左翼知識分子的追求和理想〉。

張文中：第三波的台灣左翼思潮，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的？

陳映真：從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是台灣第三波左翼運動的十年。……跟過去兩波左翼運動完全沒有關係，是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內部矛盾和社會矛盾，再加上左翼思潮突破了冷戰和內戰的思想框框，看到了社會，看到了階級，看到了帝國主義的問題。這是一個完全新的視野。<sup>27</sup>

26 〈一時代的倒退思想與反動〉，載1998年12月《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創刊號：清理與批判》，頁255。

27 張文中，〈《人間雜誌》：台灣左翼知識分子的追求和理想——陳映真訪談〉（2001年11月27日），收於《兩岸三地名家訪談》，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可見得，陳映真把七〇年代台灣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以及以《夏潮》為中心的思潮，看作是「台灣第三波左翼運動」。

在赴北京講學前夕，陳映真花了極大的心血編輯出版的保釣運動35週年文獻選輯《春雷之後》三卷本<sup>28</sup>中，也把有關鄉土文學論戰的文章編入，更印證了陳映真把鄉土文學論戰視為台灣第三波左翼運動的重要想法。

#### (六)「紀念楊逵〈和平宣言〉投獄、『四六』事件50週年」文化、文藝晚會

1999年4月5日、6日兩晚，由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人間出版社、夏聯會、勞權會聯合主辦了這場盛大的文藝晚會。晚會有演講、詩歌朗誦、演唱、合唱、演劇、鋼琴獨奏、紀錄片、幻燈報告。以多彩多姿的文藝形式紀念了1949年楊逵〈和平宣言〉中，左翼的民族和平、民族團結的精神；以及在1949年國共內戰的戰火中，作為全中國「反內戰、和平、民主」運動一環的台灣學生運動。

會上陳映真講述了〈楊逵「和平宣言」的歷史背景〉，並與曾健民共同以幻燈報告的方式，報告了〈四六事件的大歷史背景〉。

#### (七)出版「人間思想創作叢刊」

1997年對陳映真來說，是忙碌的一年，也是在思想實踐上多彩豐實的一年。從這年開始，因為與他一起工作的朋友，如橫地剛、藍博洲、曾健民等，在有關台灣日據末期到光復期（四〇年代）的歷史、文學、文化史料調查研究上，有許多重大的突破和發現，陳映真在台灣

28 釣統運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厚達兩千六百多頁，2006年7月人間出版。

文學史論上出現了飛躍的進展；並透過新掌握的文學史論連繫到台灣社會史論，進一步發揮了縱橫無礙的、令人動容的宏大論述。同時，也開始透過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在大陸舉辦了數次有關台灣文學的研討會；以呂正惠為團長，帶著一群台灣的朋友擴大與大陸文學界的交流。

同年的2月，主辦了第一屆的「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陳映真是台灣秘書處的負責人；從此展開了與琉球、韓國、日本的各種市民運動團體和左翼運動團體的交流，以及對東亞各地區的冷戰與國家暴力的歷史和現實有了共同的認識，採取了共同行動。陳映真的思想實踐擴大到東亞民眾運動的範圍，與東亞反美日帝國主義、反國家暴力、追求東亞和平與人權的歷史運動站在一起。

接著：

4月，接受了中國社科院「榮譽高級研究員」的頒授。

7月，舉行了前述的「香港：一個半世紀的滄桑」活動。

10月，舉辦了「回顧與再思：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年」研討會。

翌年1月，在北京與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中國作協共同舉辦了「呂赫若作品研討會」，發表了〈呂赫若的冬夜〉。

陳映真思想實踐的範圍，再一次的飛躍，擴及東亞(日、韓、琉)、中國大陸、香港甚至東南亞。

在舉辦了「鄉土文學論戰20年」研討會後，研究會曾進行了活動的檢討。1997年12月22日，陳映真、呂正惠和曾健民等在研究會上討論了創辦季刊或雜誌的問題。依據我的筆記，陳映真大概做了這樣的總結：

要辦成一個有權威性的左統指標性刊物；編輯部要先統一自己的思想，一定要有一條主線，充分準備後再出發，出發後要連續



出擊；並且要善於廣泛團結其他進步的朋友和力量，議題一定要與現實結合；對大陸的問題要關心，要跟大陸知識分子在知識、思想方面交流，適度地對大陸思想界提出批判；有意識地發展成言之有物的思想中心，全方面地面對兩岸、亞洲、第三世界的問題。<sup>29</sup>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5月3日，經由藍博洲的引介，日本福岡的民間學者橫地剛等三人，來研究會進行了交流。從此橫地剛在關於四〇年代史(台灣光復前後史)方面，在新的史料和觀點上給予陳映真和研究會很大的幫助和突破。譬如，有關黃榮燦、范泉、楊遠、歐坦生……等人物的新史料出土，以及這些人物在台灣戰後初期的文化、文學上扮演的重要歷史角色等。諸如這些，全都化成了「人間思想創作叢刊」以及人間出版書籍的點點結晶。

1998年，以叢書的形式而非雜誌的形式，出版了「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的第1冊：《清理與批判》。封面和內頁的攝影報導一直維持著《人間》雜誌的風格。如封面所呈現的，這本書的主議題是對台灣皇民文學和鄉土文學的清理與批判。刊登了「鄉土文學論戰」20周年研討會的論文以及相關文獻；同時，刊登了「台灣皇民文學和理論」的批判特集。

在〈出刊報告〉中，陳映真指出：

「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是想要對戰後民族分斷、台灣反帝民族解放傳統的毀滅、軍事國安國家的形成和支配、反共獨裁下的資本主義發展、在美國制霸的世界秩序下的「現代化」，美國化菁英

29 引自1997年12月22日「鄉土文學論戰20年」研討會的活動後，檢討會議上陳映真的發言。

知識分子的出台，和台灣本地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形成等，做出所能及的思考、創作和清理。<sup>30</sup>

從結果看來，叢刊的主線一直針對戰後美國冷戰和民族內戰支配下的台灣歷史闡部，或者說，對另一條被體制湮滅、「專制」「噤啞」的戰後歷史，進行系列的「清理和批判」。「清理」是使「噤啞」的歷史復現，「批判」是通過復現歷史對現實進行歷史性的批判。

對於曾親身經歷過，長期間一直是神祕、恐懼竊語的歷史的錘煉的陳映真來說，從這裡再出發也是必然的。

一直到2006年，陳映真主編的這11冊叢刊，一直很清楚地畫出這一條復現「噤啞」歷史的主線。而且，由於文學是現實最集中、最形象的反映，因此，叢刊也一直以文學思潮的復現和論述為主調，當然文化、政治也是有一定的比重。

第2冊是1999年秋季出版的《噤啞的論爭》。作為該期的「增刊號」，同時也出版了陳映真和曾健民合編的《1947-1949年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該書全面出土整理了被稱為台灣文學史上三大文學論戰中的第二次論戰——「橋副刊」論戰，或者也可稱之為「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戰（第一次是1930年前後的「台灣白話文論爭」，第三次是1970年的「鄉土文學論戰」），書中共收入了論戰的50篇文論。圍繞著這場文學論爭，陳映真在《噤啞的論爭》上，分別以石家駒、許南村、卓言若的筆名，寫了四篇大文章，以「馬克思文論在台灣的中挫」為「特集」的題目。他還特別親自到昆明去，尋訪了在論爭中以「駱駝英」筆名，在《台灣新生報》的「橋副刊」上，發表總結性文論〈論台灣文學諸論爭〉的羅鐵鷹的生平蹤跡，並為此寫了〈兵士駱駝英的腳蹤〉。該期叢刊的

30 引自1998年12月《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創刊號：清理與批判》之〈出刊報告〉。

另一議題是——繼續發展皇民文學的批判。

也同在這一期，刊出了陳映真文學創作再出發的第一篇小說〈歸鄉〉，這是他間隔了12年的新作；顯示了陳映真已找到了思想的出路，有了新的豐潤的思想「騷動」。

這前後，陳映真推動了幾次大型的活動：1998年8月，在韓國濟州島，為「濟州·四三事件」舉辦了第二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的國際研討會。

1998年10月，由中國作協主辦，在北京舉行了「黃春明作品研討會」。這個會對陳映真的文學創作再出發有很大的影響。

1999年4月5至6日，在台北耕莘文學院，舉行了紀念楊逵因〈和平宣言〉投獄及「四六事件」50週年的大型文化活動。1999年11月，在琉球，以「反美軍基地」為主議題，舉行了第三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在會上，陳映真發表了〈台灣當代歷史新詮〉。

2000年12月出版了叢刊第3冊《復現的星圖》。這期間陳映真有三方面的突破：首先，是有關台灣光復期文學史方面的突破：幾年來橫地剛對於一直無人知曉的戰後初期兩岸文化文學交流情況，以極大的熱情投入研究。先是，他復原了大陸來台木刻家黃榮燦的生平及藝術、文化活動蹤跡，並結集為《南天之虹》<sup>31</sup>；同時，他揭明了戰後初上海散文家、編輯家范泉與台灣文學的關係，出土了范泉有關台灣文學的重要評論；同時發掘了在范泉主編的《文藝春秋》上，歐坦生（來台後，五〇年代起以丁樹南筆名活躍於文壇）描寫二二八及光復初社會不平等狀況的重要小說——〈沉醉〉、〈鵝仔〉；陳映真為此出版了范泉的

31 橫地剛著，《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陸平舟譯，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初版）。

散文集《遙念台灣》<sup>32</sup>，以及歐坦生的小說集《鵝仔》<sup>33</sup>。陳映真曾懷著對歐坦生的敬意，於2000年9月，同我一道搭飛機到台南市拜訪了歐坦生，寫成了〈掌燈〉的訪問記。<sup>34</sup>另外，曾經為了追尋歐坦生的身分之謎，又促成藍博洲編了「藍明谷專題」，把藍明谷的作品和生平做了完整的呈現（藍明谷於五〇年代因基隆中學光明報案，遭刑殺）。<sup>35</sup>

第二個突破是：陳映真從2000年7月開始，在《聯合文學》連續刊登了三篇批判陳芳明的對於台灣新文學的建構與分期的文章。<sup>36</sup>他發揮了有關「台灣社會性質」的深刻認識，以及10年來對台灣新文學的新而全面的掌握，論破了陳芳明對台灣新文學論的虛構。

第三個突破是：陳映真發表了小說〈夜霧〉。這篇小說的大現場背景，是2000年台灣的政黨輪替，50年來長期一黨專政的國民黨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以分離主義為政綱的民進黨陳水扁當政。在這世紀之交的台灣政黨交替劇中，對於50年來的「反共戒嚴」體制並沒有絲毫的根本性批判。陳映真用文學的形式反映並批判了這個真實。

這一年的8月，在陳映真的推動下，中國作協在蘇州舉辦了「台灣新文學思潮1947-1949研討會」。該會有大陸、台灣學者5、60人參加，也邀請了當年參加「橋副刊」論戰的老人孫達人、朱實、呂宋、蕭荻、方生等人與會，使該會益添歷史的真實感。這些老人的發言和證言，構成了第4期叢刊的主題和書名《那些年我們相遇在台灣》。這個會也促成了由呂正惠、趙遐秋主編，兩岸台灣文學史研究者共同合作寫作的《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的出版。該書於2002年在北京出版，同

32 范泉（徐煒），《遙念台灣：范泉散文集》（台北：人間出版社，2000年初版）。

33 歐坦生（丁樹南），《鵝仔：歐坦生作品集》（台北：人間出版社，2000年初版）。

34 陳映真訪談歐坦生，〈掌燈〉，載於《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0秋季號：復現的星圖》。

35 「藍明谷專題」同載於前引註。

36 三篇文章分別刊載於《聯合文學》第189期、第191期、第194期。

年6月人間出版社出版了繁體字版。這本書創下了兩岸研究者共同寫出版書刊的首例，也可說是範例。也許因為這個關係，後來趙遐秋被民進黨政府列入禁止入境台灣的黑名單，據說理由是：「對台灣不友善」。由此可知，所謂「民主、自由、人權」是有相對條件的；也印證了陳映真說的：「被支配性意識形態霸權專政」這句話的真實意義。

從「人間思想創作叢刊」和人間出版的相關書籍，再加上陳映真推動的文學活動內容來看，登場的歷史人物有：呂赫若、楊逵、藍明谷、朱點人、雷石榆、歌雷、歐坦生、朱實、黃榮燦、張光直……等人；這些作家、藝術家，包括他們的生命、作品和思想，都在五〇年代的冷戰、內戰的反共狂飆中犧牲、遭監禁、或逃出台灣，自此長期遭湮滅；如果再包括「橋」論爭的思潮在內，它是一條被湮滅的台灣進步的左翼的文化和文學的歷史，而且是一條省內外進步知識分子，共同攜手創造的進步文化的歷史。陳映真使這可稱為台灣第二波左翼文學、文化運動的歷史，從冷戰內戰的歷史閹部中復生，成為一股對台灣的歷史和現實最徹底和根本的批判力量。

這些都與陳映真在23歲的牯嶺街與中國三〇年代左翼文學和思想的相遇；接著在31歲的泰源、綠島監獄，與「被殘酷的暴力所湮滅的，卻依然不死的歷史」相遇一樣，都成了陳映真最深層的感情熔岩和思想磐石。

#### (八)主辦「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

這個國際研討會是因為在九〇年代初，曾遭受34年的白色恐怖政治牢獄的林書揚先生，與坐過南韓政府10年政治牢獄的在日韓裔徐勝先生的相遇而促成的。他們的相遇，象徵了東亞各地戰後冷戰與國家暴力的支配下，50年間被分裂被湮滅的東亞歷史的相遇；這個相遇，促成了台、日、韓、琉四地反美日東亞冷戰與國家暴力的民主人士、

社運團體的第一次交流與合作。於是共同商定，由四地分別各自組成研討會的事務局，輪流主辦這個國際研討會。台灣方面，主要的推動力量來自「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而由陳映真負責組成台灣秘書處（不用日語的「事務處」）負責推動，作者有幸參與了秘書處的工作。

這揭開了東亞四地區，反帝反國家暴力與追求東亞和平與人權的民眾與團體，首次合作的歷史性序幕；共同攜手清理帝國主義與冷戰、國家暴力所造成的戰後歷史的闇部，而且互相支援、共同對抗蘇東波後東亞新冷戰在各地所造成的新問題。

台灣秘書處於1997年2月21至24日，在台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辦了第一屆會議。台灣、日本、韓國、琉球四地共有260人參加。通過學術研討會（包含開幕詞在內，共有16篇論文）、文化座談會、歷史證言會、對犧牲者追悼會，以及到六張犁、鹿窟的實地學習，大家進一步認識到：台灣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韓國濟州四三事件、琉球美軍基地問題、中國兩岸分裂和朝鮮南北分斷、日美安保體制等，本來在四地各別面對的重大歷史或現實的問題，並非彼此孤立的，而是有東亞戰後史的共通性和關連性。而這個共通性，就是東亞的日美帝國主義、冷戰與國家暴力的支配和反抗的歷史。通過研討會和人的交流，打破了冷戰的國族和意識的疆界，增進彼此共同的歷史感；並以此為基礎，共同面對東亞新冷戰的新問題。

陳映真在會議的〈旨趣書〉中指出：

從戰後世界史的視野看待，五〇年代大規模的國家暴力在台灣的展現，絕非孤立的歷史事件……要把台灣的「冷戰—戒嚴」結構放在東亞冷戰的宏觀背景中來看，才能掌握開啟五〇年代各國由政府發動的恐怖主義內幕的鑰匙。……對台灣來說，將台灣戰後特

殊的歷史與東亞冷戰的普通歷史結合起來……才能踏出本土意識感情論，道德論的框框。……獲致科學的本質的認識。<sup>37</sup>

台北的研討會後，接著連續在各地以各地的主議題召開了五次會議；它們是：

- 1998年8月21至24日，在韓國濟州島，以1948年發生的「濟州島四三事件」為主題。
- 1999年11月26至29日，在琉球那霸市，以「反美軍基地」為主議題。
- 2000年5月18日，在韓國光州，以1980年發生的「光州事件」20週年為主議題。
- 2002年2月22至25日，在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以「舊金山和約與日美安保50週年」為主議題。
- 2002年10月17至20日，在韓國麗水，以「韓戰時期的麗水、順天事件」為主議題。

每一屆會議都有來自四地區200名以上的人參加。雖然經費並不充裕(以共同分攤的方式)，但熱情克服了各種困難；背後各地事務局的工作最繁重，不但要彼此分担各國論文三種語言的翻譯，會場上更要維持三國語言的同步翻譯工作。雖然在會議的事務協調中，會出現彼此相左的意見，但在文化交流節目上，大家共同手拉手歡唱，最後齊唱同調不同語的「國際歌」，高昂了大會的國際團結的精神。六次研討會共積累了一百多篇的論文、歷史証言和報告，是東亞民眾歷史的

37 引自1997年2月21至24日台北「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之〈旨趣書〉。

共同無價之寶。

在第二屆濟州島會議，韓國事務局把研討會名稱改為「東亞和平與人權」國際研討會，並邀請了當時東帝汶獨立運動領袖賀爾他進行基調研講；賀爾他在講詞中有對中國大陸的不當措詞，為此在事務協調中曾發生了意見不一致之處。因此，陳映真在研討會最後的呼籲文中，特別針對「和平和人權」的問題，發表了台灣秘書處的看法。特別在關於「人權」的問題上，他表示：

對於第三世界而言，人權絕不限於個人的公民權治權。我們認為人權是歷史發展過程的產物。<sup>38</sup>

他申述「人權」應該包括：民族自決權、經濟發展權；教育、保健、食物、住房、就業、社福和收入的公平機會等權利；婦女權、勞工權……等「集體人權」。

而且「人權」應涵蓋：

主權國家有權按照自己的歷史、傳統和國情選擇適合自己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經濟社會發展模式。<sup>39</sup>

在第三屆琉球會議上，陳映真發表了〈台灣當代歷史新詮〉，在結語中他表示：

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主統一，是一個歷史久長的台灣反帝民族

38 引自1998年8月21至24日韓國濟州島「東亞和平與人權」國際研討會台灣秘書處的呼籲文。

39 同前引註。



解放運動的歷史傳統。我們要積極清理東亞冷戰的歷史；清理東亞冷戰和美國支持的法西斯國家所遂行的暴力和民族分斷的構造。我們反對美國在東亞的武裝駐軍；反對美國軍事基地在東亞所造成的危機和傷害；反對美日安保新指針……反對美國干涉下朝鮮半島長期分裂……都是從我們在台灣的當代史中，身受美帝國主義的新殖民地化和民族分裂化的生活具體經驗中得來的結論和經驗。<sup>40</sup>

### (九) 走在台灣左統運動的前頭

一個完全獨立於社會、脫離時代的思想是不存在的。任何思想必定帶有一定的社會性、歷史性，從而必定有或多或少的政治性。要談陳映真的思想，如果忽略了它與政治的連繫，那必然是空泛的；因為陳映真思想的形成，從一開始就是在政治高壓下開始的，與政治是不可分的。陳映真思想實踐的獨特之處，就在於他勇於從事政治的行動。從八〇年代起，陳映真經常走在政治抗爭運動的前頭。

1988年4月4日，正是解嚴後且台灣統獨開始分流不久的時候，在陳映真和一些熱心朋友的奔走下，成立了「超黨派民間組織」的「中國統一聯盟」，陳映真擔任創盟主席。陳映真草擬的〈統盟宗旨〉是：

促進民族內部的團結與和平，建設民主統一國家。<sup>41</sup>

其目標是：

終止國土分裂和民族分裂的悲劇；實現國家的民主統一、促進民

40 〈台灣當代歷史新詮〉，發表於2000年11月26至29日琉球那霸國際研討會。

41 引自「中國統一聯盟」的〈統盟宗旨〉。

族內部的和解、團結與和平；建設民主、富足、統一的新中國；再造進步的、現代的、中國新的文明；對世界和人類的進步、和平、正義與發展，做出中國人應做的貢獻。<sup>42</sup>

這也是陳映真在政治上最高的心願。二十幾年來，陳映真總是堂堂正正地走在中國統一運動的最前頭。一直擔任統盟的常委，2007年統盟執委全體通過共推陳映真為榮譽主席。

對於台灣的左統運動，陳映真有這樣的清楚看法：

從政治上論，他認為大陸與台灣的分裂，在日帝下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在韓戰後是美帝國主義干涉的結果。台灣的左翼應該以克服帝國主義干預下的民族分斷，實現民族自決下和平的統一為首要的願念。對於大陸開放改革後的官僚主義、腐敗現象和階級再分解，他有越來越深切的不滿。但他認為這是民族內部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從來和反對外力干預，實現民族團結與統一不產生矛盾。（〈後街〉，洪範版散文集1：頁65-66）

以上簡單介紹了我們所知的，陳映真在九〇年代的活動和思想。只可說是皮相的、雜駁的試談，希望能給大家提供一點有關九〇年代陳映真的初步印象，以作為進一步研究陳映真的參考。

42 同前引註。



## 討論與對話

夏林清 主持

張瑜珊、林家瑄 錄音整理

王墨林 | 鄭鴻生這篇論文滿重要的，因為我們通常很關心社會、思想，卻很少關心文化。這篇文章的好處在於援引了六〇、七〇年代的脈絡，且用了「文藝復興」概念作總結，但對台灣所謂的文藝復興，我個人有點小小質疑，因為這裡面有個戒嚴的問題。藝術家的藝術心靈，尤其是藝術與社會的關係，到底在那個時候要用什麼樣的話語表現？我想當時還是有一定的限制，像論文提到的林懷民、蔣勳，或是沒提到但當時已經出名的邱坤良，從這些文藝青年的典型來看，他們如今的保守性甚至自我菁英化以及與民間社會的疏離是非常清楚的。八〇年代解嚴前夕的台灣小劇場運動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行動劇場」與「報告劇」，而「行動劇場」與「報告劇」都是在《人間》雜誌辦公室被策劃出來的。所以，我覺得鄭鴻生把六〇、七〇年代整理得非常好，可是假如沒有加上八〇年代的話，這個文藝復興的脈絡建立不起來。我們真正要脫離40年來整個戒嚴的意識形態才算是文藝復興，才可以被書寫成為看到一個台灣社會文化發展的脈絡。

邱士杰 | 從昨天到今天，大家都提到陳映真思想的危機問題，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八〇、九〇年代也不斷地在論戰，比方「台灣結」與「中國

結」等等一系列的論戰，有論戰代表他有一定的想法與堅持。如果危機存在的話，那麼到底是那個時段呢？還是說他不斷地在危機狀態之中？但最明顯的是1989年到1992年之間是空白的，而這是曾健民老師與陳映真先生一起工作的時候。您能不能談一談他的社會性評論，他的具體想法？有沒有什麼是他希望我們後人延續的？

**白永瑞** | 我很好奇陳映真先生怎麼看待1980年以後中國的情況？尤其是賀照田怎麼看待他的看法？這是我的問題。

**呂正惠** | 補充一下我所知道台灣老左派的危機是兩次，第一次是鄉土文學，第二次是1989年的時候。

**陳光興** | 我還被一些事情干擾著，就是「到底陳映真是不是黨員？！」我覺得關鍵都在之前引用〈後街〉的那一段，所以我認為他是在獄中被吸收成「精神黨員」。換另外一個方式來講，有點像是他坐在前面，後面有一大批人像佛一樣在他背後施加一大堆的武功在他身上，所以出獄之後，他其實承擔了這一整批黨員的——佛教用語叫「加持」。但我覺得他到底是不是黨員已經不重要了，而是他承受了一整代人放到他身上的東西。那為什麼會放到他身上？也許因為他本身已經是個有名的作家，大家對他有期待。也許是這個原因，造成他後來對關於黨的東西總是小心謹慎地發言。

**徐秀慧** | 當我們談到陳映真是台灣六、七〇年代的左翼作家時，其實郭松棻在海外、在保釣運動時也不斷地關心台灣，文革時也到大陸去，我覺得也是台灣重要的左派作家。他們後來在思考所謂社會主義的出路時，就像陳明忠老師談到的，陳映真覺得「如果由共產左翼推

動資本左翼有多好」；事實上，郭松棻也提到中國要首先要富起來的問題。我想要問的是這些左派知識分子所關心的問題：到底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是什麼？我們對未來的願景到底是什麼？

**鄭鴻生** | 先謝謝墨林的提問，我有兩點回應。首先，「文藝復興」這個詞確實是誇張的，我故意用這個詞，因為台灣的六十年代（就是我所描寫的1960至1970年代之間）跟七〇年代確實是需要重新把它抓回來，那是一個光明的起始。第二點，確實也沒錯，八〇年代由《人間》雜誌開始的行動、報告劇場及很多藝文活動也似乎才是真正開啟了思想解放；但我在文章裡也強調，起源基本上還是在六十年代，而推動行動劇、報告劇的這些人就是成長在六十年代，所以我強調六十年代的重要性是在這一點。當然，也許有比「文藝復興」更好的名詞來概括那個年代，我希望各位或者是王墨林兄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名詞。

**賀照田** | 對於白教授的問題我想先簡單回應。陳映真對第三世界的理解，我自己覺得他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他提到了對於第三世界的看法受到大陸影響，但是他最早認為第三世界主要是台灣應有的自我意識的視野，到了八〇年代，他認識到第三世界分析的視角對大陸的把握也非常重要，但是我覺得到了九〇年代之後，第三世界論述對他變得更加重要，因為大陸經驗主要在第三世界的視角裡，而且要從第三世界整體實際的歷史當中抽取他講的所謂人民性和價值意義的問題，所以第三世界論到後來對他產生特別大的意義。但陳映真有個一直都沒有完成的工作，就是重新以第三世界的視角分析中國大陸的歷史。這涉及到我和陳光興在2005年9月12日跟陳映真見面，陳映真當時跟我們說了很多話，但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一個革命的地方，怎麼最後歷史會變成這個樣子？」他這個話應該要怎麼理解？陳映真到

九〇年代之後，若第三世界變成提供意義與歷史分析的視角，從這樣的角度看，當然必須要進行某種歷史性的工作——但陳映真沒做，陳映真說他那個時候回到大陸，就是想就近觀察與閱讀。所以這個問題對他來說，始終在觀念上有個想法，實際上卻還沒有做。

另外涉及到台灣的問題，王安憶提到陳映真在八〇年代和劉賓雁的見面，但可惜她沒有注意到陳映真和劉賓雁當時的差別。陳映真在自我整理時，基本上從兩個問題群設想，一是民眾文學論，一是民族文學論。我們從這兩個問題群的視角來看，八〇年代陳映真有關於民眾文學論的地方，尤其他關於中產階級還有對於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分析，他對弱者、《人間》的處理方式，這和他的民族文學論在八〇年代是相互滋養互補與映照的關係。但是到九〇年代之後，這塊沒有特別發展，而是主要往民族文學論發展。陳映真後來的構想是：在某種滿足反帝、反封建等種種條件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建造一個民族資產階級。他這個想法比毛澤東的新民族主義論都退了一步，如何理解這退了一步？其實和陳映真八〇年代理想主義的認識、人民性的認識（其中的關鍵是中產階級的認識）有關，但這個部分在台灣始終沒有特別整理。

**曾健民** | 邱士杰在日前《文訊》主辦的研討會上提出過一個很艱難而現在我也沒辦法清晰說明的問題，也就是陳映真在九〇年代以後最在意、一直想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台灣社會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社會？」更具體來說就是「台灣社會性質論」的問題。關於陳映真「台灣社會性質論」的整理與討論，第一篇論文其實就是邱士杰在那一場研討會發表的，他問到「陳映真的台灣社會性質論的結果是什麼？」實際上，陳映真在2006年6月到北京，到了北京就倒了下來，在行前好幾次跑到我這邊來討論說，我們把「台灣社會性質論」搞了十幾年，是不是應

該把它寫下來，我們嘗試了，可是還是沒有完成。可見這個問題對陳映真而言從九〇年代之後是個中心。

我大略地說說陳映真的想法，在我與陳映真一起搞的「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每一週的筆記裡，有記錄1998年3月26日陳映真的一段話，他是用假設句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台灣社會是新殖民地社會，那麼，變革的方法，要以民族主義去克服；如果台灣是資本主義社會，且在階段上已進入獨占資本主義，那麼，就屬於社會主義的變革了。」因此他認為台灣社會的性質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新殖民主義，另一個是資本主義。新殖民主義就是要用民族主義來克服，這是為何陳映真被放在中國民族主義者這邊；資本主義就要社會主義來克服，這就是為什麼陳映真是左統。

**邱士杰** | 剛剛賀老師提到的民族資產階級是陳映真很有趣的一個現象，如果抽象起來看的話可能意義比較低，但如果放到他反對封建主義的論述中看就很明顯，他談民族資產階級是與他對改革開放的看法完全相反，一方面是他反對改革開放，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資產階級統一中國。所以到了2000年時，他在杜繼平新書的序裡頭明確提到自己看法改變了，他覺得是應該是兩岸無產階級的合作，要靠這個來統一，這和他之前的看法是很不一樣的。

**鄭村棋** | 陳光興剛提到關於陳映真到底有沒有實質上黨員的身分，他當然不是一個實質上的共產黨。我的回應是，要討論台灣左翼的歷史與傳承，包括剛才講的那幾波——七〇年代一些朋友從海外回來參加島內的鬥爭，工黨失敗之後建了勞動黨等——其中有個問題是，這些海外回來的朋友、牢內的老同學，以及《夏潮》、《人間》這些朋友的合作問題。我記得當時我提出的關鍵是：「到底能不能批判中共？」昨天



在這個會場上一直提到，為什麼左統在台灣不能批判中共？似乎因為中國共產黨在台灣已經長期被污衊、醜化以及妖魔化，在這種情況之下批判，不是給台獨或國民黨更多子彈來打擊嗎？可是我當時講說：「中國共產黨不是神，他們也會犯錯，如果有些錯誤迴避了不能批判，我們在台灣是沒有辦法立足的。」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批判怎麼會是跟國民黨式、民進黨式、那些英美獨派人的角度一樣呢？如果沒有一種不同的聲音，反而會被淹沒。可是當時他們就非常堅持不能批判中共，我對這樣的堅持是非常不能理解的。昨天一直提到他們在島內的「不能講」，甚至陳映真也說到了中國大陸偶而會講，但是島內的不能講，是雙方不能合作的一個重要關鍵，那個「不能講」到底是什麼？後來在工運的鬥爭裡面，對於我們來講大概有三股勢力：跟勞動黨這個勢力大概是可以合作，也有尖銳的鬥爭，但是不能結為同志；另外跟所謂的勞工陣線，當然是接近一種敵我鬥爭的關係。

事實上台灣左翼還有很多需要補課（把三〇年代到舊俄的東西一路補課過來，包括工黨失敗的前因後果），除了對於社會性質在理論上的強化與深化之外，另一個是組織生活、民主的過程，這是非常困難的。我們跟群眾長期在國民黨閹割之下是不可能接觸的，若有些機會下去組織群眾，會是非常重要的課程。在裡面鍛鍊磨練也是補課的一部分，這個東西在島內很多老同學被殺，只有少部分殘留下來之後，一直沒辦法有比較明確的政治活動。所以在工黨組織時，一下子要面對島內外各種政黨的操作，很快就失敗了，這些慘痛的經驗事實上也都沒有機會再回顧。總之剛剛提到陳映真是否為黨員，當然並不是實質上的重要，而是那個部分影響了後來的合作。

還有一部分是更早的時候，島外釣運的一些餘韻也影響到後來島內的合作。釣運後來分裂了，除了劉大任這批之外，還有一批以當時中共黨中央唯命是從的官府派，跟另外一些人產生很大的爭議。所以

後來在海外因為開讀書會而被影響到回來島內搞運動的人，基本上非常痛恨這派（以中共黨中央唯命是從），所以對島內像《夏潮》、左統，也被認為是如果對中共唯命是從，對於島內要開展其他的左翼運動是一個非常大的反叛，所以有一派是非常堅決台灣的左統是完全不能接受。我們是比較好一點，認為可以合作，但是要結合為同志……反中、反共、反中共基本上是不太一樣的，反中共的話是要反哪一個階段的中共？早年的中共，還是當前的中共？這些問題如果沒有一個比較仔細的討論，下一階段要怎麼開展，怎麼合作，還是有很多的障礙。

**王超華** | 我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剛才講陳映真到底有沒有危機？我很奇怪為什麼說中美建交不會對他社會主義的信仰產生危機？因為在中國大陸內部其實是引起了對於意識形態的不信任、拋棄的作用，這是我還不了解的。另一個問題是王安憶文章的最後結尾，我也覺得好奇，為什麼《人間》突然結束了？

**呂正惠** | 我覺得老鄭（鄭村棋）對老左派缺乏同情，因為他們其實活得很痛苦又不能表現出來，他們不知道怎麼辦。我問過陳明忠在反分裂那時候的情形，他說那個時候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他面對很多變局都是他們從來沒有經驗過的，他們都很苦惱。我是很同情他們，如果將來有機會，我會把陳明忠那段話整理出來。第二個，《人間》的發展，很簡單，沒錢。已經虧了好幾期，陳映真跟我說：「嚇死了，虧到沒辦法。」就這麼簡單。

**曾健民** | 《人間》為什麼會停刊？呂正惠已經說了，很簡單，就是沒錢。沒錢是什麼意思？陳映真曾經很意象地形容過：「《人間》出刊、印刷這麼精美，必須要靠廣告；但那些廣告主後來看到你寫的、表現的

東西是在批判他們的東西，怎麼拿得出錢來呢？」這個是最重要的，這是台灣資本主義社會裡文化生產的困境。不然的話就搞「同人誌」，陳映真九〇年代之後就是自己出錢自己印，不要廣告主。這個就是所謂「民主自由社會」的真義。

第三世界



# 陳映真和馬華(民族)文學

莊華興

## 一、前言

陳映真和馬華文學有什麼關係？乍看這個問題似偽問題。然而，若把陳映真置於第三世界文學的討論脈絡，毋庸諱言，他對馬華文學的觀察和建言凸顯了他的重要位置。陳映真不但關心第三世界文學，對第三世界華語文學尤為關注。就筆者所知，他曾兩次公開造訪馬來西亞，一次在1995年4、5月間，第二次於2003年12月杪出席《星洲日報》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頒獎儀式。若包括他和「在台馬華文學」以及其他馬華學子的接觸，則不止兩次了。跟其他台灣文化界人士如南方朔、詹宏志、蔣勳、吳淡如、劉墉、余光中、龍應台等比較<sup>1</sup>，他和馬華文學／文化界的關係不同之處，在於他對馬華文學場域介入之深。簡單說，前者夾著文化明星效應，留下的往往是浮淺短暫的轟動(或騷動)，最終風過了無痕。後者的言論卻沉潛於馬華文化底層，並逐步發酵，時機成熟將發為有意義的討論。這跟七〇至九〇年代香港作家李

1 另一層關係來自台灣學界，主要因研究馬華文學，或更貼切說，因研究在台馬華文學而進入馬華文學場域。其人數雖不多，卻頗能發揮影響力，著名的有李瑞騰夫婦。他倆對商晚筠小說的研究頗有建樹。

怡在新馬的影響大體一樣。

## 二、馬華文學的誦友

目前有關陳映真與馬華文學的文獻含演講紀錄兩篇和文學獎評語三篇(包括文集序文)，以及一篇得獎感言。兩種性質的文獻分別代表兩個人生階段及不同身分背景——從解嚴前後的演講者和評論者身分，到2005年做為得獎人，從中揭示了他對馬華文學漸進的認識過程。茲按年分把有關文獻臚列如下：

- (1)〈第三屆旅台大馬現代文學獎之小說組總評〉(1985)
- (2)〈40年來台灣文藝思潮演變初探：在馬華青年會中的講話〉(1985)
- (3)〈第三屆旅台大馬現代文學獎評審講評〉(1985)
- (4)〈敬意與祝願：序南洋文藝1995小說年選〉(1996)
- (5)〈我對馬華文學的觀感〉(1999)
- (6)〈第二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得獎感言(2005)

以上六份資料，一方面揭示陳映真對馬華文學的觀察與建言，同時也藉此提出他對漢語圈文化共同體的願望。這與他的中華民族文學的理念是頗一致的，也符合中華世界給他「海峽兩岸第一人」的稱謂。

陳映真與馬華文學的首次接觸並不容易斷定。若以他於1985年為第三屆旅台大馬現代文學獎擔任小說組評審為起點，時間上應該不會相距太遠。同年，陳映真和幾位年輕朋友籌劃創辦了《人間》雜誌，同時積極參與解嚴前後一波接一波的社會運動。他對社會的關懷，從之前的筆墨春秋到實際參與，誠為一大轉變，這也說明何以他對馬華文

學表示關心。在〈評審講評〉中，陳映真對馬華學子提出了他的建言：

也許，在台灣你們常常聽到這類言論，說你們是中華兒女應該要發揚中華文化；我想：這對你們不一定是好的，對整個大馬人民來說也不一定是公平的。本來，你們今天在這裡受教育，對中國文化感到興趣且引以為榮，這是非常自然之事，同時也是你個人的權利，但是從長遠角度來看，若你們想永遠留在馬來西亞生活及繁衍子孫，且教育下一代，則需對馬來西亞的文化要有所認同，且承認自己是馬來西亞人，是這個國家的公民，而不是炎黃子孫。(1985c：239)

顯然，在陳映真眼中，國家認同超越族群身分認同，或說國家認同可以決定族群身分的認同。換句話說，在文化身分上，華人需認同包含多元民族文化元素的馬來西亞文化；政治身分上，則需承認自己是馬來西亞人。這是國家主義意識形態下的民族國家理念。這反映出陳映真對海外(相對於中國、台港澳)華人的基本觀點，與他的兩岸關係立場頗為契合，也是中國官方自1955年萬隆會議以後的立場，並反襯出他和國民黨的華僑觀點的基本差異。從長遠來看，選擇落地生根，就必須有明確的國籍身分和文化身分，而華人文化必須與當地文化融合；作為馬華作家，「應該發展出屬於你們獨特的大馬文學——漢語文學」(同前引)。以國家意識為大前提，陳映真也提出大馬華人參與建國應有的省思：

處於大馬這種多元文化的國度裡，你們的文學往何處去呢？……應該深思探討你們的創作是否真正深刻反映大馬人民的心聲和問題？另一方面，你們也必須勇於面對你們祖先在大馬有心或無意



所造成的各種錯誤，並且把這些錯誤視為一種借鏡和警惕，同時也作為整個大馬新興民族在國家發展上的共同經驗。唯有對大馬的華人歷史提出嚴肅、獨立的自我批判方能使那邊的華僑從這種惡性循環的命運中擺脫出來；才能真正和這新興的民族國家合而為一。(1985c, 頁239-240)

過去數十年，一般人都傾向於把台灣文學視為馬華文學的補給源頭，就這一點，陳映真提出了「文學自決」的道路：

馬華文學……對台灣文學的過度的傾向，受到台灣的作家、作品和文學運動過多的影響而阻礙了自我的發展。事實上，你們應該向台灣深入介紹馬來西亞華文和巫文文學，讓台灣的文學界理解作為第三世界文學之一環的馬來西亞文學，相互影響、相互交流，也相互豐富，而不是一面倒的介紹和模仿台灣文學。台灣文學有它的成就面，但也有它的缺點。例如膚淺和惡質的西化；例如對世界趨勢的缺乏理解；例如對新舊殖民主義和殖民文化的缺乏批判，等等。建設大馬自主的華語文學，其實和認同大馬聯邦，認同大馬人民，認同整個亞洲特性的歷史和命運是不可分的。(1985b: 178-9)

由此可知，陳映真的民族觀是建立在國家主義(state-nationalism)之上，是一種國族身分的嚮往與追求。這與當前處於民間文學形式的馬華文學身分顯然有一段距離，與方修建構的民族文學史亦頗有出入，有關此問題容後再論。

陳映真對馬華文學的評議與他對第三世界文學的思考與認識有關的。1983年，他第一次獲當局批准出境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

作工作坊」。他從南非和菲律賓作家的自白中開始對第三世界作家的處境有更深層的了解(〈對我而言的「第三世界」〉,北京三聯版:頁529-534),在另一篇談第三世界文學的文章中,他交待了掌握第三世界的方法:「第三世界特殊的歷史、經濟、文化和政治的情況,根本不需要什麼『意識形態定位的標籤』,只憑活生生的歷史的、經驗的事實,就可以把握得清清楚楚的。」(〈反諷的反諷:評《第三世界文學的聯想》〉,北京三聯版:頁451)2003年,陳映真出席《星洲日報》第二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受獎儀式,獲獎感言雖簡短,但他進一步提出「以漢字為主要語文的文化共同體」以及「開設一個開放性的、敏於吸收,豐富和發展的世界華文文學的公共領域」,卻和他一貫倡導的民族文學理念相當一致。

### 三、在馬的台灣文學

無可否認,馬華新文學在始源處與中國文學的確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文學史家方修先生把「馬華新文學」的起源界定為「接受中國五四文化運動影響,在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婆羅洲)地區出現,以馬來亞地區為主體,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華文白話文學。」(方修,1972:3)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不僅指新精神、新思想,更重要的是早期文學系統的生成與建構與南來文人/知識分子有直接的關係。南來文人之所以南渡到新馬,往往是出於不得已的緣由。「他們或則出於個人憂患,或則出於為國輸將;總之,萬方多難、劫運浩大的時代,促使他們為了整個民族的存亡而企圖保全一芥性命,竭力救難,從而發揮力量,慷慨呼籲,以『紙彈』配合『子彈』,尋求和平民主的新局面」(林萬菁,1994:12-13)。這些文人,大多棲身於教育界與報界,任華校教師、報社文藝版編輯或主筆,為南洋文化建設奠定了基礎。<sup>2</sup> 1949

2 南來文人在馬華文學場域的出現隨著東亞近代史的變遷而出現三批文人/知識分子遷移

年中共建政，1957年馬來亞建國，這期間大陸的南來文人、知識分子已大幅度減少（詳參林萬菁，1994；郭惠芬，1999）。但馬華文學的外延關係並未中止。一方面它接納了落難香港的第三勢力陣營的文人、作家，另一方面它通過台港書籍的傳播以及文人／知識分子的造訪持續文化傳播之旅。前者填補了馬華文化場域的空缺，在冷戰年代的美援策略下，給馬華文學帶來了現代主義思潮。<sup>3</sup>相較之下，後者的作用雖不如前期作用大，但卻也為域外文化香火的延續起著微妙的作用。數十年間，曾造訪馬來西亞的台港作家文人不計其數。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不時有文人／作家受邀來馬進行訪問、交流與演講。可以這麼說，馬來西亞建國後到此地造訪的文人／知識分子是延續前期南遷作家的軌跡，間歇性對馬華文學灌注資源，陳映真可以納入這個脈絡之中。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台灣文學對馬華文學的影響最初是以離散現代主義文人為先導，通過馬來西亞現代文學組織（如六〇年代末至七〇年代的天狼星和綠洲詩社，以及七〇年代末的神州詩社）毫無反省地進行第二度橫的移植。紀弦、覃子豪、鍾鼎文、痲弦、洛夫、張默、余光中、葉珊等都曾經是馬華現代主義文學接受台灣白話「古典」現代詩的創作與理論資源／支援，現代、藍星和創世紀三個詩社在七、八〇年代馬華現代詩壇並不陌生。其次是來自馬華文學本身的離散現代主義作家，他們大多來自第二代（六〇年代）留台生，如王潤華、陳

---

浪潮。第一批起於1927年4月「寧漢分裂」，因蔣介石發動清黨而有大批作家文人從海南島、汕頭、廈門、上海等各地向南逃難，許傑是這批文人的代表；第二批是在七七抗戰爆發後，而且人數更多，包括成名作家郁達夫、胡愈之、巴人、楊驪等；第三批是二戰後國共內戰期間，作家包括米軍、韓萌、丁家瑞等。

3 筆者在〈誰的疆界：馬華現代文學的文化意涵〉一文中曾就現代主義文學的興起和五、六〇年代的美援策略有直接的關係。而第三勢力文人被友聯出版社指派，從香港南渡新馬辦雜誌、報紙、創立出版社、編纂教科書，幾乎控制了馬華文化的空間（參莊華興，2007：177-200）。

鵬翔、麥留芳、林綠等。大概在同一個時候或更早，有一批在台留學的大陸落難學生，後來繼續南下到馬來亞，他們包括劉國堅(白垚)。第二代以後的留台生繼續從離散現代主義給馬華場域介紹台灣文學，後來白先勇、陳若曦等現代主義作家在大馬深受歡迎，與此不無關係，稍早的則有於梨華、聶華苓等留學生離散文學。然而，這些作家對馬華文學的影響大多在現代主義美學層面，現代核心思想——民族主義——對後殖民脈絡下的馬華作家的影響微乎其微。即便如知名的現實主義作家如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宋澤萊等，對馬華文學雖然不見得有多大的影響，但他們的核心思想如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以及結合鄉土與現實的審美關照，對馬華文藝界的現實主義作者仍然可以找到相互交集的樞紐。下文將把方修和陳映真置於一個平台上討論，主要為了檢驗馬華文學的民族文學的本質與特殊性。

#### 四、陳映真與方修

方修是馬華文學史奠基人，被譽為馬華文學史研究第一人。他的文學史著、兩套大系，以及幾部史論基本上是一部馬華民族誌，讀完大系和《馬華新文學史稿》，基本上已經足以掌握戰前華人的心靈真實。簡單說，閱讀大系和幾部史論，就是閱讀華人先輩紮根南洋的心路歷程。整體進程，可以「地方作家談」、「馬華文藝獨特性」等議題作為註腳。方修的文學史體現了民族文學的三大本質，即集體性、內延性和外延性。

翻開《馬華新文學史稿》，不難發現他著重建構集體意識，而非個別作者的經典化操作。一部大系就是一部集合眾多作者的書寫史(而非作者史)。它結合了各種文學運動——新興文學運動(1927至1931年)、南洋新興戲劇運動(1931至1933年)、大眾語與拉丁化新文字運

動(1934年杪至1935年初)、反黃運動(1953至1956年)等等。這也導致閱讀方修文學史的最大難處——紛繁龐雜的人名，加之時代的隔閡，因而構成閱讀上更大的挑戰。

從三〇年代抗戰文學飽滿的**家國憂患**，到戰後初期對殖民主義及資本主義回潮的憂慮，這些在方修的文學史敘事中都有跡可循。至建國後，因族群政治的抬頭，憂患意識更進一層，終演變成**危機意識**。因此，書寫被賦予更重大的意義，而書寫本身成爲一種**徹底的政治(抵抗)姿態**。這是民族文學史內延性的具體特質。

現代民族的關鍵是國民意識的興起，而作爲一個新興民族的新馬華人自然也不可免。方修建構的馬華民族文學史包含的正是華人逐漸向一個新國民身分過渡的文學史敘事，我們把它稱作前國民意識(*pre-national conscious*)。例如他對槐華愛國主義篇什的介紹。更早則有鐵戈的《在旗下》，雖然那是另外一個歷史軌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方修建構的是國境內的民族文學史，而非國別的民族文學。國別的民族文學強調某種單一語言坐大和霸權地位，一如馬來西亞當下的情況。因此方修的文學史預留了其他民族文學的位置，只因能力有所不逮，因此這個空間有待後人開拓、填補。際此後方修時代，論者往往據此認爲馬華文學既然很早就是離散文學，它拒絕被國家收編，因此是非國家的，即「非民族—國家文學」。這種論述恰恰和方修的論述相反，它沒有外延聯繫(這裡指國家與社會屬性)，所謂文學論述，更多的是虛無主義的政治表述。筆者以爲，在目前階段，馬華文學未到棄絕民族文學屬性的階段，因為：

- (1)它仍然重視身分認同。它一方面加強對民族身分的認同，另一方面也力求它與國家體制均等的關係。
- (2)客觀的壓迫——國內的、國外的——仍然沒有消除。如：中

心一邊緣二元對立思維的坐大，文化帝國主義的擴張等。

(3)它對本土的認同愈來愈強烈。

陳映真的民族觀與思想主軸是對民族苦難的思考與悲憫，他的民族主義是批判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對兩岸造成的分裂，從〈將軍族〉開始，以〈歸鄉〉告一個段落，基本上是政治的民族主義；方修的民族主義卻是對批判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華人身分的蠶食和侵害，是屬於文化的民族主義。在南洋，統獨問題可以從華人對中國情意結和去中國化的拉扯看出來。戰後初期的馬華文藝獨特性論爭代表的正是去中國化的意識操作。顯然，這場爭論觸及的不外乎歷史淵源及其延續性之問題。

陳映真在〈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指出：

先行代抵抗的民族文學家給予我們的教育是什麼？首先，是他們有明顯的歷史意識，他們的文學，強烈表現了整個近代中國抵抗帝國主義的歷史場景，其次，這些作家表現了勇於面對當時最尖銳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問題，不逃避、不苟且，在抵抗中，正面表現了人類至高的尊嚴；再次，他們毫不猶豫地採取具有強烈革新意識和傾向的現實主義，作為他們文學表現的工具。對於台灣先行代民族抵抗作家的再認識和再評價，無疑地將成為新一代在台灣的中國文藝家最好的教材，承傳這一偉大而光輝的傳統，發揚而光大之。（〈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北京三聯版：頁110-111）

民族文學以歷史為底蘊，是陳映真和方修的共同思想基礎，因此，陳映真對馬華文學史的精確掌握就不奇怪了。

## 五、結論

馬華文學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內始終糾纏在經典缺席議題之上，即便在左翼／革命一寫實主義思潮異常高漲的三〇年代。戰前著名的馬華左翼作家張天白曾提出〈馬華文藝界散渙性的補救〉<sup>4</sup>的議題，後來乾脆提出〈馬華何以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sup>5</sup>的質問與反思。郁達夫也在其擔任主編的《星洲日報·晨星》拋出〈幾個問題〉，並提出關鍵性的思想與認識問題，認為它是成就偉大作家的條件：

南洋文藝，應該是南洋文藝，不應該是上海或香港文藝。南洋這地方的固有性，就是地方性，應該怎樣使它發揚光大，在文藝作品中表現出來？這問題實在是一個很重要而亦極普通的問題。文藝，既是受社會、環境、人種等影響的產物，則文藝作品之中，應該有極強烈的地方色彩，有很明顯的社會投影。我以為生長在南洋的僑胞，受過南洋的教育而所寫作的東西，又是以南洋為背景，敘述的事件，確是像發生在南洋的作品，多少總有一點南洋的地方色彩的。問題只在這色彩的濃厚不濃厚，與配合點染得適當不適當而已。地方色彩，在作品裡原不能夠完全抹煞掉而不管，但一味的要強調這地方色彩，而是作品的主題，凡退居到了第二位去的這一種手法，也不是上乘的作風。所以，根本問題，我以為只在於人，只在於作家的出現。南洋若能產生出一位大作家出來，以南洋為中心的作品，一時能好好地寫它十部百部，則南洋文藝，有南洋地方性的文藝，自然會得成立。我們只需向這一方向去努力，修練我們自己的表現力、觀察力、消化力，將來

4 載 1938 年 3 月 25 日《星洲日報·晨星》。

5 載 1938 年 4 月 1 日《星洲日報·晨星》。

當然是有希望的。

(1939年1月21日)

郁達夫所謂的「表現力」大體指語言與藝術技巧，「觀察力」和「消化力」則顯然與思想、認識能力有關，與他稍後建議「選出若干部書，開一個書目出來，教青年去讀讀，如哪幾種是奠定思想基礎的書，哪幾種是叫人寫作的書之類」相互呼應。然而，郁有關思想鍛煉的呼籲卻引發南洋青年的強烈反應，郁達夫不得不作出回應——〈我對你們卻沒有失望〉<sup>6</sup>、〈我對你們還是不失望〉<sup>7</sup>。大作家缺席始終是馬華文藝界經久不衰的話題，一直到上世紀九〇年代，經典缺席議題再度浮出地表，並對馬華現實主義寫作構成巨大的震盪與打擊，奉行此一路線的老作家封筆退隱<sup>8</sup>，從此在馬華寫作人之間埋下了難以弭合的世代分裂與冷戰，至今沒有止息。由此可見，馬華文學面對的是一個亙古的議題——經典焦慮，而作為主導思潮的左翼革命現實主義因受客觀政治敏感性的制約而不敢直面現實時，加之書寫語言的匱乏，任何外力便輕易地把它打垮，以致一蹶不振。

如果當年陳映真的創作理念能繼魯迅之後在馬華發酵，情況或不至於這個樣子。方修把陳映真談馬華文學史的訪談輯入其編著之《新馬文學史叢談》大概也是居於理論支援的需要。方修先生在〈編輯者言〉不無坦白地說：陳映真先生的講話，談到早期馬華文學史的一些段落。雖然說是根據我的作品來推演。實則大都是陳先生的獨到之見，我的研究沒有他那麼深入。(陳映真，1999：3)

可惜的是，台灣文學在馬華場域的流通過於受現代主義思潮的主

6 載1939年1月25日《星洲日報·晨星》。

7 載1939年1月27日《星洲日報·晨星》。

8 黃錦樹稱之為「馬華老現們」，首當其衝者包括備受尊崇的「馬華文學最重要的播種人」(大馬現任作協主席葉嘯語)方北方(1919-2007)、韋葦(1913-1996)等人。



導，構成馬華現實主義作家對台灣文學的偏見，而至交流與借鑑始終無法開展。這究竟是大馬華人主觀上的局限，還是客觀歷史現實的選擇呢？

#### 參考書目

- 方修(1962/63/65)《馬華新文學史稿》(全三卷)，星洲：世界書局。
- 方修編(1972)《馬華新文學大系1：理論批評1集》，星洲：世界書局。
- 林萬菁(1994/1978)《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1927-1948》，新加坡：萬里書局，頁12-13。
- 郭惠芬(1999)《中國南來作者與新馬華文文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陳映真(1983)〈中國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之比較〉，《文季》1卷5期(1984年1月)。
- (1985a)〈小說組總評〉，載《三寶山的遐思：第三屆旅台大馬現代文學獎作品專輯，1984-1985》，台北：第三屆旅台大馬現代文學獎委員會，頁68。
- (1985b)〈40年來台灣文藝思潮演變初探：在馬華青年會中的講話〉，載《三寶山的遐思：第三屆旅台大馬現代文學獎作品專輯，1984-1985》，台北：第三屆旅台大馬現代文學獎委員會，頁175-198。
- (1985c)〈評審講評〉(鍾雪梅整理)，載《三寶山的遐思：第三屆旅台大馬現代文學獎作品專輯，1984-1985》，台北：第三屆旅台大馬現代文學獎委員會，頁239-241。
- (1996)〈敬意與祝願：序南洋文藝1995小說年選〉，《南隆·老樹·一輩子的事》(王錦發、陳和錦主編)，吉隆坡：南洋商報。
- (1999)〈我對馬華文學的觀感〉(李賢麗整理)，《新馬文學史叢談》(陳映真等著·方修編)，新加坡：春藝圖書貿易公司，頁5-12。
- (2005)〈第二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花蹤文匯7》(蕭依釗主編)，吉隆坡：星洲日報，頁16。
- (2009a)《人間風景·陳映真》，台北：文訊雜誌社、財團法人趨勢教育基金會。
- (2009b)《陳映真文選》(薛毅編)，北京：三聯書店。
- 莊華興(2007)〈誰的疆界：馬華現代文學的文化意涵〉，《跨越疆界：全球化、現代性、本土文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創作室，頁177-200。

# 陳映真思想中民族主義與第三世界的重疊\*

白永瑞

筆者最近正著手以東亞的視角來分析 1970 至 1980 年代的台灣知識分子社會，所以當接到這次紀念陳映真先生的學術會議邀請時，很愉快地就答應了，希望藉此機會分析一下台灣知識分子社會對民族主義和第三世界的看法。然本人因俗務纏身，尚未能真正對此問題進行系統性研究，這次只能發表這篇讀書笈記性質的文章，還請大家諒解。

本文主要立足於兩種觀點來闡明陳映真的思想。

首先，台灣與韓國具有相互連動的關係。在近代，兩社會都被強制編入日本帝國圈內，亦可說兩者是因日本帝國而產生了連結。日本帝國沒落後，在美國和蘇聯主導的東亞冷戰秩序下，兩者又都成為自由陣營的成員，又因美國而產生連結。韓國和台灣之間並沒有直接建立關係，而是以第三者為媒介，隸屬於同一東亞秩序。而這種狀況正是對兩社會居民生活具有決定性影響的結構性要素。尤其本文所關注

---

\* 本文為 2009 年 11 月在新竹交通大學舉辦的「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中發表的論文加上註釋而成。

的1970年代，由於美國與中國的和解，導致東亞冷戰秩序出現第一次分裂，韓國與台灣的社會內部局勢也因此發生巨大的變化。這是結構性的連貫性。而且，作為對應冷戰秩序分裂狀況的行為主體之一部分，兩社會的批判性知識分子所提出的實踐課題也具有相似性，並且亦自覺或不自覺地互相連貫在一起。（如眾所周知，另一行為主體國民黨政府和朴正熙對國際局勢變化亦表現出類似的因應方式，不過這點不在本文關注的範圍內。）

其次，兩社會都在東亞冷戰秩序確立過程中經歷了內戰，最後並形成分斷狀態。這種分斷狀況能否說是一種體制，還有待進一步討論的必要，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兩岸關係和南北韓關係所表現的分斷現實，至今仍是影響兩社會居民生活的核心因素。兩岸關係基本上是一種不對稱關係，因此說台灣是「分裂國家」也許是恰當的；而南北韓關係是一種對稱關係，所以有人主張南北韓應被稱為「分斷國家」。<sup>1</sup>

最能體現筆者所強調的這兩種觀點的例子就是陳映真的思想，他在七〇至八〇年代已經以自己的方式直接表明這兩種觀點，並且加以實踐。接下來筆者將把焦點放在民族主義與對第三世界的認識來探討陳映真的思想，而為了能在東亞的脈絡上進行更深入的分析，並選擇同時期的韓國文學評論家白樂晴的相關論點進行比較。

## 二

前面提到韓國和台灣的知識分子在其實踐課題上具有相似性。然儘管如此，他們之間對彼此的了解又有多少呢？這點可以從陳映真和

1 木宮正史，〈比較1960年代韓國與台灣的冷戰外交〉（1960年代韓国と台湾の「冷戦外交」比較：ベトナム戦争への対応とASPACを中心として），張啟雄編，《戰後東北亞國際關係》（台北：中央研究院，2002年）。

白樂晴兩人的例子來說明。

儘管韓國和台灣在結構上具有連貫性，韓國還是缺乏對台灣的關注。直到1980年代，對韓國而言，台灣只是「中華民國」即「自由中國」的代名詞，台灣本身（尤其是在那裡生活的民眾）尚處於韓國人的視線之外。<sup>2</sup>部分進步知識分子也是到1987年以後才開始關注台灣的民主化運動和兩岸關係的變化。像白樂晴在1970至1980年代提倡第三世界（文學）論的文章中，也幾未言及台灣問題。不過他所領導的「創作與批評社」在1993年編印第三世界叢書時曾經出版了黃春明的短篇小說集《莎喲娜啦·再見》（但這也只不過是日文版的再譯本）。

與此相比，同時期台灣的進步知識分子在某種程度上對韓國還是有相當的關注。例如左派雜誌《夏潮》偶爾會刊登與韓國有關的文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過從這些文章內容可知，當時台灣知識分子所掌握到的韓國相關訊息大部分都是透過日語資料間接得來的，尤其自1976年起即開始關注韓國的民族文學論和民眾文學論的陳映真，剛開始同樣也是透過日語資料來理解韓國。不過到了1980年代以後，陳映真即多次直接訪問韓國，與韓國民族民眾文化運動勢力進行交流，同時也展開連帶活動，結果他對韓國的民族民眾運動的理論和實踐也有了相當深入的認識，其成果則集中呈現在他對當代韓國民主運動的全面性(all-dimension)報告中。<sup>3</sup>可以確定的是他在韓國的見聞對他的思想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陳映真也曾經說過，與南非作家的會談及韓國的民主化運動是影響他認識第三世界最主要的要素。<sup>4</sup>筆者希望日

2 日本的情況亦類似。松永正義，《考慮台灣時會面對的難處》(台湾を考えるむずかしさ)，東京：研文出版，2008年7月。

3 《人間》第44期(1989年6月)和《人間》第45期(1989年7月)的「韓國民主運動特輯」。

4 陳映真，〈對我而言的「第三世界」〉，收入《批判連帶》(陳光興編，台北：台社，2005)，後亦收入《陳映真文選》(薛毅編，北京：三聯，2009)，頁529-536。

後能對此問題作更深入的分析。

白樂晴和陳映真兩人對於對方社會見聞的差異也導致他們對第三世界的認識及其變化產生一些差異——儘管他們兩人的思想因韓國和台灣在結構上的相似性而具有很強的共通性。

### 三

接下來讓我們對陳映真的民族主義與第三世界認識作一考察。陳映真思想的特徵在於，他的民族主義與對第三世界的認識是重疊在一起的。

經歷了「保釣」事件的衝擊，陳映真開始反思 1960 年代位居主導地位的西化現代文學——他將這種傾向形容為「台灣在文學上極端的惡質的西化」——同時他也主張應該回歸中華民族的傳統和現實本土，在民族文學論即「鄉土文學」上有很充分的體現。

他對「鄉土」的認識是這樣的。「鄉土今以此處之鄉土始，而終必以到大鄉土之大陸終，成為將來光輝的、偉大的中國文學的一個組織部分」。這裡的中國（民族主義）意味著「對內『五族一家』，『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對外抵抗外來的侵略」（〈在民族文學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人間版作品集 11：頁 52-53）。所以他號召要為「共同克服中原的漢族沙文主義和地方分離主義」而「團結起來」！（同前引：頁 54）

不過，他認為「鄉土文學是中國新文學在台灣目前階段中的重要形式」（同前引：頁 53），「鄉土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正是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並進而認為民族主義「正是亞洲式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同前引：頁 46）。他的民族主義與第三世界論正因此而產生了連繫。

在台灣的現代中國文學，和其他第三世界現代文學一樣，是做為

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文化啟蒙運動之一環節而產生。(〈中國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之比較〉, 人間版作品集 8 : 頁 82-83)

「台灣」「鄉土文學」的個性, 便在全亞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文學的個性中消失, 而全中國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個性中, 統一在中國近代文學之中, 成為它光輝的, 不可割切的一環。

(〈「鄉土文學」的盲點〉, 人間版作品集 11 : 頁 3-4)

如此, 對陳映真而言, 台灣—中國—第三世界成為一種重疊性的結構, 而這種重疊性在白樂晴的認識中也有類似的表現。

如同「保釣」事件對陳映真思想的影響, 韓國在 1960 年發生的「四一九革命」也使白樂晴開始關注民族文學。<sup>5</sup>不過白樂晴的民族文學概念具有徹底的歷史性, 即他的民族文學概念是「必須在賦與實在內容的歷史狀況存在的前提下才會有意義, 情況一變, 即有可能會淪落於被否定或被更高層次的概念吸收的命運」。<sup>6</sup>他在強調民族文學的歷史性之外, 同時並將民族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作了連結, 進而賦予民族文學重新審視世界文學的先進作用。

白樂晴(백낙청)的第三世界觀是在 1970 年代隨著韓國民族文學論的展開而正式形成。七〇年代韓國民族文學論所展望的就是在清算與歐美發達工業國家文學在精神上的從屬關係之際, 建立面向整體人類

5 四一九革命「不僅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勝利, 也是我國自身的民族主義的勝利」, 「正如四一九以後文壇所體現的新變化般, 4 月革命對我們文學界來說, 至少找回了部分的民族意識及民眾意識」。白樂晴(백낙청), 〈民族文學的現階段〉(민족문학의 현단계), 《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 2》(민족문학과 세계문학 2), 首爾: 創作與批評社, 1985 年, 頁 17。

6 白樂晴, 〈為了民族文學概念的確立〉(민족문학 개념의 확립을 위하여), 《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 1》(민족문학과 세계문학 1), 首爾: 創作與批評社, 1978 年, 頁 19。

社會的開放性文學。因此他關心第三世界文學，探索第三世界的新連帶意識，也是理所當然的。<sup>7</sup>不過，白樂晴所說的第三世界論，與誇張第三世界的區域特性或將之視為與世界其他部分割裂而被孤立的特定區域，即試圖將「第三的世界」實體化的「第三世界主義」態度（「新的虛偽認識」）有鮮明的區別。依照他的說法，

從民眾的立場來看——例如從韓國民眾的立場來看——說自己是第三世界的一員，就意味著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正是全世界全人類的問題，而就在這一點上，這一句話有其重要性。即，與其說是將世界一分為三，不如說其真意是要將世界合而為一。而所謂的合一是站在民眾的立場上來看，而非從第一世界或第二世界的強者或富者的立場來看。<sup>8</sup>

以民眾立場為根據的第三世界論就本質而言雖然是將世界視為一個整體，但也賦予後開發國家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和民族主義的自我主張絕對的價值。但同時也認為各國家民族的獨立和自主並不是最終目標，而是全世界民眾合為一個整體的一個過程，這是最明顯不過的了。<sup>9</sup>

從上述引文可以看出，白樂晴將民族文學、第三世界文學及世界

7 白樂晴，〈看第三世界文學的眼睛〉(제3세계문학을 보는 눈)，《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2》(민족문학과 세계문학 2)，首爾：創作與批評社，1985年，頁168。此篇中譯文收入《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白永瑞、陳光興編，台北：聯經出版社，2010年)，引文請見頁58。

8 白樂晴，〈第三世界與民眾文學〉(제3세계와 민중문학)，《找尋人類解放的論理》(인간해방의 논리를 찾아서)，首爾：詩人社，1979年，頁178。

9 同前引註，頁181。

文學做了連結並將之視為一個整體，尤其希望通過民族文學，乃至第三世界的先進性來重新思考世界史。

1970年代韓國文壇所進行的「民族文學」討論，不僅將自身的文學放在與最高水準的第三世界文學的連帶關係上加以思考，同時也在此尋找世界文學的先進性，並已認識到以「第三世界」的視角重新解釋西洋文學的古典本身的必要性。<sup>10</sup>

比較陳映真與白樂晴兩人的觀點可知，雖然兩人都具有重疊民族主義和第三世界論的共同點，但對陳映真而言，正如他在〈對我而言的「第三世界」〉一文所言<sup>11</sup>，他不是從理論，而是根據「具體的感性經驗」來認識第三世界的，而中國正是重要的媒介，這是兩人的不同之處。同時這也正是1980年代後隨著台灣本土論的抬頭，他的第三世界論之所以遭到「只不過是中華主義的包裝」攻擊藉口之所在。<sup>12</sup>此後本土論掌握了主導權，鄉土文學論或第三世界文學論在台灣論壇被邊緣化。那麼，結果台灣論壇所失去的是什麼，所得到的又是什麼呢？

筆者現在還沒有介入「台灣意識論戰」的意義和後果的能力，只能先介紹一下做第三者的韓國青年學者對該論戰的觀點。對於台灣問題，陳映真不僅從兩岸關係中尋找解決辦法，同時並認為只有「從世界秩序這一廣泛的意義上，台灣、中國，以及有關的美國、日本等新帝國主義的三角結構中去思考，才能得出客觀的合理的結論」，宋承錫

10 白樂晴，〈英文學研究中的主體性問題〉(영문학연구에서의 주체성 문제)，《民眾文學與世界文學2》(민족문학과 세계문학 2)，首爾：創作與批評社，1985年，頁165。見陳映真，〈對我而言的「第三世界」〉(同前引註4)。

11 見陳映真，〈對我而言的「第三世界」〉(同前引註4)。

12 施敏輝編，《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88年。



認為陳映真的這種視角「值得肯定」。但他也指出，這種視角「忽視了台灣這一實體的存在及以此為基礎的台灣意識，因此也很難獲得現實性」。<sup>13</sup>

不過，陳映真真的忽視了「台灣這一實體的存在及以此為基礎的台灣意識」嗎？筆者認為這點還有深入討論的必要。在這裡想先指出的是，事實上陳映真是以批判的（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悲觀的）態度來看待台灣文學和台灣現實。陳映真指出台灣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的普遍傾向不同，其特殊性之一就是台灣文學一般總是缺乏歷史性、文化性及哲學性，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中國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之比較〉，人間版作品集8）而且，相較於1980年代韓國民主運動中所呈現的民眾活力，他認為在同一時期台灣的抵抗運動存在著「某種焦慮和彷徨」，無疑也是證據之一。<sup>14</sup>當然，這是他借鑒第三世界的經驗，為促使台灣文學自行反思並提高批判意識而提出的觀點。然不管其意圖為何，這點與強調韓國民族文學並具進步性思想的白樂晴有所不同。

這一問題也許與他在1980年代以後沒能進一步以台灣的視角來說明兩岸關係的理論框架有一定的關係。其實他已經清楚認識到「冷戰—國家分裂『結構』」，並將這作為戰後台灣所有問題的總根源，而且認為只有克服這點，台灣才能實現民主幸福的願景。<sup>15</sup>但可惜的是，不知為何他並沒有進一步發展這個理論。在以重疊的實體來看待台灣—中國—第三世界的過程中，他有關1970年代的理論已經認識到台灣作為一個開放性主體的可能性，照理來說，他應該更加致力於此一理論

13 宋承錫(송승석)，〈台灣文學的中國結與台灣結：台灣文學本土論與中國文學論的對話〉（'다이완문학'의 중국결(中國結)과 타이완결(台灣結)—'다이완문학 본토론'과 '중국문학론'의 대화），《中國語文學論集》（중국어문학논집）第18號（2001年10月）。

14 陳映真，〈韓國民眾的反對運動〉，載1989年6月《人間》第44期。

15 朱雙一，〈「第三世界」視野與陳映真現實主義文學理念與創作〉，《陳映真創作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訊雜誌社，2009）。

才是。但他卻認為1970年代的理論已經失去活力，接著到來的是「全面反動和全面保守的局面」，而且對於沒能好好應付這一局面的原因，也只是簡單帶過說：「台灣左翼傳統的弱質，和戰後台灣左翼在知識理論——從而在實踐上的貧困和極端艱難的處境」。<sup>16</sup>

這一觀點也適用於現在台灣的論壇。為了克服台灣的分裂結構，在此借用一下陳光興的說法，即要重新追問一下「將中國(人)問題化」這個「老問題」。<sup>17</sup>然而，「在『將中國(人)問題化』的過程中，如果沒有第三世界或東亞等媒介的介入，終究難以擺脫中國—台灣的二元論。」<sup>18</sup>白池雲(Baik Ji-Woon)指出的這點也值得我們關注。東亞這一媒介絕不是對「兩岸關係這一特殊而具體的問題」的「一種逃避的遁辭」<sup>19</sup>，相反地是要將其視為一個擺脫以二元論看待兩岸關係論點的契機而積極加以接受。

與台灣一樣，韓國在1980年代後半期之後也不再關注民族主義與第三世界的關係，取而代之的是分斷體制論述和東亞論述的抬頭。白樂晴也是經過八〇年代進步陣營內部的爭論之後，才開始認為民族文學想要邁入先進途徑，應先克服韓半島的分斷體制。從這種想法出發，他開始埋頭精心打造他的分斷體制論述。與此同時，他的同事們在反思第三世界論的過程中，於1990年代提出了東亞論述。在1970至1980年代，在韓國主導第三世界論的是專攻西洋文學的學者，他們關注的對象主要是可透過西洋語接觸到的非洲和南美洲的一些作品，因

16 陳映真，〈向內戰、冷戰意識形態挑戰：七〇年代台灣文學論爭在台灣文藝思潮史上劃時代的意義〉，載1997年12月《聯合文學》第158期。

17 陳光興，〈白樂晴的「超克分斷體制」論〉，載2009年《台灣社會研究》第74期。

18 Baik Ji-Woon(2010, Dec). "East Asian perspective on Taiwanese identity: a critical reading of 'Overcoming the Division System' of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1: (4), 595.

19 趙剛，〈以「方法論中國人」超克分斷體制〉，載2009年《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4期。

此連白樂晴自己也曾反省道：「我們把真正的亞洲文學尤其是與我們最近的東亞文學擱置在一邊，總是關注遠處的文學。」<sup>20</sup>因此，創造「第三世界論的東亞樣式」的任務受到重視，結果出現了東亞論述。希望通過東亞論述，韓國的民族文學論能夠獲得「豐富的現實性和真正的先進性」。<sup>21</sup>

現在，現存社會主義崩潰，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取得全球規模的優勢，此時正是我們可以更接近將世界視作一個整體，不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強者或富者的立場來看待世界，而站在民眾的立場來看待世界的第三世界論，即開創世界層次的民眾世界之第三世界論的真正性的時候。陳映真的精神資產和實踐經驗時刻提醒我們不要忘了這一目標。

20 見白樂晴，〈看第三世界文學的眼睛〉(제3세계문학을 보는 눈)(同前引註7)，韓原文版：頁173；中譯版：頁63。

21 崔元植(최원식)，〈民族文學論的反省與展望〉(민족문학의 반성과 전망)，《民族文學的論理》(민족문학의 논리)，1982年，頁368。在此，再將視線轉移到中國大陸。到1970年代為止，在中國第三世界思想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因此可以說，第三世界論的影響力制約了東亞視角能為中國思想的生產作出貢獻的可能性(見孫歌，〈東亞視覺的認識論意義〉，載2008年6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0期，頁255)。不過1980年代以後第三世界論在中國也逐漸失去了魅力。

## 陳映真和「第三世界」的政治／文化評論

王曉明

陳映真先生是小說家，也是批評家。我這篇短文要討論的，是他的評論家的一面。當然，比起他的評論文章，他的小說的內涵更豐富，即便其中的思想，也比表現在他的評論中的更複雜，因此，要理解評論家陳映真，不能只談他的評論，也必須談他的小說。但真要這麼做，事情就大了，我想不清楚的就更多了。因此，作為第一步，我先放開他的小說，只談他的評論。

之所以選「『第三世界』的政治和文化批評」這個角度來討論陳映真，是因為目前大陸知識界正面對一道思想和精神的難題，陳映真的評論寫作有可能對破解這道難題，提供重要的啟示。

簡單來說，這道難題是這樣的：

自19世紀中期中國的現代思想萌生以後，差不多一百年間，許許多多中國思想者前仆後繼地探索一條既師法「西洋」、又絕非「西化」、而是要超越「西洋」、因此被稱為「中國革命」的思想和實踐道路，形成了許多不同的路標；到20世紀中葉，別的路標都斷了，只剩下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支；但到1970年代中期，「文革」失敗，這一支也斷了；在各種新的內外條件的綜合作用下，經過一番猶豫和掙扎，1980年代中期，那支80年前曾被中國現代思想的主流明確拒絕的「西

化」的路標，又插回了路口，儼然為最大的指示牌；它的對面，2000年以後，則豎起了一支新的路標，上刻「大國崛起」四個字，隱約指向國家主義的強權路。

這情形太令人難堪。可是，在美國化的「西洋」和「崛起」式的「非西洋」之外，中國還有別的路可選嗎？應該是有的。可那在哪兒？該從哪裡起步去探索？

這就是我說的難題。

1970年代以後，陳映真頻繁使用「第三世界」這個詞。從我上面說的那道難題的角度看過去，他的評論文字中，在這面「第三世界」的旗幟下展開的部分，是最有活力的。

他這個「第三世界」論，在中國現代思想的範圍內，並非無根之木，早在1910至1920年代，許多中國思想者就將「世界革命」一分为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和非資本主義國家「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社會革命。依照這個視野，「中國革命」一方面是反「西洋」式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另一方面又並非從屬於馬克思主義的、因而也是西洋式的無產階級革命，而是另有所屬——是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社會革命的一部分，甚至是這個革命的領頭的一部分。

這裡沒法進一步介紹這種自我定位所導致的複雜的思想論爭（其中表現了中國現代思想的一部分可能是最有意思的內容）。只說一點：1960年代中共脫離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而推出的「第三世界」理論，從某個角度看，正是1920年代的主流「中國革命」思想的某種變異的復活。

倘說評論家陳映真的「第三世界」視野的來源之一，就是中共1960年代的「第三世界」理論，那是不是就可以說，他是在台灣的特殊環境裡，再度復活／變異了「中國革命」的思想傳統中一個可能是最有活力的精神傾向？

不用說，這個精神傾向，正是今日大陸知識界破解那道難題所能援引的——可能是最重要的——本土資源。陳映真的評論文字的思想意義，也正由此凸顯。

這裡說的「思想意義」，不妨被再強行分解為二：一是「政治」，二是「文化」。

所謂「政治」，在現在中國<sup>1</sup>，首要的一點，就是回答如下問題：今日社會，是個什麼社會？而要回答這個問題，又必須在「現實」這一維度之外，同時釐清「歷史」和「世界」這兩個維度：今日這現實，是怎麼來的？如今，是怎樣一個結構支配著全球？我們置身的國家，在這個結構中處於何等位置？……只有講清楚這些，才可能開闢通向未來的政治想像的空間。

陳映真非常清楚地知道這三個維度的深刻的互相糾纏。他的政治評論，總是試圖在側重其中某一維度的同時，兼顧甚至同時推進對其他維度的理解。他所創造／借重的一些評論概念，例如「美國統治下」、「世界體系下」、「二體制對立的世界結構」、「亞洲的冷戰架構」、「『冷戰—國土分裂—反共—安全』的亞太架構」等等，無一不具有多維的功能：既包含對世界大局的概括，也呈現敘述歷史的框架，當然，更是對社會現實的判定。

不過，這些分析框架並不足以幫助他避開20世紀中葉「中國革命」論述曾經深陷的一個困境。

在1900至1910年代，「中國革命」的主流論述雖然把自己和「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區別開來，卻同時認定後者是自己的同志，甚至是自己的歸宿。1920年代，孫中山就不只一次說，俄蘇的今天就是中國

1 如果說，對於18世紀中葉以後的中國而言，進入「現代」的主要意思，並非只在回答「中國如何現代」的問題，而更在回答「中國要何種現代」的問題，那就可以說，今天的中國仍遠未走出「現代」時期，我們依然活在「現代中國」。

的明天。但是，當蘇聯及其「第三國際」逐漸變質，在國內和國際事務中越來越肖似資產階級國家／帝國主義的時候，一種如同被人從背後捅了一刀、前後為難的困窘感受，在「中國革命」的思想和實踐中四處冒頭。越是國民黨不成器、「三民主義」被抽空、共產黨逐漸成為「中國革命」的首席代表，這種困窘感受越是深化。早在1930年代，共產黨一路的「革命」的變質就開始顯露；1949年以後，變質的症狀加速擴散，上述的困窘感隨之強化。1957年的「反右」運動，從一個方面來看，似乎標誌著共產黨徹底壓制住了這種困窘感。但幾乎同時，隨著毛澤東式的「反修正主義」和「革命民族主義」意識的膨脹，這種感受又在共產黨內以明顯的變形的方式重萌。「不結盟」、「亞非拉」、「第三世界」：所有這些概念／策略的運用，則可以被視為這重萌在國際意識方面的表現。

回到陳映真。倘說正是那7年的牢獄生活，在他身上第一次促成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血肉化，同時以那些共產黨人獄友為中介，促成了他對來自大陸的「中國革命」思想／實踐傳統的感性領受，那麼，他此後展開的思想道路，特別是當把「思想」落實為「現實政治」的時候，就自然和1910至1920年代大陸的「中國革命」的主流論述頗為相似：明確以西方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及其在中國（此處是台灣）的附庸勢力為首敵，而以馬克思主義及其現實代表（此時——至少是最初階段——是「社會主義陣營」）為靠背。

但他當時所站的位置，另有一個特殊之處。他是同時面對兩組對立：一是全球範圍內的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一是中國範圍內的台灣和大陸的對立。如果粗糙地看，這兩組對立似乎可以合併：前者是總體，後者是局部。但實際上，情形並非僅是如此（正是這個「並非」之處，埋伏著再思考的重要契機）。正是這個既可以如此合併、又不能完全如此合併的複雜狀況，給了他一條生路。他很快

就看清了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非社會主義的實質，這使他不得不將「美國」和「蘇聯」等量齊觀。但是，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的分道揚鑣，又讓他可以在把「蘇聯」劃出「社會主義」之後，轉移支點，以「大陸」為馬克思主義的首席現實代表物。當這個轉移進行得順利，他內心是不大會有重大的精神壓力，逼迫他整個改變先前那樣的政治站位的。

也就是說，當「第三世界」這個詞在1970年代第一次從他筆下走出來的時候，其實並不意味著他已經開始真正的思想突破。他那時似乎還能沿著老路往前走，還沒有真正遭遇窮途。

窮途是在1980年代初逐漸呈現的。經由「六四事件」和其後大陸「市場經濟改革」的瘋狂膨脹對他的精神衝擊，這個窮途結結實實攔住了他。他不能不承認大陸社會主義的「退行」，不能不改變原來那種安心倚靠「蘇共和中共的社會主義」的單向的戰鬥姿態，不能不向「共產主義體系」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之外的其他方向去開闢希望，不能不從中共及其意識形態符號——乃至中共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體——之外的其他角度，發展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認同意識。這是真正陷入困境了。

作為評論家的陳映真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並不逃避困境，相反，他努力從正面突破。正是這個不逃避的態度，將他引到了「第三世界」的政治批評的一個緊要之點：當打破其實是由全球支配體系（例如他所稱的「世界體系」）派生的種種二元對立框架（例如「冷戰」框架及其各類變種），因而自覺展開「橫站」（魯迅語）式的多向反抗之後，如何重新深入分析現實，從中發現／促成具有廣闊可能乃至普遍意義的新的革命方向？在我看來，他1980年代初期以後的評論工作的一個可能是最重要的意義，就在這裡：他似乎開始正面強攻這個緊要之點了。1989年，他堅持要從「亞洲左派」的立場去評價北京「六四事件」，就是這種正面強攻的一個重要信號吧。



這需要更仔細地閱讀和檢點他在這個方向上的工作的成敗得失。雖然還沒有完成這個閱讀，我卻可以肯定：收獲一定不小。

再說「文化」。

一旦自覺站在「第三世界」這樣的位置上，你立刻就會發現可資憑藉之物的匱乏。400年的所謂「現代化」進程，從一開始就以赤裸裸的暴力，推廣一套新的標準，讓被壓迫民族和社會覺得自己百事不如人。那怎麼辦？還在20世紀初葉，「中國革命」的主流論述就開始強調：革命的本錢不在別處，就在革命者自身，和其他條件——武器、制度、金錢——相比，「新的人」是最重要的，而要造就「新的人」，第一個該訴諸的就是「精神」（當時的流行詞叫做：「革命道德」）。當強權把幾乎什麼都抓在手裡的時候，弱勢者確實只有「精神」可以憑藉。

在這裡，正可以看到「第三世界」（或類似的其他政治立場）對於「文化」的非常尖銳（一時想不出別的更合適的形容詞）的定義。

在中國現代思想的範圍內，這種定義引發了非常多樣的思想論戰。整個20世紀上半葉，有一個焦點特別突出。被如此定義的「文化」如何創造「革命」的「主體」？粗略來說，這個焦點有兩個大的面向。其一是「被壓迫」和革命精神（「革命道德」）的關係：「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阿Q式的革命」？「平民」？「人民」？「覺悟階級和不覺悟階級」？「到鄉間去」？……許多重要的思想分歧和論爭，其實都是圍繞著這個問題展開的：如何看待勞苦大眾被欺凌、被剝奪、貧困苦難的生活狀況所蘊含的反抗的能量？

其二是「理論」和「實踐」的關係：「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問題」與「主義」？「反對教條主義」？「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獨特性」？「思想掌握群眾」？「革命黨和革命主體」？……這些牽涉面往往很廣的思想和政治討論，其實都在爭一件事：中國革命所激發、創造、憑藉的文化力量，是否應該被某一個革命理論所統領？

在大陸，1950年代中期以後的20年間，這些論爭都銷聲匿跡了。1980年代中期以後，它們開始復活，一度堪稱活躍。但進入1990年代以後，它們開始越來越嚴重地遭遇一種與政治專制結伴、但軀體似乎更大得多的力量壓抑，那就是對整個「精神」和「意義」問題的普遍的冷淡和輕蔑：「我們受夠了這一套！別跟我談什麼精神！」。……今天，就整個社會的情形來說，經由一個世紀的的中國革命的歷史過程逐漸培養起來的「第三世界」式的文化視野、眼光和想像力，是明顯衰落了。

容我說得絕對一點，當上述這些能力普遍薄弱的時候，大陸社會不可能造成具有真正反抗和革命意味的大的文化力量；如果沒有這種力量的推動，「第三世界」式的社會理想就不可能在這片大地上紮根抽枝。

這是否就是陳映真的評論文字，作為「第三世界」的一種「文化批評」的重要的意義之所在呢？

就我粗略的閱讀心得而言，他的幾乎所有重要的評論文章，包括那些並不以「文學」和「文化」為題目，而是直接分析經濟和政治現象的文章，都包含這種「文化批評」的涵義。我甚至想說，恰恰是他那些列出許多數字、似乎是專門討論經濟社會現象的文字，更能夠體現「第三世界」式的「文化批評」的一種精粹之力：無論從什麼地方，都能看出「文化」的深刻意味。正是憑藉這種眼力，文化批評才能以「文化」轉化其他社會因素（例如大眾的日常生活經驗），激發、促成乃至創造革命的能量。

舉一個例子：陳映真似乎是將那些中等或中等偏下收入、並非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面都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的公民，看成是新的社會理想的重要的現實基礎的；但同時，他明確將台灣「中產階級」的政治和文化特性，看成是跨國資本主義經濟在台灣擴張模式的產物。因此，他的許多文章（包括一部分小說），都針對這個難題而展開。他創辦《人間》雜誌（包括堅持那樣的裝幀），也是因此而來的吧。

我會繼續沿著這個思路，深入閱讀陳映真先生的著作。我到目前為止的心得，雖然凌亂，卻足以令我相信，他的「第三世界」式的文化批評，當為後來者——不僅是中文世界內的——所深切敬重。

「第三世界」並非一塊地域，而是一種視野，一種精神立場，一種感受和思考的方式。它應當可以充滿全世界，實際上也確實能在各地都看到。中國自然也不例外，在某種意義上，「中國革命」正是「第三世界」的別稱之一。陳映真先生的「第三世界」的政治／文化評論的意義，正可以這麼來看吧。

2010年2月 屯門

#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狂人／瘋子／精神病篇

陳光興

「是我們有計畫地去研究、譯介第三世界文學的時候了。」

2009年5月，去南京師大開國際心理學會議，因為在醞釀寫作這篇文章，打算開始慢慢重讀一次陳映真所有的文學創作，好在暑期間動筆寫作，也就隨身帶了陳映真的《父親》。由於第一次去南京，想到處看看，所以早到了兩、三天。一天，打車去市中心找朋友，跟出租車師傅聊起來，他說自己是南京人，問我哪兒來的，我說台灣，母親是山東人，父親是安徽人，他說安徽哪裡？我說盱眙，聽說八〇年代被劃入江蘇，他說盱眙很近啊，離南京一個多小時，我心裡一震，是

---

\* 本文於2009年11月在新竹交通大學舉辦的「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中發表。寫作過程得到許多朋友們的支持。感謝鄭鴻生、趙剛、蘇淑芬、蘇淑冠、宋玉雯、鄭聖勳、丁乃非的閱讀與修改建議，特別是賀照田一語點醒夢中人，調整了文章的氣質，也得感謝施淑、孫歌、夏林清、翟宛文、劉人鵬、黃文倩、黃琪椿、倪文尖、毛尖、羅崗的鼓勵。文章的思考受惠於2007年與2008年分別在清華大學研究所與大學部開設的陳映真的思想與文學相關課程，與同學們的共同閱讀與討論，成為文章書寫的物質基礎，其中許多想法都是她們的，不過是藉我的書寫來表達吧，感謝她們！這篇文章是國科會計畫「陳映真的第三世界」(NSC 96-2411-H-007-023-)的部分研究成果，於2009年秋天進駐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時完成。

啊，該利用機會去看看——但是馬上就打消了念頭：真到了盱眙要去哪？父親的老家在縣城還是鄉下？家裡還有誰都不知道，怎麼去？陳映真《父親》中的〈祖祠〉與〈安溪縣石盤頭：祖鄉紀行〉顯然白讀了，每次讀到就覺得該提起勇氣，認真挖掘父、母親家鄉的點點滴滴，才能了解他們一生未了的牽掛，也才能像陳映真那樣把自己跟過去連上關係。離開了南京，我還是沒有鼓足勇氣採取行動開始做些家族研究，父、母親早已離世，沒人可問，看來再去南京還是得悵然而歸。但是〈安溪縣石盤頭〉卻陰魂不散地逼問著：別說133世了，為什麼會連祖宗八代都無法面對？

寫這篇文章在經驗中是最困難的一篇，部分原因正在於近鄉情怯中的逼問。做為陳映真先生的晚輩，跟一般圈子裡的朋友不同，我在年輕時代沒有半點受到他思想的影響，也就從來不覺得他是龐然大物的存在，九〇年代跟他認識後，雖然對他頗有敬意，但是相處起來也感到格外輕鬆。直到後來開始有意識的走向亞洲與第三世界的路，意圖重新發現貼近我們生存狀況的思想資源的時候，才慢慢察覺他早就上路了，繞過他很多線接不起來。為了補課，也為了準備這次「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2006年秋天和2008年冬天，分別在清華大學的研究所與大學部開了兩次閱讀陳映真文學的課程。結果當然是更為責怪自己過去捨近求遠，視而不見身邊的寶藏巖。雖然終究沒有成為陳映真的粉絲——這樣是陳先生最不願意的，最近3年卻都浸泡在他的小說世界當中；萬萬沒想到，是在2006年9月初先後兩次在北京見到他，兩次討論這回會議的規劃，等到他病了之後才開始慢慢與他的文學世界相遇，受到莫大的滋潤。

越是閱讀陳映真的文學，越是強烈的感受到：台灣社會1990年代後，在統獨爭議激化的條件下，一般將陳映真理解為台灣本土主張統一的代表性人物，將他視為中國民族主義分子，或是馬克思主義者，

這樣的理解沒有錯誤，也跟他作為左統的代表性人物有關，但是站隊式的認識，以「政治的陳映真」高於一切，其實關閉了陳映真思想與文學豐富性與複雜性的討論空間。在我看來要重新激活作為思想資源的陳映真，學術思想與評論界不能重蹈覆轍，繼續忽視他整體思想中具有籠罩性的關鍵面向：第三世界。這是台灣思想界長期以來至為嚴重的問題，戰後的親美反共切掉了身邊的中國，又沒有亞洲與第三世界的中介，美國幾乎成為唯一的參考座標與思想資源，半個世紀以來對台灣整體造成莫大的傷害。重新閱讀陳映真就是重新發現內在於台灣的第三世界想像。

當然，過去重要的評述都會提到陳映真作品中觸及很重要的第三世界普遍的問題，但也都沒有進一步的展開討論。<sup>1</sup>台灣文學及思想界相當受到敬重的姚一葦先生，曾經在1988年《陳映真作品集》15卷版的〈總序〉中寫到：陳映真1968年入獄，1975年出獄後，

所描寫的不再是市鎮小知識分子，而是一個屬於第三世界的普遍性問題，當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企業進入到我們生存空間時，帶給我們的影響，無與倫比；不僅是生活改變，而是整個兒的想法、觀念、行為和生存方式的劇變。他企圖揭示掩飾在那美麗外衣內的猙獰本質，大眾傳播媒體的麻木與無知，以及如何在被侮辱、被欺騙、被傷害之後的覺醒。（姚一葦，〈總序〉，人間版作品集1-15：卷前頁15）

而東京一橋大學的松永正義教授則指出陳映真的基本主張：

1 參見呂正惠(1988b: 209)，詹宏志(1988: 3)，劉紹銘(1988: 40)，黎湘萍(2003: xxii)。

對現代主義的批判與對現實的重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第三世界文學這個立場的中國近代文學的傳承；相對於「台灣民族主義」之中國立場主張；以階級分析為基礎的社會批判，等等。（松永正義，〈透析未來中國文學的一個可能性—台灣文學的現在：以陳映真為例〉，人間版作品集 14：頁234）

以上類似的評述都已注意到了陳映真的第三世界關切及立場，在此基礎上，本文企圖深化既有的討論，並且進一步提出：透過「第三世界」的視角，陳映真的思想才能夠被更完整的掌握與揭示。正如他對於美國化的質疑，不能夠被化約到中國民族主義的情緒反應上，或只是以馬克思主義對美國資本主義進行批判，他的民族主義不是關閉的，他的馬克思主義是聚焦的，二者都指向第三世界的國際主義。

從現有的文獻上來看，陳映真自己對於第三世界直接的討論是到了1970年代末期陸續展開，但是他最早期的文學創作中就散發出濃濃的第三世界色彩，從他1959年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創作〈麵攤〉起，〈我的弟弟康雄〉、〈家〉、〈鄉村的教師〉、〈故鄉〉、〈死者〉、〈祖父和傘〉，乃至於讓讀者感動落淚的〈將軍族〉，都是對於歷經殖民、戰亂、家破人亡的下層人物窮苦生命的描寫，發出了深深的人道主義關懷。然而，陳映真早期的第三世界不僅僅表現在作家對於蒼生的記錄、同情與憐憫，也展現了思想上尖銳的批判立場。1967年，陳映真在《文學季刊》上發表了〈唐倩的喜劇〉這篇短篇小說。從現在的時空來看，與其說是辛辣的諷刺小說，陳映真其實是洞察、記錄與反思了六〇年代的「知識狀況」。<sup>2</sup>他透過主人翁唐倩這個具有能動性的女小說家與她5個男人的關係，記錄了台灣知識界在1960年代追逐西方思潮、崇美的

2 過去50年台灣知識界沒有對陳映真的批判提出回應，改變跟著美國走的路線，是思想界中人都該感到汗顏。

生活世界。詩人于舟因為無法趕上知識時尚，由胖子老莫的存在主義所取代，羅大頭的邏輯實證論雖然戰勝了老莫卻又悲劇性的自殺了；後來，唐倩選擇了跟著留美工科學人喬治·H. D.周離開台灣，結果赴美後再嫁給了任職軍火公司的物理博士。於是，台北「這小小的讀書界，也就寥落得不堪，乏善可陳了」，更慘的是，還有人被「指斥為奸細，為萬惡不赦的共產黨」。（〈唐倩的喜劇〉，洪範版小說集2：頁156）如果美國化成為強大的主導性力量，那麼陳映真能夠洞悉美國化效應的思想資源是什麼？他到底是站在什麼樣的立足點來揭示美國化所造成的問題？文中，作家透過胖子老莫對於六〇年代越戰的看法，側面表達了作者第三世界認同的立場：老莫認為那些「黑衫的小怪物們」（打游擊的越共），不是「羅素說的什麼『世界上最英勇的人民』，而是進步、現代化、民主和自由的反動；是亞洲人民的恥辱；是落後地區向前發展的時候，因適應不良而產生的病態！」（同前引：頁130）站在老莫對立面的作家，顯然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能夠對風尚的存在主義、邏輯實證論、右翼自由民主世界觀，保持距離的進行批判，反映的是六〇年代的陳映真已經有了第三世界認同的底蘊，甚至是立足點，只是這個語彙尚未成為他思想上的關鍵詞。因為沒有文字紀錄可以佐證，所以只能臆測這個時期的陳映真如果有初期的第三世界意識，很可能來自於風起雲湧的殖民地獨立建國運動，乃至受到1950年代毛澤東、周恩來第三世界論的感召。

除了外在的思想資源，或許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來理解：陳映真本身從早期開始就已經形成了濃厚的主體意識，這樣的主體意識在不同層次操作，表現在對具體事件的反應上，放在國際世界的範圍內，就體現出第三世界的立論。〈唐倩的喜劇〉是以文學形式來出場，而他的評論文字中也承載了具有一樣力道的主體姿態，1967年在《文季》發



表的〈流放者之歌：於梨華女士歡迎會上的隨想〉<sup>3</sup>可見端倪，當於女士議論作家在美國有如何豐厚的物質條件專心創作時，陳映真所表達的不是羨慕而是對華裔作家遠離鄉土的集體迷失感到悲戚，他反過頭來對台灣作家自我期許，要誠實與堅定的去寫出民族的脈動。

七〇年代後半起陳映真開始直接地使用「第三世界」進行公開的評論<sup>4</sup>，到了1980年代第三世界逐漸成為思考問題的重要字眼。陳映真2005年回憶自己最早提到第三世界是在1976年〈「鄉土文學」的盲點〉一文<sup>5</sup>，當時他透過日文閱讀到韓國思想界有關民眾文學與民族文學的論爭，論戰中所參照的正是亞、非、拉的第三世界反帝與民族獨立經驗，所以他使用了這個視角來討論台灣新文學的性質(2005：4)。他最為有系統的開始闡述第三世界觀，是在1983年首度離開台灣，在訪問美國的三個月期間不僅收集了更多的資料，也開始直接接觸到來自第三世界的作家，返台後他以報告思考問題心得的方式，用〈中國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的比較〉為講題，做了一場公開演講，而後整理發表於《文季》。(〈中國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的比較〉，人間版作品集8：頁76-96)

與一般人不同，陳映真的美國行不是向資本主義的天堂朝聖，反而是讓他終於逮到機會饑渴地尋求台灣當時封閉狀況中難以取得的第三世界思想資源。在三個月期間，他除了直接面對來自第三世界的作

3 〈流放者之歌：於梨華女士歡迎會上的隨想〉一文，署名許南村，載1967年7月10日《文學季刊》第4期。

4 例如，1978年的〈在民族文學的旗幟下團結起來〉(1988a：42)和1979年的〈斷交後的隨想〉(1988c：23)等文。在我個人的閱讀中，這似乎是在文字書寫上直接使用「第三世界」一詞。

5 〈「鄉土文學」的盲點〉(人間版作品集14：頁1-7)一文載於1977年6月《台灣文藝》，該文並沒有直接引用「第三世界」一詞，是以反帝、反封建為基調。讀陳映真對葉石濤的這篇批評，可以聞到此時統獨問題透過文學史的討論正在醞釀，那時他還極力以同情與尊敬的方式在理解對手。

家<sup>6</sup>，也開始接觸了第三世界的文學與電影，他自認為雖然時間短，看到的極為有限，但是整體而言第三世界地區文藝創作的成就「已足驚人」：

所謂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難深重、社會破產、民窮財盡的處境中，卻在文學、電影、思想和宗教上，都呈現出蓬勃的發展。〔……〕這些文學和電影，不但在主題上是強而有力的；是充滿著對於人的深刻信念的；〔……〕而且，在藝術表現的技巧上，因為技巧結合了對於人的高度理念，是動人的，傑出的，甚至是堪稱偉大的，很深刻地觸動了我們的反省和思考。（〈中國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的比較〉，人間版作品集8：頁76）

顯然，通過他過去對於台灣社會的理解為基礎，現在外在的第三世界共通經驗已經慢慢的進入了陳映真內在的靈魂。在演說中，他首先對台灣與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比較，認為相對於資本主義先進國，台灣跟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在資金、技術、市場、文化上都處於被支配的位置，所浮現的效果是：「第三世界人民失去民族自信心，依強者的眼光解釋世界知識，對自己的社會、歷史、政治產生鄙視怨毒等精神上的毒害。」（〈中國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的比較〉，人間版作品集8：頁82）在結合宏觀的政經分析與深刻自省的基礎上，他進行了文學狀況的比較，發現第三世界的文學創作至今都必須面對最為根本的矛盾與張力：語

6 在愛荷華訪問期間，陳映真對菲律賓作家阿奎拉(Reuel Molina Aguilla)進行了訪談，訪談稿在1984年發表。陳映真後來的回憶，可參見〈對我而言的「第三世界」〉一文(陳映真，2005)。從今天來看，1983年那次訪美，對陳個人而言是重要的轉折，第三世界從精神上的嚮往，變成是實質的接觸，碰到了第三世界的真實面，對於他日後的思想與文學創作產生重要的烙印。

言問題，一方面要以民眾語言(白話文)取代難懂的貴族語言，另一方面要以民族本身的語言取代殖民的外來語言；一方面要控訴殖民體制的壓迫，另一方面要反省與批判國人的無知與落後。提出這些吃力不討好的多重戰線，是頭腦清醒的知識分子重建民族主體性時，所面臨的共同挑戰。陳映真在這裡顯示的認識，或許是七〇年代閱讀韓國(以白樂晴為代表的)民族文學論會產生巨大共鳴的基礎，到了八〇年代後期又親身訪問了南韓，心中激動難以言表，但是這是後話了。<sup>7</sup>

回頭來看，陳映真並沒有美化第三世界的狀況，反倒是暴露其中的真實問題：

從文學上看，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因為殖民歷史長(有的長達二、三百年!)，在殖民地知識分子和文學家中，養成了一批慣於使用殖民者語言去思考和寫作的人。他們的作品，與其是訴諸本國同胞，不如是一貫訴諸於西歐、殖民母國的評論家和出版家，而形成與本國風土斷絕的殖民地的文學。印度的詩聖「泰戈爾」，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而這種向「殖民母國」、「文明」的文學看的風尚，不但加強了對自己民族文學的自卑感、間接地壓抑了以民族語言寫成的民族文學的發展。(〈中國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的比較〉，人間版作品集8：頁85)

陳映真歸納了第三世界殖民時期的普遍現象後指出，二次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並不表示主體性的回復，西方現代主義思潮，透過美國霸權的崛起，成為第三世界在文學與藝術創作上所仿效的對象。這樣的狀況到了1960年代末期全球反戰運動開始，發生了轉機，表現在台

7 見陳光興(2009)〈白樂晴的超克分斷體制論〉。

灣的七〇年代初期的保釣運動，一直延伸到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都是從批判帝國主義、西化，從而提出回歸民族、回歸鄉土的命題。陳映真簡要地鋪陳了印度、菲律賓、非洲及拉美經驗，比較了西化派與鄉土派的差異。但是，極為關鍵的是，他認為台灣文學(中國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的最大差異在於台灣雖受日本殖民，但是時間相對短淺，中文的語言及文字傳統深厚，沒有遭到嚴重的破壞。他感慨地說：

作為文學的重要基礎的傳統文化和民族語言，在其他第三世界各國中，因新舊殖民主義的摧殘的悲慘狀況，沒有和第三世界作家談起，是無法想像的。我因此深切知道中國完整的文化和語言系統，是多麼值得珍視和寶貴，而愈益決心重新向自己的文化、文學和語言傳統去學習，以善用這可貴的文學資源。(〈中國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的比較〉，人間版作品集8：頁90)

這段話說得是相當語重心長，沒有與中文地區以外的作家及作品接觸，就沒有契機認識到自身文化的可貴，然而在充分認知中文沒有中斷的優勢同時，陳映真並沒有因而驕傲，話鋒一轉，以其他第三世界文學的實踐為基準，開始批判台灣文學的虛無、貧乏與去政治性。

陳映真在演講的結論中，很尖銳地批判了七〇年代末期逐漸在台灣文學討論中浮現的分離意識，同時更是積極地呼籲：「現在已經是我們有計劃地去研究、譯介第三世界文學的時候了。」(同前引：頁93)藉此打破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觀，透過認識亞洲、非洲及拉美的文學，重新挖掘屬於我們自己過去一直被貶抑的民族文學。

陳映真1984年的這篇文章，展現了他第三世界的基本思維。回首來看，他當時提出以第三世界為參照的呼籲顯然沒有受到廣泛的回應，相對於南韓，第三世界沒有成為台灣知識史上思想運動的資源。

但是對陳而言，他只能透過自己的方式繼續朝這個方向來耕耘。由於相信：「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應該回到人民中去，成為他們的一員。」（〈論強權、人民和輕重〉，人間版作品集6：頁5）陳映真1985年創辦了《人間》雜誌，試圖把第三世界及第三世界的視野帶入台灣社會，除了大量引進第三世界的資訊與視角外，我個人認為其中最具體的表現是在1989年，他到韓國採訪，作成了兩期的韓國民主運動專號。<sup>8</sup> 1990年代，他更進一步積極參與組織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學術研討會」，這個會議結合了韓國、日本、琉球、台灣等地的左翼分子，這些都是他的第三世界的具體實踐，以行動推進他自己在能力範圍內能落實的理念。<sup>9</sup>

2005年，應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刊物的邀請，為該刊「第三世界主義與萬隆會議」專號的製作撰文，陳映真以〈對我而言的「第三世界」〉為題，總結性地討論了他的第三世界觀。<sup>10</sup> 他自己回憶是在1976年，在台灣首次提出第三世界的語彙，主張要「參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新殖民地處境中，尚在為民眾（＝民族構成分子）的解放，國家的獨立而鬥爭的亞、非、拉世界，即『第三世界』及其文學的鬥爭問題」（2005：4）。到了1978年，海外的保釣運動也出現了第三世界的概念。於是透過閱讀，他認識到第三世界不同的認定方式，其一是西方人從生產方式來區分，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視為第一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為第二世界，經濟不發達地區為第三世界。同樣出自西方

8 見1989年的《人間》雜誌第44期「陳映真現地報告：激盪中地韓國民主化運動」專輯，和第45期「韓國錐子」專輯。有關陳映真《人間》時期最為重要的討論，見王安憶，〈陳映真在《人間》〉（收入本書下冊）。

9 有關「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學術研討會」，這是陳映真深入參與的東亞連帶運動，我個人的資料不足，期待其他朋友有深入討論。亦可參見曾健民，〈試談「九〇年代的陳映真」〉（收入本書下冊）。

10 見陳映真（2005），英文版出版於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2005）。

的第二種劃分，將自由經濟國視為第一世界，中央計畫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視為第二世界，自由市場不發達的地區是第三世界。他最後提及毛澤東的看法，以美蘇強權為第一世界，工業發達國為第二世界，其他是第三世界，也就是毛是以戰略思維把第三世界定位為反抗美蘇霸權的力量。

陳映真緊接著指出，他對第三世界的體會不是來自理論的閱讀，而是親身接觸第三世界的感性經驗，起點就是1983年訪美參加愛荷華大學的國際作家工作坊。在那兒，他不但認識了讓他心情激動來自祖國大陸的作家茹志鵬、吳祖光、王安憶<sup>11</sup>，遇見了對話中讓他內心吶喊的南非女作家，碰到了崇拜毛主席的菲律賓作家阿奎拉，以及必須藉由啤酒與國際歌才能和解相擁的東歐作家們——陳映真如今這樣陳述：

一直到今天，那個愛荷華的下午情景歷歷在目，但卻一直沒能理清清楚那歌、那眼淚、那擁抱的意義。太複雜了吧？為了一個過去的革命？為了共有過的火熱的信仰？為了被喚醒的、對於紅旗和國際主義的鄉愁？（2005：8）

陳映真記憶中的第二個場景，是1991年參加日本左派民間團體組織的會議。他發現會議的最後一天，大會的共同宣言以右派語言譴責了中共對於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處理，他在萬分猶豫中發言，建議起草小組不要以世界資產階級的語言，而是以亞洲左派自己的語言來分析「六四」。原本他期待有憤怒的回應，但是卻傳來零星的掌聲，會後更有些與會者來向他握手，表達支持。陳的心情是這樣的：「中國應該不會忘了，在窮困的第三世界，她還有不少的真心朋友吧。」（2005：

11 那次聚會不僅對陳映真意義深長，對當時的年輕作家王安憶更是有長遠的影響。參見王安憶（2004）。

10)——我個人也期待陳映真的話會是大陸的朋友們心中的信念，但是越是接觸越是懷疑，大陸的批判圈似乎眼中慢慢只有自己和敵手(美國)，早已忘記了朋友的存在。

理論的第三世界，情感的第三世界，陳映真的第三世界跟韓國思想家白樂晴的第三世界一樣，都不僅是精神的寄託，也是打開在地民族主義封閉性的外在認同指向，他們的國際主義是以反帝為前提的民族主義的延伸(陳光興，2009)。這是我個人認為重讀陳映真的時代意義之所在。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視野，除了情感之外，是建築在認識論的前提上。在〈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這篇文章中，他說明了何以西方現代主義形式在台灣缺乏了客觀存在的條件：「土壤貧瘠，又偏偏要學習別人種一些不適合於這個土壤的東西，長的當然也是一片焦黃，而且斑斑蟲蝕的了」，更為關鍵的是「缺乏與它西方母體之間的臍帶聯繫」(〈現代主義底再開發〉，人間版作品集8：頁5)。這裡的認識論意涵是：不同的地區有其自身的土壤，藝術、文學與思想必須找到適合於自身的母體的內容與形式，否則直接的移植無法與母體身上的臍帶相連，會喪失養分，不能持續的開花結果。在範疇上，與西方的土壤與母體相對的就是第三世界，更為精準地說，在陳映真的認識中，第三世界直接指稱的就是在世界史中具有共同被殖民經驗的地區：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但是關鍵的問題在於歷史本體的差異被轉化成規範性的評價，在前面提及的〈中國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之比較〉一文中，陳映真指出：

長期以來，在第三世界，存在著兩個標準。一個是西方的標準，一個是自己民族的標準。用前一個標準看，第三世界是落後的，沒有文明、沒有藝術、沒有哲學也沒有文學的。用後一個標準，

可以發現每一個「落後」民族自身，儼然存在著豐富、絢爛而又優美動人的文學、藝術和文化的。(人間版作品集8：頁92)

換句話說，在一個層次上，他企圖說第三世界的文化思想界應該從自身的處境為立足點，從在地的土壤與母體來看待自身的文化生產；在另一個層次上，他暗示著第三世界不同民族的共通性，不應該被關閉起來看待，應該更為積極的相互參照。

### 「他的小說將會永遠留存在這個世界！」

「理論的思維令人疲乏。事實上我對『第三世界』的難忘的體會，不是理論讀出來的，而是源自幾次具體的感性經驗。」(2005:5)陳映真如是說。同樣地，論述也只是皮面，無法像文學那樣去承載難以再現的生命經驗，他對於第三世界理解最為直接的資源與基礎，其實就是他自己的生存環境，體現在他創作的小說當中，貫穿了他早期、中期與近期的文學作品。姚一葦先生在1987年曾經做出這樣的評價與預言：

[……]在我看來，他所寫的其他文字和他的小說，事實上是一體的兩面，所不同的只是表現的方式。小說是內蘊的，含蓄的，潛移默化的，是屬於藝術的形式；而其他的文字是說理的、明示的，訴之於吾人思考的邏輯的形式；因此理論是他小說的延伸，小說是他理論的變形。因為陳映真正是這樣一位真誠的作家；他是入世的，為人生而藝術的。只有在他對現實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為時，才發而為文；他可以採取小說的形式，也可以採取其他的形式。

即使如此，但是就我所了解的陳映真言，我仍然堅持我的看



法，他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因為上天賦與他一顆心靈，使他善感，能體會別人難以體會的；上天又賦與他一雙眼睛，能夠透視事物的內在，見人之所未見；上天復賦予他一枝筆，揮灑自如，化腐朽為神奇。因此我敢於預言，當時代變遷，他的其他的文字有可能漸漸為人遺忘，但是他的小說將會永遠留存在這個世界！這就是藝術奇妙的地方。

(姚一葦，〈總序〉，人間版作品集1-15：卷前頁17)

每次讀到這段文字，都讓人覺得對陳映真的評論很難超越姚一葦先生如此精準的看法，二十餘年後，這段預言更是讓人信服。跟我同輩的同志趙剛這麼說：「陳映真的最深刻的思想往往是蘊藏在他的小說創作〔……〕他的小說所處理的問題往往不見得是論文、隨筆與評論所能夠深入處理的〔……〕他的小說往往較其他文體展現了更大的複雜張力、曖昧難決、自我懷疑，以及深度提問。」<sup>12</sup>是的，陳映真50年來的小說創作留下了豐富的資產，承載了具有時代性的思想與精神，因為他書寫的特性在於貼近於當時的時空背景與當下的社會脈動，而他的政治敏銳度讓他所處理的主題雖然往往超前，卻又涵蓋了政治社會的核心矛盾，因此整體而言，他的作品的廣度與厚度，足以讓我們將他的創作串連起來，提供回顧、把握、分析半個世紀台灣在大歷史中的變動、進入台灣戰後社會、文化、精神史的最佳平台。因此，從思想的層面來看，他的小說創作本身就是第三世界的寫照，大膽地說，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最大的貢獻就是對於二次戰後第三世界精神狀況的揣摩、描寫、建構、解析、反思、批判、心痛、寄望與幻滅後面的持續

12 見趙剛，〈青年陳映真：對性、宗教與左翼的反思〉，發表於「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會議」（2009年11月，新竹：交通大學），此篇文章改寫為〈頡頏於星空與大地之間：左翼青年陳映真對理想主義與性／兩性問題的反思〉一文，收入本書上冊。

堅持。這樣的聲稱顯然流於抽象的概括，還是得從不同的問題意識，透過特定主題，對文本進行閱讀才能充分體現；當然，這樣的工作不是一篇論文可以獨立完成的，這篇文章只是起點，初步嘗試，也期待學術思想界的同仁可以繼續一起努力。

在上述的前提下，本篇文章的分析焦點環繞在狂人、瘋子或是精神病狀態的主題，所選擇感興趣的文本因此也是極為突出、受到注意的幾篇小說。不同的讀者，因為經歷不同，體會不同，或許會在特定的小說中找到共振；選擇精神病作為進入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的路徑不是偶然的，在筆者的家族中，母親晚年罹患精神分裂，父親晚年有躁鬱症，兄長因為精神疾病被工作單位解聘失業，我本人過去20年間也一直為上上下下的精神變化所困，長期在學習如何與失控的狀況共存，對於精神病(院)有切膚之痛的理解，當然也能充分體會社會賦予瘋子污名的暴力，因而，文中難免會調動過去的經驗來理解陳映真筆下的精神世界。更積極的說，這篇搏感情的文章是藉著「陳映真」提起勇氣去面對、分析、解釋自身與家族在歷史中的「病源」。

陳映真對「狂人」長期的書寫與關注，當然是承續了開創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狂人日記》的傳統，但或許是因寫作時間與魯迅相距50年，其間文學界積累了更多對於精神病貼身的理解，陳映真的作品讀來較魯迅更為深刻的進入主體的內在世界。<sup>13</sup>以下的分析選擇了陳映真三個時期與發瘋主題相關的小說：早期的〈文書〉、中期的〈萬商帝君〉、近期的〈夜霧〉，試圖透過閱讀來闡釋陳映真透過小說所體現的第三世界。可以這麼說，本文的動力之一在於說明：精神病是第三世界的生存常態，不是變態。我想說的是：第三世界的物質條件相對薄弱，但是戰亂、社會機制(如人們賴以棲身的家庭)殘破、經濟快速壓縮發展

13 依據筆者長期與「精神病」周旋的經驗來看陳映真深入瘋狂主體的深厚能力，筆者猜測陳映真該有親朋好友深受精神病痛之苦。

等等，許多人處於流離失所的高度擠壓狀態中，精神狀況出問題是經常性的，只是程度不同。我猜想今天處於巨變的中國大陸，精神出狀況的人口該是遠遠超過社會主義時期，但是醫療體系不完善、物資缺乏、家庭解組，整個社會不就是某種瘋狂狀態嗎？問題是我們要不要真心面對、理解這個龐大的社會禁忌？

讓我把話說得更清楚點，以免不必要的誤解。首先，過去對於第三世界的理解基本上停留在政治、經濟的結構性分析，並不進入第三世界的精神面，如何開始理解第三世界精神狀況是本文的根本動力。再來，「第三世界就只是瘋子的世界」不是本文的論點，精神病或是發瘋不能夠與第三世界劃等號，只是一個關鍵的剖面；如果陳映真全部的小說創作構成他對於第三世界理解的整體，提供我們理解更為寬廣的第三世界精神狀況的鑰匙，那麼瘋子只是一個表現的主題與形式。以「狂人／瘋子／精神病篇」為本文的副標題，就是期待其他的篇章在第三世界的大傘下繼續被開發出來，如死亡、分斷、性、左翼、宗教等主題，逐步去展開、覆蓋陳映真的第三世界。趙剛的文章便分享了與本文同樣方向的努力，在不同層次操作。<sup>14</sup>

### 「生命原來便是這樣地糾纏不開的羈絆呀！」：安某瘋狂殺妻

陳映真 1959 年開始創作至 1968 年入獄，可以視為他早期的文學生產期間。這個時期的台灣社會可說是逐步走出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陰影，全球冷戰結構已經穩固，兩岸分治已然形成，親美反共的意識形態架構規範了社會整體的走向，在威權統治的前提下，民間被迫以擱

14 見趙剛，〈青年陳映真：對性、宗教與左翼的反思〉，發表於「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會議」（2009年11月，新竹：交通大學），此篇文章改寫為〈頡頏於星空與大地之間：左翼青年陳映真對理想主義與性／兩性問題的反思〉一文，收入本書上冊。

置政治民主訴求、全心投入經濟發展的方式向前邁進，簡單的說，這是個重新啟動的年代，因此，文化上可以說是生氣蓬勃。<sup>15</sup>相對於時代重現些許亮光的氛圍，陳映真是帶著五〇年代所經歷的林林總總的憂鬱境遇與感傷進入六〇年代<sup>16</sup>，或許正是前一時期養成的多愁善感讓他能夠與這個正在形成的新社會主流感覺結構之間，保持了一定的批判距離，他的孤獨與徬徨讓他能夠以濃烈的、後來他大力批判的所謂現代主義的筆觸／文風，在自我抒發中刻劃著六〇年代的社會。

從陳映真早期的小說開始，瘋子與精神病就一直是他書寫的主題，1961年的〈蘋果樹〉該是第一篇<sup>17</sup>，文中作家同情地刻劃著房東廖生財的文靜的、輕度精神病的妻子，與處於半瘋狀態的青年畫家林武治的一段戀情，相當細膩的、動情的描寫著她的生活世界，是那樣的「迴然于吾人」（洪範版小說集1：頁142），似乎牽引著作者陳映真，想要繼續走進那個難以進入的精神病世界。於是，經過不到兩年的準備，1963年他發表了第一篇「精神病書寫」——〈文書〉，直接觸碰精神病的問題；同時這或許是陳映真最早直接處理「外省人」流離失所，帶著過去揮之不去的歷史經驗的沈重壓力，終究精神崩潰的小說。<sup>18</sup>〈文書〉由兩

15 見鄭鴻生，〈陳映真與台灣的「六十年代」〉（收入本書下冊）。

16 陳映真在〈後街〉一文中，對他的五〇年代有部分陳述，從他的境遇中可以體會到早熟的青年陳映真，包括過繼為養子，情感至深的雙胞胎哥哥早逝，親愛的鄰居姊姊被情治人員帶走，走過政治監獄外的高牆等等。（〈後街〉，洪範版散文集1：頁51-54）

17 在此之前，1961年1月於《筆匯》發表的〈貓牠們的祖母〉中簡短的提及，祖母思念關在病院中的兒子泉兒，在父親死於荒島監獄後，叔父吞了家產，讓他沒法去日本學畫，又被下了咒藥，發了瘋成了廢人，十幾年來，衣衫襤褸，整天自言自語（〈貓牠們的祖母〉，洪範版小說集1：頁87）；同年6月，在同刊發表的〈加略人猶大的故事〉也是一筆帶過，猶大是如何在安逸頹廢的日子中，慢慢染上憂鬱症。（〈加略人猶大的故事〉，洪範版小說集1：頁114）

18 陳映真對「外省人」，從早期到後期的作品，一直都呈現了高度的關懷與同情。最早提及外省人的小說，該是1961年發表的〈貓牠們的祖母〉中，搶走了祖母孫女娟子的外省軍人張毅。最早成為小說主人翁的該是1961年〈那麼衰老的眼淚〉中的康先生及其子青

個部分構成，開頭是公文文書形式的報告，簡單的分點說明案情，而後由自白書構成小說的主體。根據巡佐周某的報告書，當事人安某少年從軍報效國家，大陸來台退休後經營紗廠，娶妻楊氏後生活美滿，而且為人謹慎膽小，不應該會犯下殺妻罪，經過追查，該是因為過度忙碌，導致精神異常，有精神病院診斷為證明。於是附件安某的自白書，對讀者而言就成為解開他何以瘋狂殺妻唯一的線索。案發後，安某錄口供時，時而清醒時而發病，常常語無倫次，於是周巡佐讓他服下大量鎮定藥物，花了三個日夜寫完了自白書，經過幾番「拼排刪修」，最後呈給上級銷案，也就是讀者閱讀的版本。周巡佐上報的意見是：「疑犯自少頗工於文藝，唯其中仍多荒謬妄誕之陳述，語多鬼魂神祕，又足見其精神異常之狀態也。雖不足採信，或不無參考之價值焉」（〈文書〉，洪範版小說集1：頁159）。這篇「精神病書寫」確實展現了作家的功力，自白書在時間軸上不斷跳躍，思緒上自由聯想處甚多，但細心的讀者來回對照，能拼貼出來龍去脈，可以說是作家早期一次成功的實驗，爾後成為他的寫作風格之一。

自白書共分三段，依照時間的順序進行，貫穿三段主要故事的是那隻雙眼翠綠的鼠色的貓，每每在死亡事件發生時就會出現，似要吞噬安某的靈魂。第一個場景大約是在1920、30年代的中國北方。安某的祖父安師長是軍閥手下立有戰功但是魚肉鄉民的狠角色。那年初雪天，在家院的柴房中，下人馮忻嫂因為被師長的次子（安某的二叔）糟蹋，上吊身亡；就是在這個陰暗的房裡，馮忻嫂的身軀在空中搖晃時，鼠色貓第一次凝視著伏在地上精神受到驚嚇的少年安某：「在那個相持的片刻裡，牠使用那桃紅的、微濕的鼻子嗅著我。大約便從那時起，這鼠色的貓便噬住我的靈魂了。牠嗅去了我的靈魂了」（同前引：頁

---

兒，與本省下女阿金的愛情悲劇。

164)。這隻讓人又恐怖又迷惑的綠貓當然不會無緣無故跟上年幼無知又無害的安某，這一切似乎又與他祖父安師長的殘暴有著什麼關連，安師長強收糧稅，莊民已經被之前的軍閥扒過一次皮，沒有能力再繳，所以只能逃走，卻在逃亡的路途上全被殺光，「那條路臭了好多月，都沒有人通行」(同前引：頁164)。作家筆下的戰亂，點點滴滴的勾勒出時代的背景與接下來會慢慢清楚的歷史糾葛，在那個混亂失序的時代裡人命不值錢，馮忻嫂、整村村民就是這樣命喪黃泉，肇事者表面沒事，卻也債留後代，安某只能承接(這點很關鍵，請讀者在往下的閱讀中放在心上)。

抗日戰爭期間，家道中落，安某沒有別的出路，於是違背了家庭的意願，輪迴似的又投軍了，來到了寒冷的塞北。本來以為可以隱姓埋名，卻被直屬排長湖南人關胖子發現他的出身，原來胖子吃過安師長部屬的大虧，左胸部被割去一塊肉下酒，現在終於得到報復機會，讓他受盡凌辱，「我便彷彿成了一個受賣身契束縛著的古奴隸，生活在毒惡的鞭笞之中。但在另一方面，我的如火的怨毒在與日俱增地成長著，一層層地在我的心魂之底層沈澱著、堆積著」(同前引：頁169)。軍隊上下關係本來就森嚴，長官要整部屬很容易，碰上關胖子的復仇意識，安某的痛苦日子可想而知，在平時下屬只能忍氣吞聲，壓抑心底的怨恨，雖然恨意不斷長大。戰時不同，機會終於來了，日軍夜襲，槍聲四起，關胖子帶頭向前跳起衝鋒，「那時我舉著槍一發一發地放著。胖子跳躍著，便在我的射程裡，踉蹌著栽下一身肥膘」(同前引：頁166)。關胖子就這樣死在安某槍下。從戰場回到軍營，他進入胖子的房間，第二次見到了那隻鼠色的貓，兩造對視，「我在那悲楚的、哀憐的、鬼綠色的眼光裡恐怖起來」(同前引：頁170)，與幼時的那次相遇不同，安某冷入骨髓的恐怖不再無辜，胖子就算不該欺人太甚，安某更不該致人於死地，連判官鼠貓都替胖子喊冤，深感悲哀與憐憫。為了

確定關胖子已經死了，安某帶了一個小兵清掃戰場，小兵執行命令，補了一槍。安某看到胖子時，除了身上有一排敵人的子彈，同時，右胸口有一個彈口，「很是燦爛地開著血和肉的花朵」（同前引頁），此時，遠處又聽到貓嚎之聲，好像在跟安某喊話：你過頭了！兵荒馬亂之際，兩軍對陣衝鋒殺敵，槍口一致對外，作者陳映真讓我們看到的卻是戰場的「後街」：對日抗戰也正是有怨報怨的好時機，關胖子要報安師長的仇，而安某要報的是遭關胖子凌虐之辱，而這些又是動盪時代內憂外患的產物，人的生命是完全不被尊重的。而冤冤相報會是沒完沒了，民族內部的仇恨會比外部來得更為直接，更為傷痛，也更難從身體記憶中消散，只是安某絕對不會想到，最後帶著胖子的肥膘來找他算老帳的，還是那隻一路從大陸跟來隨時窺視著他的綠眼貓。

來台不久，退役後，靠著關係在紗廠任職，身心的需要讓他主動勾引了貌美的女工楊珠美，此刻正逢台灣經濟起飛、都市化的過程，生意做得不錯的安某，於是風風光光包了五輛車，去南部農村迎娶珠美為妻，婚後幸福美滿。但是事與願違，鼠貓又出現了，情節複雜：安某試圖抹去的記憶又在無意中被喚起，很可能珠美年幼時的小哥，多年前在監禁中被槍決，而負責執行的正是安某本人！小哥長相幼稚清純，不是惡人像，所以安某當時行刑的印象很深，這段描寫極為細膩，是典型陳映真式處理死亡的冷酷有情：

時間一到，我上去替他蒙著眼。蒙好了，他卻忽然說：

「不要，不要這布啦，請擱開，請——……」

我於是取下了布。他羞澀如處子一般地微笑了一下。他站定了位子。有些死囚開始嘶喊著口號，但是他只是那樣沈默地，如處子一般地站立著。我按著號令舉起了槍。我在準星尖上看見他很匆促地看了我一眼，便微斜著臉去看遠處的沙灘。我又按著口

令扣動了扳機，他便那樣簡潔地應聲而倒，好像斷了線的傀儡；好像從來就不曾有過生命的土塊那樣地向前崩落。他只是那樣不沈重地仆倒下來罷了。連最小的掙扎都沒有過的。

（〈文書〉，洪範版小說集1：頁175）

與常人不同的是，這個年輕的少年有一種不畏死亡的魅力，替他摘下眼罩居然是以羞怯的笑容相對，面對著槍手舉槍還對他看了一眼（記住了劊子手的模樣，等待日後相遇？）。雖然伊的哥哥／少年何以入獄、死罪罪名為何，文中均沒有提供線索，只知道被安某槍殺的少年是少數獄中能夠說一口清晰國語的犯人（同前引：頁175）。一種合理的歷史解讀方式是：作者描寫的正是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少年應是有大陸經驗的左傾「思想犯」，而在1963年寫作時還沒有政治空間能夠明說，只能透過極為細膩的筆法營造死亡過程中暢快的氛圍，以美學偷渡思想禁忌：犯人處之泰然，眼睛看著遠處，似乎期待著死後的未來，對於自己的被行刑沒有一絲的悔恨，特別是倒地的剎那是那樣的自在，或許是年輕而沒有包袱的那種從容，沒有哭泣，也沒有重於泰山的大義，但是作為讀者的你、我知道事情沒了。

如處子般清純的少年，就是這樣安然離去的。行刑後（再次殺人的）安某非常不安，於是請求退職了，如今卻在珠美的陳述中，無論是否真是伊的哥哥，安某被迫重新回到、面對已經淡忘的記憶，是的，「生命原來便是這樣地糾纏不開的羈絆呀！」（同前引：頁176）而伊的哥哥死前的那天，有隻鼠貓來到了珠美南部的家，雖被以為是不祥之物，但不知什麼緣故，伊的哥哥死後，家人居然都喜歡牠，竟收留了牠。幾年後，就跟魯迅〈傷逝〉裡的那隻狗跟隨在子君死後回來找涓生一樣（魯迅，2004：155），那鼠貓竟千里跋涉從南部自己跑來（甚且可能是跋山涉海，從安某老家跟到塞北再輾轉來台）找她（他），使得珠美興



奮不已(使安某能不驚惶失色?)。(<文書>, 洪範版小說集1: 頁172-173)

該來的總是會來。四月前的雨季裡, 安某提前下班回家, 珠美正在午睡時, 他竟赫然看到美貌如女子的少年在旁讀書, 安某猛然贖罪般下跪, 並因內疚而歇斯底里地痛哭失聲, 驚醒了妻子後, 少年驀然地消失, 只剩下飛躍窗頭而去消失在院子的鼠貓(同前引: 頁172-173)。安某沒法告白自己是殺害少年/伊的哥哥的劊子手, 珠美不知內情便認為他病了。瀕臨崩潰的安某, 心神不寧日日枯萎, 在之後某個無法成眠的夜裡, 心中刺痛地看著深愛的枕邊人, 爾後批衣而起到大廳裡找煙抽後,

回到臥室裡, 赫然的竟又是那少年站在我們的床邊。他的臉色蒼白, 在夜光的迴照中, 十分柔美而和善。我的心悸動著, 在茶几的抽屜裡握住左輪, 對著他開放起來。少年也是那樣簡潔地仆落在床下, 不料卻成了關胖子的伏臥的死屍; 我於是又朝著胖子連發兩槍, 槍彈打翻了他的身體, 忽然又懸掛在半空裡了, 馮斫嫂背著我輕輕地動盪著伊的影子。我不住地發著槍, 直到彈盡。(<文書>, 洪範版小說集1: 頁178)

而回復深夜的寂靜時, 四射血泊裡的竟是僵臥的鼠貓與右胸染滿了鮮血的愛妻。

陳映真書寫的一大能耐, 就是在高潮戲中把複雜、糾纏、揮之不去的, 多重關鍵的歷史片刻揪在一起, 所有過去與死亡的場景在此匯聚: 馮斫嫂、關胖子、少年/伊的哥哥、珠美, 及那隻陰魂不散終於被亂槍打死的綠眼貓, 以如此沈重的速度, 壓縮在同一時間點上, 穿透了安某最後的防線, 於是他終究要用發瘋來跳出這個無法逃離又無法承受的人生, 即便是少年/伊的哥哥的柔美與和善都沒能軟化他內

心愧疚所引爆的強大悸動，驅使他拔槍四射。如作者／自白者自己的認知：「生命原來便是這樣地糾纏不開的羈絆呀！」過去的事，包括與自己個人看似無關的出身（安師長的孫子），都會糾纏在一起，至晚年之時，以前沒法忘卻的（壞）事都還會來作祟；或是說，自己身體中的幽靈都會回去找過去未了的事——這命題是陳映真從1963年〈文書〉的安某，一直到最近期2001年〈忠孝公園〉的馬正濤，不斷回返的問題意識：歷史從來就不是過去式，在精神地景中它如影隨形，不僅會在適當時機跑來敲醒心門，更會把靈魂逼到走投無路而發瘋。陳映真那一代歷經戰爭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不斷地告訴世人不能閃躲而要面對、清理歷史，或許正是基於這樣的體認。

把〈文書〉放回它的時代，1960年代初期還在第三世界殖民地獨立建國運動的浪頭上，然而東亞地區的格局已經是處於冷戰對峙當中，雖然前殖民地像韓半島與台灣形式上脫離了殖民統治，但是卻綁在分斷狀態當中。本來像安某這樣的人來到台灣，離開軍隊，成家立業，該是可以安身立命的時候，沒想到這個重生的企（祈）求又被無法逃脫的大歷史打亂了；他的命運跟黃哲暎〈韓氏年代記〉（1972），從北韓南來成為「失鄉人」的韓永德醫生，是一致的。<sup>19</sup>〈文書〉在時序上跨越了1910、20年代的軍閥割據，1930、40年代的對日抗戰，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1960年代的經濟起飛，陳映真對於安某發瘋的解釋是歷史的、是國族的、是家族的、也是個人的。相較於前／帝國核心地帶，剝削對象、殺戮戰場雖總不在「國內」，侵略、暴力的感覺結構（很多燒殺擄掠這些在「家」已經不能做的事，到了殖民地、戰場就解

19 在南韓，當初韓戰後從北韓來到南韓，後來無法返家的人，稱為「失鄉人」，不是外省人。感謝白池雲在2008年10月筆者走訪仁川時，給我的機會教育。特別感懷那次她對仁川作為港都，讓很多失鄉人在那兒得以聚集的介紹，以及與崔元植先生那段讓人難忘的港邊晚餐，首次喝到杯底有鱈魚的清酒。

放了)不必然為本國國民所分享，以至於個人、家族與國族得以有脫勾的空間，精神出狀況的主要意象被理解為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個人的孤寂與異化；相對而言，台灣在六〇年代初期剛剛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制，安某的處境不能用歐美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關係來理解，直接歷經殖民地、戰亂的第三世界，國民親眼目睹殖民羞辱與戰爭暴力，構成了社會身體的集體記憶，成為主體性的物質基礎，雖然脫離了殖民、遠離了戰爭，過去未了的幽靈隨時附身，把個人緊密的帶回家族、國族歷史的暴力。瘋狂不是第三世界所獨有的經驗，然而出身殘暴軍閥世家、藉戰場殺直屬長官、顛沛流離、淪為刑場劊子手、瘋殺愛妻，這些能夠匯聚在安某一身，何嘗又不是對第三世界地區極為壓縮的經驗的體現？

### 「這懦弱、不敢說真話的人間……」：瘋子林德旺追問現代性

〈文書〉於1963年發表之後，陳映真在1964年除了廣為流傳的〈將軍族〉之外，還發表了很少人討論的第二篇精神病書寫——〈淒慘的無言的嘴〉，精神病患「我」開始徹底懷疑、作弄精神科醫生：「一切自以為是的人都很少傾聽別人的話的」(洪範版小說集1：頁220)。三年以後他再次觸及發瘋主題，是在〈唐倩的喜劇〉中，美麗的唐倩的床上工夫，讓三號男友——新實證主義哲學家羅仲其帶來了「無窮的焦慮、敗北感和去勢的恐懼」(洪範版小說集2：頁144)，最後羅大頭終於被逼得發狂，而自殺身亡。陳映真在同年(1967)創作的〈六月裡的玫瑰花〉則記錄了冷戰體制下，美國黑人老兵巴尼與台灣吧女艾密麗相依相惜的感人戀情，可以說是〈將軍族〉的跨民族版；奴隸家族的精神病史、幼年記憶裡母親賣身養家、越戰為自保濫殺無辜的內疚，這些夢魘終於讓巴尼病發入院，被鴨子(duck)／醫生(Doc.)逼迫陳述著鬱積胸中、難以啟齒的祕密。

1968年，在世界性大規模的文化運動風起雲湧之際，陳映真入獄7年，在高大的紅磚圍牆中，落著淚與左翼歷史相遇：

在押房裡，在放風的日日夜夜，他帶著無言的激動和喟歎，不知厭足地聽取那些被暴力、強權和最放膽的謊言所抹殺、歪曲和污穢的一整段歷史雲煙。穿越時光的煙塵，他噙著熱淚去瞻望一世代激越的青春，以靈魂的戰慄諦聽那逝去一代的風火雷電。（〈後街〉，洪範版散文集1：頁60）

「老同學」們託付般的身教與言教，於是構成了他在下一個時期創作得以轉進的基石；這些故事到了後來思想管制越發放鬆時，陸續且慢慢直接的呈現在〈鈴璫花〉（1983）、〈山路〉（1983）、〈趙南棟〉（1987）、〈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沈落〉（1994），為台灣戰後左翼精神史的傳遞留下了想像的香火。

感謝老同學凝重的託付與陳映真獄中7年積累的淚水！

1975年陳映真出獄的時候，台灣已然進入經濟發展的高峰期，跨國資本主義正在大肆入侵，他跟跨國公司有了緣分，進入美商溫莎藥廠上班，取得了深入觀察的機會，於是3年之後開始創作了所謂「華盛頓大樓」系列，記錄了台灣七〇年代中期至八〇年代初期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成為今天相當可貴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報告。<sup>20</sup>

少為人注意到的是陳映真1978年再次復出文壇的第一篇作品〈賀

20 1976至1981年間，陳映真在外商公司（溫莎藥廠）負責一份社內刊物和公關雜誌的編輯與出版，故留下好幾篇當時文藝界較鮮少人知的訪談報導（〈「石破天驚」自序〉，人間版作品集7：卷前頁23）：〈生之權利：訪王曉民和她的家庭〉、〈感謝和給與：訪慕光盲人重建中心〉、〈美好的腳蹤：訪謝緯醫師〉、〈懷念蘭大弼醫師：訪彰化基督教醫院〉等，後均收入在《陳映真作品集7：石破天驚》（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一卷。

大哥》，氣質與「華盛頓大樓」系列迥異，基本上延續了前期的文風，題材上則承續了〈六月裡的玫瑰花〉的越戰後遺症，描寫著在最後被遞解出境前住在台北精神病院的美國青年麥克·H·邱克，其中第5節的病歷報告書，是他的第三篇精神病書寫；當然，與前期創作不同的是，透過賀大哥這個角色，陳映真更為直接地透露了他的左翼思想，批判了資本主義與美國帝國主義，在越戰造成的嚴重禍害。

而〈萬商帝君〉也是陳映真在這一個時期的作品，並被歸類為華盛頓大樓系列的第四篇，一般的評論多放在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但是放慢速度細心閱讀將會發現〈萬商帝君〉的整體內涵遠遠超出於此，開啟了第三世界現代性對弱勢主體精神壓迫的問題的討論。這是一篇結構上相當複雜的作品，以跨國公司內部代表的務實本土管理階層陳家齊（外省人）與劉福金（本省人）所代表的新興MBA兩個派系間的鬥爭為主軸，以兩個相對低階、相互支持的女秘書Rita與業務員林德旺為輔助的敘事方式來展開。閱讀這篇1982年的小說，陳、劉二人的角力彷彿是預見了20年後藍綠對決的氣氛。故事的結局是，陳、劉共同負責的莫飛穆公司亞洲大會正好碰上了中美建交，台灣陷入緊急狀況，美國總公司決定增加在台投資，藉美中關係改善的機會，用資本主義反攻大陸。於是，陳家齊與劉福金兩人放棄了盲目的（統獨）民族主義，最後團結在跨國資本的世界主義旗幟下！

有耐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在宏觀的政治經濟學大敘述背後，〈萬商帝君〉的化身林德旺其實是作者著墨最多、也最為認同的主人翁，更為關鍵的是這個無法在跨國公司體制中向上爬的鄉下小孩，最後雖然瘋了，但卻以民間信仰的萬商帝君形象出場，闖入進行中的國際會議，對跨國資本主義進行批判。這是一個野心極大的創作，處理的是資本主義如何動員鄉土的（精神）資源去服務跨國公司，特別是讓我們看清鄉土情感的長期滋養如何成為服務跨國公司的物質基礎，純樸的鄉下

青年又如何在大環境追逐現代性時，必然會被逼發瘋。

與〈文書〉中的安某相較，林德旺發瘋的原因很不一樣。安某成長於早一個年代，幼年見到上吊慘死的馮焯嫂，在戰亂中報怨殺死關胖子，又因服役軍中被派去槍決了少年／珠美的哥哥，甚而最後瘋狂殺妻；大時代的戰亂不斷，被迫離鄉背井，殺人內疚的積累，構成最終精神崩潰的主要軌跡。而林德旺的病因則其來有自：家境貧窮、物質條件不夠的幼年林德旺，從小缺乏安全感，晚上不停地說夢話。祖父務農，因欠錢沒法償還，而服農藥慘死山澗的草叢中，於是他被父母賣給債主／流氓養父「烏狗添」那兒抵償債務；養父關係混亂，包娼包賭，醉了就拿他出氣，用竹劍毒打，沒女人時就叫德旺跟他一起睡那張又軟又寬的大床。烏狗添被三尺掃刀砍飛一隻肩膀而死後，德旺才從物質充裕但精神空虛的養家回到了長久思念的生家，但得到的團聚卻是失望與孤寂。赤貧家中的四個兄長在外打工，姊姊素香成為他心靈上唯一的屏障，力排眾議地讓他成為家中唯一念過高中、後來又讀完了專校的孩子。（〈萬商帝君〉，洪範版小說集4：頁195-199）

德旺的不安全感紮根在幼年時期，作者在他最後發病初期時帶我們回到當時的記憶。在銅鑼鄉炙熱的夏天，他跟著鄰居哥哥阿倉去溪裡玩水摸蝦，結果發生了孩子間的爭執，阿倉把他打了一頓，然後按到水裡讓他幾乎滅頂，求生意識驅使他狠咬阿倉的腿，才能把頭露出水面，保住一命，當然又是挨阿倉哥一陣毒打，但德旺「只是那樣在溪緣的水中淒惶地、大聲地號哭著」（同前引：頁177）。阿倉丟棄了他，逼得他自己找路回家：

他在溪邊的一塊大石頭上癡呆似地坐著，然後起身尋著和阿倉哥走來的，印在沙礫和石頭上的足蹤，離開溪埔。那時候，夕陽把整個埔上的管芒，一概染成金黃的顏色。可一走上黃土地，天

就逐漸地暗了下來。原來深綠的，在風中婆婆著的相思樹林，現在卻變成了一幢幢的、遼闊的樹影。就在那時候，他曾覺得所有來過和將去的路，他全不認得了。在越來越暗的天色裡，他的稚少的心中，充滿著從未知道過的焦慮、恐懼和絕望。他在夜色中奔走，向著他無法確定的方向。這時候全世界似乎只剩下了他驚恐的足音，和自己細小而急促的喘息聲……（〈萬商帝君〉，洪範版小說集4：頁178）

這裡作者陳映真再次以他慣有特色的筆法，用寫「景」一方面去拉開主人翁身處的空間場域，營造出被丟棄在大自然黑夜的荒蕪，另一方面深刻地、同情地刻劃出了主體心底不斷回返幼年被拋棄的「原始場景」（primal scene），被遺棄的心痛讓他第一次在幼稚的生命中學習到什麼是焦慮、恐懼與絕望，以及生命中沒有方向感的徬徨：「就在那時候，他曾覺得所有來過和將去的路，他全不認得了」，那種生不如死的孤寂感似乎預先宣告了他將與黑色世界常相左右；也許只有在日後失敗、沮喪、傷心、發病時，才能體會到當時夜路的不確定感，與白晝中的跨國公司是一樣的，被丟棄後的陰森世界裡剩下的只有自己獨行的足音與心悸的喘息聲。

林德旺在高中期間第一次發病住入台北精神病院長達一年的近因不明，怕的不是被關起來，得去面對禿頭醫生無聊的盤問，逼他再次說出養父回來找他的怪夢，而是長期恐懼深怕再次「掉進那幽暗無邊的日子裡去」（同前引：頁180），特別是常人難以體會在住院前地獄般的痛苦，「那種不能自主的絕望、失敗和無顏面、無力氣再活下去的那種心情。就是那個，他想。那就是陰險地，一步步包抄著過來的黑暗。他必須使最大的氣力，哪怕是拼著一死，也要躲避那一回想起來就想要緊緊地抓住什麼的恐怖和迷亂」（同前引：頁192）。作者陳映真讓我們體會

到發病是一個過程，一步一步為幽暗所籠罩。我的體會是：憂鬱症發病到了一個深度，就像是跌入無底深淵的黑暗世界，不敢見人，也無臉見人，信心全失，萬念俱灰，過去的生命一切都失去了價值，那種被關閉起來的沈重，看不到爬出幽暗世界的可能；也就是這種難以承擔的痛，讓許多所謂的精神病患都難免會閃過自殺的念頭，有些最後走向死亡的絕路尋求肉身的解脫。但是走過十八層地獄那樣恐怖之後的精神病患，不再將死亡視為恐懼，是拋下不再可能逆轉的現世對於未來的寄望，早死早超生。

而對年輕堅韌的林德旺而言，尋死還不是時候。所有鄉下的過去的恐怖記憶所構築的幽暗世界於是成了他極欲向上擠身亮麗的上流世界的前提。

競爭條件相對薄弱的林德旺，進入莫飛穆公司再次發病前，身上就有的不只是魯迅筆下的精神戰勝法，也充分具備阿Q以自保為中心的主觀主義，把自己劃入陳家齊派系，遲早將夢想成真做到海關事務部的馬內夾(manager, 經理)。但總是得面對不被重視、升遷無望的事實，失望之餘能做的也只是一次次「躲在一落落檔案架的陰影裡，讓那連自己都不甚理解的淚水，不斷地流著」(同前引：頁174)。是，他真的不理解他如此忠心耿耿、努力工作，為什麼好事總輪不到他。夢想落空的困窘、焦慮、羞恥與絕望，他該能夾著尾巴逃回家鄉，在那兒找到溫暖與安全。但是，這條返鄉的路早已被關閉起來，德旺當初逃鄉的認識正在於：「比起台灣莫飛穆國際公司乾淨、高尚、富麗的人們，外面的世界，即使這個他的故鄉，也顯得那麼愚昧、混亂、骯髒、落後」(同前引：頁186)。這不僅是鄉下人對城市的嚮往，也是對跨國資本的欲求，受過跨國公司高檔文化的洗禮，德旺已經沒有機會重新回到僅存的寄託——家，而且是破碎瓦解中的家。

姊姊素香以乩童為主業，靠著極費體力的扶乩來支付少年大病的



弟弟德旺的醫藥費，爾後做過推銷員、女工、工地零工，在「龍宮」海產店當過服務生，養家活口，堅持讓弟弟繼續唸書，她是德旺最後的依靠。外出到莫飛穆工作，經濟條件不足，又得看來體面，只能回鄉求助，素香告訴弟弟，你變壞了，最好還是趕快辭去工作回來吧，「做田人有做田人的去路」，他回答說，自己在外商公司的高等地方跟高等人一起工作，跟姊姊借點錢算是投資，買點好衣服，以後會還的，素香拉高了聲調問他外國人就比較高級嗎？這個見過些(真實)世面的素香如是責問，「對外國人來講，台灣就好比鄉下〔……〕我不是在『龍宮』做過嗎？我看得可多了。幾杯酒下肚，日本人，美國人，誰都一般醜！」(同前引：頁185)姊姊告訴他，外國人就算是看起來體面，都還是外莊人，「是外莊人，就休想給你留下什麼好處」(同前引：頁187)。素香最後要他選擇，不是趕快回家，不然就是拿著錢，以後不要回來了。她無奈的忠告：「花草若離了土〔……〕就要枯黃」(同前引：頁188)，也只能被弟弟理解為宣示從此將他拋棄，頓時失去唯一的最後靠山。德旺深感「羞恥、氣忿、懊喪」，一把抓起桌上的紅包，沮喪的離家，誓言必須衣錦榮歸，開著裕隆轎車回來光宗耀祖，誰能料到上升無望，終究變成無家可歸，只能孤寂地偷生在這個冷漠的、無助的大城市中。

這是陳映真筆下真實的「後街」。有多少鄉下人對於城市、對於外商公司的幻想最後都是破滅的，但是進入我們眼簾的只是那些體面的「成功人士」，這個社會抹去不讓看見的、也看不到的是林德旺們，他確實沒有條件在外商公司競爭，花草若離開了土，沒法兒得到養分持續的灌溉，很自然地就要枯黃，鄉下小孩的養成與城市人全然不同，卻被吸入這個無情的競爭結構當中。跨國資本所傷害的不只是什麼對於勞動力的剝削，而是對於林德旺們勾起了他們的高等慾念，鄙視自己的鄉土，最終又在競爭失敗中將他們踢向谷底。諷刺的是，在整體的結構中有能力抵擋、抗拒高等的跨國資本的力量，卻是紮在莊裡的

乩童姊姊素香，是她在戳破高等的想像，是她在告訴我們跨國資本不會留下什麼。但是同時，最為令人悲鳴的是，也是素香姐支撐了德旺向上爬的物質基礎——不是她的堅持與辛勤工作，德旺不會在年幼時被送入精神病院起死回生，不是她的大力爭取，他不可能有機會繼續唸書，也就不會拿到進入跨國公司的入場券！這些都是第三世界後街裡的真實狀況，不容抹去。

林德旺對於跨國公司過度美化的理解是：跟本地公司不同，「在外國公司，只要有能力，工作賣力，都會受重用」(同前引：頁184)，只要自己努力，再加上搭對了陳經理派系的線，遲早總會出頭天。所以他沒法理解不被重用的原因到底在哪？德旺只能主觀的把問題歸咎到他不小心撞見經理老金與總經理秘書 Lolita 在會議室中做愛，所受到的不該受的懲罰，實在不是他的錯！那個揮之不去的場景，終於成為他發病時不斷出場的夢魘：

固定的夢，他想。被扯到一邊去的胸衣，把一對碩壯的乳房辛苦地擠在一邊。暗紅色的乳暈，看來像是一種皮膚的腫炎一樣，因為不知道是汗水或是老金的口涎，發著溼潤的亮光。然後這裸的、佻促的乳像一面高塔一樣，向他倒塌下來。他恐慌地掙扎，而那乳房卻一直緩慢地倒壓下來。他的心因為恐懼而急速地悸動。他拼命地呼吸，卻被濃郁的香蕉的氣味所窒息……(《萬商帝君》，洪範版小說集4：頁194)

這個交織了處男般偷窺的性興奮與看到不該看的詛咒感，壓下來的乳房讓他在盜汗中驚醒，齷齪地脫下內衣擦去汗水，「他脫下內褲，看見了枯乾了的、新夢遺的痕跡。〔……〕他的棕黑色的男性，看來悲戚而且醜拙，在荒亂的體毛中，纍纍地下垂著……。」(同前引：頁191)作者用

他化腐朽為神奇的筆成就了極為身體、氣味、感官、慾念中的醜陋美學，讓獨居發瘋的林德旺靠著鎮定劑暫時逃離白晝的壓迫，但是夢醒過後還是逃不了離家時的「羞恥、氣忿、懊喪」（同前引：頁188）所帶來交織在一起、沒法分辨的「淚污、鼻涕和汗水」（同前引：頁180）。而與屎、尿、淚水活在一起的當然不是莫飛穆公司裡的「地毯，冷暖氣，高級的辦公傢俱，一切文書都是好幾台漂亮的IBM打出來的英文」（同前引：頁183），而是躲在跨國公司身影之後，受傷的土狼舔去血跡的破公寓：

[……]他這樣迷亂地、細聲地對著這空虛而荒蕪的空屋，訴說著在心中蜂湧著的思想，讓淚水、鼻涕溼透他整個疲倦、蒼黃的臉。

然後，鎮靜劑使他睡著了。他的右邊的胳膊，還是彎曲著蓋在他的眼睛，遮住從窗子射進來的天色。窗外是一堵灰色、陳舊的一家三層樓酒家的後壁。廚房的大抽風機，這時開始把白濛濛的油煙排出來，順著這堵灰暗的水泥牆向上浮散而去。

（〈萬商帝君〉，洪範版小說集4：頁190）

作者再次帶領我們辯證地看清：跨國公司鮮亮的外表，其實正是靠著躲在骯髒黑暗小巷子裡油煙密佈的破舊隨亂隔間的小屋與臨時的塑膠衣櫃所支撐；老金咬著 Lolita 壯碩的巨乳流下的口水，發出溼潤的亮光，又何嘗不是鮮明的對應著德旺纍纍地下垂著的男性，悲戚而醜陋？

林德旺於是再次瘋了！

就算瘋了，他還是跟狂人一樣，頭腦清楚的知道：「我當然不屬於鄉下那個落後，不識字的地方，哈」（同前引：頁201）。他在自助餐店裡，在切成細長條、發紅的豬頭肉裡看見摻雜了人耳、指頭、生殖器……，他把老闆娘的笑容當成是猙獰的黑心人，下一個要宰掉的就

是他，於是拔腿狂奔。但是，發瘋的他在被迫害妄想中反而又能跳脫自我中心的局限，看清了世間的真實存在：

**每一個人，都相互欺詐，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把人的筋、骨、肉、皮，當作豬肉、雞肉吃掉，他想著。只為了保全自己，就不惜欺誑著別人和自己——每一個人都明知自己在欺誑著別人和自己——而不去說破，吃著同類的肉，啃著同類的骨，喝著同類的血……卻沒有一個人敢起來舉發那人肉黑店的真情，打殺了那長著一身白得像用蠟去做成的白肉的，終日油膩膩的老闆娘。**（《萬商帝君》，洪範版小說集4：頁204）<sup>21</sup>

我們上網一點來閱讀，此刻的自助餐店成為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縮影，人吃人、人欺人都是為了自保，就是沒有人敢勇敢地站出來，拆穿那個靠著剝削別人養肥自己的老闆娘，才是殺人魔王。陳映真的林德旺對於1980年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承續了魯迅的狂人在1910年代對於中國文化的反思，控訴著人吃人的欺誑。林德旺心中已定，他會是那個要公開揭穿黑店真相的瘋子。

莫飛穆公司的亞洲區域性大會，在陳家齊與劉福金的萬全準備中，於台北的國際飯店粉墨登場。會議進入第三天的高潮，正當遠東區行銷部長McMurry先生在討論如何找出行銷問題之所在時，會議室的大門被衝開，闖進了一個衣裝不整的怪人，用閩南語高聲喊叫：「我是萬商帝君爺……世界萬邦，凡商界、企業，攏是我管轄哦！」（《萬商帝君》，洪範版小說集4：頁234-235）此人力大無窮，飯店人員沒法制止他的，場面混亂，他目中射出兇光與憤怒，繼續高喊：「我萬商帝君爺

21 黑體字強調為本文作者所加。

有旨啊……你們四海通商，不得壞人風俗，誑人財貨喂……」(同前引：頁235)。此時，老經理陳家齊看出是他，怒喝林德旺不准胡來！德旺聽到是老經理的指揮，慣性地馬上就馴服的退下了。外國人問是怎麼回事？陳家齊雙手一攤：「沒啥，一個瘋子，就這麼回事兒」(同前引：頁236)。是的，碰到陳家齊的震懾，林德旺馬上腿軟，然而唯一能夠暫時的、短暫的衝出來批判跨國資本主義在在地進行破壞善良風俗、剝削人的情感與勞力、詐取錢財的，也只有瘋子林德旺！進步的陳家齊與劉福金都早已自願委身其中，不可能有批判距離的對自己效忠的跨國公司做任何指責。林德旺最後的下場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家族中的精神病經驗告訴我，與1910年代魯迅的狂人不同，估計1980年代的台灣社會已經有了強大的醫療體系讓他關入精神病院，德旺大概沒有足夠的資源以培養高度的自覺來恢復到能夠與體制對抗，從此跟任何其他的精神病人一樣，在病院中用藥來壓制他高度焦慮下的異行，好些就被迫出院，沒有用藥壓制，異行復發，又被迫送入醫院，周而復始，終其一生，除非他看開了，步上李清皓的後塵，先走一步。

難道瘋子的存在本身就只能是一種莫名的控訴嗎？

面臨各個層面都高度擠壓的第三世界，宗教或許還能提供些許的救贖。所謂宗教與現代性問題於是在〈萬商帝君〉中被赤裸裸的揭示出來。<sup>22</sup>素香在三界宮閉關學法，是台灣民間宗教的體現；Rita對德旺的大愛與同情來自她長期的基督信仰，又根植於帶領她進入教會的、她所深愛著的瓊——作者陳映真沒有遮蔽經由俊美的耶穌所中介的同性愛；而林德旺雖然企圖逃離他落後的家鄉，最後在精神上崩潰，但是

22 筆者沒有能力與經歷深入討論宗教問題。眾所周知，宗教構成了陳映真思想與創作極為核心的動力，他本人出身宗教家庭，他的人道主義精神對於人間關愛有很強的宗教性，但是除了深入其中看到種種問題，或許因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念，他又對宗教持有相當批判的態度，這樣的張力支撐了早期到近期的創作。

能夠支撐他活下去的仍然是姊姊素香起乩附身的帝君爺，「帝君太子林德旺」的自我認同(同前引：頁220)與「馬內夾」咒語般的救贖，讓他還沒有跌入無底深淵的大黑洞尋求自我了結。作為思想者的陳映真，將素香、Rita、德旺並置在一起，把宗教信仰放回了歷史、社會過程，讓我們看到了第三世界現代性的構造：在意識形態上，本土民間宗教是迷信、落後，外來的基督與天主教是進步的象徵，就像本地公司被視為一切靠關係，外商公司被想像成靠能力一樣，但是到頭來，在現實實踐中「進步」、「現代」都救不了命，一旦面臨即將滅頂，被進步的資本主義拋棄的德旺所能調動的存活資源，還是那個屬於自己都認為是迷信的帝君。<sup>23</sup>

(這裡要強調的是，我無意神聖化本土民間信仰，醜化外來的基督教與天主教，陳映真本人對於宗教問題從始至今保持著複雜的態度與張力，就像對待任何思想資源一樣——包括馬克思主義——要能夠更為細緻地分辨其間的可能性。〈萬商帝君〉中的瓊／陳映真對於教會的質疑：「許多世上的苦難，是我們這兒的教會與信徒所完全不理解的」(同前引：頁216)，從而改宗天主教，到羅馬修行，而後去了南美洲的玻利維亞工作，最後留下那本 *CHURCH AND ASIAN PEOPLE*，這些都強烈暗示著第三世界解放神學的色彩，對於基督教與天主教與西方殖民主義共謀關係的反思，又同時持續濟世救人的宗教國際主義實踐。在我個人的閱讀當中，最為感人的面對宗教問題是在陳映真的散文〈生死〉，在大病經過死而復生的體驗後，重新回到主內，但不是沒有遲疑：「——主，我如此駑鈍，如何讓祢再次擁我入祢懷抱？我無助地

23 連德旺自己都意識到自己身上的矛盾，病發後他在素食攤吃飯，看到報上的廣告，很多地方都在徵求經理人才，一邊吃一邊歡喜地說：「『這，分明是帝君爺的指示……』他被自己的最後一句話嚇了一跳。他把咀嚼著的嘴停止了片刻，捉摸著那句話的意思」(〈萬商帝君〉，洪範版小說集4：頁208-209)。在鄉下人的愚昧與現代人的理性中，他自認為自己早就有了抉擇，但在絕望的此刻看到了亮光時，胸中出現的居然是帝君爺！

喃喃傾訴。但回答我的，依舊是那無垠的沈默。」(〈生死〉，洪範版散文集1：頁199-200)我相信陳映真對於宗教充滿曖昧與張力的態度，不會僅是來自於自身面臨生死關卡的體會，他出入中國大陸深刻體驗廣大下層人民精神上的困苦，不能只靠著馬列主義的信念，在今天的世界整體沒有出路的時候，又有誰能夠就此輕易取消宗教作為一種救世的力量呢？<sup>24</sup>)

在第三世界，「西方」、「進步」、「現代」在整個20世紀中構成了無法撼動的緊箍咒。也許，只是也許，2010年的今天我們開始有些條件，開始鬆動那個密不通風的壓迫空間，在「西方的沒落、中國的崛起」的強勁力道中，還給沒有基礎又得追逐現代性的林德旺們一些公道，不要再次用菁英階層「那是沒辦法」的民族主義說詞，繼續壓迫苦難的農民工。

我的朋友呂正惠教授早在1987年即於《文星》雜誌肯定陳映真創作的整體貢獻，同時也砲火猛烈地批評了〈萬商帝君〉，認為這是一篇極其失敗的小說，根本是在寫經濟論文(呂正惠，1988a：194)。陳映真本人也早在出版此文的翌年，在1983年《夏潮論壇》接受李瀛的訪談中謙虛地表示：

〈萬商帝君〉，在自己看來，是比較深入探討跨國企業下的文化、民族認同、人間疏隔這些問題。但是一般反應，似乎認為故事太為思想服務，枯燥無味。說起來，這是我才華不足，不能像卓別林、布萊希特、蕭伯納那樣，使思想的宣傳充滿著藝術的芬芳。我一定要再努力才行。(〈寫作是一個思想批判和自我檢討的過程〉，人間版作品集6：頁14)<sup>25</sup>

24 這段文字來自趙剛的提醒，也請參考蘇淑冠(2009)。

25 或許陳映真自己真的不滿意，所以在2000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陳映真自選集》中，

二十幾年後來重新評價，〈萬商帝君〉顯然不會是被當成經濟論文、也不會是貼上左派教條標籤的文宣品來閱讀。迥異於一般的理解，台灣莫飛穆公司的背後不只是以波士頓總公司的雄厚資本為後盾，〈萬商帝君〉的政治經濟學開啟了一隻第三世界的眼睛，讓我們看到跨國資本（在本土）得以運作的感情基礎：把陳家齊、劉福金、Rita與林德旺放回歷史過程，我們看到的是家庭的、社會的感情資源如何被積極地調動起來，支撐了外表進步、高人一等的外商公司，而華盛頓大樓背後幽暗的巷子裡又上演著嘩啦嘩啦流著的鏡頭：退役的陳將軍天天帶著家小在祖宗牌位前跪拜，H. K.把自己最珍貴的鄉土文學都拿出來交換，Rita身後的耶穌基督與她深愛的瓊一起落淚，姐姐素香毫無代價的悲憫，被砍去手臂的養父烏狗添所提供的成長物資……陳映真寫下的是第三世界前殖民地國家七〇、八〇年代由鄉村向城市移動的精神（崩潰）史，為我們今天思考城鄉問題、現代性的壓迫留下了歷史資源。或許我們不該流於作者論的陷阱，過度聽從作家自己的看法，對於〈萬商帝君〉的藝術、思想及歷史價值應當給予高度評價。

### 「無所不在、陰狠、寒冷的白色的夜霧……」：特務李清皓發瘋解脫

陳映真中期的文學創作，包括〈萬商帝君〉之後的〈鈴璫花〉系列，基本上都是中篇，脫離了早期的短篇形式，更為自覺地貼近所謂寫實的風格，資訊豐富、脈絡清晰，讀來有社會科學研究的功底作為支撐；這些表面的變化沒有動搖作家骨子裡深入主體精神狀態的特異功能。這個時期的陳映真已經不再是單純的作家，面臨「時候到了」的台

---

並沒有收入〈萬商帝君〉這篇小說。



灣政治社會，他積極介入思想戰場，肩負了組織工作者的角色，除了至1989年止全心投入《人間》雜誌外，他籌辦了人間出版社，花了大量的時間規劃、翻譯「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引進批判的社會科學方法來分析台灣的戰後社會，在九〇年代初為方興未艾的台灣社會研究注入活水。（陳映真先生曾經這樣說：「一個搞創作的人去搞理論、搞社會科學，對一貫讀書不求其甚解的他，是一件無味的苦事。而他之接近理論，是由於他必須尋求思想出路，而客觀上又沒有一群進步優秀的社會科學隊伍做為他的依靠之故」（〈後街〉，洪範版散文集1：頁68）。作為立足學院的我們，當然覺得汗顏，當年我們的前輩學者沒有成為可以依靠的社科隊伍，直到今天，我們也都沒有能夠提供有效的社會分析，突破當前的思想困境。）他籌組中國統一聯盟，成為首任主席；他參與主導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的跨國計畫；他介入了大大小小的筆戰，對親美反共的台獨思想進行批判。<sup>26</sup>可以說，文學創作中期的陳映真是以思想為主戰場，歷史的來看，這似乎具有歷史的必然性。1980年代以後至2000年國民黨政權倒台，是台灣政治社會變動最為劇烈的時刻，幾乎所有具有政治意識的人都沒有選擇、無法抗拒地被捲入到變革當中。

然而繼1987年的〈趙南棟〉之後，陳映真重新拾起中斷12年的小說家的筆，在1999年發表了〈歸鄉〉，我將此歸類於他近期創作的起點，爾後陸續出版了兩個中篇小說，2000年的〈夜霧〉與2001年的歷史大作〈忠孝公園〉。<sup>27</sup>此刻，省籍與兩岸問題已經不再是作家早期筆

26 我個人特別期望陳映真有關人間出版社的工作以及參與組織的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的多次會議，陸續能夠有更多的整理與討論，少了這幾塊研究，無法拼貼出他更為完整的思想實踐。

27 到目前為止，〈忠孝公園〉或許是陳映真最近期的一篇小說創作。2001年後，陳先生發表了幾篇感人的散文，如〈父親〉、〈四十五年的朱批〉、〈阿公〉，與我個人認為要了解陳先生整體思想，最為重要的〈生死〉。這些文章都收於2004年洪範出版的《陳映真散文集

下的暗流，而被政黨政治的選舉動員炒作成相互糾纏的、台灣社會最突出的矛盾。猜想陳映真應該是深刻地感受到其他書寫、論爭形式已經不再能起更大的作用，才痛心地再次拿起筆來以文學的形式介入社會，想要化解被激化的省籍矛盾與被挑起的兩岸仇恨，這或許是他近期文學生產的動力之所在。〈夜霧〉是上述多重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作家再次以小說貼近千禧之交的台灣社會。

發表於2000年的〈夜霧〉是陳映真的第四篇精神病書寫，透過情治人員李清皓精神病發病過程中所寫的日記，呈現了一個「忠黨愛國」的小人物是如何在政權交替中，無法逃脫內疚與恐懼，終究發病自殺身亡。小說書寫的形式與1963年的〈文書〉有些神似，除了頭尾透過當初錄用李清皓的老長官丁士魁的視角，帶出相關主要人物與故事發展的來龍去脈之外，十篇李氏的病中筭記構成了敘事的主體。

在這位丁秘書的記憶中，三十幾年前，大約1960年代，岡山眷村出身的外省小孩李清皓，在台北某大法律系畢業後，為了報效國家，報考安全局(或是調查局)，主考官丁秘書因為看他為人正直——「但絕不是拿自己的正直處處去判斷別人，不肯饒人的那種正直」(〈夜霧〉，洪範版小說集6：頁73)，於是錄取了他，從此一生跟參加黑社會一樣，難以「漂白」。台美斷交、美麗島事件之際，李的忠黨愛國信念顯然已經在動搖，趁機請辭，帶著不合的妻子小董與出世不久的男嬰赴加拿大攻讀法學碩士。4年後學位完成，夫婦協議分居，李隻身回台，找不到工作，無可奈何地回到局裡的研究部門任職。在偶然的機遇中，李利用工作位置的特權之便，搭救了朋友的苦命女兒邱月桃，結了緣，兩人雖沒名分卻從此相依為命。歷經林宅血案、黨外組黨等事情，進一步撼動了情治人員固若金湯的「領袖、國家、主義」的堅定思想，李

1：父親》一卷中。

悄悄地找了一份專科的教職，離開1、20年的愛國救國工作崗位。但是，外在政治氣氛沒有能夠讓逃離的清皓從此安心，台獨運動高漲、兩岸關係改善也讓過去威權體制的反共反獨國策快速瓦解，原來的愛國分子現在變成了國民黨特務，原來的台獨野心分子現在都成為電視上耀武揚威的立法委員；再加上外省身分的他，於是在面臨族群政治動員達到高潮時，精神崩潰了！在精神科的病房中他渡過了生命中剩餘的一段時間，最後在一個大雨天裡，他在浴室中上吊身亡。故事的結尾是：新政府上台，丁秘書打算退休赴美，但是出身嘉義鄉下的學生許處長代表新政權來訪，希望他繼續為國效命，畢竟「時代怎麼變，反共安全，任誰上台，都得靠我們」（同前引：頁123）。於是丁秘書壓抑了心中的喜意，狀似勉為其難地繼續承擔起反共愛國的重責大任。

在李清皓的十篇筭記中，讀者看到的是清皓病情的日漸惡化，起先只是生理上的不適，心悸胸悶，四肢無力，隨著病情升高，被迫害妄想開始出現，死亡意識隨後產生，最後走上絕路。相較於林德旺的發瘋，肇因於不安的童年家庭與後來在跨國資本體制中的職場失落，李清皓則接近於安某，關乎民族，關乎國家，不同的是李比安晚了近30年，有幸也不幸地經歷了政權更迭的20年。與安某和德旺不同，李所處的時代不再是五〇年代的流離失所，不再是六〇、七〇年代的快速城鄉移動，他似乎有更多的本錢面對、整理自己的焦躁與不安，他「悄悄地問自己，我為什麼害怕，憂愁著些什麼……問我自己，鼓勵我自己慢慢想」（同前引：頁87），他對於自身的反思能力遠遠高過無法面對過去的安某，與沒有能力看清自己處境的德旺。他找到了這些焦慮的癥結：當年黨外的政治事件發生，我們都是按照上面的指示編造證據，把肇事者送入牢房，那時共同的認知是，這些惡人不可能有翻身之日，但是「現在上頭怎麼就把這些當年他們要我們不擇手段送進去的人全放了，猛虎出了柙了。『壞人』、『國民黨特務』的帽子讓我戴一

輩，上頭的人卻去充『開明』、『民主』的好人」(同前引：頁88)。李清皓說的該是1979年的高雄美麗島事件，上頭的蔣經國為台灣內外情勢所迫，在統治末期的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這批黨外陰謀顛覆分子被陸續放了出來，首當其衝的當然就是這些為了維護社會安定而辦人的國安人員，當初的行為是愛國之舉現在成了民主罪人，這要如何調適？

在接下來的1986年桃園機場事件中，李清皓奉命去現場採證，卻碰上了綠色小組的手提錄影機，混亂中很多情治人員都躲不過鏡頭，有的還被群眾圍毆，「我盤算，在人群中，我定然也被他們拍下來了吧。事後想起，將來有人認出來，我該怎麼辦？為此，我悒悒很久，甚感憂慮」(同前引：頁88)。作者陳映真引領我們進入了這個還有良心的情治人員的內心深處，看見政局對他所帶來的精神效應，表面上是擔心被攝影機揪出來算帳，但是憂慮的程度之深，似乎是因開始懷疑採證背後所代表的整體特務體制的正當性。最後那根稻草接踵而來，1986年黨外組黨闖關，上頭手軟，「這個幾十年來不計代價、一定要加以撲滅的、很有被『共匪利用』之虞的不祥組黨運動，竟然也就眼巴巴讓它組成功了」(同前引：頁89)。威權體制瓦解的骨牌效應難以阻擋，政治的就是個人的，就這樣直接擠壓到李清皓及家人，他的身心症徵兆此時開始出現，卻找不到病因，相依為命的月桃到處奔走，求神問卜也都無助。1988年小蔣總統走了，清皓才突然體會到，那個有信仰的時代原來已經結束了，於是找到了專科學校的教職，遞上了辭呈，認為就此可以脫離苦海，走出黑暗的人生。

事情當然沒那麼簡單，想走就走？

一旦對過去的工作開始心虛，原來不在意的事都會悄悄地喚醒胸中埋藏的內疚。清皓告白式的札記讓我們知道情治單位可以順從上意羅織罪名，濫抓思想不同的人。其中，他最為耿耿於懷的兩件事，一件是那個愛國先鋒黨案子裡的單少校。局裡的人都非常認同與感動

於這位退伍軍人反共、反台獨、清除蔣公身旁宵小的愛國心，只是以單先生為首的先鋒隊採取了行動，兩次在海邊檢閱隊伍，準備推翻政府，沒想荒謬之餘，上頭逮到懲一儆百的機會，結果單少校判處死刑，其他黨羽重判，局裡同仁於是立了大功，動用特權集體瘋狂嫖妓尋歡，李清皓當然也跟著一起分享戰功，如今悔恨自己對不起月桃，「對自己感到說什麼也不肯原諒自己的不齒，弄得失眠和頭痛加劇」（同前引：頁93）。

另一件事就是阮老師跟老太太的那幾箱書。七〇年代末台美斷交，李清皓奉派清除高校中思想有問題的分子，某校物理系學生、出身東部農家的林育卿表現積極，他彙報了該校教歷史出身昆明的阮老師散播親匪言論，說什麼共產黨試爆原子彈中國終於有了國防，還有他們搞的建設是根據孫中山的《建國大綱》，於是阮老師不久就被抓走了，第一次立功的李清皓與林育卿「莫名的興奮，但也有一層害怕」（同前引：頁99）。林生在繼續監視阮老師宿舍後發現，阮老師家境窮苦，太太7年前死了，孝順的阮老師帶著本省籍老邁的岳母生活，如今老太太無依無靠，每天只能以淚洗面。對阮老師有了更多了解後，林育卿自省地發現當初打的報告極為片面，阮老師其實對共黨很不滿，說大陸同胞生活困苦，共產黨只要核子不要褲子，所以非常懊惱當初的斷章取義。結果阮老師被判7年，育卿情緒崩潰。為了挽回自己犯下的錯誤，育卿寫信到各個部會，還上書小蔣院長，遭致局裡訓斥李清皓辦事不力。純樸認真的林育卿沒法兒原諒自己的錯誤，「早已精神恍惚，形容枯槁」（同前引：頁101），只好休學，由遠自東部鄉下的老農夫婦帶回家了，好不容易培養成人進了大學的農民之子，就這樣毀了一生。故事還沒完，阮老太太被迫搬離宿舍，李清皓前往監視，站在老榕樹下看著白髮蒼蒼的老太太把剩下的家當慢慢搬上小發財卡車：

[……]我看著老太太在烈日下艱難地搬動，不覺走出了榕樹的樹蔭，還沒等回過神來，就發現自己正加入搬家的行列了。我搬的是一箱箱沉重的紙箱，只搬了幾趟，我就開始氣喘，臂膀酸痛。

「什麼東西這麼沉？」我憋著氣說，笑著。

「還不就是一些書嗎？」老太太細聲說，「我哪知道哪些書他要，哪些他不要……」

「嗯。」

「我只好全部搬走了。」老太太茫然地說，「要不然，將來他回來了，找不到書……」

我忽然覺得無所措手足，不覺訕訕然走開了。「……將來他回來了……」老婦人的自語，在我的耳際迴盪不去。

記得就是當日的第三天開始，我的臂膀開始酸痛，至第三日為最。我買了「擦勞減」軟膏擦了幾天，也逐漸就好了。

如今，這無來由的雙臂灼痛，使我忽而想起了這密實地塵封多年的往事來，想起了那無依的老婦人，尤其無法不去不斷地想起那寫得一手工整的好字的林育卿，痛苦不已。

而如若是他們來尋仇，我只有默然受死了。

（〈夜霧〉，洪範版小說集6：頁101-102）

在這長段極為細膩的引文中，看到的當然不是作者陳映真簡單地告訴我們「外省人也被國民黨體制壓迫」，或是外省女婿孝順本省岳母。讓清皓（與作者）揪心的是在這場誤殺中，毀掉的不只是那幾箱沈重的書的主人阮老師，還有無辜的老太太；不只是精神出了問題的良知青年林育卿，還有他鄉下老朽的老父、老母，他們後來下場如何？老太太是否因為無法生計而流浪街頭？育卿恢復到能夠復學唸書，寫他那手好字嗎？他的雙親又如何？當然最讓人擔心的是阮老師放出來

了嗎？我又希望他平安出獄，又擔心他來找我報仇。清皓的憂心不是空穴來風，雖然最後來找他說清楚講明白的不是阮老師，而是後面一場戲所出現的另一個案子的張明。「擦勞滅」的消疼作用是短暫的，無法除去的是雙臂劇痛中像刺青一樣的絞痛，今天重新被喚醒的力道來回蕩漾，刺心刻骨。清皓此時已經準備好了以死贖罪，只是最後來找他去地府報到的不是誤判的受刑人及無辜的家屬們，而是自己從昏睡中醒來的良心。拉長時間來看，法西斯特務體制下，沒有贏家，包括無所不用其極自我保衛的政權。

這些過去做過的、看到的壞事，在李清皓發病過程中開始發酵，持續成為攻心的致命武器。就連那個以前的長官及他暴力拷問過的趙委員都透過電視螢幕來找他：「從螢光幕上，他偶爾裝著若無其事地用他的眼角餘光掃著我。他自然是知道我在收看他的發言的」（同前引：頁103），準備隨時來半夜敲門算舊帳。現在趙委員這樣的人當道了，該如何跟他解釋當初粗魯的行為？隨著政局排山倒海的變化，李清皓跟其他十幾、二十萬的情治人員一樣，處於徬徨之中，未來何去何從，挑戰著基本的生存價值。他們被迫要變，要識實務，「只不過和我大大不一樣的是，我疑心這1、20萬人也已經各自秘密地成為他們的人了。我其實也想變成他們的人，只是不知道跟誰接頭去」（同前引：頁105），連相對簡樸的李清皓心中都晃過「只剩下我一個人，沒有人來接頭……」的念頭（同前引：頁106）。至此，兵敗如山倒，連情治人員的心理都已經準備好隨時轉向，國民黨的政權還沒丟，實際上它依靠的統治機制卻已經垮了。

作者陳映真透過忠貞於黨國的中層幹部丁士魁的眼睛，總結了半個世紀變動的世局極其強烈的挑戰。他想起了民國39年後隨著幾年強烈的肅共鬥爭歷史：

時代劇變，調查工作的三大支柱——領袖、國家、主義——已經全面遭到變動的世局極其強烈的挑戰。他想起了民國39年後隨著幾年強烈的肅共鬥爭，他把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在風風火火的肅共行動中經過百般拷訊，送上了刑場、送進了監牢，終竟保住了國民黨的江山，當時靠的正是對領袖、國家和主義的不搖的信仰。今天的挑戰，對調查工作的衝擊，李清皓內心嚴重的糾葛，就是生動的說明。（〈夜霧〉，洪範版小說集6：頁122）

以所謂領袖、國家、主義的法西斯教條遮蓋意識形態的路線之爭，情治單位就像是明代的東廠一樣，成為政權打擊異己最為殘酷的工具，你死我活的一言堂的信念殺人無數，卻自以為是，然而就像〈萬商帝君〉的林德旺是資本體系中間的一顆螺絲釘，必須承受整個機器運轉的壓力，李清皓面對的也是整體黨國機器變化中巨大的扭動力，特別是他這樣還有點良心的人是無法承擔如此重力加速度的變化的。

在李清皓還有能力書寫札記的最後一篇中，我們已經看出他徹底的絕望，跟所有走向惡化的精神病人一樣，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就是把最親密的人當成跟他們一夥，對自己密謀暗算：月桃居然配合著那個他們派來裝扮成的醫生，不僅背著我偷偷咬耳朵，還騙我吃下造成昏睡的藥片，那可怕的黃色藥片「似乎使世間萬事變得遲滯緩慢，而其實讓人沉落到更深、更其徹底的絕望罷了」（同前引：頁113）。失去黨國體制，又把身邊最後唯一的依靠推向對立面，李清皓最終的命運呼之欲出。

雪上加霜的是，月桃跟他約好在台北的大百貨公司見面，帶他去逛街、吃館子，李清皓卻在約了見面的地方先碰上被他以匪諜案辦過、判了10年的張明。現在已經是頂著灰白頭髮的老外省人了，張明顫抖地抓住他的肩膀，告訴他案發後太太死了，兒子逃家，拖累著無法嫁人的女兒。場景就這樣翻轉了：李清皓不再是過去偵訊的調查



人員，逼著那時膽小、滿心牽掛著家與工作的張明進行坦白，現在他自覺是在法庭上接受審判的重罪犯，面對著張明對他的控訴！面對指責的李清皓理所當然的想逃開，激發的當然也就是張明長久累積的憋悶、歇斯底里的吶喊。「我開始氣喘，我感到至大無邊的恐慌，心臟酸痛。我撥開他抓住我的衣袖的手，快步走進那家擠滿人群的大百貨公司。『喂，你別走。』他在我的後面喊叫，『你們害的，家破人亡呀！』」（同前引：頁116）逛街購物的太太小姐們哪裡會知道怎麼回事，把他們當成笑話來看，在上下扶梯的逃跑追逐中，張明高喊著要人們攔住這個國民黨特務，「『那個人一定是個瘋子。』那滿面脂粉的胖太太笑著對我說。我心境慘惻地笑了……沒有一個人人在意張明的淒厲的叫罵，有人看著張明竊竊私語，有人對他咧著嘴笑」（同前引：頁117），發病的李清皓與發狂的張明於是又調了位，警衛急於要抓走的是大吼大叫的瘋子張明，此刻只有清皓知道實情，但是也只能慘惻地笑，你要他跟身旁的胖太太說什麼呢？說張明沒瘋，說的都是實話？這時跟化身帝君的林德旺一樣，作家透過了良善的清皓，對這個世界提出了他的同情與控訴：「我彷彿覺得張明在聲嘶力竭地向整個城市叫喊。而整個城市卻報之以深淵似的沉默、冰冷的漠然、難堪的竊笑，報之以如常的嫁娶宴樂，報之以嗜慾和麻木……」（同前引：頁118），他顯然有愧於張明的10年冤獄，還別說是造成張家家破人亡的慘劇，但是他也深知還有誰在這個時候會對與己無關的往事給予關切，還給那個時代無心被捲入的人們該有的公道？他自己作為造成冤獄的劊子手，除了逃離追趕還能如何正面的回應呢？原來身邊的同志不是紛紛倒戈，就是各自隱藏起來，至今沒有一個人可以對他指點迷津，丟下他，讓他持續沉淪在迷惘的夜霧當中，隨時得面對張明們的追捕：「你們是這城市裡到處漂流籠罩著的夜霧。我做了什麼，竟讓你們把我一個人扔進了豺狼的洞窟，卻又鐵了心腸不肯來連繫。哦，你們這籠罩著這大城市的夜霧，

無所不在、陰狠、寒冷的白色的夜霧……」(同前引：頁119)這就是前朝特務人員最後的下場，為政治權力所丟棄，不能挺胸見日，只能苟且偷生於夜霧當中，跟魂魄一樣四處飄零。

保全人員架走了失控的張明，李清皓狼狽地逃出百貨公司，漫無目的的快走著，還好救星出現了，月桃喘著氣追上了他，揪心地問他跑哪去了，突然解除緊繃狀態，他終於淚流不止的崩潰了。從此李清皓跟我所知道的很多精神病人一樣，來來回回進出病院，在醫院被強制用藥壓制了發狂失控的病情後返家，在家則逃避藥物造成心悸、昏睡、呆傻的可怕副作用，不肯服藥，病情就再次惡化而入院，惡性循環；先是母親，後來我的兄長就是這樣來回於醫院與獨居的小公寓之間，我是那麼不斷地期待奇蹟發生，他能夠長出高度的自我意識，能夠生出另外一隻眼睛看到自己的狀況，能夠找到自己的方法慢慢走出永無止境的循環。但是，20年後的今天，期望還是落空的。

喪失了生存意志的清皓，「表情茫漠中透露著某種深不可探其底的淒惻」(同前引：頁120)，沒有人能夠理解，也不再有人可以信賴。或許深入心坎的淒惻已經到了無法承擔的地步，在最後一次住院3個月後那個大雨交加的日子裡，「李清皓把睡褲倒著綁在浴室的蓮蓬上，把頭伸進了褲襠，而後猛然跪坐下來，自縊而死」(同前引：頁120-121)。脫離苦海後留下的是傷痛的月桃，因為沒有名分，又擔心沒她在身邊清皓哥會害怕，只能躲在殯儀館靈堂的後面，偷偷地送走了世上唯一疼惜她的人。情治人員李清皓至此徹底家破人亡了。

陳映真筆下由早期至今的「家」，從來就是殘破不全的，就連〈趙南棟〉裡的趙爾平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想要在廢墟中重建家園都還是失敗了，〈夜霧〉當然也不例外，李清皓與妻子小董沒和好過，連生的小孩在故事中都沒名沒姓、面貌模糊；雖然自始至終兩人沒有正式離婚，但家其實形同虛設。從小命苦的月桃，原來以為嫁了人會好些，結果

流氓丈夫——「路旁屍」——讓她如同上刀山、下油鍋般，家成了痛苦的溫床；靠著祈求神明，才替自己修來了清皓哥這個觀世音菩薩，讓她知道女人居然是可以被疼愛的（同前引：頁97）。本來兩個天涯淪落人該可以守住這殘破的小家好好過日子，誰知道李清皓泥菩薩過江，當年小董就不喜歡那個讓人詛咒的工作，如今終於逃離了那夭壽的職業，但命運不放過他，最後還是拆散了這個好不容易得來的家。家，常常被當成人們的精神堡壘，是那個容許你在外受傷，回去將傷血舔乾的地方；但是，破碎的家庭作為第三世界的基本構造，其實無法承擔作為感情的支柱，存活在倒塌的廢墟上，國也沒了，家也毀了，能不發瘋求解脫嗎？

陳映真曾經自述，〈夜霧〉是對戒嚴體制的反省，「想說的是，那是歷史所造成的，可是我們該正視這個歷史，當歷史過去的時候，我們應該清理這個歷史，然後從這個歷史裡面學習經驗和教訓，並且超越之，讓我們不要重新犯這個錯誤」（〈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北京三聯版：頁53）。他清理歷史的方式，選擇了一條極為困難的路，試圖進入當初審訊他入獄的情治特務人員的內心深處，對李清皓這樣的「敵人」透過同情與憐憫，揭示了他們所面臨的精神困境，乃至於在分斷體制下沒有出路可尋的窘境。我們或許極為驚訝作者陳映真何以有這樣的胸襟與能力能夠深入對手／主體的內在，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陳映真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清楚看到人是活在體制、結構當中的，所有的問題不能歸罪於個人，關鍵是在歷史過程中學習到體制是如何對人進行摧殘，包括體制的「自己人」。但是，我們還是不能不說，陳先生對於情治人員（李清皓、丁士魁）的寬容與體諒是近乎宗教性的，超越了黨派與政治立場，可說是作家本身在長期壓迫的國民黨下台之際，尋求自身與過去威權體制的和解，也許，也唯有這樣才能更為積極地召喚有心的讀者，尋求更大範圍更為超越的國家民族分斷的和解。

〈夜霧〉當然是在控訴國民黨的暴力統治，當然是在尋求超越省籍矛盾，但是不僅止於此，如果把李清皓的下場讀成只是外來政權自作孽就太粗糙了。在陳映真的認識中，戒嚴體制是歷史的結果，是世界冷戰與國共內戰雙重結構的產物，不能簡化成國民黨一黨之私的問題來理解，要放在世界史的格局中才能充分解釋。在冷戰鬆綁的今天，我們還是沒有看到更為細緻的分析，追究第三世界因為冷戰所造成的精神問題，我們大致理解的是冷戰結構的形成延續了殖民主義，延宕了在諸多的第三世界地區去殖民的反思，更造成了民族分斷與內戰（如韓半島、台海、斯里蘭卡等）；但是落實到社會內部的對峙，情治系統這樣的國家暴力施展權力的正當性，在〈夜霧〉中讓我們理解到真實狀況的複雜性，連一般被理解為施展國家暴力的一方，落實到個人身上時，確是那樣的脆弱。情治特務體系作為第三世界普遍存在的國家暴力形式，至今似乎還沒有太多研究與討論的空間，施暴者不會談，受害者為了避免二次傷害很少願意返回現場。陳映真的〈趙南棟〉側面處理了受害者的獄中場景，〈夜霧〉則又進一步打開施暴者的內心世界，但相對於南韓重要作家黃皙暎的《悠悠家園》則更為深入的描寫獄中狀況，故還有很多空間要去追問，誠如陳映真先生對於歷史的理解一樣，必須面對這個嚴酷的歷史教訓才能阻止它繼續存在的正當性。

話雖然是這麼說，但是我們也清楚的意識到，2000年至今的這個年代，所瀰漫的徹底絕望感深深地感染著、包圍著作者本人，陳映真筆下早、中期的瘋子與精神病患幾乎沒有一個走上黃泉路，安某再慘，林德旺再失落，總是活著還是有希望，然而〈夜霧〉的李清皓與〈忠孝公園〉最後瘋掉的馬正濤，都已經是窮途末路走上自我了斷的結局，這不是偶然的境遇，隱藏在陳映真先生救救孩子的心靈深處，總是存在著得誠實面對救不了又不能不說的窘境。馬克思主義烏托邦的陳映真與以魯迅作為黑色精神祖國的陳映真，兩者之間的拉扯所構成

的正是那個第三世界外表強顏堅信、內心徬徨悲愁的陳映真。

我以為這種內外交戰不是陳映真的特質，這是第三世界的批判知識分子們心懷黃金世界又得面對殘酷現世所共有的根本精神狀態。

### 「瘋子比正常的人更正常」——第三隻眼

在一次出版〈夜霧〉與〈忠孝公園〉之後回顧自己的文學與思想的演講中，陳映真把他對於書寫精神病患的興趣大體歸諸於魯迅，但是沒有充分闡釋，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我想世界上有個通例，寫瘋子呢，往往是瘋子比正常的人更正常。『救救孩子』這話是從瘋子嘴裡講出來的，沒有人把他當回事，而講出來的道理之批判、啟蒙，是非常大的」（〈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北京三聯版；頁51）。我對這句話的理解是，所謂正常人過度為社會規約所駕馭，算計很多，瞻前顧後，反倒失去常人該有的、對於事物真實又基本的判斷能力與表達方式，只有瘋子能夠甩開種種羈絆，突破分際，不顧情面地直接說出些真話。

所以，陳映真是台灣的瘋子？！

這麼說絕對不能被理解為庸俗地在慶賀瘋子，呼籲人們加入發瘋的行列，或是把瘋子的存在自自然然的化約成社會批判，文學史裡有太多這樣過度的表現。<sup>28</sup>自己或是身邊有精神病患的人，都會告訴你那種存在的狀態有多麼痛苦，多麼地難以承擔，不要那樣輕易的對待精神病。所以，讀者不斷地要被提醒，雖然我們可以從精神病的狀態中學到很多，但是請不要醜化也不要美化精神病。

放慢腳步閱讀〈文書〉（1963）、〈萬商帝君〉（1982）與〈夜霧〉（2000），像是看到陳映真在近40年間，導引我們出入整個世紀現代史，從1910

28 感謝鄭聖勳2009年8月在陳映真文學青年工作坊的討論。

年代到2000年。這三篇小說所引出的時序，都得從出版當時的時間點向前倒推40年，彼此之間交叉重疊，安某、林德旺、李清皓屬於三個不同的歷史世代，面對的是不同的社會狀況，從戰亂的廢墟到重建家園，從鄉村的農業社會被逐步捲入以都市為中心的跨國資本主義，從堅定的黨國威權體制到其倒塌後難以命名的現在（後發展？後威權？後民主？後冷戰？恐怕都不對）。在這三個發瘋的主人翁身上，作者陳映真雖然細膩地給出了不同的解釋——安某過去殺人的內疚，德旺為土洋之間的現代性衝突所折斷，清皓則是毀於政權移轉過程中信念的瓦解——但更為相通的是作者陳映真把他們放回家庭、社會、民族的歷史洪流中去解釋。是的，許多的精神病都不能由生物病理學的角度來解釋，我的母親病發後堅持在每餐飯要擺上一份「蔣爸爸」的碗筷，難道不關乎黨國？父親到晚年才患有躁鬱是在返鄉探親後出現的病徵，這難道不關乎分斷？兄長被台大社會系解聘又何嘗沒有省籍矛盾、藍綠衝突的時代背景？我自己長年情緒上上下下的節奏又只是湊巧的與台灣政治社會的快速扭動同拍而已？感謝陳映真的分析，讓我們有勇氣開始去面對自己身邊不忍也不堪回首的苦痛與羞辱，如果說陳映真先生的文學是要讓「遭到羞辱的人重檢回尊嚴，[……]給予受挫折、受辱、受傷的人以力量」（《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北京三聯版：頁40），他做到了。

陳映真不只透過歷史解釋找回了精神病人的尊嚴，並且進一步賦予了瘋子更為積極的能動性：在痛苦的生存過程中，從安某的束手無策、林德旺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到李清皓對冷漠的世間提出了控訴，瘋子世界的存在於是人世的對照空間，沒有瘋子就沒有辦法揭示出人間真實的荒謬與無情，在此意義下，陳映真的「第三」世界就是瘋子的世界，只有瘋子才能夠暫時超脫人世的枷鎖，用他的第三隻眼來透射真實世界的遊戲規則，暴露世間的自私、冷酷、吃人、相煎與殺

戮。他對於瘋子的著迷與他對死亡的格外親切的冷靜一樣，承續了魯迅的傳統，在積極地為當下的歷史社會尋求參照的另類空間／世界，目的不在於從瘋狂與死亡中建立烏托邦，而是能夠照射出難以理解、無法直面的人世。放大到在全球的格局來看，第三世界存在真實狀況的愚昧、落後與荒蕪，也就突出了高檔的第一世界文明進步中隱藏於身後的虛妄與異化，不能脫離帝國主義對於弱勢地區的剝削、利用與欺壓來理解，沒有第三世界就沒有第一世界。

如同本文開場時指出，從政治經濟學的第三世界，或是說以政治經濟學為前提的第三世界，把目光轉向精神的、情感的第三世界時，陳映真所傳達給我們暴力而荒蕪的語言中，所體現的混亂、矛盾、曖昧、懷疑、心虛、不解，其中所凝聚的極大的批判性早已脫離了那種姿態高昂、自以為是、憂國憂民、路有凍死骨的中國文人傳統，如何學習、承襲放低身段、貼近現實、尊重歷史、最終心底徬徨的那個部分的陳映真，這是第三世界批判分子的知識情感與相互對待的出路。陳映真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他們很大的局限，但是我們不能倒退，要在他們所搭建起來的基礎上，承先啟後。我個人深信，至少在台灣，戰後至今累積了不少批判實踐的經驗，成就也好，挫敗也罷，該是停下腳步重新整理、誠實面對的時候了，當務之急在於如何建立起批判圈的新文化，找到彼此相互提攜、相互攙扶而又能夠在相互批評的互信中前進的方式。直覺告訴我，「陳映真」提供了我們這個契機與平台。

在台灣戰後當代的文化思想領域中，持續以第三世界作為論述框架與想像參照的代表性人物是陳映真。他半個世紀創作中的經驗都根植於台灣社會，當「台灣研究」根本還不存在，他就開始以小說分析台灣社會，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他的文學沒有一篇不立基於他所熱愛的這塊鄉土，所以他是不折不扣的「本土派」；不同的是，當思想界把目光外射指向歐美時，他特立獨行的朝向第三世界，對他而言，台



灣，乃至於中國大陸，第三世界的存在與位置與認同是清晰而不容置疑的。但是由於冷戰的歷史因素，台灣被納入美國資本主義陣營的庇護，第三世界的政治想像無法進入思想界的視野。這個視野的缺席，阻絕了台灣主體性更為多重自我定位與認識的可能。雖然作為分析概念，第三世界因其內部的逐步分化，已經逐漸喪失它的解釋效力，但是作為歷史概念、理念與精神狀態，特別是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席卷世界的大勢，第三世界是亟需重新提出的思想資源。透過陳映真的論述實踐，我們希望釐清深植於在地歷史中的動能。

整體而言，陳映真第三世界思想的資源大致來自於幾個方向：國際左派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毛澤東／周恩來的第三世界主義論、在生命中直接碰到第三世界作家及左翼分子的經驗、他的第三世界實踐（透過訪問與會議組織等）。然而，他的第三世界，如本文所企圖論證，其實根本上來自對身邊的生命經驗，也就是他自己的小說所體現的生活世界，透過這個基礎，他有能力體會與參照其他第三世界的經驗，乃至於產生積極的連帶。要了解第三世界戰後的精神狀態，陳映真的文學就是我們的思想資源。在此意義下，一般論者認為陳映真的意識形態主導了文學，這是不公平的講法，陳映真的寫作動力來自於政治，但是他的客觀性來自於他的「文學性」，客觀地、同理心地進入他者，前述的分析，安某也好，林德旺也好，乃至李清皓（還有我們沒法兒分析的晚期忠孝公園中殺人無數的馬正濤），都讓我們看到他在對於這些人物的高度同情下，能夠客觀且深刻進入這些人物精神狀態，這是所謂客觀學術分析無法做到的。

分析暫且告一段落前，還是得回答：陳映真的第三世界到底意味著什麼？對我而言，陳映真所謂的第三世界是戰後新殖民主義時期的後殖民世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個前殖民地、半殖民地、次殖民地，在反殖民獨立戰爭、內戰中慢慢走出來，不論以「富國強兵」或



是追求國家現代化為動力，被立即且快速地(被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及其內部與之抗衡的社會主義陣營，所構成幾乎二元對立的全球冷戰體制中。冷戰的對峙，一方面延續、轉接了新殖民主義的形成，在部分地區形成民族分斷，另一方面延宕了各個殖民地在思想、文化、精神層面的反思，於是座落在新興獨立國家政治舞台核心位置的是經濟發展主義，「以農養工」的國家主義發展策略所帶動的社會變遷是城鄉移民，是離鄉背井，是長期歷史所建立起來的社會關係的重新調整，及調整中弱勢者在物質資源匱乏、精神無所依歸境況下的撕裂與折斷。由於各地在地歷史(基體)的龐大差異，使得第三世界歷經殖民地、脫殖民地與資本主義化所形成的社會與文化有著截然不同的形式與風貌(如陳映真提及漢字書寫提供了台灣脫殖民地主體重建的基礎，而許多前殖民地依然要與殖民者的書寫語言繼續共存、搏鬥)。因此，除了上述作為世界史範圍中的亞、非、拉、歐、美以「洲」為地理實體之間關係性想像的這個層次之外，第三世界其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一塊多元豐富的另類參照體系的構築，不再像過去那樣以歐美為唯一的參照點，透過彼此的對照能夠在分析中把握、解釋自身處境、存在邏輯，乃至於找到繼續轉化的可能性之所在。

除了作為實體想像與參照方法的第三世界外，我們當然不能抹去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歷史過程來理解第三世界的精神，在今天21世紀的語境中，它意味著在全球範圍內的連帶與結盟關係，弱勢地區之間的團結，藉以消極防止帝國主義、積極促進世界和平，繼續跟著強權走不過是在深化已經極不平衡的權力關係。也因此，第三世界同時意味著打破以帝國之間霸權更替的舊世界，尋找新世界的運作方式，用好友白永瑞的語言來說，這會是「更民主、更人性、更具主體性的理論與實踐方案」(白永瑞，2009：iv)，這個方案同時在重新思索與超克作為三位一體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現代性，對人類所造成的壓迫。

在此意義下，本文所關切的第三世界的精神世界，是轉化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要透過那隻第三隻眼才能勇敢透視問題，看到微薄光影的指向。

在這樣的前提下，本文書寫的動力很簡單，是希望台灣批判的學術思想界能夠認識自身的第三世界歷史屬性，期許中國大陸知識界不要丟棄第三世界的屬性與思想資源，要保留第三世界想像的香火，擴大我們極為狹窄的知識對象，使得他者與自我能夠更為開放、多元。更為迫切的是，在「亞洲的崛起」與「中國的和平崛起」的氛圍中，將第三世界的歷史意識重新放入討論的議程，正是要華文地區與亞洲思想界眼中不能只有強勢者的存在，得承續第三世界主義的精神，讓弱勢民族與地區成為我們關注、參照、合作的焦點。

陳映真在1983年時曾說：「是我們有計畫地去研究，譯介第三世界文學的時候了。」坦白說，我很懷疑今天的中文思想界會積極回應老同志的呼籲，但是為了延續這條微弱的香火，還是得硬著頭皮繼續走，等真的到時候了，接棒跑馬拉松的年輕同志不會是在一片荒蕪中從零開始。

至於鼓起勇氣追溯父、母家族歷史這件事，看來只能暫時擱在那兒，反正未了的心中大石遲早會回來敲門。

2009年9月5日初稿，10月10日修訂

2010年3月初定稿於新竹寶山

#### 參考書目

- 王安憶(2004)〈英特納雄耐爾〉，《上海文學》第315期，頁75-77。
- (2009)〈陳映真在《人間》〉，《「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論文集》，新竹：交通大學。(後定稿收入本書下冊)
- 白永瑞(2009)《思想東亞：韓半島的歷史實踐》，台北：台社。

- 呂正惠(1988a)〈從山村小鎮到華盛頓大樓：論陳映真的歷程及其矛盾〉，《陳映真作品集15：文學的思考者》，台北：人間，頁181-195。（原刊1987年4月1日《文星》雜誌第106期）
- (1988b)〈現代主義在台灣：從文藝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卷第4期，頁181-209。
- 松永正義(1988)〈透析未來中國文學的一個可能性——台灣文學的現在：以陳映真為例〉(鄭莊譯)，《陳映真作品集14：愛情的故事》，頁228-239，台北：人間。（原刊於1984年《凱風》雜誌7月號）
- 姚一葦(1988)〈總序〉，《陳映真作品集1-15》，卷前頁11-17，台北：人間。
- 陳光興(2009)〈白樂晴的超克分斷體制論：參照兩韓思想兩岸〉，《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4期(6月號)，頁3-47。
- 陳映真(1988a)〈在民族文學的旗幟下團結起來〉，《陳映真作品集11：中國結》，台北：人間，頁39-54。（原刊於1978年8月《仙人掌雜誌》2卷6號）
- (1988b)〈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陳映真作品集8：鳶山》，台北：人間，頁1-8。（原刊於1979年1月《中華雜誌》）
- (1988c)〈斷交後的隨想〉，《陳映真作品集8：鳶山》，台北：人間，頁22-24。（原刊於1979年1月《中華雜誌》）
- (1988d)〈中國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的比較〉，《陳映真作品集8：鳶山》，台北：人間，頁76-96。（原刊於1984年1月《文季》1卷5期）
- (1988e)〈模仿的文學和心靈的革命：訪問菲律賓左翼阿奎拉〉，《陳映真作品集7：石破天驚》，台北：人間，頁87-101。（原刊於1984年1月《文季》1卷5期）
- (1988f)〈寫作是一個思想批判和自我檢討的過程：訪陳映真〉，《陳映真作品集6：思想的貧困》，台北：人間，頁12-20。（原刊於1983年7月《夏潮論壇》1卷6期）
- (1988g)〈論強權、人民和輕重〉，《陳映真作品集6：思想的貧困》，台北：人間，頁3-11。（原刊於1982年8月《大地》第10期）
- (1988h)〈「石破天驚」自序〉，《陳映真作品集7：石破天驚》，台北：人間，卷前頁23-25。
- (2000)《陳映真自選集》，北京：三聯書店。
- (2001a)〈後街〉，《陳映真散文集1：父親》，台北：洪範，頁51-69。
- (2001b)〈貓牠們的祖母〉，《陳映真小說集1：我的弟弟康雄》，台北：洪範，頁85-94。
- (2001c)〈加略人猶大的故事〉，《陳映真小說集1：我的弟弟康雄》，台北：洪範，

頁105-133。

- (2001d)〈蘋果樹〉，《陳映真小說集1：我的弟弟康雄》，台北：洪範，頁135-155。
- (2001e)〈文書〉，《陳映真小說集1：我的弟弟康雄》，台北：洪範，頁157-179。
- (2001f)〈淒慘的無言的嘴〉，《陳映真小說集1：我的弟弟康雄》，台北：洪範，頁203-221。
- (2001g)〈唐倩的喜劇〉，《陳映真小說集2：唐倩的喜劇》，台北：洪範，頁121-157。
- (2001h)〈萬商帝君〉，《陳映真小說集4：萬商帝君》，台北：洪範，頁125-252。
- (2001i)〈夜霧〉，《陳映真小說集6：忠孝公園》，台北：洪範，頁69-124。
- (2004a)《陳映真散文集1：父親》，台北：洪範。
- (2004b)〈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上海文學》第315期，頁62-70。
- (2005)〈對我而言的「第三世界」〉，《批判連帶》(陳光興編)，台北：台社，頁3-10。

黃哲映(2002)《悠悠家園》(陳寧寧譯)，台北：印刻。

詹宏志(1988)〈文學的思考者〉，《陳映真作品集15：文學的思考者》，台北：人間出版社，頁1-3。

趙剛(2009)〈青年陳映真〉，《「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論文集》，新竹：交通大學。(後定稿為〈頡頏於星空與大地之間〉，收入本書上冊)

鄭鴻生(2009)〈陳映真與台灣的六十年代〉，《「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論文集》，新竹：交通大學。(後定稿收入本書下冊)

魯迅(2004)〈傷逝〉，《徬徨》，台北：風雲，頁133-168。

黎湘萍(2003)《台灣的憂鬱》，台北：人間。

劉紹銘(1988)〈陳映真的心路歷程〉，《陳映真作品集15：文學的思考者》，台北：人間，頁34-40。(原刊於1984年7月《九十年代月刊》)

蘇淑冠(2009)〈以「家」之名下的慾望、主體與現代性問題的思考：以台灣戰後成立之JT兒童之家為例〉，2009年流離、家園與認同工作坊，新竹：交通大學。



# 討論與對話

瞿宛文 主持

詹亞訓、林家瑄 錄音整理

**林建國** | 我想做資料上的補充。如果要談陳映真跟馬來西亞的關係，時間要推展到1985年，我當時還是師大的大二學生，在辦馬來西亞同學會的文學獎時找陳映真當小說組評審，同時還邀請他到師大演講。當時台灣還沒解嚴，情況相當緊張，學校都要審查，我跟學校說要邀請陳永善來演講，學校不知道陳映真就是陳永善，所以就通過了。我們在海報上都寫陳永善，但私底下都跟同學說陳映真要來了。

我到《人間》辦公室跟他見面的時候，發現他人很好，個性非常溫暖，他跟我講了很多話，說你們馬來亞華人剝削當地土著，你們自己要懂得懺悔，大概是這些話。作為一個大學生我只好乖乖聽他說，也沒辦法反應。不過當時從簡單的交談裡面，我知道他可能只掌握到早年華人對當地人的剝削，並沒有掌握到整個東南亞的後殖民狀況，特別是當地國家獨立之後，菁英分子起來之後又變成另外一個奇怪的怪獸，馬來西亞華人面對的問題就是這個。

他在1985年3月17號到師大演講，題目是「40年來台灣文藝思潮演變初探：在馬華青年會中的講話」。我簡單地說他當時對馬華文學談的兩個部分：第一個是他對馬華文學的批評——1985年時的馬華文學的研究不是現在這個樣子，還沒有真正的論述，但已經跟很多大

中國主義者不一樣了——他提出馬華文學應該是大馬文學的一部分，意思是說它不是中國文學（在當時他幾乎是第一個這樣講的人），且接著他在演講中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所以陳映真很早就對台灣文學跟中國文學的關係、馬華文學跟中國文學的關係做了一個釐清。但當時他的判斷主要是基於第三世界國家獨立之後，當地的文學（不管是什麼語言——英文也好，華文也好），就是第三世界個別獨立國家的文學，所以他認為馬華文學跟宗主國中國文學的關係在這個地方必須要切斷；可是他擔心這個說法會被誤會，所以他接著馬上強調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第二，是他對我們同學作品的反應——他作為一個小說家，對小說評審的眼光是非常準確的——他有很高的要求，對於這些作品覺得很不滿意，認為沒有反映到當地第三世界的狀況。我覺得當時這兩個想法可能都有一些貧弱，不及王安憶對馬華文學的觀察那麼準確。

**呂正惠** | 我認識林建國，也認識黃錦樹。有一次我就很坦白地問黃錦樹：「你們馬華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因為我認為你們是馬來西亞，可是你們住在台灣，還批評台灣、批評中國，你是什麼意思啊？」（我直接這樣問他，因為我們很熟。）後來他說：馬華的問題在於馬共消滅以後，美國要解決馬華問題就跟國民黨合作，把很多馬華知識分子送到台灣來留學，所以他們一方面學到的中國文化是封建、反革命的中國文化，一方面學的是西方現代主義的東西，所以真的很困難。我說：「那你要不要回去？」「絕對不回去。」「那你要不要入籍？」「絕對不入籍。」他說，「永遠當個流浪者。」

**曾健民** | 王安憶的論文提到《人間》的工運專題有寫顏坤泉，他是馬來西亞華僑，念文化大學，從《春風詩刊》進入到夏潮系統，後來也參與

工黨建黨和很多內部運動，是夏潮內部左右分裂批判王曉波的信件起草者之一，還參與後來批判南方朔的民間哲學。可是他後來離開這個陣營到《明鏡週刊》。在學生時代他談左派理論談得最好，是同輩年輕人之中最聰明的，可是一旦離開左派到另一邊，他就馬上變成另外一種人。我提這個只是作為一個現象，是延續剛才呂正惠所談的，這也是我們無法理解的。這個人的父親本身是馬來西亞華僑學校的校長，這樣一個小孩和台灣的小孩是完全不同的，這是左派內部馬來西亞僑生的一個現象，我在這裡提供給莊華興先生做一個參考。

**陳光興** | 呂正惠講的有其道理，但我覺得莊華興的問題裡面暗示的是我們對馬來西亞的狀況的不瞭解，我覺得這個問題要擺在檯面上來談。也就是說，這牽扯到對第三世界的理解，可是我們對於馬來西亞沒有內在的理解，我覺得是這種問題。我不是想挑釁，而是陳映真留下來很多東西，特別是對於第三世界的想像跟路線，其實透過《人間》後來很多朋友進入了不同場域，包括墨林、鐘喬、藍博洲等等，我反而想回過頭來問：這些朋友怎麼看待陳映真第三世界觀的資源？陳映真的東西有在這個陣營、圈子裡面被廣泛地承繼嗎？我覺得這是需要被整理跟面對的。

**汪立峽** | 就我的瞭解，陳映真對第三世界的理解最早來自北京周跟毛的第三世界論，到了八〇年代他接觸到西方的依賴理論，像華勒斯坦、阿敏，還有巴西跟阿根廷的幾個馬克思主義依賴理論學者的論述，他開始把第三世界的東西豐富起來，展開論述。在他的第三世界視野裡，台灣跟大陸都屬於第三世界。基於這樣的理解，中國大陸開放之後他有所不滿。因為現代西方依賴理論的主要目標是指向以美國為代表的美國帝國主義，第三世界被美國支配了，中心支配邊緣，他



看到台灣跟美國的關係就是這樣。所以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時他慌了，本來大陸沒有依附美國，但搞改革開放，搞了一點走資，也就可能會被美國支配，整個中國都會變成依賴，但原本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之下跟美國是對抗關係、是反帝的。他是這樣來理解，但這個理解在大陸八〇年代是不討好的，共產黨說：「我正要改革開放，你說我依賴美國，你也太不給我面子了」。非共產黨也不滿意，因為八〇年代大陸的知識分子是一頭嚮往美國：「你說什麼依賴啊，我們就是要改革開放」。所以他在大陸不討好，在台灣也不討好。

另外，他的理論是有一致性的，因為他根據第三世界理論來看，馬來西亞是獨立國家，所以馬來西亞文學是一種文學，而台灣不是獨立國家，是中國的一部分，陳映真是這樣理解的。拉長時程來看，陳映真也不算特別，到今天中華民國憲法也修改了，是一中憲法，這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張是一樣的。因此他說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和馬來西亞的馬華文學是不一樣的，就陳映真的認識來講，這是一致的，不矛盾。

**鍾喬** | 1989年天安門事件前一個月，發行《人間》第44期，刊載陳映真當時在南韓對於當地社會運動、民族主義運動和學生運動作了一系列的報導，恰好以一名南韓的學生運動領袖舉著拳頭的樣子作為那期的雜誌封面，這是一個面向。另外一個面向是在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後出的第45期裡，他在專欄裡面寫了一篇文章〈等待總結的血漬：寫給天安門事件中已死和倖活的學生們〉，非常憤怒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裡面有一個重要的話語：廣場上的學生、知識分子所擁護的，恰好也就是他們所反對的官僚主義的根源。這裡面他訴諸了第三世界的觀點，包含當時八〇年代他作為民族主義的左翼，以及作為一個國際的左翼的觀點，這對他而言是一體的兩面。

在我的理解底下，從現在的角度來反思「左統」，恰好有第三世界這樣的意涵，同時也表現在《人間》雜誌的呈現上面，這是我當初除了理解之外也是實踐的事情。《人間》雜誌結束時，因為當時我在《人間》當主編，藉由陳映真的引介，我才有機會真正到南韓去參加亞洲民眾戲劇訓練的工作坊，去面對亞洲第三世界的劇場，我覺得這是從他的第三世界角度裡面延伸出來的越界實踐和想像。這些實踐和想像對於我，還有後來在亞洲從事民眾戲劇，從第三世界的角度去思考世界問題，是很重要的面向。

**王墨林** | 剛才聽到王曉明老師的發言，我好像看到在某種高度上，大陸跟台灣在革命的引介下，相互交叉出一些我們可能都沒有思考過的問題：「台灣的陳映真現象或是《人間》現象或左翼現象，與中國革命的意義是什麼？」（我說的革命並不是在建國以後就結束的，而是包括之後的文革、六四等等）這是讓我很感動的，因為沒想到我們在台灣所做的事可以跟中國革命有一種交叉對照、參照的關係。這當中沒有位階問題的分別，而可以是互為文本，所以這條脈絡必須連結起來，並且這對於我們怎麼敘述台共或者台灣左翼都是未來很重要的議題，甚至還包括怎麼跟中國的革命以及繼續進行的反思資本主義連結——雖然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大陸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在電影、戲劇、文化生產等面向都沒有看到——所以這樣交叉參照的連結是我們在台灣要面對的重要議題。

**莊華興** | 我其實想問更多問題。在台的馬華作家表現相當受矚目，不知道台灣的讀者是怎麼看這個現象？我的觀察是，在台馬華作家的作品最後還是馬華的讀者在讀，但他們的知名度卻是在台灣創造出來的，由地方和學界大力推動，甚至台灣的學術體制也讓他們有這樣的

平台，但真正的讀者還是回到馬來西亞、新加坡。不知道台灣讀者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白永瑞** | 我想回應王曉明老師有關中國思想史裡兩個第三世界潮流的問題。我想這個區分可能太簡單了，從第一世界變形、由上而來的第三世界看法，跟從下面其他世界來的看法，兩者肯定有一部分是交叉的。比如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培的亞洲觀，還有20世紀前半期國民黨領導的戴季陶等人提出民主國際來反對第三國際跟歐洲的同盟。所以在整個中國思想史裡，這兩個看法應該是層層交叉的。

**王曉明** | 「第三世界」這個詞在大陸是六〇年代中共提出來的，在這之前沒有這樣的概念，但第三世界理論所要討論的問題從1900年代開始就一直在，有非常多的論述。比如二〇年代到四〇年代，國民黨是講世界革命，共產黨偏重講國際主義，再往前推到劉師培等等是講得非常之多的，這是一個非常複雜多樣的狀況，需要慢慢梳理。但我想指出的是，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理論放在整個中國革命論述裡面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國大陸，現代歷史上積累了豐富的論述和實踐，包括一直到四〇年代蔣介石在英國和印度衝突時還發表一個《告印度人民書》，但所有這些東西到了1949年以後的曲折表現就變成第三世界論。這個第三世界論包含著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正如陳光興看到中國一個很有名的學者說：「現在就是中、美對抗，你們這些都是胡扯！」之後，很受刺激地問我這個想法是從哪兒來的？我當時直接、粗暴、簡單地回答他：「這就是眼睛裡只有美國，而且認為全世界能夠跟美國對抗的就只有咱們中國，其他都不算數。」這種看法有一個來源，就是史達林第三國際翻版式的第三世界論。當然我當時是一個比較粗暴的回答，但我想是有關係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理論慢慢發

展出另外一個面向。當然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第三世界論本身也不是沒有根的，它從現代思想傳統接了很多根連續下來，但也受到當時世界政治局勢的影響，還有中國文化傳統裡面一個更壞的東西影響，這是很複雜的，好幾個東西最後在這裡體現了出來。所以粗暴地講，那個時期中共的第三世界理論有革命性的一面，也有非常壞的一面，而這些面向都會結出不同的果實。

**陳光興** | 我也許還是用陳映真自己的話，放在一個比較具體的脈絡來說。薛毅編的《陳映真文選》裡面有一篇〈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原刊在1991年的《海峽評論》裡面講到「河殤」：「錄像影集『河殤』中，甚至嗟怨中國文明的限制性，使中國沒有在鄭和的航海事業上發展成從貿易而向外殖民，以收奪南洋民族走向帝國主義！而這樣的世界觀，竟而曾經一時成為中共官方的世界觀，令人震驚。」（北京三聯版：頁497）我引這只是想以此來理解陳映真對於中國該怎麼走，還有和帝國主義的關係，這裡面的一致性是很強的，其中有很根柢性的第三世界視野在。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這兩天在這個場子裡其實有一個缺席的在場，就是我們很多人共同屬於的一個團體叫做「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這是我們推動很多事情的主要介面，當然很多人對「台社」看法不一致，但其實「台社」也有不同光譜、不同立場、不同走向。對我自己來講，尤其是最近這段時間，精神上的支撐有一部分是來自「台社」內部20週年時成立的「超克分斷小組」，我和這些同仁們彼此相互支撐，反而慢慢開始了一些可能性。我們往往沒有足夠的時間回過頭來檢討這個東西到底給予我們什麼？讓我們喪失什麼？在座包括趙剛、鄭鴻生、瞿宛文等等，我們能夠脫開既有台灣主導性知識的框架來討論問題，我必須要說台社是一個溫床，不然很多事情大概也很難這樣推動。



綜合討論



# 盜火者陳映真

施淑

今天這個會議要我做總評，我實在沒有這個能力。兩個月來我努力讀每篇會議論文，因為它們涵蓋了陳映真文學、思想、社會實踐的各個方面，裡頭有不少問題和觀點是我從未發現和思考過的，讀到後來只覺得招架無力，所以也就談不上什麼評論。以下只是我的一些感想。

我要講陳映真的時候，比較具體或是比較真切的印象，大概都停留他在1968年入獄之前的作品，雖然我不是教徒，最近卻常想〈聖經·約伯記〉裡頭的故事；約伯是放牧人，有很多牛羊，某天他的僕人告訴他，有人入侵、掠殺羊群，前前後後我不記得有幾個人，每個人對那掠殺的情境有不同的說法，但是他們都講了：「我是唯一逃出來報信的人。」我想要用這個故事來說，陳映真是五〇、六〇年代，站在人道和理想主義的角度，用文學的方式，從台灣的白色恐怖逃出來，那個唯一報信的人。

我教了幾十年書，因為是教台灣文學，一定會提到陳映真。每年開課的時候，我會叫同學建議這學期要讀什麼，尤其在八〇年代、九〇年代，陳映真（幾乎、很少例外）都是未被提及並被忽略掉的；但每年學期報告中，總會有少數幾位同學寫到陳映真，而又往往是那學



年報告裡頭最優秀的。陳映真究竟為什麼能感動這些人——雖然也只是少數幾個人——甚至受他引發出那些很深刻的思想？每一年，我們大概都會選一、兩篇陳映真的小說，開始的時候，同學們幾乎都沒有辦法跟他溝通，特別是六〇年代的〈鄉村的教師〉、〈故鄉〉，還有八〇年代發表的〈山路〉。他們真的搞不懂，小說人物為什麼會有那樣的行為。於是我就透過聊天，他們會問我：「陳映真為什麼寫出那樣的人物？」關於他們的心理背景等等。

從陳映真的自傳性文章〈後街〉，我們找到了解答。這篇文章讓我們看到陳映真如何由五〇、六〇年代——也許可以稱之為台灣思想的後街——的台北牯嶺街舊書攤，找到倖存的大陸三〇年代左翼文學以及社會主義思想著作，由此得到啟發，甚至用它們衝撞白色恐怖的黑暗閘門，並在他的早期小說中以隱晦的語言藝術，表現在（用陳映真的話來說）：人的理想和希望被「酷刑、問吊和謀殺」的時代。這讓人看到魯迅筆下的「盜火者」形象，也就是那些在人類歷史上帶來重大的精神變革作用的思想的異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映真可以說是從台灣白色恐怖的政治迫害和思想監控，逃出來報信的人。

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陳映真為什麼會在白色恐怖如影隨形的1960年代末，嚴厲批判風靡當時文壇的現代主義，譴責它的精神荒廢和思想墮落。為什麼他會是光復後文學界第一個意識到台灣現代文學史的斷層現象，意識到失去日據時代台灣和大陸的左翼文學思想傳承，對創作的根本傷害。更不難理解他為什麼會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站在第三世界文學的立場，思考世界性的冷戰思維結構下，台灣文學該何去何從。而後又以〈「鬼影子知識分子」與「轉向症候群」：評漁父的發展理論〉這篇鉅作，對台灣文化思想界進行總體批判。（〈「鬼影子知識分子」與「轉向症候群」〉，人間版作品集12：頁71-120）有關這些問題，這次會議已有多篇論文提出精闢深入的討論，不必我再作解說。

因為教書的關係，在跟同學們討論陳映真及其同時代作家的作品時，我一直有個困惑：就是該如何看待台灣的現代主義？這方面我與陳映真的看法有點分歧。因為從文學史來看，當時的現代主義者或許在美國新聞處的文化陰謀下，不自覺地扮演冷戰工具，成了政權的幫兇。不過從當時的整個文學環境衡量，生活在文學史的斷層，失去了自己的民族和文學認同，向懷疑、虛無走去，幾乎成了文學藝術的、道德的亡命之徒的現代主義者，他們在創作上的冒險；或許像一般前衛或先鋒文藝運動，會因他們的暴力形式，對五〇、六〇年代恐共反共的文學教條，和對當時僅有的疲弱的、熱能耗盡的所謂寫實主義起著破壞力量，甚且在創作方法、人的知覺的解放及至文學典範的更替發生必要的作用。如同五四運動後，現代主義思潮之間歇性地挑釁中國文學主流，日據時代中後期，以日語寫作的部分小說家和風車詩社，曾以負面書寫抗拒殖民統治，還有文革後的先鋒派和朦朧詩，他們都留下了不可忽視的成績。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先鋒派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Avant-Garde)一開頭就以劇作家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為例，說明先鋒派和現代主義的難分界限，他敘述1912年1月，一列由斯德哥爾摩工人公社成員帶頭的遊行隊伍，高舉紅旗和火炬，唱著革命歌曲，慶祝史特林堡的壽辰，因為這位後來被推崇為夢幻劇和象徵主義標竿的戲劇大師，年輕時曾在詩中宣稱：在社會劇變的時刻，他會站在來自社會底層的、手拿武器的一邊。陳映真在悼念畫家吳耀忠的文章，沉痛地寫道：「革命者和頹廢者，天神和魔障，聖徒與敗德者，原是那麼相互酷似的孿生兒啊。」(〈鳶山：哭摯友吳耀忠〉，洪範版散文集1：頁42)根據威廉斯的研究，先鋒派表現的是從革命到一切意義含混的、心靈的狂歡，先鋒派成員會因20世紀的政治運動成為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等等的信徒。所以

在思考和清理台灣的左翼和現代主義文學的歷史意義時，陳映真研究或許可以就此開啟新的契機。

# 從拉斯基到陳映真

我們如何啟動既有的思想資源

孫歌

大家好，我得先向大家坦白兩個小秘密。

第一，恐怕這次與會者裡面，讀陳映真讀得最少、對陳映真最不瞭解的人就是我。兩年之前光興跟我說，在籌劃這樣一個會，希望我能來參加，而且希望我能夠給個報告。但是這兩年我正焦頭爛額地纏在我自己研究課題的一堆材料裡面。我簡單地交代一下這個課題：一個是戰後日本思想界對中國革命的想像；第二個是日本民眾史研究和認識論相關的一些基本問題；第三個就是關於沖繩的民主運動和現實之間持續性的對抗如何原理化的問題。每個課題都非常難做，我陷在裡邊就不可自拔。而我也知道陳映真是一個非常「不現成」的作家。所謂不現成的作家是指，有一些作家，你可以依靠某一些既定的框架，或者是模式、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他；但是陳映真是拒絕這種處理方式的一個作家。我知道他的思考空間、政論的空間，和他文學虛構的空間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重合關係，故我個人不傾向於把它們分成幾個獨立的部分來看，但是它們之間又有非常明顯的差異。所以如果我要給個討論的話，我必須要更多的時間才能正面地面對這個問題，但我覺得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不太可能。同時，陳映真不是一個可以離開歷史來抽象地討論的作家，所以我還必須要補台灣光復以

後的整個這段歷史的課程，後來我說能做這件事的大概只有我們的「賀大哥」——賀照田，我做不了。另外還因為有曉明和薛毅他們這次都來加盟，所以我覺得我可以偷懶；我說：「我可不可以告假？」後來光興說：「那行，妳可以不做報告，那妳最後講一講。」我剛才坐在這個位置上，才意識到這是一個非常陰險的建議，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所以我現在如坐針氈，覺得像沒有溫課就上了考場的學生，這個處境很凶險！這是我的第一個小秘密。

第二，我其實已經有十幾年不讀小說了，雖然我供職的地方叫文學研究所，但我一直在掛羊頭賣狗肉。我做的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不讀小說不是因為不喜歡小說，而是沒有精力，因為有太多的課要補，有太多的歷史資料要讀。現在面對陳映真這樣的一個作家，確實感覺到有雙重的緊張，但是光興剛才跟我說：「沒關係，妳就放開了講。」所以我就決定試一下，放開了講，講得不好那就請大家多包涵。

首先呢，我想談兩個問題，我在這兒很認真地聽了兩天會，當然來之前也把能讀到的論文都讀了一遍，我覺得非常有收獲；大家提出來太多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裡面，又隱含了很多問題。有一些問題是我可以認可、認同的，有一些問題是我覺得需要討論，或者需要置疑的；而所有的這些問題全攪在一起，我不自信我能把它們完全整理清楚，所以我放棄給大家的發言作整理這樣的一個思路。所以我想，從自己的感覺出發談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作為一個試圖面對、繼承陳映真思想和文學的這樣的一個思想財富的後來者，如果要是放肆一點地說，我們應該怎麼去理解他的政治、他的政治感覺、他的政治觀念、他的政治理念？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怎麼去理解陳映真的文學世界？或者說他的文學創作和我們今天思想生產的關係？特別就我來說，我剛才交代了，我已經很少讀小說了，是因為我需要把全部精力，都放到思想史的研究

裡頭來；但是呢，在這個研究裡面我發現有一些最根本的問題，其實通向我剛才提的第二個問題。

所以我想完全作為我個人的感想，向大家彙報一下這兩天的收獲。

我想先談第一個問題。先東施效顰模仿一下光興，我也來進行一個挑釁性的發言。這兩天大家都把陳映真和魯迅放在一起討論，而且這也是這個會的基本設計，我想這個設計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想離開這個設計，我想把陳映真跟另外一個政治學家放在一起討論。我認為他們在某種意義上，也有很密切的相關性，這個政治學家是英國的拉斯基。（在座當中可能較年長的各位讀過，但年輕人大概不一定讀。）現在中國大陸年輕的學生基本上是不太知道拉斯基的，因為從五〇年代開始，拉斯基對蘇俄是表示了無保留的好感，所以中國大陸從五〇年代後期開始，就將拉斯基視為一個為修正主義鳴鑼開道的人，所以其實是對拉斯基保持距離的，他的論點或中譯著作多是放在內部參考資料裡面的。

我想簡單地介紹一下拉斯基(Laski, 1893-1950)，他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英國政治學家。在年輕的時候，一直到1920年代前半期他都是一個多元國家論者；也就是說，他認為國家不應該只有一個政府，他跟無政府主義不一樣，他是「多政府主義者」（這個當然是政治學裡邊的一個流派，我們不講它）；但他骨子裡，是一個古典自由主義者，他篤信的信條是自由和平等。我認為今天討論自由主義或者自由主義的理念，正面來談的時候，我們其實過度地關注了自由，而過少關注平等，但實際上，法國大革命留下的遺產恰恰是自由、平等這雙重的價值；一個認真的自由主義者一定要面對一個現實裡面的悖論：一個社會如果自由了，它就不可能平等，而這自由一定是相對有限的一群人的自由，它以多數人的不自由為代價。而拉斯基早年是一個古典自由主義者，他認為自由主義的理念是有可能通向現實社會的，但是在他

去美國哈佛大學教書的時候，遇到一些現實的事件：他發現，像美國這樣的一個號稱最民主、最尊重人權的國家，實際上尊重的仍然是少數人的權利。漸漸地，他從20世紀的末期開始一直到三〇年代以後，就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他的特點，不僅在理論上具有馬克思主義觀察世界的方式和思維，同時又伴隨具體的政治實踐。

這個政治實踐主要是他在英國擔任英國工黨的領袖人物，而且在五〇年代初為了讓英國工黨競選能夠成功，他可以說是累死在演講台上。拉斯基一共只活了五十幾歲，但卻留下四十多本政治學的著作；裡面集中地討論國家、法律、公平、正義、自由和平等。在他早期的著作裡面，留下了很多學理上的討論，而他後期的論述，如果拿到中國大陸來唸的話，我想就會像這兩天會上幾位發言者說的：「喔，黨委書記都來了！」也就是說，他後期的討論及表述，實際上是十分意識形態化，具體地說，就是他反覆強調一個信念：世界上唯一能夠造成自由和平等同時實現的社會型態，就是「社會主義」，而真正實現的就是「蘇聯」。

如果我們只在這個層面上理解拉斯基的話，那拉斯基受到的冷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問題沒有那麼簡單。拉斯基在三〇年代寫過一本書叫《現代革命的考察》(*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sup>1</sup>，這本書是他專門以蘇俄為研究對象，歷史性地去討論蘇俄政權成立以後(包括史達林時期)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暴力和鎮壓？拉斯基的基本看法是，蘇聯在建立自己新的主權國家之後，所要完成的一件事就是實現現代化，可是這個現代化對於一個落後的、沒有資源的、經歷戰爭的，而且國內百姓的教育素養低落的國家來說，它面對兩個

1 Harold J.Laski. (1943).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Ltd.

選擇：第一個選擇是，讓自己成為各種意義上的殖民地，依靠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來實現現代化；第二則是自己獨立地完成工業化的過程，為了這個它只能夠在內部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用拉斯基的話說，在歐洲需要300年的時間來完成，那麼在美國要用100年的時間來作準備，但在蘇聯卻只有三十年的時間；拉斯基說，在這樣的情況下，蘇聯就變成是一個依靠內部暴力完成建立現代主權的國家。

在做這個論述的同時，從30年代以來，拉斯基其實一直在進行對史達林的批判，這個批判並不妨礙他肯定蘇聯的社會主義，於是這整個論述成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整體結構，而這個結構的內部深層包含的是一個今天仍在面對的悖論：我們要不要現代化？我們要不要用獨立的方式去實現現代化？如果你說我們要，那麼在這個前提下發生的暴力的過程，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對待？拉斯基也不例外，他認為暴力的過程即使可以被歷史化，但卻不能被正當化，所以他分析同時批判。可是這樣整個的分析結構，由於拉斯基後來現實的活動太多，而沒時間進行更深入的學術生產，通常透過口述，由秘書幫忙打字，一本書就這樣出來了。那個東西確實是很粗糙，於是導致全世界學政治學的人，沒有幾個願意讀他後期的東西。（很多人說到拉斯基，認為讀到1927、28年就算了，後面的就不讀了！）可是，問題在於如果拉斯基被遺忘了，那麼也許我們今天可以說，這樣一種模式在政治思想裡面失去了它的意義。但問題很有趣的是，我在丸山真男那裡發現了重新啟動拉斯基這一部分資源的努力。可以說由於丸山真男的論述，使得拉斯基重新獲得了政治思想的意義。

大家知道丸山真男可以說是百分之百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史學者<sup>2</sup>，對整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的實踐，他是一直嚴格地保

2 丸山真男(1914-1996)，日本著名政治思想史家，在戰後日本思想界具有重要影響力。作為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代表作有《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日本：未來



持距離。但是在四〇年代末五〇年代初，他連續寫了兩篇關於拉斯基的論文，主要是討論《現代革命的考察》裡面，拉斯基對於俄國革命之後的社會主義過程，所謂的「現代化的非西方模式」的論述。那麼在這種分析方式裡面，丸山真男非常敏銳地察覺到所謂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立，只是一種表象，而不是根本性的問題；根本性的問題是，其實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同一的：它們都面對著要現代化的問題。尤其是歐洲的資本主義，它先走了一步，有了殖民地的積累，所以它可以用看上去比較體面的方式現代化；那麼後發展國家，我們一直在討論的第三世界國家，沒有這樣的可能性，但要追求的東西卻是一樣的。

還有一個最麻煩的問題，就是「國家的獨立」。作為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它仍然有正當性。丸山真男試圖將拉斯基所拋出來的這些問題進一步深化，即使政治學的所有理論都迴避了這個問題，但他更敏銳地看到所有自由主義在面對現實的時候，可以討論自由、討論民主，但卻不能同時討論「自由和平等」。在寫完這兩篇論文之後，丸山真男呼籲，如果我們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就要面對這樣的現實，讓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表示寬容的態度。

這樣的立場，讓丸山真男後來寫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政治學論文。這篇論文實際上是一篇宣言的前兩章，也是它的理論部分，叫〈三談關於和平〉<sup>3</sup>，這是一篇關於冷戰的分析。（我們這兩天的討論，很多討論也涉及到了冷戰，我覺得這個問題還要回過頭來看一下，在冷戰從1946、47年開始形成這個結構的時候，當時的人是怎麼討論冷戰的。）其實在1946、47年應該是從英國，接下來是美國出現了「冷

---

社，1964）等。

3 〈三談關於和平〉第一、二章，載於《世界》（日本）1950年12月號。後收錄於《丸山真男集》第五卷（東京：岩波書店，1995）。

戰」(Cold War)、「鐵幕」(Iron Curtain)這樣的詞語的時候，「冷戰」並不是如我們現在想像的這麼容易辨識的輪廓，當時的輪廓是非常混沌的。而且1948年聯合國組織了一個多國學者的討論，提出了一個觀點：世界上有兩種民主，一種是以資本主義國家為代表的，就是西歐和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另一種則是蘇聯國家主義為代表的，大眾的民主主義。當時是把這兩種社會制度同時作為「民主主義」來討論的。為什麼？是因為這兩種社會的對立面，在當時是法西斯主義。丸山真男剛好是在1952年的時候寫的〈三談關於和平〉，他說冷戰至少要分成三個結構來認識：第一個結構是「冷戰意識形態」，這也是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那一套關於冷戰的話語，而在這個層面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勢不兩立的。第二層是「現實的冷戰」，冷戰實際上是美國和蘇聯兩個國家在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上的衝突，確實在一段時間內會處於一個高度緊張的狀態，但是我們已經看到這兩個國家在體制上如果冷戰繼續深入的話，他們在體制上將會越來越接近。那是因為蘇聯如果為了長時期冷戰，它必需要有足夠的物質財富，才有足夠的社會力量來支持它，所以內部需要不斷地調整、放開，也就是說它要更民主化；而美國如果要長時期地進行冷戰，它必須進行高度的政治動員，所以將會法西斯化，或說將會集權化，於是兩種社會體制將會接近。第三層是「冷戰的中間地帶」，所謂的中間地帶是包括中國、印度和亞洲的國家，丸山真男認為中間地帶其實和美國、蘇聯之間的關係是不確定的，不管它們的社會形態如何，它隨時可能發生一個不同的組合，而且這些國家本身未必願意將自己牢牢地綁在美國和蘇聯的戰車上。

對不起，我講這個好像有點離陳映真太遠，但是我之所以講丸山真男的分析，是為了要顯示這樣一個思想程式的鏈條，因為丸山真男能做這樣的分析，當然和當時日本和戰後整個世界的認知格局有直

接的關係，而背後一個很重要的理論資源恰恰是拉斯基，是拉斯基給了這樣的一個模式之後，暗示了事實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立，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樣要緊，更根本的對立存在於另一個層面。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拉斯基說：我認為沒有第三條路可以選，如果只能選一個的話，我選社會主義。拉斯基很幸運在五〇年代初就去世了，他沒有看到後來，如果看到後來，他要如何修正自己的論述，我無法想像。但至少我覺得拉斯基的遺產讓我們可以意識到，今天對於冷戰、對於社會主義的想像，其實是相當膚淺、相當表面，而且相當的意識形態化。這是我援引剛才的一個部分所要談的問題。

這也引伸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怎麼看第三世界那些比較小的國家？相對地來說，在現代的政治格局裡面比較弱的獨立性和主體性——我不敢說，因為沒有讀沒有資格做斷言——但我推測，這有可能是陳映真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今天白永瑞先生也在場，我很願意把北朝鮮拿出來作為一個例子來說明。北朝鮮是個一直在頑強保護自己的、維護自己主體性的國家，不排除它在一些緊急關頭利用一下俄國、或者是中國，甚至是美國；它用這樣獨立的方式來完成現代化的、或者是完成它的主權國家的努力，其實我們是可以看得到的。我想有很多這樣的個案。我們今天只是看到北朝鮮的世襲政治，看到種種表象，但是對它面對的基本問題和這些問題與人類的關係，幾乎沒有什麼討論。

我想把話題引回陳映真。陳映真對大陸的態度，今天的發言一路聽下來，我特別受啟發的是：對陳映真來說，中國大陸到底是什麼？我覺得他真正關心的其實是台灣。大陸確實是他理想的一個載體，或者是一個烏托邦的媒介，但是賀照田今天說一句挺有意思的話：陳映真最後沒有把大陸整個八、九〇年代之後的那段歷史把它歷史化。為什麼他沒有把它歷史化？我覺得，他可能真正要做的是把台灣歷史

化。因為陳映真只是不想把台灣變成一個封閉的、用台獨的方式來建立認同的社會。我花那麼多時間來談拉斯基，是因為我對陳映真沒有任何判斷力，但有沒有可能從這個方向，去讀陳映真那麼多的政論文本？並且建立他的政論文本和作品之間的關係？他的政治關懷到底是什麼？是像拉斯基那樣的關懷？如果是的話，他會認為人類大概只有這幾條路可以走；那麼如果是社會主義的話，他就會把他的熱情傾注到大陸的社會主義實踐上。這有沒有可能成為一種思路？不知道，也許接下來我自己要讀的時候，可能會找到不同的感覺。但是，我認為作為整體、一個結構去讀陳映真的政治關懷，我最關心的是陳映真對政治的討論是道德的、心理的、文化的？還是政治的？（所以今天賀照田講到這個的時候，在台上因為沒時間就沒講完，他下來我問他，他又不講。這個問題可能得問他。）

我曾經跟一位日本的社會運動家有機會交談，我問他：「你們搞運動的時候是怎麼做？」他說：「搞運動的時候一定要設立一個明確的對立面，我們一定要二元對立！二元對立的原則是：A對非A，我們絕不做A對B的事；這樣我們出手才能打得準。」我覺得運動圈一定要二元對立，這樣是可以搞運動的；可是知識生產如果也用A和非A的方式來做，可能有一天連我們自己都可能覺得太沒意思了。結果只是在「你是對」、「你是錯」、「你的立場在哪邊」，只是這樣在這個圈子裡面走的話，那也就要面對很重要的問題：「左翼思想怎麼介入現實？」這個問題現在沒有時間，也不太可能把它展開來討論，但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我們總是有一個錯覺，覺得我們說的這些話有可能明天變成一個推動社會現實的力量。我自己是做了思想史幾年之後，才知道這是自欺欺人的錯覺，因為歷史不是那樣運作的。這是一個我要補充的。

還有一個要補充的就是，在這個會上，聽了那麼多過來人在談陳

映真文學作品給他們帶來的感動，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訊息：文學作品的功能，是給一個歷史時代的氛圍塑型。所有人會感動是因為你自己感覺到了，可是你沒有辦法表述，因為陳映真在利用文學的方式，給這個社會的某一些心態、感覺、精神在「塑型」。讀這樣的文學的時候，我一直在進行反思：我們有沒有這樣塑型的能力？是不是像施淑老師剛才批評的那樣：文學批評是理論的重災區？其實現在所有的學科都是重災區，我們想一下，如果把那些英美學者的理論丟掉，我們還有什麼？那個時候，我們得重新想了，是不是有能力自己給自己的同時代來「塑型」？因為我想，這理應不是陳映真的工作了。

2007/10/18\*

林思晴

## 一、某一個日午

這天。我與陳映真第一次相遇。

從沒想過，能有這麼寶貴的時光，仔細去閱讀陳映真，這是多麼奇妙的緣分，浩瀚書海中，天真的年輕人與他碰面了！有點悶熱的夏末初秋，同學們在教室裡大聲喧嘩，互相討論著自己有沒有讀完文本，記得〈趙南棟〉是我第一篇接觸陳映真的文章，那時候只覺得文章好多頁，但故事非常有趣，也就飛快的讀過。光興老師在台上吆喝著大家快點分組討論，以便待會有更多的討論時間，並且依人物分組，這是我第一次發現原來這篇小說幾乎每個人都有其存在的必要，而對於故事的最後，趙南棟究竟代表了誰，同學也議論紛紛，因為趙南棟的濫交、自我與沉迷慾望，誰敢攬在自己那個世代呢！以這個方式做結尾，想必陳映真是帶著許多批判的靈魂，而閱讀陳映真也無疑讓人

---

\* 此文為修讀陳光興老師「文化研究導論」及「陳映真的思想與文學」課後所感。題目「2007/10/18」源自於光興老師「文化研究導論」課上我第一次接觸到陳映真的時間，並於2009年11月的「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中參與座談，日後修訂為此文，收入此書。

感到驚慌失措。在我對人生剛懵懵懂懂卻又夢想做一番事業的興頭上，陳映真無非是給我一記當頭棒喝。

## 二、不能忘記的山路

忍不住對陳映真的佩服，又選讀了光興老師「陳映真的思想與文學」，一學期下來和大家愉快地分享陳映真的作品。永遠難以忘記〈萬商帝君〉中的林德旺發狂癡顛的模樣、無法忘記矗立在〈山路〉中千惠與貞柏互訴夢想的正直與良善。這些情感不論是瘋、狂、痴、傻都令人感到真實，這也是為什麼讀陳映真小說如此有吸引力的地方。而陳映真也帶領著一起閱讀的陳光興老師與修課的同學們，進入了小說所建構的世界，在裡頭我們見到的風景，人人各不同，但相同的是我們都受到陳映真的「感召」，面對自己心中最深刻的情感。有時強忍著快潰堤的眼淚，只因心疼故事的主角；還記得〈山路〉，課堂上同學們多數認為，這是陳映真最令人感動的文章，我還無法忘記光興老師講著講著眼睛也泛紅的畫面，而自己對身處在富足享樂的世代中而不知人間疾苦又是多麼的羞愧。陳映真的小說讓人無法抗拒地捲入「真實」的情境，雖然這個可能帶有誇大的虛構性存在，但卻是一種歷史情境般的身歷其境，似乎偷聽到蜿蜒山路中的細語；一方面又讓人拉回到自己身處的現實世界，另一個「真實」。

對當時大二的我而言，很快的看到真實並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我曾和許多同世代的朋友一同聊聊陳映真，大家來自不同的科系與學校，彼此有著不一樣的生長與知識背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像我對陳映真有著如此熟悉與感動的心情，或許是自己有讀完大部分的小說集，對陳映真的了解比她們再多一點點，但她／他們也並非沒有接觸過陳映真，只是都接觸到他的其中一面，所以和我

想像的回答出入很大。某校中文系的朋友，有讀過一些作品，對〈山路〉以及〈將軍族〉這兩篇指定讀物非常有興趣，但也僅只於上課閱讀，並沒有更進一步的追逐陳映真，但對他的文字印象深刻，因為實在非常特殊。另外幾位只有讀過一篇文章，但印象深刻的卻是課堂上老師提到陳映真與某些人們的論戰與火爆，所以對陳的印象沒有很好。我相信人也存在許多偏見與喜好，也不是每個人都會喜歡一樣的東西，意志是不容被干涉的，但若是有人因人廢言，我真的想替這為情感直接的作者說話，因為他有自己的理想與堅持，也不怕被人知道自己的言論與立場，我們不應該只看到某一面而錯過了這麼一位優秀的作家。那時候的我們血氣方剛，當然現在也沒改進多少，總認為自己將要從青少年轉入成人的世界，卻不知道我們早已戴著大人世界的有色眼鏡張望四方。

〈山路〉中年老的嫂嫂總是回憶起那個台車道，這是與她年輕時代的連結，也是她贖罪的道路，更是她拋棄理想與愛情的通道。

少年的我，接觸到這樣的題材，總認為怎麼有這麼傻的女生，只因為良心的譴責，自願去替一位無親無故的政治犯照顧他的家。這不只是放棄了自己的愛情與璀璨的生活，同時也要獨自堅強扛下莫須有的壓力和重擔，這不是傻瓜嗎？第一次閱讀的「不可思議」，在第二次、第三次的閱讀中漸漸消失，取代的是最清澈而不虛偽的人情，這種「甘苦人為甘苦人」的情感在冷漠的社會裡我們要如何懂得？這種陳映真式的社會主義理想在我生活的年代早就無蹤影。還記得當時閱讀心裡滿是慚愧，與朋友分享之後，發現我們都有著這樣的焦慮，才稍稍放心原來不是只有我這麼認為。但我很開心擁有這樣的情感，證明自己似乎還擁有一個靈與肉的軀體，願意相信這種事情是可能存在的，也願意承認我們缺少了這些勇敢。曾想過〈山路〉為什麼取名為〈山路〉？只覺得篇名取得好，因為那個年代只有在蜿蜒的山路上，無



人煙的小徑中，才可以講述這些夢想，年輕的千惠與黃貞柏，互相交換著彼此的理念，他們的臉上彷彿有一道光，照亮了疾苦的世界，這種抱負是很偉大的，卻也不容易實現，社會主義的崇高理想藉由黃貞柏和李國坤的神采中透露出來，千惠也受到感動，決定替李家付出她的一生的那刻，正是實踐著自己的社會主義——替窮苦的人們贖罪，可是她也只能做到拉拔弟弟國木長大，督促他讀書，長大過著好生活……。時間久了，當看到報紙上寫著，黃貞柏被釋放出來的消息，女主角千惠有如被驚醒的貓，懺悔地不知如何面對黃貞柏，也不知如何面對這個被資本主義馴服化的自己，已經過著物質充沛的好日子，無法再回到過去了，內疚使得千惠病了，而且也喪失了活下去的意念，因為本來到李國木家，是為了要贖罪、喫苦，她的憂慮是，這麼安穩的生活，對得起當年的理想嗎？又是一記當頭棒喝。

回頭看著最近的報紙，2010年鬧得沸沸揚揚的中科三期、苗栗大埔開發案，我們太依賴科技業強大的產值能力，有些人選擇忽視高科技背後帶來的缺陷，農民辛苦一甲子才得到的土地農田，不分青紅皂白被劃入用途不明的規劃區；怪手半夜無聲地進入田地，破壞了快要收成的農作物。在每個人都自私自利的環境下，回頭閱讀〈山路〉只換來更多的感嘆。當然我們這個世代的青年，也並非如此自私，但不可否認的是，對社會有著關懷的人遠比從前缺乏，而被慣壞的政府與財團面對權力／利的取得，許多是建立在程序不正義的過程上。陳映真說過：「我們都不要讓別人教你們從小就彼此分別，彼此仇恨」（〈鈴瓊花〉，洪範版小說集5：頁19）。可是在社會瀰漫著你死我活的競爭下，資源分配不均而產生的巨大貧富懸殊，早就清楚的劃清你們／我們的界線，不論是階級、性別、政治的分歧，導致二元對立的場面一再出現，好希望陳映真的小說能夠喚醒更多人的良善與寬容。陳映真與他的時代緊緊結合，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社會關懷與實踐，雖然每

個時代有自己的路要走，但社會關懷是不能被忘記的，天秤若有傾斜，表示兩邊可能有一方太多、一方太少的情況發生，多的那方是如何得到增加的部分？少的那方又是怎樣發生缺損？仔細想想，我缺乏的正是陳映真看待社會那銳利的眼睛與筆鋒，常處在後知後覺甚至是不知不覺的情況，寫這篇文章的同時，我期許自己能夠替對的事情勇敢的發聲，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值得嘗試。

無論是陳映真青少年時期有些鬱鬱寡歡而浪漫式的文章、或中期帶強烈社會主義色彩的華盛頓大樓系列、晚期小說如史詩般記載著歷史洪流，這些文章篇篇都令人印象深刻。可是到了中期，華盛頓大樓系列，我感覺陳映真的使命感覺醒了，他好像知道自己的筆就是要為了這些勞苦的人發聲，所以在〈萬商帝君〉或者是〈雲〉這些文章裡面，大多都可以看到小人物在資本主義下是如何被壓榨，也隱約看得出陳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不久後，他成立「人間出版社」，這樣的胸襟和關懷，使得這時期的小說非常具有批判性，也可以讓我們強烈看到資本主義的戕害。前面提到陳映真的小說充滿「真實」，有趣的是，回頭看幾十年前的文章，竟然也都能與現實社會接軌。小說〈雲〉講述工會的議題，主角何春燕等人努力爭取自身權利，卻只換來公司連哄帶騙的安撫，表面上想要順應潮流成立工會，但也只是想成立由上層直接下令的傀儡罷了，對於女工積極推動工會的動作，男性主管感到威脅，由於利益是一個公司的生命，工人的權利在此可以被無限縮小，一切都是為了公司，員工好像只是附屬品，陳映真不只點出資本主義的缺失，也帶出性別問題。陳映真的筆下女性特別富有堅強的生命力，從前期〈某一個日午〉下女彩蓮和〈六月裡的玫瑰花〉中的艾密麗、〈永恒的大地〉中的「伊」（似乎沒有名字），到〈雲〉的工會組織，她們的身分也許不高，其中艾密麗和「伊」還是接客的妓女，從世俗眼光來看這些工作，她們理應像黑暗角落裡的動物，是見不得光亮的，陳映真卻賦

予她們更堅強的勇氣與光明，讓人別有一番省思。雖然彩蓮是個下女而她也未被房處長接受，但她懷有孩子，一個新的生命可以使她繼續走下去，散發出母親的光輝，是非常美麗的。而艾密麗和〈永恒的大地〉中的「伊」，懷中也都有小孩，雖然巴尼死了、「他」病了，她們的母性包容力和堅忍不拔，足以撼動人心。陳映真筆下的女性，是非常堅強有創造力的，地位通常也都不高，但表現出來都是傳統母親的堅強，對照他所描寫的男性，很多都是沒有生命力的，例如房處長即是一例，為什麼陳映真要如此反諷？是下意識使然，還是故意？！（若有機會，真想問問陳映真呢！）

「死亡」在中國是不太被描寫的，可能覺得穢氣吧！但陳映真毫不掩飾的描述它，且描述分外生氣勃勃，這更是一件弔詭的事情。例如小說〈死者〉，文字畫面繽紛的印象跳動整篇文章，雖然阿公就像黑白印刷的相片，但活在他周遭的人事物，卻有如電影一幕幕地穿插在這個灰暗的空間，主角林鐘雄悄悄流動的情慾、村子裡的惡習、林家特殊的疾病等，都活靈活現的出現在〈死者〉文中，這也是陳映真常用的反諷手法。陳映真很少文章裡沒有提到死亡，究竟「死亡」對於陳映真的作用是什麼？實在讓人很難捉摸，但陳映真對死亡的描繪，存在著許多可能性。例如他處理政治犯的死亡，是與〈死者〉有些差異的。政治犯的死在描述中會帶有理想性，而且也特別容易使人感動，我覺得陳映真不只是一要為他們平反，同時也對時代的暴戾進行無言的控訴，並不是所有的犯罪都令人髮指，也不是所有的犯人都有錯，若是沒看過陳映真或者是其它政治犯的相關文學，那段歷史，也只不過是課本上匆匆帶過的一兩句話而已，但它確實存在，我久久不能忘記的是〈趙南棟〉中許月雲老師的那句：「殺人者……殺人者！」（〈趙南棟〉，洪範版小說集之5：頁125）究竟是歷史殺人？還是國民黨殺人？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若是當時國民黨政府安穩的接收台灣，也沒有共產黨來擾事，

這樣的歷史下，我們還會看到這些驚心動魄的故事嗎？或許國民黨的嚴刑厲法這麼做並不全然沒道理，而且也算是很無奈的決定，反攻大陸，自己的家鄉卻只能用反攻這兩個字，我覺得時勢讓他們不得不緊繃，也不得不對一些思想犯進行控管，該怪罪誰呢？再看〈夜霧〉，雖然只是個故事，但我相信在真實世界中許多當過特務的人，心裡狀態應該很不好受，明明知道犯人是被誣陷的，但還要用國家所訂下來的正義去將他們定罪，心腸軟一點的人——不——就算心是鐵打的特務到最後，也是無法直視自己的人生，其實這些歷史，又該怪誰呢？同樣都在描寫死亡，我覺得陳映真前期多帶著浪漫的色彩，間或穿雜著民間傳說，例如〈貓牠們的祖母〉中祖母死後，竟直挺挺的靠在牆上，與民間傳說人死後被貓跨過，死屍必然挺立，有點神祕又帶著誇張的筆調。還有〈我的弟弟康雄〉，透過姐姐來描述已經死亡的弟弟，究竟為什麼而死？〈六月裡的玫瑰花〉的軍曹巴尼，最後光榮捐軀，他們都為了自己的理想與抱負，死亡在此也有種英雄式的色彩，很符合前期的浪漫主義筆調。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陳映真後期主角的死，多帶有種懺悔，或者是心理因素作祟而不得安寧，陳映真很強調這種精神所引起的疾病，而且也很深入刻畫這些發瘋的人的想法，看起來是一個很荒誕不羈的世界，但或許從他們的眼中，所見的才是最真實的寫照，〈萬商帝君〉的林德旺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還有〈夜霧〉的主角李清皓，他們也都看透了最血腥的社會，我們身為一個「正常人」，卻沒有辦法看透一些事時——就如同魯迅《狂人日記》所說，這吃人的世界——李清皓和林德旺被固定在一個框架，雖然走不出我們所謂的不正常但卻看透了框外的資本主義和吃人者的心，他們所說的話和看到的事，難道比我們這些圈外人更不清醒嗎？

死亡、瘋狂、吃人，魯迅式的明嘲暗諷。

### 三、故鄉與歷史

陳映真描寫起家庭與人之間的互動，特別有味道，不知為何總讓我眼淚直流。但出乎我意料之外，陳映真寫起兄弟的感情，卻不如寫起其他家庭關係來的精彩，原本以為他會把自身的感情投射在文章當中，因為自身家庭背景的關係，可以寫出讓我們這些平凡人難以進入的情況內，這是我的期待，我好想看到更多關於他們兄弟的故事，雖然哥哥已經在9歲時去世了，也許這是個強人所難的要求吧。陳的文章放進許多個人的生命體驗及感情，現實中陳映真與養父母及原生家庭的關係應該算良好，但與他的小說相比，小說中的家庭常常是支離破碎的，或者是不愉快的，這樣的故事出現的次數非常多，究竟他用怎樣的心情去寫這些故事？而且他對於「家」的概念也擴張至國家的範圍（「家」到「家國」），陳映真對於家庭的描寫特別引起我的注意。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故鄉要回去，沒有故鄉的人是流浪且無依靠的。

洪範出版的《父親》這本散文集，裡面有很多感人的篇幅，例如〈父親〉一文中，他描寫了一個高大、溫暖的父親形象，雖然陳映真是由養父所照顧，但是血濃於水的親情，是空間也無法剝奪的。另外，在那個年代，陳父可以有著開闊的胸襟，接納不同的意見，特別在政治上，陳映真成為「左派分子」的危險思想絲毫不受家庭限制，能夠寫出這麼動人且激奮人心的手，沒有被摧殘，我想陳父算是陳映真的搖籃，讓他的思想可以對台灣透出一絲光亮。陳映真雖然在政治上有著明顯統派的立場，從他念念不忘的舊鄉的地址：大清國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歸善鄉，依仁里，石盤頭，崎溝，福安厝，這一串文字承擔了不只是陳映真的家族使命，更承擔他串起台灣與中國聯繫的渠道，台灣與中國這個難解的問題，我相信到了我們20歲的這輩學生，很難有一個共通的標準回答，但在陳映真的那幾年，這些問題更無法

輕易的說清楚、講明白，但我自己覺得陳映真早期或中期的文章對大陸帶有高度的憧憬，到了晚期的〈夜霧〉和〈忠孝公園〉似乎台灣又有可能成為他落地生根的希望，但也和之前一樣，可能得問問陳映真本人，或許這永遠是個無法清楚被表述的情感，因為故鄉的分量實在太重、太重了。

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不僅當局者迷，我們幾十年後的旁觀者還是一樣「迷」，不論是台海兩岸關係或者是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歷史多角度的史觀，切任何一塊都無法看透全面。再次重讀〈趙南棟〉，我更能體會陳映真會什麼要寫作，為什麼要不顧被抓的危險去記錄不同世代的人生，因為不寫，就更多人遺忘這慘絕人寰的歷史，一切的富裕和民主，是踐踏在前人血淚上，而我們只享受到成果卻無法了解這些都是多少破碎和有苦難言的命運所交織而成，以前不曾流淚的情節，現在看來，我都覺得陳映真那時代的苦痛，是讓我不忍見的，不只〈趙南棟〉，連〈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也讓我淚如雨下，我覺得文學不只是要讓人有樂趣，我更想要在其中得到一些感情的脈動，這樣才讓我感覺它是一個活著的東西，因為它活著，所以我得以窺見這些人的愛和故事，似乎就在身邊。我覺得陳映真的文章，寫的真好，到現在為止，我的記憶又多了點故事，好像是真的又好像是假的，但是這個世界就是假假真真，那個顛倒是非的歷史，同樣也令人撲朔迷離，不是嗎？

陳映真用趙慶雲、趙爾平和趙南棟，這三位代表人物，來依序書寫台灣時代的變遷，只是一代一代過去了，能繼續傳承前期人民信念的人有多少？趙慶雲那輩披荊陷陣，為的就是實踐陳映真所謂的社會主義理想，他和宋蓉萱也是在抗爭中認識的，這種有為青年的結合，很多只在現代人的想像中出現。現在的年輕人，包括我自己，都與趙南棟一樣，只跟隨自己的慾望走，作者對此沒有任何批判，也沒有任

何負面字彙去評論趙南棟，對於下一代，陳映真可能感到很無力，但趙南棟又真的是在寫我們八〇年代出生的這一批？我並不知道。誰敢就這麼承認自己忘記了一開始前人的血淚築成的歷史，在這麼民主、富裕的時代，慾望流動的時代。我想這應該只是我自己的懦弱與逃避吧！

我對於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記憶幾乎為零，藉著閱讀陳映真才能搭起一些真實的連結。還記得《父親》中，陳映真提到他悼念戴國輝的文章，他說曾在某個場合遇到戴國輝，兩人聊到郭琇琮的報導，戴國輝就說他寫得不錯，突然：

不料語聲方落，戴先生猛然抓住我的右手腕，低下頭來：開始十分費力地吞嚥著他突如其來的哭泣。我在他強力的握力和顫抖，在他於公共場合也無法抑壓的至深的悲慟中，沉默地坐著〔……〕  
（〈宿命的寂寞：悼念戴國輝先生〉，洪範版散文集1；頁155）

在戴國輝哭完之後，兩人又若無其事地聊其他事情。這對我來說真的難以想像的一個情景。對陳映真而言，戴國輝彷彿是從一個長期不允許述說和回憶的、遭到滅族而覆亡的國度中倖存下來的，變裝逃脫，而又異服行走於今日市城中的人。這種強烈的存在感，不是翻一翻高中的歷史課本就能體會，若我沒有讀到這段話，我也不懂得在這個噤語的時代多麼令人感到苦澀。

#### 四、最後

期許自己不要只成為陳映真筆下〈上班族的一日〉中：

一大早，無數的人們騎摩托車、擠公共汽車、走路……趕著到這

個大機器中去找到自己的一個小小的位置。(〈上班族的一日〉, 洪範版小說集3: 頁200)

雖然這是每天最正常不過的景象。

還有, 不要忘記〈山路〉中的千惠臨死前的醒悟:

如今, 您的出獄, 驚醒了我, 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 突然因為您的出獄, 而驚恐地回想那艱苦、卻充滿著生命的森林。(〈山路〉, 洪範版小說集5: 頁90)

每次熟練地打開電腦的資料夾, 翻閱陳映真上課的筆記與心得, 讓人又重新回憶起美好的課堂、朋友的笑聲、老師的直爽; 但最不能夠面對的, 還是我漸漸消失的熱情跟理想, 舒服躲在資本主義體系中, 把耳朵、眼睛都關上, 假裝自己可以過得很好, 快快樂樂上學, 世界照常運轉, 九〇年代RCA的悲慘女工、清大宵夜街的外籍看護、科學園區過勞死的員工, (假裝)都離我好遠好遠……。

我以為我可以置身事外。

但心裡其實非常難受, 陳映真的文章, 一次又一次甩了我熱辣的巴掌。「為什麼你明明知道卻選擇沉默?」腦中自問自答還是沒有動作。希望千惠給我一些勇氣改變(哪怕是給我在FACEBOOK的議題聯署上面按個「讚」的力量也好), 讓自己再多承擔一些, 每個人都有各自碰撞社會的方式, 陳映真靠著書寫的力量, 而我應該試著找到自己對這個世界發聲的方式。





## 喪父\*

陳幼唐

〈趙南棟〉並不是我在陳映真所有小說中最喜愛的一篇，但或許可以算是和自己的經驗、思想纏繞最深的一篇。在2007年，也就是我大二上學期的「文化研究導論」中，陳光興老師就帶大家選讀了陳映真的〈萬商帝君〉與〈趙南棟〉，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觸陳映真。同年下學期，又在老師的「陳映真的思想與文學」課上，將洪範出版的6卷小說連同一本散文集給紮紮實實地讀完了。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同學幾乎非為文學專業，多半是憑藉自己的經驗與感覺閱讀小說的。而在閱讀和討論〈趙南棟〉的經驗中，我觀察到兩個較為特別的狀況：一、我們直覺地將趙慶雲、趙爾平與趙南棟父子三人當作三個不同世代的人看待；二、同樣是反射性地將自身與「趙南棟世代」重疊。

不知是否源於青少年多少會感到的一種虛無感，或者是因為自己的父母輩正是成長於台灣經濟起飛的時期，並且就像兄代父職的趙爾平，以實質經濟建立一個有模有樣的「家」，養育我長大的緣故，我是「認同」並多半能理解趙南棟的。然而，大概是在「陳映真的思想與文學」這堂課上，陳光興老師不假思索地說自己正是「趙南棟」<sup>1</sup>，這立即

---

\* 本文與女性主義沒有任何關係。

1 他其實是說：「我就是趙南棟啦！」至於有哪些地方像趙南棟請去問本人。

引起台下同學<sup>2</sup>懷疑與不解，包括我自己當時也是完全無法接受的——經過蓬勃的學生運動、社會運動的滋養，以及高漲的民主化浪潮，那樣能夠不分省籍年齡一起坐在中正廟，僅因理想而高唱「青春之歌」的我的老師輩，怎麼能是「趙南棟」呢？我想起2009年5月於清華大學舉辦的「1970年代保釣運動文獻編印與解讀國際論壇」，雖然我僅參與了一天，但很多與會者，暫且稱為「中生代左翼知識分子」（簡稱左翼中年）罷，他們的活躍以及談到理想時的激昂仍令人印象深刻，他們怎麼會、又怎麼能是「趙南棟」？然而，據小說內容估算，生於1949年的趙南棟，的確算是我的老師、父母一輩沒錯。那麼，問題將變成：和身為「趙南棟世代」的老師出生相隔30年的我輩，為什麼在精神、情感上仍會覺得自己就是「趙南棟」呢？誰又是「趙爾平」？

本文即為，經過課堂及私下的閱讀經驗，以及前述的「文化衝擊」後，以及參與2009年的「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的基礎上，在2010年已進入尾聲的今日，重新閱讀〈趙南棟〉，以家—學生兒—父親這三個相互關聯的主題檢視〈趙南棟〉及陳映真的其他小說，並回應我在上文提出的問題。在與初閱〈趙南棟〉相隔3年的今天寫下這篇短文，也算是給自己的一個交代。

## 家

從陳映真早期小說到最近一篇的〈忠孝公園〉，「家」一直是個重要的場域，而他筆下的家庭皆是不完美的，最淒慘的莫過於如〈蘋果樹〉裡後街家庭的破敗，就算是〈上班族的一日〉中的小康現代核心家庭，也硬是要加入男主角外遇的橋段，難保以後這段裂痕不會突然爆發。

2 課堂同學皆為所謂的「七年級生」，和「四年級」的老師出生相隔30年。

在〈試論陳映真〉一文中，陳映真如此評價自己的早期作品：

他不曾理解到：市鎮小市民的社會的沈落，在工商社會資金積累之吞吐運動的過程中，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幾乎是一種宿命的規律；他不曾懂得從社會的全局去看家庭的、個人的沈落；他也不曾懂得把家庭的、個人的沈落，同自己的國家、民族的沈落連繫起來看。（〈試論陳映真：《第一件差事》、《將軍族》自序〉，人間版作品集9：頁4）<sup>3</sup>

在今日，大抵是因為知識、物質基礎，以及歷史條件等各種因素，我這一代的年輕人，尤其是接觸過一些批判理論的，是能以面對一個全然與己無關的「客體」般，以「理性」的姿態批評「國家、民族的沉落」，並大談諸如帝國主義、第三世界關係等議題的。諷刺的是，無論在理性亦或是情感層面，我是沒有能力去面對那些發生在自己生活周遭那些「家庭的、個人的沉落」的，更無法在當下將這些與「國家、民族的沉落」連繫起來的。比較起來，無論陳映真所探討的是民族分斷、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在第三世界的共構，它們的破壞性力量往往都直接對「家」造成衝擊性的裂痕：陳映真筆下的「家」是破碎的，而這樣的破碎又來自於一連串的歷史過程。而最大的悲劇，同時也是多篇小說的結局，都是使得這個原是遮風避雨的最後一堵牆徹底崩毀，歷史悲劇莫過於「家」竟成了廢墟。

趙南棟的哥哥趙爾平，一直以來的目標以及生活重心就是重建一個「家」（縱使他對完美家庭的想像僅在於經濟層面）。最後他家庭的破碎，自然也是對於國民黨一手主導的白色恐怖的批判。在這裡，陳映真是完全有條件去直接批判黨國機器直接施於人類肉體的壓迫，他

3 黑體字強調為本文作者所加。

大可鉅細靡遺地描寫特務是如何搜捕他們所謂的「政治犯」，拷打施刑的細節、昔日革命同志的背叛以及所造成的大規模牽連逮捕……。然而陳映真卻不這麼做<sup>4</sup>，相反地，他往往採取迂迴的作法，透過「家」這層中介，拉開一層距離去訴說那個肅殺沉默的時代。小說中最大的悲劇也不是發生在肉體與國家機器碰撞的高潮，最大的悲劇不是發生在如宋蓉萱、蔡宗義、林添福這些左翼分子們的「朗澈地赴死」，而是在「事過境遷」後，趙家的破碎。歷史導致家破人亡，這難道不是對那段噤聲的年代最沉痛的控訴？我想起〈永恒的大地〉中那對喪心病狂的父子，陳映真對他們的批判固然是銳利的，我卻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的「嘲諷」，或許正因為陳映真總是「把家庭的、個人的沈落，同自己的國家、民族的沈落連繫起來看」，他才能用一種同情的姿態看待那對父子罷。又或許，最深的分斷裂痕，最強烈的流離失所，正存在於時代底下，那個名為「家」的廢墟中。

## 學生兒

趙爾平那立於自廢墟底重建家庭的目標，是偉大的，卻也是短淺的、不堪一擊的。他對於「家」的想像僅止於經濟層面，而這自然也是歷史悲劇下的產物。可以理解的是，自小失去父親的趙爾平，是沒有能力知道除了物質援助之外，還能給予弟弟什麼的。回應先前提出的「三個世代」論，縱然趙爾平明顯地是在「兄代父職」，但我已不會再將他與趙南棟視作兩個不同世代的人了：趙南棟的確有生存在虛無中之感，但趙爾平那將自己完全投入資本主義運轉的生活，未必比較「現實」。甚至，趙南棟的虛無感更加符合台灣歷史進程的「現實」，趙爾平

4 如同對宋蓉萱遭受拷打的描寫是透過葉春美的回憶揭示的，陳映真似乎不直接描寫「當下」。

的「現實」作風，未必不是一種對於真實歷史的「反現實」；他所追求的「家」，未必不是一種更大的虛渺。趙南棟的所作所為，或許可以說是「叛逆」的（但他竟是如此「良善」的），然而趙爾平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的「腳踏實地」，又未嘗不是對於他將青春肉體獻給理想的父親最大的「叛逆」？

陳映真在小說中，時常描寫帶有理想性格的市鎮小知識分子的墮落，如〈故鄉〉一文裡主角大哥的墮落；或者，是像〈雲〉裡的張維傑，直接進入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裡了。從理想到墮落，或者屈服於現實，這樣的巨大轉變在陳映真的小說中時常可見，且都是極為快速的，天使在轉眼間就墮落成魔鬼了。在紀念好友吳耀忠的散文中，陳映真這麼寫道：

革命者和頹廢者，天神和魔障，聖徒和敗德者，原是這麼相互酷似的學生兒啊。幾個驚夢難眠的夜半，我發覺到耀忠那至大、無告的頹廢，其實也赫然地寓居在我靈魂深處的某個角落裡，冷冷地擰笑著。（〈廬山：哭摯友吳耀忠〉，洪範版散文集1：頁42）

趙爾平和趙南棟並不分屬兩個世代，而比起兄弟，他們更像一對學生兒。有意思的是，陳映真本人就是學生兒。<sup>5</sup>陳映真所描寫的這些成長於五〇年代之後的青年們，縱使胸中懷有理想性格，總會伴隨著相當的虛無感，而他們堅持的理想也是脆弱的，在破滅後會讓人一蹶不振。今天滿懷理想的青年在明天未必不會成為世故的趙爾平<sup>6</sup>，或是沉溺於虛無的趙南棟。

5 據陳光興老師的看法，陳映真好像能透過外部／學生哥哥的眼睛看自己，從而對於自己有清楚的認識，如〈後街〉一文所呈現的。

6 更多例子詳見陳映真小說的「華盛頓大樓」系列。

## 父親

我想多數人都同意，進入各類人物的內心世界、感受不同於自身經驗的生命歷程，是陳映真的天賦異稟。另外，我也曾聽過認為陳映真描繪男性遠比女性還要細緻複雜的這種看法。但在我心目中，陳映真筆下最特別的一類人就是「父親」。父親的角色在陳映真小說中，無論是省籍、教育程度、階級、政治立場……可說是各種各樣，但這些「父親」們在家庭中往往不是沉默就是缺席，總之不會是個好父親。相較之下，堅忍、獨立的母親在陳映真的小說中俯拾即是。從〈某一個日午〉中最終選擇保下孩子的彩蓮，〈萬商帝君〉裡點出跨國資本醜陋真相的姐姐素香<sup>7</sup>，到〈趙南棟〉裡死命護著腹中骨肉的宋蓉萱，陳映真的小說裡有太多類似的女性形象。而無論這些女性是否真為好母親，相較於總是缺席或失職的父親，總是強上許多。

弔詭的是，小說中的「父親」和陳映真本人的父親差距相當巨大。陳映真常常將自己的真實經驗置換在小說中，但卻從不見他親密熟悉的「父親」形象落實在小說裡的哪個父親角色上。據陳映真本人的自述，他自小就與生家分離，而後向來與之親密的小哥又病死了，絕不能說他的家庭是「完滿」的。在青年時期陳映真即因其思想上的超前以及現實知識資源的匱乏，而感受到精神上巨大的壓抑；成年之後，他更遭到當局逮捕，度過一段長久的牢獄生涯，真實體驗到在那樣的社會，改革有多麼的艱難。然而，這樣的陳映真卻終究沒有變成趙爾平或趙南棟，現在看來是多少有些費解的。在〈父親〉一文中，陳映真如此描述父親在他那段歷程中的內心位置：

7 素香算是姐代母職，從小照顧〈萬商帝君〉主角林德旺，並資助他的教育與生活。

當自己和同伴全部被捕，幼稚的組織破滅，在巨大無比的「國家」機關的暴力前，感到脆弱和渺小時，父親的話，才以深刻的迴音在反省的心中響起。（〈父親〉，洪範版散文集1：頁145）

陳映真的父親陳炎興就是這樣一個特別的人物，陳映真的小說筆下出現了各種父親角色，無論是隨波逐流的小人物，還是如趙慶雲這種獻身的理想主義者，卻從來沒出現如陳映真自己父親一般的「父親」。而擁有這樣特別的「父親」，大概也不能全然歸於陳映真自己的經驗，但也不能簡單地如此推論他的父親代表了某種失落的精神。總之，陳映真的父親雖不像趙慶雲般在時代中燃燒自己，但卻比趙慶雲還要成功地在年幼陳映真的心中「守住了一個祖國」。若陳映真將這樣的父親寫入小說中，或許能避免多篇小說人物自毀的命運。是什麼東西使家在時代的洪流中不成為廢墟？是什麼使虛無的學生兄弟不在夜半悄然出現？我想有一大部分得歸功於陳映真的父親。縱使陳映真自小被伯父收養，但他與父親在精神、情感上的連結卻是比小說中任何一對父子還要強，也更像一個「家」。在陳映真的理想遭受巨大打擊時，他的父親如此叮嚀：「追求世上的正義，不能忘記人原有的軟弱，不能失去靈魂的潔白……」（〈父親〉，洪範版散文集1：頁145），我相信他的父親讓初嘗巨大挫敗的陳映真不那麼容易地頹喪、沒有在長年的牢獄生涯中陷入一直存在於他心底的巨大虛無，沒有成為一位「墮落幹」<sup>8</sup>。

## 一個喪父的世代

陳映真自己的父親不但是他小說中絕無僅有的，更是我在情感、

8 墮落幹（日音darakan）源自三〇年代的日本，意指公開背棄自己思想的左翼知識分子、政治人士（〈父親〉，洪範版散文集1：頁144）。



經驗上所陌生的。或許能大膽一點說：對建立於歷史廢墟中的「家」存在的一股疏離感、使人容易從理想跌落至谷底的巨大頹廢與虛無，都是台灣社會不知從何時延續下來的一代精神特徵。如同小說中的多對父子，時代的巨輪同樣也在陳映真與其父親之間劃下無法抹滅的刻痕，但陳映真終究沒有走向他筆下人物的悲劇結局。若原因之一在於陳映真的父親，那麼陳映真本人與其筆下人物的差異之處又在哪？

在我看來，陳映真在面對其父親時，總帶著一種相當特殊的情感，茲引〈父親〉裡的一段文字說明：

我一個人默默地目送著一直不曾回頭的父親的背影，消失在鐵道轉彎處一叢漂亮的相思樹影。我深深地向著我的養家父母，是由於他們對我百般疼愛。生家對我的招喚，卻是骨肉的血潮。只有在像父親來到跟前時，那血潮才開始逐漸騷動。一等他走了，那骨血的波紋，也逐漸歸於寧靜。而在少小的我的心湖中，這寧靜的過程，往往也是一段刻骨的寂寞。而我便懷著那寂寞，凝望著父親在料峭的春寒中隱去。（〈父親〉，洪範版散文集1：頁138）

這一段描寫陳映真自身心境的文字看似尋常，細讀下又相當耐人尋味。無論是在父親前來探望時，於心湖中騷動起的「骨血的波紋」；還是幼小的陳映真懷著「刻骨的寂寞」，「凝望」著他父親遠去的背影——這些意象非但極少在小說中出現，更顯得有些超齡。其中我尤為在意陳映真面對父親（或許亦是面對家—國—歷史）所感到的「寂寞」——相較之下，為什麼我在閱讀〈趙南棟〉時，從趙南棟身上感到的是虛無而非為寂寞呢？此外，縱使陳映真懷著那樣的「刻骨的寂寞」，最後卻不是背離（甚或是切割、唾棄）父親，而是走向並理解父親（—歷史—中國）。這不禁讓我想到當今的左翼分子，是否也多少懷

著那難耐的「刻骨的寂寞」，饑渴地從西方知識中汲取能量、從草根社會運動中尋找烏托邦的可能，以及從連結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相同處境的朋友中得證「其實我們並不寂寞」？但或許在夜深人靜時，那「骨肉的血潮」又會如夢魘般騷動起來。

我企圖由陳映真的小說以及自身經驗指出：由於怎樣複雜難解的歷史因素，無論是趙爾平、趙南棟、我的父母、老師輩乃至於我自己，都成為擁有這樣精神特徵的「喪父」的世代。「喪父」作為一種情感經驗的概括，或許會比以往在台灣語境下常常被使用的「棄子」比喻更加貼切——棄子還知道誰是生父，無論是欲切割還是認同都有清楚的對象；縱使內涵空洞貧乏，也不能不說是擁有強烈「主體性」的。相對於「棄子」，「喪父」之感更意味著一種道標的喪失感，是對過去或現在的自己在認識上的無能，也是對未來的茫然，既是趙爾平又是趙南棟。<sup>9</sup>

這種不知所措的虛無感也自社會衍生到了家庭內部：我的父母輩年輕時多少帶有反叛的氣息，一如陳映真會議上的左翼中年，他們年輕時身處的社會瀰漫著一股亟欲破殼而出的氣氛，無論是對民主自由的渴望還是實踐的動力，但這些於今日卻令我感到陌生。如同今日仍在各個場域活躍的左翼中年，似乎沒有一個符合陳映真本人的父親形象，反之往往帶有一股反叛不羈的青春氣息。然而，除了這些仍然堅持自己理想道路，至今已然邁入中年的左翼分子們外，有多少人在經歷了狂飆般的青春後，又迅速地屈從於「現實」？又有多少人被那「至大、無告的頹廢」所擊垮，以至自毀而亡？

究竟是從何時開始，我們變得既「現實」又相當「反現實」；我們在

9 本文的隱藏企圖為：或許「喪父」可以作為重新思考台灣左翼知識界以及兩岸歷史因緣的不同參照。然由於作者本身的能力限制，無法在此篇文章中進一步處理「喪父」與現實政治的關係。

年輕時可以為了理想盡情燃燒青春，在未及初老之時又如此迅速地恢復世故；我們能以「理性」並保有「批判距離」的姿態批評台灣社會的腐敗、中國的落後與美國帝國主義於世界各地種下的惡果，卻總是無法誠實面對自己的血脈與家……。

2010年11月2日 台北

# 討論與對話

賴鼎銘 主持

吳欣潔、林家瑄、蘇淑芬 錄音整理

**賴鼎銘** | 我自己這兩天會議聽下來有幾個想法，如趙剛論文裡提及的左翼主體根本無法重建怎麼辦？尤其在整個資本主義的大結構下，我們要怎麼發揮能動性？比較嚴肅的問題是，如何從思想的左翼、邁向行動的左翼。我常聽人提及目前台灣的高等教育，已變成「資本主義的精神，社會主義的體制」，包括整個總量的管制、學費的管制，任何事情都要經過教育部的通過，面對這整個大結構，其實我也自問，該怎麼樣來改變？

**呂正惠** | 剛剛孫歌講到拉斯基——我就幫在座的陳明忠先生講話，因為他不善於發言——陳明忠在監獄裡面也看到中國革命的困難，陳映真也這麼問過：「如果中國革命墮落了之後怎麼辦？」所以其實他們都看到這個問題，也去重新思考這個問題，然後也去讀列寧、讀日本的學者，結果結論跟拉斯基差不多：落後國家只有這條路，沒有第二條路。

**蔣淑貞** | 接著剛剛的問題，如果從歷史上分析的話是很有道理的，因為社會主義實踐和資本主義實踐，實際上都是在現代化，也就是20世紀以來工業化的過程。但我的問題是，這樣的情況是不是只適用於地

理面積和人口總數都比較大的國家？而第三世界，在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上基本上比較小的國家，就變成了蘇聯的衛星國？！如果我們這樣去理解的話，那就好像最近有大陸學者討論中國有特殊的、自己一貫獨立的主體信仰，好像其他國家都沒有一樣；那麼是不是說，第三世界人口比較少，哪怕你在非洲地域比較廣闊，或者其他地方的，國土面積也很小的這樣的國家，根本就沒有希望建立自己的主體性格？我覺得如果從這角度看，不論拉斯基還是陳映真的立場，都還有值得商榷的必要。

**汪立峽** | 剛剛的討論可能有一個參考點，就是古巴，它可能更好解答。古巴是社會主義也是一黨執政，古巴和中國大陸有什麼不一樣呢？為什麼大家要占領古巴？這也是可以去思考的問題。

**與會者** | 我覺得日前《文訊》辦的會議，基本上是比较用右派的文學觀點去討論陳映真的小說，也是比較文學性的，不同於這兩天的會議聽到非常多大陸學者的意見交流，也覺得是比較進入思想和政治性的討論——王曉明老師也說，他提前拉到這方面的問題。假如說這個會議的討論，有一些交換的火花或光點，我覺得對於台灣和中國的未來，尤其是和平發展的未來，就具有意義——文學外的意義。尤其是我看兩位學生的反應和說法，就體認到為何當初魯迅要棄醫從文——陳映真的小說居然超越政治理論或是經濟理論，影響了兩位學生——這也是孫歌老師說的文學的包含性，所以在這一點上，陳映真和魯迅就有一個非常相通的地方。當然這也是在台灣的現況中，必須以這樣的方式所取得比較好的效果。第二點，孫歌老師用拉斯基的觀點，從日本學者丸山真男來看拉斯基的結果，來解釋今日中國，我覺得等於可以解釋說今天中國用「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這樣的實

踐、檢驗真理的過程，也可以說明拉斯基理論的階段性。基本上我也覺得拉斯基的說法，可以讓自由主義者或是社會主義者，找到一個共通點：就是所謂經濟以外，我們還有文化的問題。國家不只有武力跟經濟，文化才是一個偉大的說服力。可是如果今天要用拉斯基的理論來解釋社會主義的正當性，我覺得它只是一個部分，還要從文化層面去說出一個更有說服力的道理。譬如面對美國華爾街的金融風暴，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有些人提出一個理路，一般來講，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外文系的事情，中文系也應該有一套理論，從我們中國傳統管仲的輕重理論，還有法家的理論，提出今天社會主義的正當性。

**賴鼎銘** | 我曾經問過北大的校長：「大陸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嗎？為什麼大陸的學費那麼貴？以他們的生活水準來講，不是可以付得出來的，這是非常矛盾的。」

**汪立峽** | 這問題不好回答，但你不能一口說它左資，也不能說它是原來的社會主義。

**陳光興** | 我不是很知道要怎麼樣問我的問題，因為很多困擾跟這次寫的論文有關，特別是要向施淑老師提出來的問題。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我不知道趙剛的經驗是怎麼樣——我們受的訓練跟文學沒什麼關係，然後要去研究文學，其實是戰戰兢兢的，然後又碰到其實我們不太懂的問題：「什麼叫寫實主義和現代主義論戰？」

我知道有一長串的辯論，可是其實我自己沒有能力進入論戰的內在性。對我來講，我沒有能力從文學史的出發點——不像施淑老師她幾十年捲在裡面——反而沒有那個能力去體會。所以這一直就會有一個困擾——有點賴皮的問問題方式——這個問題為什麼重要？因為陳

映真這些人在不停地回應這些問題，對他們來講在創作過程中，他有一些實際的、真實存在的一些歷史問題，就是當有人說你這是現代主義或是什麼的，他們必須要去回應；但同時我一直要告訴自己說，陳映真講的話不重要，他為了現實主義辯論，有一點點像是白樂晴先生做的事也是，民族文學會親近於現實、寫實主義的這一套東西。可是假如我們把朱天心昨天講的這些話，重新把它搬回檯面來，我們應該先不要堵住陳映真的嘴，也就是對於創作的人來講，不是這樣想問題的，不是照表操課的！

另外一個層次，對於我們作為閱讀的人，我們不是這樣操作的，也不是這樣去理解的，反而是因為有感動，而不管是不是現實主義——我相信林思晴、陳幼唐他們也不管什麼是現實主義、什麼不現實主義。也因為最常聽到說：陳映真最讓人感動的，不是他的現實主義，而是他的現代主義等等這類的話，所以對我來講，困擾就是這樣的一個、可是又沒有能力進入文學史、文學內部的辯論。這個東西牽扯到很多連在一起的東西，就是孫歌所談的文學和歷史的問題。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困擾，就是研究者或是思想知識工作者，沒有那個能力可以進入那種精神、真實的在歷史狀態中存在的精神層面，反而文學提供了這一些東西。

當然，那意味著我們其實也有問題，知識弄到後來，沒有能力處理精神問題在歷史過程中產生的作用，那我們到底在搞什麼知識啊？而我們又知道，陳映真的思想和文學是不能這樣分的！所以弄到後來很亂，換言之，把它當成一種表達他思想的一種媒介，到後來真實狀況就變成大家企圖用分析的去釐清，他的什麼作為思想的陳映真，什麼是文學的和政治活動的陳映真。可是把他丟回真實的過程中，沒有辦法作分析上的區分，得要回歸到真實的歷史過程——譬如也有人提出陳映真的政治介入有他的美學形式，所以你也不能不管這個層

面——我只是拋出來這一些困擾。作為寫論文的人，或者是知識生產論文的人，我相信我們的論文到學界裡面是不及格的，因為規格不合、不是制式化的，也搞不清楚我們在哪個學科內部對話（講白的是沒有），可是到了很多空間裡面去卻又被制度化。我不知道施淑老師跟孫歌，或者是其他的人有什麼可以介入的方式。

**施淑** | 兩天的會議，起碼有四個甚至於六個面向，我真的是已經被搞得支離破碎了！我盡量在文學方面所謂的專業可以講一點——可是陳映真好像一隻八腳章魚，有很多領域——如果要看陳映真的文學的話，必須要從他的政治思想、社會、還有他很根本的宗教面向來看，這樣才能把一個陳映真的文學給講出來。

另外我講點關於鄭鴻生的那篇論文，雖然中間有一段時間我不在台灣，不過六〇年代是剛開始要有點社會實踐的時間點，比方說我們聽披頭四的歌，我想那個應該是實踐吧！儘管那個是外來的，是熱門音樂，可是不管怎樣，那個總是作為一種反抗的姿態；那個反抗，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積極的作用先不講，但就作為一個異端，也算是一種實踐、反抗。

這個會議其他的論文和那些政治的面向是我完全沒有能力講的——而且把我搞得，真的，我都不知道陳映真在何方。現在僅僅能夠講的一點是有關作為小說家的陳映真。我熟悉的是1968年以前，1968年以後我一樣讀，可是呢，就像有的同學說1968年以前的陳映真，閱讀它的時候是一種意義方面的，或者心智方面的冒險，因為你不知道那個人物，下一個瞬間他的心理轉折會是怎麼樣。但是，出獄以後的陳映真，他的東西開始讀了，人物都出來了以後，我們大概就知道結果會是怎樣。

而講到陳映真免不了就提到他對台灣現代主義可以說是「深惡痛



絕」，因為他覺得台灣的環境沒有發生現代主義的可能，如果要按照西方現代主義發生的邏輯來看，那確實是。可是，台灣還有中國大陸的文學，大概也都是經過西方的影響，比方從五四開始，文學的形式到內容都有外來的，而且是相當強勢性的影響，而台灣的情況更是，因為日本人帶進來了所謂的日本的現代化等等，就開始有了現代文學。當然現代主義跟現代化，剛好就是一個對立的觀念，如果用一般都認為很經典的解釋，就是盧卡奇的《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裡認為現代主義都是個人的、非理性的、往內心發掘的等等。所以儘管陳映真1968年以前，我們認為他最具有文學魅力的那一些作品，我卻覺得好像就是盧卡奇要指責的面向——很奇妙，我這一代被他魅惑，然後我們的學生還隔代遺傳的樣子——也覺得那是陳映真文學裡頭從藝術來講，可以給最多的思考跟討論的作品。

接下來就要回應陳光興——他好像很沒有自信，似乎他寫那篇論文不是他的專業領域——什麼叫做文學批評？變得好像是和哲學一樣，你的論述越雄辯滔滔，那就是文學批評。我經常看同學的論文，常常引述了一大堆的理論，甚至把概念當成形容詞，他根本就不知道那個批評的概念、觀念本身的脈絡是怎樣，但是他就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形容詞那樣，去經營他的論述。我覺得台灣的文學批評，從新批評以後，真的是一個理論的重災區。當然有很多學養很好的學者，他們可以像我講的像哲學的論辯一樣雄辯滔滔；可是同學不是，容易把那些概念當作是形容詞點綴起來。所以我想，這樣的話就不要去管什麼現代主義、現實主義，那會變得真的只是學理的方式。因為這兩天會議的轟炸，我沒有辦法講得很細，但是最後我還是要講，不管是1968年以前的陳映真，或是1975年以後的陳映真，他一定是台灣心靈災難的一個文學方面——特別是1968年以前——和絕對是白色恐怖唯一的報信人。我們應該不只是受感動，應該要用感激的心跟態度，去接受他。

**賴鼎銘** | 其實我也是想假裝回應光興的問題。我蠻喜歡跟光興的團體在一起，是因為有點不大正常。因為這個社會正常的人太多啦！我最近每天都在聽John Nash的“Brilliant Madness”因為他到最後有點發瘋了。他說所謂的正常，其實就是被conform了，必須要conform這個社會的rule。可是我們知道，從小我們就在追逐社會給我們的東西，等到這個年紀卻想打破東西；我覺得打破的感覺非常好——比如說我們用質化去討論量化、研討會去挑戰SSCI——像今天有個名詞叫「跨界」，我覺得很好。如果文學批評搞得變成形式主義的話，就不太有靈魂了，看文章會感動，是因為有靈魂跟精神在那裡。維根斯坦《哲學研究》的那些文章，都是心得、片語，他想到什麼就寫下來，編成一本書，但如果用現在的學術標準來講，一定沒有辦法出版，可是人家說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所以光興不要那麼沒信心！因為我覺得你在寫這個東西的時候，好像在自我診斷跟治療……

**王曉明** | 我一直記得兩位同學的發言，剛才陳幼唐有一個比較好的問題就是說，你讀陳映真有開心也有不開心，我當時聽到妳說不開心，我以為妳會說陳映真不瞭解我們，我們不是陳映真寫的那個樣子；後來妳解釋，（也許我理解錯誤）妳的不開心好像是因為陳映真沒有寫出自己。所以我在想，這個問題也包含問這裡的其他同學，對於陳映真寫出趙南棟這樣的形象，你們覺得有沒有真的把我們寫到位？或者我們有自己另外的理解，或者認為有別的作家寫得比陳映真更好！有沒有這樣的感受？我不知道對不對，所以我請教這個問題。

**趙剛** | 回應剛才孫歌講到陳映真的小說跟我們的思想之間的關係。我自己讀陳映真小說的經驗，1968年之前的早期小說，一般被大家認為是比較懸疑、曖昧、晦澀，很難懂，多是一些心理的過程、心理的

轉變、人格的複雜。不可否認，大家都是有這樣的經驗，我自己也是，這個感覺是很突出的。但是，我們讀的過程有很尖銳的一個心得就是，陳映真幾乎早期的小說不管是多麼晦澀，都是能夠讓你對於那時候的歷史和社會能夠進行理解，也就是在這樣一個試金石上頭，容我很粗暴的說：陳映真應該不是我們一般所理解的現代主義吧！基本上現代主義跟寫實主義的辯論我沒興趣，但是我想說假如現代主義也有特質，我覺得是現代主義也沒問題，只是我瞭解一般現代主義好像不太允諾這樣的價值，就是說一個小說創作它不會讓你對那個歷史、社會進行理解，它只是讓你對一種抽象的、去脈絡化的、人的一種狀態，進行一個非常繁複的令人頭腦爆炸的複雜感觸，這是我的感覺。所以說，實際上陳映真的早期小說或是他的全部小說，我覺得那是一個最真實的歷史。孫歌她也講說陳映真的小說所處理的那個時代、人，那種真實性，遠遠地不是各種學術論文，甚至傳記、回憶錄能提供的。那些東西會切割掉一個人的整體的、很重要的部分：一個時代裡頭很多的秘密。就我論文裡面講的，舉例來說，切割掉性的部分，對不對？陳映真他作為一個很整體的左翼青年所面臨的整個整體感觸，他在小說裡是非常誠實地展現出來。假如這樣說的話，小說實際上比歷史更真實。（當然有人說詩是最真實的——我不懂詩，也很難在台灣的現代詩裡頭，得到一些什麼真實感。）但是，既然陳映真的小說是那麼具有真實感，甚至比歷史寫作、論文、資料還具有某種真實性，那麼，孫歌的一個結論，我認為我能理解，但是我們是不是能超越那種方法、限制？因為妳剛才是說我們是不是只能把陳映真的真實，以一種我們對於歷史、社會的啟發，作為一種啟發工具讓我們感受到真實；但是我們真正要去書寫歷史的話，還得要遵照我們本行的行規。這意思好像是說，陳映真他是最真實的歷史，卻只把他當成一個啟發，當我們真正要去寫歷史的時候，卻要借助不那麼真實的歷史

素材。這是不是有點利用陳映真？或者換句話說，這邏輯上的矛盾就是，陳映真假如最真實，為什麼不能用在書寫歷史上？也就是，最真實的反而不能當成一個正當化的素材來使用，反而還是得去接受、去使用我們一般而言史學界的史料。文學為什麼不能當作歷史？當然很多文學不能當成歷史，但是，我們很直觀的感觸是陳映真的文學是歷史。因為他寫的東西都不是亂寫的，而且小說中的各種情節，真的能夠讓我們感受到活生生的、血肉感覺的歷史感。我讀陳映真回憶錄裡頭的六〇年代小說《六月裡的玫瑰花》，他馬上就喚起我六〇年代初的記憶——我住在台北內湖的郊區，要到市區都要經過一條路叫中山北路，六〇年代初美國大兵在中北山路整個的活動，然後台灣在打越戰時整個中山北路的躁鬱，像一個情慾、不正常的一個壓抑的社會一樣，然後威權的（因為中山北路有憲兵，而大公司的資本家又向蔣介石每天經過的車隊，在大看板上面寫著：工業報國）——整個時代景況……陳映真的小說完全就是我青少年的回憶，我覺得陳映真的小說完完全全、真實地作為歷史存在。

**林思晴** | 我覺得陳映真是被我們選出來的歷史，他講的故事是我們可以接受的。我在想，到底誰可以寫出歷史的氛圍？誰又可以代表整個時代？每個人的認同都是不一定的。我選陳映真是我認同他講的東西，要真正寫出我們的歷史可能還需要等一段時間去沈澱，然後回頭再去看。目前我還不能講出誰寫得最可以代表我心目中的歷史。

**陳幼唐** | 關於王曉明老師的問題，我有點迂迴的回答。第一個，目前看到的對於台灣比較有批判性、全面性的作品，大概我看到的只有陳映真，沒有看到別人，所以我能透過陳映真來想像自己；第二點就是在座各位所謂的左翼知識分子，有很長一段時間是消失不見的、從來

沒有出現過，今天終於齊聚一堂。我的生活過得其實就是一個斷裂，長輩們一直跟我說要做什麼，然後突然有一天發現對我們有一個批評叫做：「你們沒有社會關懷、沒有社會意識」，但是也沒有人教。現在社會上其實也就是這樣。我雖然不能直接回答王曉明老師，但是難道我們不能提出認為陳映真寫趙南棟寫得不夠好？這不能代表我們的問題嗎？另外，雖然不是我的觀點，但是我可以提供一個新時代青年的觀點給王曉明老師參考。現在有一掛覺得自己繼承了左翼影響的知識小青年，他們會否定、不滿陳映真如此，覺得自己很有社會意識，會批評像呂正惠老師很在意的：「作為一個有國際主義理想的左翼知識青年，你們這些民族主義都是不夠左翼的！這是根本不需要的！」對於這樣的一批人，我們的回答其實也只能靠陳映真的小說理解他的歷史過程。所以我提供這個反面，讓王曉明老師知道現在青年有一個這樣的意見。

**孫歌** | 我剛才說得有一點簡單，所以趙剛有一點誤解。我覺得不僅僅是陳映真的小說，其實所有小說都有成為史料的資格，但問題是它必須先經過一道程序，也就是史料批判，必須放在它的同時代史裡面，梳理它和其他不同定位的史料之間的關係，才能作為史料來使用。這是歷史學最基本的規則，我認為這個規則還是有意義的。至於你提到該怎麼繼承陳映真這部分歷史的文學書寫，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到達的層面，是通過描述去體驗、想像那一段歷史，而這樣的想像的、真實的到達點，未必是真實狀況，但也未必需要真實。陳映真的小說傳達給我們的，是他對那一段歷史的體驗，而不是一個客觀描寫，這是不能混同的。我剛強調他的作品之所以有這麼大的感染力，是因為他不是客觀地記錄那段歷史，他是在體驗那段歷史。同時他給那種體驗打造形狀，而這種打造具有代表

性，所以有那麼多人有共鳴，這個其實是真正的藝術家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面，我覺得思想跟文學其實不必要分家。這是第一個層面。

我們還可以從陳映真的文學活動繼承的另一個層面就是：我們讓他的技術、他對歷史的體驗和感覺、他對同時代史的感覺跟技術，和我們自己對於同時代史的感覺跟技術發生一個對照關係。我認為把陳映真作為一個媒介，絕不是不尊重他。留在歷史裡面最重要的著作，其實它的真正功能都是媒介，因為所有照翻、照抄那樣地去傳承歷史，基本上那歷史不會被傳承。我個人希望把陳映真整個思想和文學活動作為一個媒介，來激活我自己的思想史研究。這裡邊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怎麼去理解我們的思想生產和現實之間，這樣斷裂的連接關係？我相信陳映真的文學世界會有一些暗示，我們必須自己去找、去體驗。「斷裂的連接」意思是所有的思想生產工作其實是無用之用，它不能直接拿來用，用了它，可能就基本上不再具有思想功能，當然也不是絕對的。這點我想可以跟白永瑞先生多交流，韓國文學和現實運動之間的連接，他們是最有經驗的。這個問題再往前推的話，接下來的問題其實是我最想和大家共享、也是我自己最苦惱的問題：我們怎麼處理我們在現實裡面的政治立場，和我們在思想生產領域裡面的知識立場之間的關係？它既不是對立的，又不是重合的，它的連接方式又不是直接的。

**陳福裕** | 剛才陳光興提出的問題、他的焦慮，是真實的焦慮，但其實沒有必要，因為除非你轉行。我們所有的認識活動都是為了客觀掌握真實，包含科學的認識活動在內，所有的認識活動跟藝術創造最大的差別恰恰就在這裡，所有的認識活動都是要把客觀世界片面化、抽象化，作出一個個概念的範疇，再經過這些概念更換之後，重新去再現真實這個整體，因此不可避免都是片面化。只有藝術的創造才能跳

脫，因為第一，藝術必須要有對象，這個對象又經常存在於日常生活裡；第二是剛才孫歌老師講到的，那種再現不是客觀的再現，是包含了主觀意識、批判精神在裡面，因此它才恰恰能夠去接近真實。陳映真的思想和文學是統一的，他思想上就是一個歷史主義者，因為透過他的主觀世界，他再現的真實絕對是具有歷史主義特徵的。

**范綱堉** | 我會接觸陳映真是因為一句話，施善繼先生講的：「〈我的弟弟康雄〉有誰還沒有讀過？」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嚇到了，「完蛋了，我還沒讀過！」所以我就打開家裡書架上那一本以《我的弟弟康雄》為名的第一冊小說開始看。誠如施淑老師說的，在做台灣文學史的研究時，很多人避開陳映真的小說，但是我必需很誠實的說，從〈麵攤〉到最後一部〈忠孝公園〉，34篇小說裡面，有24篇小說我是看不懂的，剩下的10篇是我感動到了，但是一知半解。其中的問題我個人覺得在於：第一，陳映真是個天才，台灣文學史上少見的天才之一，很多用字遣詞不是我們物欲飽足、思想貧弱的一代可以理解的。當然在歷史經驗的傳承上，我們也沒生活在白色恐怖的時代，所以要去理解那些東西是有點困難。第二，今天大會有一個題目叫「實踐」，東海大學有一個社團叫「人間文化工作坊」，這個工作坊很特殊的是，只要學校對學生有任何不公、不義的狀況，它都會挺身而出，可是我覺得這個工作坊在反對所謂東海大學資本主義體制下對學生不公、不義的事情來說，是非常薄弱的，都淪落為紙本的文書抗議，幾乎沒有具體在現實上的行動。今天我們怎麼面對左翼思想對年輕一代造成的斷裂，又該怎麼重新銜接？我想這是我們這一代該去反省、去想的。

**邱士杰** | 研究陳映真時，因果性好像很難去掌握。第一個是陳映真自己所歸納，他的小說跟論述之間的因果性，第二個是他自己所期待的



因果關係。所謂他自己所歸納的因果關係，就像剛才施淑老師講的，到底他自己的文學作品跟大陸三〇年代作品之間的關係有多深？又跟台灣自己本土的關係有多淺？他有他的說法，但我們看的時候未必是這個感覺。這在他的政論方面可以看得出來。比方說，他一直把他的社會性質論歸納到大陸三〇年代社會性質論戰的傳統，當然如果我們看他的社會性質論，會發現他其實是非常嚴格地遵守新民族主義論的邏輯，連用字遣詞跟排序都是。比如他絕對會講「半殖民地半封建」，而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陳映真為什麼會這麼精準？我認為是很嚴格地按毛澤東那種看法而來的，可是中間還是有個媒介，比方說媒介可能是八〇年代韓國社會構成原理論爭，或者是三〇年代日本資本主義論戰等等。這個東西陳映真先生也沒有講清楚，但我認為絕不能按照他的說法去理解他，而是還有很多我們可以去理解的空間。再來，他認為只要把台灣的社會性質搞清楚，就會促成台灣的社會變革，問題是，在三〇年代大陸社會性質論的邏輯被建構起來，大家都相信這一套，可是在台灣只有他相信這一套，所以那個因果關係是建立不起來的。我研究了台灣社會性質，並不代表大家都會和我一起進行社會變革的工作，除非今天台灣的社會科學界，大家都像他這樣想，論述才會產生因果關係，這是我得到的第一個感想。

第二個跟孫歌老師講的有關：他的這一切，最終還是為了解決台灣的問題。這裡面至少有三個點可以看。第一個是「內外有別」的問題。因為六四，還有陳映真訪大陸的事情，大家都提到可能陳映真覺得內外有別，可是這應該跟八〇年代初期陳映真不斷批評大陸這個事情連繫起來看；他為什麼那時候會這樣子？然後後面沒有這樣做？我覺得可能和台灣當時的環境有關，當時在台灣你作為一個中國人、批判中國的事情，我想不會有什麼問題，可是到了後來台獨出現之後，你要用中國人的身分，去批判中國的事情可能就會變得很奇怪。我想



這是大環境導致他沒有辦法那樣子做。然後接著說六四，我有一個疑問：「陳映真先生是不是希望有一個台灣人的六四觀點？」就像他有自己的文革觀點一樣？為什麼因為大陸那邊否定了文革，所以台灣人就不能對文革感到感動呢？

最後，提到陳映真是不是黨員的問題，我不知道大家提的黨是什麼黨？是中共嗎？如果是指這個，那當然不是，但是至少我知道陳映真是勞動黨員。陳映真是那種會在勞動黨員大會裡以中常委的身分坐在主席台上，向下面說：「請大家利用我。」他是這樣子的人。他翻譯過一首文藝的詩，聶魯達的《獻給黨》，最後一句大概是這樣：「因為我與黎明同在，所以我將堅不可摧。」我想不管是什麼黨，陳映真就是一個很有黨性的人。

**施嵩淵** | 剛才提到年輕人的疏離或是失去理想性的狀態，我想講事實上這不是只有年輕人自己要負責的。第一個要負責的是這個時代太混亂了，過去左翼知識青年的各位還有一個明顯的對抗對象，但我們這一代並沒有，而是資訊很混亂的狀況，所以這個時代要負起三分之一的責任；另外三分之一是在座各位的左翼的中老年；另外三分之一是現在年輕人自己要負責的。我提這個，是因為這代年輕人常常被講說很不負責任，被罵得很慘，但是我想說陳映真的小說裡一個很重要的特色是不管這些多麼罪惡的人，他都會帶著一種同情式的理解。希望各位對於台下的年輕人也能有這樣的理解。

**黃文情** | 我想回應兩位大學部的同學，我覺得他們講出我們的心聲。以趙南棟這個角色的描寫，我覺得太哲學化、誇張化，是一種哲學式的頹廢。誠如同學講的，我們會有很多感覺很頹廢的狀態，有可能那是一種保護；因為如果你太過於嚴肅，很容易讓自己燃燒殆盡。在這

個時代我們看到我們的長輩實在是墮落得太快；如果我們也燃燒得那麼快，後面要走長是很難的！我認為這個頹廢應該也是有正面積極的意義。

余帛燦 | 延續前面的發言，陳映真對他書中每一個人物都寄予最深刻的同情，而這個同情是基於對個人身分的同情？還是基於個人脫離掉那個身分的同情？陳映真在處理小說中人物的時候，比如馬正濤跟林德旺，他不是用「因為馬正濤是個漢奸，所以我們要同情他」或是「林德旺是一個失敗的小資產分子，所以我們要同情他」。他的同情是在小說角色的獨特的幸福與悲痛의 張力之間去理解他，而角色的特殊的幸福與悲痛之間的關係，來自於角色特殊的經驗。我發覺他在處理每個人問題的時候，會把這樣的關係先敘述清楚，才能使我們感動地去同情他。因此，從個人推到台灣社會，我認為陳映真的重點是在台灣社會上面，他不是要直接呈現台灣社會的普遍性，而是嘗試呈現出台灣社會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浪潮下的特殊性；但他同時能夠把這個特殊性背後的張力說清楚，也因此對於不同地方、台灣以外的人在某種意義上獲得一種普遍的感動，這和詩學理論上的「出入」很像，所謂「出入」就是在某個程度上面，當你了解了某個人、掌握了某種特殊性之後，就能夠在普遍的意義中感同另一個個體。



## 「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會議」的故事

陳光興

過去20年間，個人參與主辦的大小會議及活動不下幾十個，但是「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會議」是最曲折的，也花了最多的時間和精力。

坦白說，這個會議構思最早的時間點，已經不太記得了，是2004至2005年間在上海跟薛毅談起，主要動力是大陸對陳映真的思想基本上不理解，把他當成普通作家，薛毅很感興趣，我們就這樣開始推動了。好像是在2006年5月間，王曉明在上海大學辦了文化研究在各地歷史的討論會，我在上海多待了幾天，在住的公寓酒店的客廳裡，請來了陳思和、王安憶、薛毅及王曉明，算是第一次的籌備會議，「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是曉明的原始提案，準備2007年後半在上海開會，還開了好長一串名單，準備請來大陸當前最重要的一些作家參與；思和兄負責文學史的部分，安憶負責思想組，曉明負責作家及創作書寫問題，薛毅跟我負責打雜，推動會議前進——所以2009年的會議基本上按照了當初的格局進行，唯一不同的是作家場縮水。同時，薛毅還安排一起跟上海書店王為松先生見了面，談了會前出版陳映真6卷版，收集映真先生重要的小說、散文及雜文，預定2007年出版。忘了是在上海還是回台灣後，跟陳先生通了電話，彙報狀況，他初步同意了。

2006年暑假期間(大約8月間)，林載爵跟我跑了一趟北京，跟

陳映真與陳麗娜夫婦在他們臨時住的小旅館裡商量這件事，還記得映真先生很謙虛也很客氣地說，他的文學不但量少，品質也不值得這樣來討論，但是原則上支持我們的想法，載爵還提到在台灣出版完整的作品集，由聯經負責出版。回到台灣，我們還在淡水約了施淑、朱天心、呂正惠等人，一方面討論會議的事，一方面還談到要組成一個資料收集委員會，請施淑老師當召集人，以研究計畫的方式向台灣文學館申請專案，重新收集相關資料。還記得我去見了老友邱坤良，他那時在做文建會主委，請他幫忙，他很支持，還立刻交代台灣文學館要支持研究與出版。

比較清楚的記憶是，2006年9月以*Inter-Asia*刊物的名義在北京人民大學主辦華文地區、日本、韓國知識狀況會議，會後9月12日返台前，約了陳先生夫婦與好友賀照田及張釗維，在便於陳先生的蘇浙匯朝陽店中午飲茶，跟他們二位進一步報告會議組織及出版規劃狀況，同時跟賀照田討論三聯書店出版雜文集一事，跟釗維討論開會時能否製作出影像等等事宜。映真先生對朋友老邱(主委)表示感謝，但是對文建會表示有疑慮，主因是對於扁政權多有保留，還記得他用熟悉、客氣的口氣說：「光興兄，你知道我剩下的不多，只有這點了。」我體會的意思就是堅持僅存的名節。

返台後，9月19日收到了薛毅從上海發來的完整會議及出版計畫書，正式提案要在2007年10月在上海舉辦「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6年10月16日，傳來映真先生在北京二次中風的消息，經過一番波折，於是整個會議及出版的構想，最後，再努力後，被迫完全停擺。

雖然停擺，但是這件事像是幽靈一樣，沒有真正離開，過一陣子老是回來找我。還記得2006年11月，思和兄到政大客座，於是利用機會請他到清大演講，講的題目是「中國現代文學傳統中的陳映真」，在

沒有完整資料的情況下，他花了很大的力氣準備，演講當天講得很興奮，11月間已經冷了，他頭上冒煙，最後脫了外套講，聽眾聽得也很亢奮。（他在會議的講稿，就是在那時候打了底。）

到了2008年6月初，心意大致已定，決定要做完這件事。陳先生病了，會議在大陸開，幾乎不可能了，要開還是得搬回台灣，於是重新啟動會議規劃，根據上次經驗，將一切事情簡化，把會開好，最終目的就是要出一本研究陳映真的重要論文集。於是，找了林載爵與呂正惠組成籌備小組，會議組織重心由上海回到台灣來。

2009年2月過完年，開了一次台灣內部的籌備會後，跑了一趟北京跟那兒的朋友們確認，然後去了一趟上海，2月10日，在同一個酒店住房的客廳裡，跟曉明、安憶及薛毅（思和在香港講學，不在上海）研商，決定把原來的會議計畫做了些更動，繼續推進。

會務的推展持續進行，基本上順利，相關單位適時提供了贊助，我們也盡了力考慮不同的狀況，希望與會者都能按計畫成行。沒想到到了9、10月間，逐漸出現狀況，很奇怪，幾位與會者或是他們的家屬陸續發生身體狀況（包括我家白狼），議程於是得做調整。一天，一起負責會議的淑芬發信來說，該去廟裡拜拜祈福，我說也對，最後不知道她去拜了沒，我自己去了，祈求老天爺保護與會者及家人們平安。

開會的那兩天天氣都很糟，但是還是匯聚了很高的人氣，有趣的是參與會議的主力人口的年齡群是50歲以上跟30歲以下，於是會議奇特的變成了青年人聽老人講古的歷史空間——也許批判圈的承續就是這樣發生的，也許年輕一代能夠更沒有包袱的想去理解陳映真到底意味著什麼？

台灣的（左翼）批判圈，除了在政治社會運動的抗爭時碰面，很少會在「沒有迫切性」的公開場合中討論問題，這個會議成了「例外」，再加上設定超出台灣的知識框架——中國大陸、亞洲、第三世界，或許

為了照顧外來對台灣狀況不清楚的朋友，所以話得說的特別清楚，於是多種因素的碰撞反而形成了難得的對話空間，讓彼此之間過去沒有條件談的問題能夠公開出場，有些釐清了立場的差異，有些澄清了認知的差距，有些因此釋懷而重新開啟未來合作的空間。這些難能可貴的效應都不在會議原先的規劃之中，大概只有「陳映真」能夠創造這樣的契機，沒法複製，也就凸顯出批判圈長遠的問題。

體會比較深的是，長期生活在台灣以外的朋友們沒有我們的歷史包袱，丟開黨派立場，從他們自己關切的語境中進行分析，反而能夠更為「公平」地對待陳映真，打開很多我們沒有耐心也不願意理解的面向。越界的交互理解，迫使我們重新面對自己身上的偏見、盲點與限制，也只有在接受內外的激盪中才能走出不同的知識方式。

會後，我們逐步開始準備會議論文與討論修訂出版的工作。比較成形的一批文章2010年6月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8期，以專號的形式刊出，其他的文章經過與會朋友們陸續的修改完畢，最後呈現在本書，算是了結了階段性的心願。

但是故事還沒結束，看來短期內也不會結束，2010年9月底《台社》成立了學會，首次召開年會，東海大學社會所的博士生與台社同仁組成了一個大的panel，繼續討論陳映真，還醞釀要籌組歌友會。台社同仁趙剛更是活力四射，產出了多篇有質量的論文，分別發表在不同的刊物，專書也將於2011年秋天出版。2011年9月，《台社》將第二次以專號的方式發表更新的有關陳映真的研究。在此期間，台社同仁也分別在南京、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與研究機構，受邀演講陳映真相關的研究，並且得到熱烈的迴響；我個人也在2011年春天休假期間，在上海大學開課，跟上海地區的研究生們一起閱讀陳映真所有的文學作品，其中部分的博士生也在推動來台參加《台社》年會，發表她／他們對陳映真的初步研究成果，與台灣的研究生進行對話；台灣也有年

輕一代的批判分子在推進陳映真研究相關資料庫的建立。

總之，陳映真研究才剛起步，故事才剛剛開始，未來回頭來看，這個 2009 年的會議或許扮演了些許承先啟後的推進作用。





陳映真重要著作、作者簡介



## 陳映真重要著作

## 小說

- 〈麵攤〉1959年5月24日作。載1959年9月15日《筆匯》1卷5期。署名陳善。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1》。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1》。
- 〈我的弟弟康雄〉載1960年1月《筆匯》1卷9期。署名然而。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1》。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1》。
- 〈家〉載1960年3月《筆匯》1卷11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1》。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1》。
- 〈鄉村的教師〉載1960年8月《筆匯》2卷1期。署名許南村。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1》。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1》。
- 〈故鄉〉載1960年9月《筆匯》2卷2期。署名陳君木。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1》。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1》。
- 〈死者〉載1960年10月《筆匯》2卷3期。署名沈俊夫。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1》。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1》。
- 〈祖父和傘〉載1960年12月《筆匯》2卷5期。署名林炳培。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1》。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1》。
- 〈貓牠們的祖母〉載1961年1月《筆匯》2卷6期。署名陳秋彬。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1》。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1》。
- 〈那麼衰老的眼淚〉載1961年5月《筆匯》2卷7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1》。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1》。
- 〈加略人猶大的故事〉載1961年7月《筆匯》2卷9期。署名許南村。又載1975年1月6日《臺大文訊》，署名南村。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1》。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1》。
- 〈蘋果樹〉載1961年11月日《筆匯》2卷11、12期合刊本。署名陳根旺。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1》。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1》。
- 〈文書〉載1963年9月30日《現代文學》18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1》。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1》。
- 〈將軍族〉載1964年1月15日《現代文學》19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1》。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1》。
- 〈淒慘的無言的嘴〉載1964年6月30日《現代文學》21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1》。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1》。
- 〈一綠色之候鳥〉載1964年10月10日《現代文學》22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

- 2)。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2》。
- 〈獵人之死〉載1965年2月1日《現代文學》23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2》。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2》。
- 〈兀自照耀著的太陽〉載1965年7月1日《現代文學》25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2》。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2》。
- 〈哦！蘇珊娜〉（初載1963年3月香港《好望角》半月刊）載1966年9月《幼獅文藝》153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2》。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2》。
- 〈最後的夏日〉載1966年10月10日《文學季刊》1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2》。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2》。
- 〈唐倩的喜劇〉載1967年1月10日《文學季刊》2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2》。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2》。
- 〈第一件差事〉載1967年4月10日《文學季刊》3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2》。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2》。
- 〈六月裡的玫瑰花〉載1967年7月10日《文學季刊》4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3》。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3》。
- 〈永恒的大地〉約1966年作（1968年陳映真入獄後，友人代為發表）。載1970年2月《文學季刊》10期。署名秋彬。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3》。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3》。
- 〈某一個日午〉約1966年作。載1973年8月《文季》（季刊）1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3》。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3》。
- 〈賀大哥〉載1978年3月《雄獅美術》85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3》。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3》。
- 〈夜行貨車（華盛頓大樓之一）〉載1978年3月日《臺灣文藝》58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3》。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3》。
- 〈上班族的一日（華盛頓大樓之二）〉載1978年9月《雄獅美術》91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3》。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3》。
- 〈纍纍〉約1967年作（1968年陳映真入獄後，友人代為發表）。（初載1972年11月香港《四季》不定期刊物）載1979年11月《現代文學》復刊9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3》。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3》。
- 〈雲（華盛頓大樓之三）〉載1980年8月《台灣文藝》68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4》。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4》。
- 〈萬商帝君（華盛頓大樓之四）〉1982年11月15日作。載1982年12月日《現代文學》復刊

- 19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4》。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4》。
- 〈鈴璫花〉1983年3月20日作。載1983年4月《文季》(雙月刊)1卷1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5》。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5》。
- 〈山路〉1983年7月14日作。載1983年8月《文季》(雙月刊)1卷3期。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5》。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5》。
- 〈趙南棟〉載1987年6月5日《人間》20期。又載1987年6月《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節錄為〈趙爾平〉。收於1988年人間版《作品集5》。又收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5》。
- 〈歸鄉〉1999年5月作。載1999年9月22日至10月8日《聯合報》副刊。又載1999年人間出版社《喋啞的論爭》(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收於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6》。
- 〈夜霧〉2000年3月28日作，4月1日定稿。載2000年11月25日至12月5日《聯合報》副刊。又載2000年12月人間出版社《復現的星圖》。收於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6》。
- 〈忠孝公園〉2001年6月6日作，19日定稿。載2001年7月《聯合文學》。又載2001年8月人間出版社《那些年，我們在台灣……》。收於2001年洪範版《小說集6》。

### 著作、選集

- 《陳映真選集》1972年香港小草出版社，劉紹銘編。
- 《第一件差事》1975年10月遠景出版社。
- 《將軍族》1975年10月遠景出版社。(後在1976年初遭查禁)
- 《知識人的偏執》1976年12月遠行出版社，署名許南村。
- 《夜行貨車》1979年11月遠景出版社。
- 《雲：華盛頓大樓系列(一)》1983年2月遠景出版社。
- 《萬商帝君》1984年6月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
- 《山路》1984年9月遠景出版社。
- 《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1984年9月遠景出版社。
- 《陳映真小說選》1985年12月人間出版社，陳映真自選、插繪。(本書為紀念人間雜誌創刊收藏版，有序文並收錄：〈將軍族〉、〈唐倩的喜劇〉、〈第一件差事〉、〈夜行貨車〉、〈山路〉等五篇小說)
- 《趙南棟及陳映真短文集》(人間文叢1)1987年人間出版社。

### 人間出版社：作品集15卷

1998年4月1日、5月10日共出版「陳映真作品集」1-15卷：小說卷5冊、訪談卷2冊、隨筆卷1冊、序文及書評卷2卷、政論及批判卷3冊、論陳映真卷2冊。各卷均收錄出

版緣起、編輯體例、銘謝、總序、分卷序、分卷自序。

作者：陳映真

編輯委員會召集：高信疆

委員：姚一葦、尉天驄、葉石濤、王拓、詹宏志、李歐梵、鄭樹森

策劃：王拓

總校定：陳映真

作品集1——《我的弟弟康雄》(小說卷：1959至1964) | 1988年4月1日

〈論陳映真小說的三個階段〉(葉石濤撰序)、〈麵攤〉、〈我的弟弟康雄〉、〈家〉、〈鄉村的教師〉、〈故鄉〉、〈死者〉、〈祖父和傘〉、〈貓牠們的祖母〉、〈那麼衰老的眼淚〉、〈加略人猶大的故事〉、〈蘋果樹〉、〈文書〉、〈將軍族〉、〈淒慘的無言的嘴〉。

作品集2——《唐情的喜劇》(小說卷：1964至1967) | 1988年4月1日

〈一綠色之候鳥〉、〈獵人之死〉、〈兀自照耀著的太陽〉、〈哦！蘇珊娜〉、〈最後的夏日〉、〈唐情的喜劇〉、〈第一件差事〉。

作品集3——《上班族的一日》(小說卷：1967至1979) | 1988年4月1日人間出版社

〈六月裡的玫瑰花〉、〈永恒的大地〉、〈某一個日午〉、〈纍纍〉、〈賀大哥〉、〈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

作品集4——《萬商帝君》(小說卷：1980至1982) | 1988年4月1日

〈雲〉、〈萬商帝君〉。

作品集5——《鈴璫花》(小說卷：1983至1987) | 1988年4月1日

〈鈴璫花〉、〈山路〉、〈趙南棟〉、〈附錄：從浪漫的理想到冷靜的諷刺—尉天驄、齊益壽、高天生對談陳映真〉、〈三十年代文學的傳承者：談陳映真的小說〉、〈陳映真寫作年表〉。

作品集6——《思想的貧困》(訪談卷：人訪陳映真) | 1988年4月1日

〈最後的烏托邦主義者：簡論陳映真知識世界諸要素〉(南方朔撰序)、〈「思想的貧困」：自序〉；輯一訪問陳映真：〈論強權、人民和輕重〉(琳達·傑文撰)、〈寫作是一個思想批判和自我檢討的過程：訪陳映真〉(李瀛撰)、〈溫暖流過我欲泣的心：在愛荷華訪陳映真〉(蘇濟維撰)、〈陳映真的自白：文學思想及政治觀〉(韋名撰)、〈擁抱生活，關愛人間〉(姜郁華撰)、〈文學、政治、意識型態：專訪陳映真先生〉(鍾喬)、〈陳映真的自剖和反省〉(彥火)、〈「鄉土文學」論戰十週年的回顧：訪陳映真〉(《海峽》編輯撰)、〈由「出走」談起：映真對當今台灣教會之觀察與評言〉(康

來新、蘇南洲、彭海登合撰)、〈思想的貧困：訪陳映真〉(蔡源煌撰)、〈附錄：我的老友陳映真〉(邱勝男撰)、〈附錄：我所認識的陳映真〉(單培撰)；輯二陳映真對談：〈「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戴國輝與陳映真於愛荷華對談〉(戴國輝、陳映真對談)、〈台灣變革的底流：戴國輝、松永正義、陳映真對談〉。

作品集7 ——《石破天驚》(訪談卷：陳映真訪人) | 1988年4月1日

〈「石破天驚」：自序〉、〈悲觀中的樂觀：訪問許常惠、史惟亮〉、〈人與歷史：畫家吳耀忠訪問記〉、〈生之權利：王曉民和她的家庭—腦震盪後遺症患者家屬的苦難、愛心和希望的故事〉、〈感謝和給與：訪慕光盲人重建中心〉、〈美好的腳踪：謝緯醫生的一生〉、〈懷念蘭大弼醫師：「……因為我的心裡柔和謙卑」〉、〈模仿的文學和心靈的革命：訪問菲律賓作家阿奎拉〉、〈相機是令人悲傷的工具：日籍國際報導攝影家三留理男剪影〉、〈鍾楚紅：人、女人、演員〉、〈用舞蹈向「現代日本」叛變？：「白虎社」社長、企畫訪談錄〉、〈石破天驚：如果沒有顏文門和自立晚報，後世的人要怎樣看這一時代的報人和報業啊……〉、〈為弱小者代言：訪日籍報告攝影家樋口健二〉、〈「非理性」下的科技〉、〈台灣經濟發展的虛相與實相：訪劉進慶教授〉、〈速寫大陸作家：訪吳祖光、張賢亮、汪曾祺、古華〉。

作品集8 ——《鳶山》(隨筆卷) | 1988年4月1日

〈求真若渴、愛人如己：我的老師陳映真〉(蔣勳撰序)、〈「鳶山」自序〉、〈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期待一箇豐收的季節〉、〈知識人的偏執〉、〈斷交後的隨想〉、〈關於「十、三事件」〉、〈答友人間〉、〈潘曉的信所引起的一些隨想〉、〈中國的希望繫於國民的道德勇氣：讀劉青「沮喪的回憶與瞻望」後的一些隨想〉、〈關於中國文藝自由問題的幾些隨想〉、〈無盡的哀思：悼念徐復觀先生〉、〈思想的索忍尼辛與文學的索忍尼辛〉、〈中國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之比較〉、〈從江文也的遭遇談起〉、〈綠島的風聲和浪聲〉、〈打起精神，英勇地活下去吧！：懷念繫獄逾三十年的友人林書揚和李金木〉、〈大眾消費社會和當前台灣文學的諸問題〉、〈大眾消費時代的文學家和文學〉、〈「學院理想主義」的憂鬱：從臺大學生會主席吳叡人辭職事件談起〉、〈醫學和文學上的幾個共同思考〉、〈關於中共文藝自由化的隨想〉、〈《人間》雜誌發刊辭：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兩鬢開始佈霜〉、〈從台灣都市青



少年崇日風尚說起〉、〈我們做的，還不夠〉、〈石飛仁的正義感與海峽兩岸之冷漠〉、〈人文思想雜誌的再生〉、〈科技教育的盲點〉、〈新種族〉、〈日本接觸：實相與虛相〉、〈高山：哭摯友吳耀忠〉、〈關於台灣文學的一島論：讀松永正義「八〇年代的台灣文學」書後〉、〈四十年來台灣文藝思潮之演變〉、〈肅穆的敬意〉、〈你所愛的美國生病了……〉、〈作為一個作家〉、〈歷史性的返鄉：送何文德與他的老兵返鄉探親團〉、〈悼念的方法〉、〈我們愛森林的朋友阿標〉。

作品集9 ——《鞭子和提燈》(自序和書評卷) | 1988年4月1日

〈三十年來的夥伴，三十年來的探索！〉(尉天聰撰序)、〈「鞭子和提燈」自序〉；輯一自序：〈試論陳映真：《第一件差事》、《將軍族》自序〉、〈鞭子和提燈：《知識人的偏執》自序〉、〈懷抱一盞隱約的燈火：遠景《第一件差事》四版自序〉、〈顛覆而困乏的腳踪：《夜行貨車》自序〉、〈企業下的異化：《雲》自序〉、〈一些「論爭」的參考構造：《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自序〉、〈凝視白色的五〇年代初葉：《山路》自序〉、〈一面嚴重歪扭的鏡子：《曲扭的鏡子》自序〉；輯二書評：〈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試評《亞細亞的孤兒》〉、〈原鄉的失落：試評《夾竹桃》〉、〈試評《打牛浦村》〉、〈青年的孤獨和悲哀：試評《再見，黃磚路》〉、〈再起台灣文學的藥石：讀陳虛谷的《榮歸》〉；輯三影評：〈日本軍閥的陰魂未散一評「日本最長的一日」〉、〈最牢固的磐石〉、〈自尊心和人道愛：電影「甘地傳」觀後的一些隨想〉、〈「侵略」和「侵略原史」：介紹森正孝先生批判日本侵略歷史的兩部傑出記錄影片〉、〈台灣第一部「第三世界電影」〉、〈電影思想的開放〉、〈從一部日片談起：論「聯合艦隊」〉、〈台灣內部的日本：再論日本戰爭電影「聯合艦隊」〉。

作品集10 ——《走出國境內的異國》(序文卷) | 1988年4月1日

〈理想論者的思想與歷史觀〉(詹宏志撰序)、〈試評「金水嬌」〉、〈台灣畫界三十年來的初春〉、〈「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試論蔣勳的詩〉、〈試論施善繼〉、〈不朽的冠冕〉、〈試論吳晟的詩〉、〈釣運的風化與愁結〉、〈千年古塚〉、〈不怕寂寞的獨行者高準〉、〈走出國境內的異國〉。

作品集11 ——《中國結》(政論及批評卷) | 1988年4月1日

〈重建台灣靈魂的工程師：論陳映真中國立場的歷史背景〉(王曉波撰)、〈迎接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政論及批判卷」自序〉、〈「鄉土文學」的盲

點)、〈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關懷的人生觀〉、〈在民族文學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台灣長老教會的歧路〉、〈致一群「自由人」〉、〈中國文學的一條廣大出路〉、〈思想的荒蕪〉、〈注視一件在逐漸株連擴大中的文字獄〉、〈讀七教授「坦白的建議」有感〉。

作品集 12 —《西川滿與台灣文學》(政論及批評卷) | 1988年5月10日

〈色情企業的政治經濟學基盤〉、〈路線思考的貧窮〉、〈向著更寬廣的歷史視野〉、〈為了民族的團結與和平〉、〈嚴守抗議者的倫理操守〉、〈追究「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西川滿與台灣文學〉、〈反諷的反諷〉、〈「鬼影子知識份子」和「轉向症候群」〉、〈台灣山地少數民族問題和黨外〉、〈建立真正獨立的產業工會〉、〈「炎黃子孫」靠那邊站〉、〈反對日本軍帝國主義復活〉、〈抗議日人藤尾正行來台〉、〈戒嚴體制和戒嚴體質〉、〈台灣勞工必須組織自己的政黨!〉、〈習以為常的荒謬〉。

作品集 13 —《美國統治下的台灣》(政論及批評卷) | 1988年5月10日

〈一個罪孽深重的帝國〉、〈美國統治下的台灣〉、〈世界體系下的「台灣自決論」〉、〈共同的探索〉、〈台灣的殖民地體質〉、〈「台灣」分離主義「知識份子的盲點」〉、〈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何以我不同意台灣分離主義〉、〈國家分裂結構下的民族主義〉、〈大眾傳播和民眾傳播〉、〈附錄：文藝、政治、歷史與香港〉(黃繼持撰)、〈附錄：反省吧！香港知識份子〉(馮偉才撰)、〈建設具有主體性的高雄文化〉、〈一九九八台灣文化新貌〉、〈民眾的中國和民眾的知識份子〉。

作品集 14 —《愛情的故事》(陳映真論卷) | 1988年5月10日

〈一個作家的迷失與成長〉(尉天聰)、〈愛情的故事〉(劉紹銘)、〈陳映真的小說〉(沙蕪)、〈試析「夜行貨車」〉(何欣)、〈偏執的真相〉(彭瑞金)、〈越戰後遺症〉(林梵)、〈尊嚴與資本機器的抗爭〉(詹宏志)、〈大時代的見證者〉(《前衛》編輯)、〈海峽東西第一人〉(徐復觀)、〈從辦公室到工廠〉(許達然)、〈縫合這一道傷口〉(宋冬陽)、〈試評陳映真的「第一件差事」〉(亞菁)、〈在破滅中瞭望新生的陳映真〉(高天生)、〈「美麗新世界」?〉(李黎)、〈試論陳映真在「萬商帝君」中的寫作意識〉(譚嘉)、〈讀陳映真的近期作品〉(沈濟)、〈陳映真早期小說的象徵意義〉(馮偉才)、〈走上未成熟的道路〉(何慰慈)、〈透心未來中國文學的一個可能性〉(松永正義)。

作品集 15 —《文學的思考者》(陳映真論卷) | 1988年5月10日

〈文學的思考者〉(詹宏志)、〈陳映真小說的寫實與浪漫〉(洪銘水)、〈陳映真的心路歷程〉(劉紹銘)、〈「山路」讀後隨想〉(錢江潮)、〈陳映真論〉(封組盛)、〈側寫的藝術〉(龍應台)、〈「華盛頓大樓」初探〉(武治純)、〈台灣文學的現實〉(岡崎郁子)、〈枷鎖上的斷痕〉(米樂山)、〈陳映真的沉思文學〉(羅賓遜)、〈從山村小鎮到華盛頓大樓〉(呂正惠)、〈憂鬱的台灣社會〉(吳璧雍)、〈歷史的夢魘〉(呂正惠)、〈中華雜誌與陳映真先生〉(胡秋原)。

### 洪範出版社：小說集6卷、散文集1卷

2001年10月、2004年9月共出版「陳映真小說集」1-6卷和「陳映真散文集」1卷。

小說集1 ——《我的弟弟康雄(1965至1964)》| 2001年10月

〈麵攤〉、〈我的弟弟康雄〉、〈家〉、〈鄉村的教師〉、〈故鄉〉、〈死者〉、〈祖父和傘〉、〈貓牠們的祖母〉、〈那麼衰老的眼淚〉、〈加略人猶大的故事〉、〈蘋果樹〉、〈文書：致羅忠畢業紀念〉、〈將軍族〉、〈淒慘的無言的嘴〉。

小說集2 ——《唐情的喜劇(1964至1967)》| 2001年10月洪範出版社

〈一綠色之候鳥〉、〈獵人之死〉、〈兀自照耀著的太陽〉、〈哦！蘇珊娜〉、〈最後的夏日〉、〈唐情的喜劇〉、〈第一件差事〉。

小說集3 ——《上班族的一日(1967至1979)》| 2001年10月

〈六月裡的玫瑰花〉、〈永恒的大地〉、〈某一個日午〉、〈賀大哥〉、〈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纍纍〉。

小說集4 ——《萬商帝君(1980至1982)》| 2001年10月

〈雲〉、〈萬商帝君〉。

小說集5 ——《鈴璫花(1983至1994)》| 2001年10月

〈鈴璫花〉、〈山路〉、〈趙南棟〉。

小說集6 ——《忠孝公園(1995至2001)》| 2001年10月

〈歸鄉〉、〈夜霧〉、〈忠孝公園〉。

散文集1 ——《父親》| 2004年9月

〈序〉、〈鞭子和提燈〉、〈綠島的風聲和浪聲〉、〈關於「十·三事件」〉、〈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鳶山：哭至友吳耀忠〉、〈祖祠〉、〈後街〉、〈安溪縣石盤頭：祖鄉紀行〉、〈十句話〉、〈評《中國不可以說不》論〉、〈一本小書的滄桑〉、〈黑松林的記憶〉、〈洶湧的孤獨：敬悼姚一葦先生〉、〈父親〉、〈宿命的寂寞：悼念戴國輝先生〉、〈記黃繼持先

生)、〈四十五年前的朱批〉、〈香港「天地」版選集《鈴璫花》序〉、〈懷想胡秋原先生〉、〈阿公〉、〈生死〉。

### 北京，三聯出版社：陳映真文選

2009年12月出版《陳映真文選》。薛毅編。簡體字版。

#### 輯一 —— 關於陳映真

〈試論陳映真：《第一件差事》、《將軍族》自序〉、〈關於陳映真〉、〈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魯迅與我：在日本《文明淺說》班的講話〉、〈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祖祠〉、〈父親〉、〈生死〉

#### 輯二 —— 鄉土文學論戰

〈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最牢固的磐石〉、〈知識人的偏執〉、〈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在民族文學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回顧鄉土文學論戰〉、〈向內戰·冷戰意識形態挑戰：七〇年代文學論爭在台灣文藝思潮上劃時代的意義〉、〈七〇年代黃春明小說中的新殖民主義批判意識：以《莎喲娜拉·再見》、《小寡婦》和《我愛瑪莉》為中心〉

#### 輯三 —— 分離主義的盲點

〈「鄉土文學」的盲點〉、〈原鄉的失落：試評《夾竹桃》〉、〈台灣長老教會的歧路〉、〈追究「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西川滿與台灣文學〉、〈美國統治下的台灣：天下沒有白喝的美國奶〉、〈從台灣都市青少年崇日風尚說起〉、〈從一部日片談起：論《聯合艦隊》〉、〈台灣內部的日本：再論日本戰爭電影《聯合艦隊》〉、〈「台灣」分離主義「知識分子的盲點」〉、〈精神的荒廢：張良澤皇民文學論的批評〉、〈被出賣的「皇軍」〉、〈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論「文學台獨」〉、〈警戒第二輪台灣「皇民文學」運動的圖謀——讀藤井省三《百年來的台灣文學》：批評的筆記〉

#### 輯四 —— 消費社會和文學問題

〈色情企業的政治經濟學基盤〉、〈大眾消費社會和當前台灣文學的諸問題〉、〈大眾消費時代的文學家和文學〉、〈《人間》雜誌發刊辭〉、〈新種族〉、〈大眾傳播和民眾傳播〉

#### 輯五 —— 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

〈中國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之比較〉、〈反諷的反諷：評《第三世界文學的

聯想》、〈「鬼影子知識分子」和「轉向症候群」：評漁父的發展理論〉、〈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同一個民族，共同的命運，共同的鬥爭：台灣新文學運動和「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聯繫〉、〈天高地厚：讀高行健先生受獎辭的隨想〉、〈中華文化和台灣文學〉、〈對我而言的「第三世界」〉、〈從台灣看《那兒》〉。

## 作者簡介(按筆畫順序排列)

王安憶——現任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專職作家，並兼任上海作家協會主席。著有《天香》(2011)、《上海女性》(2008)、《啟蒙時代》(2007)、《遍地梟雄》(2005)、《上種紅菱下種藕》(2002)、《富萍》(2000)、《長恨歌》(1996)。

王曉明——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紫江講座教授、《文藝理論研究》副主編、《中國學術》學術委員、TRACES執行編委、*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顧問。著有《文學經典與當代人生》(2008)、《思想與文學之間》(2004)、《半張臉：中國的「新意識形態」》(2003)、《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2001)；編有中國語言文學本科必讀書目》(2010)、《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2010)、《熱風學術(第四輯)》(2010)、《在「新意識形態」的籠罩下》(2000)。

王墨林——現任牯嶺街小劇場藝術總監、導演，曾經在《人間》報導文學雜誌擔任文字記者，長期關注小劇場、身體文化、表演藝術和前衛藝術等議題。他的藝術成就包括在北京推出台灣原住民希臘悲劇(TSOU伊底帕斯)，擔任編劇、聯合導演、策劃、製作等工作(1997)；受邀至日本、斯洛伐克、匈牙利、韓國參加國際行為藝術節，發表個人行為藝術作品(2002)；受邀赴北京參與「台港小劇場戲劇藝術展演」，演出《黑洞之外新版》(2003)；策劃製作：台、中、法前衛戲劇《敲天堂的門》(2006)等。著有《身體論》(2009)、《都市劇場與身體》(1992)、《後昭和的日本像》(1991)等。

白永瑞——任職於韓國延世大學歷史系，擔任《創作與批評》季刊主編以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委。著有《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2009)、《作為發現的東亞》(2000)；編有《東亞的地域秩序：從帝國到共同體》(2005)、《從周邊看到的東亞》(2004)。

朱天心——現任專職作家，曾經擔任族群聯盟發起人以及《三三集刊》主編。著有《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2010)、《獵人們》(2005)、《小說家的政治週記》(2001)、《二十二歲之前》(2001)、《漫遊者》(2000)、《古都》(1997)、《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992)、《時移事往》(1989)、《昨日當我年輕時》

(1981)、《方舟上的日子》(1977)、《擊壤歌：北一女三年記》(1977)等書；作品多次榮獲時報文學獎等多項文學獎，為台灣文壇上重要的作家。

呂正惠——現任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同時擔任人間出版社發行人。研究領域包含漢魏六朝詩、唐詩、現代小說、台灣文學。與大陸學者趙遐秋共同主編《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2002)；出版著作有《戰後台灣文學經驗》(2010)、《殖民地的傷痕：台灣文學問題》(2002)、《CD流浪記》(1999)、《文學經典與文化認同》(1995)、《杜甫與六朝詩人》(1989)、《抒情傳統與政治現實》(1989)、《小說與社會》(1988)等書。

松永正義——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客座教授、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東亞言語文化論專任教授。著有《台湾文学のおもしろさ》(2006)、《戦後台湾の「国語」問題》(2004)、《四〇年代後半期台湾文学研究の資料と視角》(2002)、《郷土文学論争(1930-1932)について》(1989)、《「中国意識」と「台湾意識」》(1989)、《近代文学形成の構図—政治小説の位置をめぐる—》(1981)、《台湾領有論の系譜—1874(明治7)年の台湾出兵を中心に—》(1978)。

林思晴——2009年清華大學人社系學生，現為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英培安——現為全職作家兼出版人、新加坡草根書店負責人，曾創辦《茶座》、《前衛》、《接觸》等雜誌。創作體裁有現代詩、雜文、小說劇本，擅長於寫雜文，常以敏捷的思路、簡潔的語言表達對世事的看法，著有詩集《手術台上》(1968)；散文《螞蟻唱歌》(1992)、《身不由己集》(1986)、《翻身碰頭集》(1985)等；小說《孤寂的臉》(1989)、《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1987)、《寄錯的郵件》(1985)；文藝評論《閱讀旅程，香港》(1997)。曾於2008年獲新加坡文學獎華文組首獎榮銜、2003年獲新加坡文化獎。

侯孝賢——為台灣電影導演，作品包括《紅氣球之旅》(2007)、《最好的時光》(2005)、《珈琲時光》(2003)、《南國再見·南國》(1996)、《好男好女》(1995)、《戲夢人生》(1993)、《悲情城市》(1989)、《戀戀風塵》(1986)、

《童年往事》(1985)、《風櫃來的人》(1983)、《兒子的大玩偶》(1983)等。除電影創作外，也參與社會運動，於2003年發起籌組族群平等聯盟以及參與台灣民主學校，並積極支持原住民運動，曾聲援反對三鶯部落拆遷、桃園縣撒烏瓦知部落與炭津部落住屋遭拆除等運動。

施 淑——曾任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現為榮譽教授。創作文類以論述為主，為當前研究中國新文學發展之主要學者之一。研究範圍為中國現代小說、臺灣文學、文學理論與批評。著有《兩岸文學論集》(1997)、《理想主義者的剪影》(1990)；編有《賴和小說集》(1994)、《日據時代台灣小說選》(1992)。

莊華興——任職於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外文系，並擔任大馬翻譯與創作協會秘書。研究方向包括馬華文學主體建構、馬來文學與國家話語、文學翻譯與文化生產、大馬華族文化思潮。以中文和馬來文創作、撰寫學術論文與翻譯。著有 *Cerpen Mahua dan Cerpen Melayu: Suatu Perbandingan* (馬華—馬來短篇小說比較研究)(2006)、《伊的故事：馬來新文學研究》(2005)等。

孫 歌——任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並擔任比較文學研究室副主任，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兼任教授，以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編委。著有《把握進入歷史的瞬間》(2010)、《文學的位置》(2009)、《竹內好的悖論》(2005)、《主體彌散的空間》(2002)、《亞洲意味著什麼》(2001)。

陳思和——現任復旦大學教授、人文學院副院長、中文系系主任，曾任《上海文學》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文藝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當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秋裏拾葉錄》(2005)、《中國現當代文學十五講》(2003)、《還原民間》(論文集，1997)、《中國新文學整體觀》(1987)等書；編有《世紀回眸人物系列》、《中國文化名人傳記叢書》、《火鳳凰文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書》、《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等大型叢書。

陳幼唐——2009年為清華大學人社系學生，現為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 陳光興——任職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同時負責亞太／文化研究室。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成員，*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執行主編。著有 *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2010)、《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2006)、《帝國之眼》(2003，韓文版)、《媒體／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逃逸路線》(1992)；編有《從西天到中土：印度新思潮讀本》(2010，與張頌仁、高士明合編)、《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2010，與白永瑞合編)、*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2007，與蔡明發合編)、《Partha Chatterjee 講座——發現政治社會：國家暴力、現代性與後殖民民主》(2000)等書。
- 陳明忠——在日據末期飽受日本同學欺凌，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開始抗日。台灣光復後，曾參與二二八事件，參加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並在攻打日月潭戰役中擔任突擊隊隊長；白色恐怖期間被捕入獄，判刑10年；1976年再度被捕，被控接受中國共產黨命令，在台陰謀叛亂，警備總部甚至以「為匪宣傳」判他死刑，後來在1988年獲得特赦出獄。現任夏潮聯合會名譽會長。著有《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2011)等。
- 崔末順——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並定期為韓國《釜山日報》撰稿，同時擔任韓國MBC文化放送電台的海外特約記者。著有〈韓國民族文學論的建構及其焦點：以白樂晴的民族文學論為中心〉(2008，《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69期)、〈皇民化時期台灣與韓國的戰爭動員體制和女性論述〉(2008, *Journal of Korean Culture*, 11)、〈韓國的現代性經驗與全球化時代的課題〉(2006,《當代》第226期)等論文著作。
- 賀照田——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曾任《學術思想評論》主編，同時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成員。著有《當代中國的知識感覺與觀念感覺》(2006)；編有《顛覆的行走：20世紀中國的知識與知識分子》(2004)、《在歷史的纏繞中解讀知識與思想》(2003)、《東亞現代性的曲折與展開》(2002)等書。
- 曾健民——現任文學評論者與執業醫生，並曾任《人間》雜誌思想創作叢刊主編、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計劃研究員。編著有《1949·國共內戰與台灣：台灣戰後體制的起源》(2009)、《1945破曉時刻

的台灣》(2005)、《文學二二八》(2004, 與藍博洲、橫地剛合編)等書。

趙剛——現任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同時也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委。學術上的核心關懷是激進民主, 一併關注社會運動、民族主義、多元文化與全球化等關連議題。著有《求索: 陳映真的文學之路》(2011)、《知識之錨》(2005)、《告別妒恨》(1998)、《小心國家族》(1994); 譯有《法國1968: 終結的開始》(1998)。

鄭鴻生——現任專職作家, 寫作主題包括其求學經歷, 其中所提及之左/右翼思想衝突、黨國威權、政治搜捕與自我掙扎等, 呈現當時白色恐怖陰影猶存之七〇年代台灣氛圍; 另一類作品以異國風光為主, 於其中體現個人感悟與文化觀察。著有《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2010)、《百年離亂: 兩岸斷裂歷史中的一些摸索》(2006)、《荒島遺事》(2005)、《踏著李奧帕德的足跡》(2002)、《青春之歌》(2001)。

錢理群——2009年為國科會講座教授, 台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歷史、思想與文化講座教授, 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現已退休。長期關注語文教育、西部農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和青年志願者運動, 同時從事現代民間思想史研究, 並持續關懷社會底層, 被譽為八〇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著有《知我者謂我心憂: 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至2008》(2009)、《我的回顧與反思》(2008)、《1948: 天地玄黃》(1998)、《拒絕遺忘: 1957年學研究筆記》(1999)、《走進當代的魯迅》(1999)、《拒絕遺忘: 錢理群文選》(1999)、《1948: 天地玄黃》、《精神的煉獄: 中國現代文學從「五四」到抗戰的歷程》(1996)、《周作人傳》(1990)、《心靈的探尋》(1988)、《豐富的痛苦: 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1993)等。

藍博洲——曾任職《人間》雜誌, 時報出版公司特約主編, 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 TVBS《台灣思想起》製作人, 現專事寫作。1983年開始寫小說。1985年以短篇小說〈喪逝〉獲時報文學獎。1989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旅行者》。2002年出版長篇小說《藤纏樹》, 獲當年《中國時報》年度十大好書獎、《聯合報》年度最佳書獎。著有《老紅帽》(2010)、

《青春戰鬥曲》(2007)、《二二八野百合》(2007)、《宋非我》(2006)、《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2005)、《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2004)、《紅色客家莊》(2004)、《紅色客家人》(2003)、《藤纏樹》(2002)、《麥浪歌詠隊》(2001)、《台灣好女人》(2001)等書。